

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锐

窑洞杂述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窑 洞 杂 述

李 锐

责任编辑：肖屏东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6,000　印张：10　印数：1—9,600

统一书号：11109·185　　定价：0.97元

前　记

辑录在本书中的四十几篇文章，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写的，内容主要是反映抗战中三种地区——解放区、国民党区和敌占区的某些侧面，曾先后发表在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这些文章如过眼烟云，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有一个原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在挨批斗的过程中，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刊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曾获大罪。大概解放后写的全部文章再也查不出什么毒草，于是被质问在延安写过什么，"放过什么毒"。当时根据记忆交了一份文章目录，并交待在延安用过的笔名（张昂、李亮公、孙元范、孙后礼、李候森、侯森等），请详查当年的《解放日报》和《中国青年》等。虽然由于工作关系，多年舞文弄墨，但问心无愧，不过尽了一个编辑、记者或岗位工作的职责而已。此种回顾，一方面觉得"平生文字难成狱"；另一方面，反而引起某种负气心理，何不索性编成一个集子，以示"文如其人"：我总算是一个从来不喜欢讲空话、讲大话的人。

事情过去二十年了。承湖南人民出版社不惜纸张，将这些过眼烟云的东西一一搜来，成书付印。除开文字上稍有修饰外，内容一仍其旧，以存史实。作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报道性、材料性的东西，能够对关心或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用处。

此外，有几篇是抗战前、解放战争时以及解放初写的，一并附在书内。所有各篇发表的报刊和日期，都附在篇末。

在延安都住窑洞，文章自然都是在窑洞中写的，因而命名《窑洞杂述》。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

晋察冀边区大部分处于山西与河北，此外还包括热、察、辽的南部。它是华北三大主要山区（北岳、太行、山东）之一，不仅可依靠北岳来支持平原，挺进东北，而且可以直接地西与晋绥（同蒲路为界）我军，南与太行、冀南（德石与正太两铁路为界）我军，东南与山东我军，取得配合与互相支援。这个区域共有一百零八县，二千五百万人口，包括三个伪政权：伪满、伪蒙和伪华北政委会。我们抗日政权，在北岳、冀中、平北、冀热辽四个独立行政区域下，设有十六个专署，共管一百零八县（其中有许多新设县治，除阜平一城数年苦战仍在我手外，其余县城均为敌所占）和一千八百三十多万人民。敌伪用于此区的兵力，据今年统计，有敌军九万人，伪华北治安军（及伪地方军）、伪满军、伪蒙军十万人，敌伪军共十九万人。敌伪建立据点达四千六百余处，公路二万七千余公里，封锁沟四百一十余公里。但尽管如此，敌人各重要铁路干线（平汉、津浦、同蒲之北段，以及平绥、北宁、平热、德石、正太等）和战略要点（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大同、万全、承德等），七年来仍无日不处于我严重威胁下。现在晋察冀和华北其他各地区一样，已经渡过了一九四一、四二年最困难、最严重的阶段，而进入日渐恢复与扩大的新时期。北线我军已挺进至察哈尔的多伦、热河的宁城、辽宁的锦州一带。

晋察冀边区之能雄峙敌后、日益巩固和扩大，是以巨大的代

价换来的，其代价是无法统计的劳力、苦难、牺牲和鲜血！现在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斗争的岁月吧。

建立的开端

八路军于“七七”事变出发时，毛泽东同志给予如下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在敌后牵制敌人，建立根据地，这样正面才能支持。因此，就准备派一部兵力挺进燕山山脉，深入敌后。但刚一出动，南口就失守了。随即接到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令，前往蔚县阻敌，途中蔚县又丢了。二战区又命赶到飞狐口（涞源与蔚县之间）阻敌，但师至太原，飞狐口又丢了。这时，敌人已全面逼近山西北部的国防工事，正拟突破平型关、雁门关。于是一一五师就迂回敌后，阻止南下敌人，九月二十五日在平型关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娘子关、太原、忻口形势吃紧时，八路军急往驰援，总部率我军主力，星夜离开五台南下。这一师的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同志，十月二十三日受命留守五台地区，创立第一个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根据地，所有的兵力是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和不完整的两个连，共二千人左右。十一月七日，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奉朱、彭总副司令之命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晋察冀三省边陲地带，这时处在极端混乱状态中。已熟的禾黍无人收割；平汉线上无数的难民逃出山村小镇；国民党大军沿着铁道公路向南飞跑，大炮、机枪、步枪到处丢弃；旧政权瓦解，土匪蜂起，几个日本浪人拿着日章旗，就可以随意占领县城。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继续多久。那两千人的队伍旋风一样向前推进，独立团很快成了威震雁北、察南一带的杨支队；骑兵营打开了冀西的游击区，政工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带着一连兵力，到处打击敌人；徒手的群众被带去打扫战场，被抛弃的枪弹重新找到

了它们最适当的主人。广大人民的情绪逐渐好转。但严重的问题是老百姓并没有从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如阜平的穷人还没有吃树叶的权利（树是地主的），于是地主与饥饿的农民被邀来一起谈判，农民才有了采树叶的权利。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个合法组织在边区每一个村落掀起了动员热潮，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动委会又暂时执行了地方政权的任务，认真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了苛捐杂税，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实行合理负担。但这还只是过渡的办法，组织起来的武装要打仗，要吃饭（十二月中，北岳四个军分区就有了一万二千多武装），三省的人民要互通有无，平汉路东西两侧的人民要求打成一片，大家渴望着一切有个统一的办法。这时候原来的行政人员，只有晋东北政治主任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在坚持政府工作，他们时常和聂司令见面，都赞成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开“民国”历史上新纪元的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揭幕于阜平城，边区行政委员会的组织和人选，随即得到国民党蒋委员长和行政院的批准。抗日的新秩序不到两个月就普遍建立起来了。

冀中方面，大军南撤之时，吕正操同志带领两个营向敌人后方挺进，摧毁了深泽、安国、任丘、河间、献县、安新、高阳等地的伪组织，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成立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署），山地与平原从此便联结起来。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二〇师的主力曾进入冀中，进行了有名的河间歼灭战，帮助了平原游击战的展开（一二〇师主力，后经过北岳区参加了陈旺、黄土岭等战役，于晋西事变时返回晋西北）。同年六月，宋邓支队挺进平北、冀东，七月九日在李运昌等同志领导下，爆发了冀东七县的抗日大起义，在十七个县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十月以后受到一些

挫折。一九三九年春肖克同志到平西组织挺进军，继续开展平北、冀东的游击战，冀东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丰玉一县募集子弹十九万发，蓟县捐枪二百余支，妇女和儿童几乎每人都捐赠一件礼物。辽阔的冀热辽边的抗日根据地从此建立起来。

第一次反围攻胜利

一九三八年春，敌人一个联队窜到涞源，我们新建立的部队就转到紫荆关至涞源交通线的两翼，不断袭击敌人的运输给养，将涞源城孤立起来。敌人驻扎了一个礼拜，不得已撤走了。为了配合津浦、晋南正面的战役，二月的一个夜晚，我军在平汉与津浦线上展开大破袭战，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清风店等城站，这几县的群众都参加了破路和搬运战利品。这是平型关一役以后的大胜利。为了进行"报复"，敌人调集了一万二千以上的兵力，四路向边区进攻，曲阳一路有五千多人，以飞机十多架掩护，配合千余骑兵，用猛烈炮火，向阜平扑来。一个黄昏，敌人从正面逼近了阜平的东郊。城内各机关和群众都按照指定的方向撤退，天快黑了，聂司令向最后离城的老乡说："我们暂时离开这里了，现在这是一座空城，我们不能让敌人得到半点东西。"敌人在野外停留了一夜，大炮向空城轰击到天明，第二天上午才进占阜平。但他们不敢继续深入，因为后路被切断了，其他各路配合的形势也已经完全被打乱了，当天夜间敌人就慌忙退出了这座空城，分三路逃奔一百多里。我们的追击部队，从两侧夹攻，猛追到曲阳地界，敌人只得爬上汽车再次逃跑。

整个边区游击战猛烈地展开着。游击队一直出现于北平的四郊，敌人吓得把城门都关了起来。敌寇汉奸的报纸于是战慄地叫喊："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等

地……之共产军，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各地皆属支蔓。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京。……日军决心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

敌人改变了战术，新的围攻与反围攻的战役开始了。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八路敌人，五万兵力，向五台区域围攻。我们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对抗敌人的围攻，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战线，而常于扑空之余，遭我痛击。于是从盂县出发深入到五台的敌人被我打垮了，阵亡了一个清水少将，敌人还抬棺“凯旋”五台城。不久，我军进行了战役的全面反攻，敌人共损失三千多人。关于这次战役，当时英政府曾来电向我外交部询问，外长王宠惠不得不答称：我军仍在华北敌后坚持，五台山根据地依然屹立。

“变落后村庄为进步村庄”

敌人第一次围攻边区，我们胜利了，但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的许多弱点：一年来，各方面的工作还不深入，许多区村政权仍为少数旧人员把持，村长村副中有许多流氓地痞，公正人士都还不愿出来负责。在敌人的围攻中，大部分的村政权都塌台了。因此，就提出了“把山沟小道落后的村庄变为进步的村庄”的口号，号召各村组织救亡室或民革室，以发扬民主，协助村政，同时着手改革村政权：将区划小，取消编村，取消旧的家长包办的邻闾制，建立村代表会与村公所各委员会，热烈地开展村选运动。在反围攻以前，由于多年受压迫，老百姓对民主参政是没有兴趣的。区村政权改造后，老百姓懂得了：“还是民主好，大家的事大家办。”“咱们选好人当村长，能替咱们办事。”一九三八年村选中，选民仅占公民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一九四〇年边区大选中，选民与公

民之比平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心地区县（如平山、灵寿等）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游击区的选举，成为团结一切抗日人民的群众运动。抗日民主政府的机构，由一九四三年一月的边区参议会最后完成。政府人员精简百分之五十，工作效率反而提高。“统一累进税”的实施，是政权组织工作中一个最大的成就，边区各阶层人民都认为这是一种极公平合理而又管理得很好的税制。村政权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七年来无休息地艰苦工作。例如某村庄联席会主席女干部郝秀金，她那个村子处于敌人三面包围，离堡垒只半里路，历年反“扫荡”、反蚕食，都是她领导群众转移，摧毁伪组织。去年敌人突然占领了这个村庄，夜里，天下着大雨，她还领着民兵冲进去，抢出了几万斤公粮，第二天又独自爬回村内带出文件。但是七年来，广大基层干部牺牲被捕的数目也是非常之大的。手头只有前五年（到一九四二年止）的一些材料：据已知的有三千七、八百个区以上的干部光荣牺牲或被捕了。村级干部当更不止此数。牺牲的干部中，无一不是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徐水县长刘萍被敌包围后，用枪打死了几个敌人；最后想自杀，枪弹已尽，因而被俘，敌寇汉奸先则利诱，继则加以无法形容的酷刑，刘县长却不曾有一个字的口供，他愤怒地宣布敌寇的罪状，绝食十天，光荣殉国。

大水灾的考验

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民主运动，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性与组织性，因此，经得起另一种大考验——一九三九年夏的大水灾。

一九三九年七月，淫雨为灾，河川泛滥，敌人在冀中决破了四处河堤，万里洪波，造成了数十年来边区未有的大灾。被毁良田不下十七万顷，被冲毁粮食不下六十万石，淹没的村庄一万多

（冀中占六千七百五十二村），人畜的伤亡也极严重。灾民三百万，真是哀鸿遍野！边区党政军尽一切力量克服水灾造成的困难。一九四〇年春，政府贷款三百万元，赈济一百余万元，种子借贷四千七百六十七石（仅北岳二十个县统计），耕畜补充牛六千九百二十一头（十四个县统计）……所有劳动力都参加了修滩组织。根据北岳区不完全统计，水灾前二十一县原有滩地十七万零四百二十七亩，被冲毁十四万七千六百二十六亩，修复了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五亩。边区子弟兵全体动员，日夜帮助人民修滩，挖大渠，垒石头。他们还每天节省些小米给老乡们吃。总计共帮助修滩十一万亩，帮助春耕十八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亩，开渠一百五十道（可浇地十万亩），掘井一百六十眼。难怪阜平的老乡一看到沙河沿岸的麦秀稻青，便念念不忘地说道："多亏教导团，不然三十年也修不起来。"冀中区敌寇决口一百八十五处，救灾中心就是治水，总计一九四〇年全冀中军民共修险工五十九处，筑堤三十三条（长五百二十八里），堵决口一百九十七处，浚河九道（长一百六十五里）。这些都是"民国"以来河北少有的大水利工程。因此，冀中不但克服了一九三九年大水灾的灾害，并且终于获得一九四〇年的丰收。

除开敌寇人为扩大的天灾之外，边区军民还经历了另一种灾难。武汉失守后，反共逆流开始增长。一九三八年冬，当敌寇大举进攻冀中的时候，张荫梧乘机到冀中"收复失地"，要"消灭八路军"，称八路军三纵队为"伪抗日军"。柴恩波在反"扫荡"中投敌，公开当了汉奸，而张荫梧反谓柴逆为"曲线救国"。这种亲痛仇快的行为，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九年夏，演出残杀抗战干部进攻抗日武装的悲痛事件。一九三九年十月，山西保安十区的白志沂率部包围广灵、灵丘县府，残杀抗日干部。涞源敌人攻陷走马驿，

灵丘敌人进扰南山，我军正迎头痛击敌人时，白志沂竟包抄我后路，终使敌寇乘机“扫荡”，大烧大杀，予雁北根据地以莫大损失。而白志沂却在敌“扫荡”中逃跑了。

百团大战之后

一九三八年敌人八路围攻失败后，三九年敌寇采取单刀直入，以相当优势兵力，一路深入袭击我中心地区（如灵寿陈庄及涞源黄土岭等役），结果为我造成大好歼灭战的机会。敌寇进攻陈庄的一个大队全部被消灭了。黄土岭之役，第一天敌人的一个大队遭我伏击，第二天旅团长阿部中将又亲自带一个大队出动“报复”，打了两天一晚，阿部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荒凉的山丘。敌人掩不住心头悲痛：“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经过这些打击之后，敌寇再不敢孤军深入了。一九四〇年起，敌人大量印发我们出的一些书籍，对我游击战及十年国内战争作全面研究。敌一一〇师团长桑木崇明建议普遍采用“碉堡政策”，实行所谓“极端分散配备”，企图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窒死我军。百团大战的时候，敌人的据点被拔掉了，铁路被破坏了。冀中的自卫队一夜之间将汽车路全部破坏。正太线动员了两万多民兵，编成五十一个大队。冀东曾动员八万多群众，把敌人在七、八个县内的公路、电线，破坏得干干净净。在封锁遵化县城二十五天中，城内敌人因燃料缺乏，门窗都拆毁烧了，最后并托伪组织人员，愿出款十余万元，要求我们解除封锁。

百团大战之役，使敌人狼狈不堪，从而认识了这个可怕的对手力量所在。于是重新加修堡垒工事，“用山炮试验是否能打”，同时改变战术，彻底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毁灭我人力、物力、财力。从此我根据地进入了最残酷最严重的坚持斗争的阶段。

一九四一年八月，敌酋冈村经过长期准备，对北岳实施所谓“铁壁包围”战术（纵深配备，各路挺进，层层紧缩围困，图歼灭我主力）。七万大军直扑边区，山沟小道无所不至，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扫荡”两个月，我虽遭受很大损失（被烧房屋十五万余间，损失粮食五千八百万斤，牲畜一万余头，被惨杀四千五百余人，被抓去东北作苦工同胞一万七千余人，牺牲与被捕干部六百多人……），但冈村不能不自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时间所能奏效”。这以后，又强调“高度之分散配备”，到处筑碉立堡，挖沟打墙，堡垒之密，几遍及各村（据点周围与铁路公路两旁，有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主要的道沟，宽深各二丈，有的且引河水灌入）。对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初则步步推进，计不得售，又以大军局部“扫荡”，以达其大块蚕食的目的（四二年对冀中的“扫荡”即属此种性质）。同时又进行“总力战”的“治安强化运动”，制造“无人区”，集注全力于人力、物力的掠夺毁灭，与进行可笑的“思想战”。一九四二年一年中，全边区人民被惨杀、毒打、逮捕、奸污者，为数当在十万人以上。我军民一方面展开反蚕食、反”扫荡”的尖锐斗争，虽一村一镇、一个山头、一道溪流、一亩地、一斗粮，敌寇如想夺取，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一九四二年五月，敌寇“扫荡”冀中，为争夺槁无县一个北候村，即曾死伤七百人。另一方面，同时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敌人企图压缩我，我们就将圈子扩大；敌人的头伸向根据地，尾巴便被斩断了。

民兵如何作战

没有民兵的广泛游击战，以及配合主力作战，所有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便无法取得胜利。起先有许多落后的群众是不大喜

欢民兵的，说民兵“惹祸”，后来这些人自己得到民兵的好处，才转变过来。自从民兵与生产结合后，发展就更快了。现在全边区的民兵已达六十三万。

战斗，打敌人，这是民兵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逢过年时，劫余的山村总是锣鼓喧天，到处有人抬着猪、羊、柿子、核桃去慰劳抗属和子弟兵；各地的敌伪军则忙着怎样来抢过年的食品，于是免不了有一场战斗。敌人快进村口了，村子里的人才在子弟兵和民兵的掩护下安然撤走。子弟兵在山头布置好阵地，民兵四面散布着，战斗就这样开始了。到处是声音：“××山头上有鬼子的机关枪”，“从这边打，这里有几个！”……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马翻人仰，看着没有办法抢到东西，要撤退了，老乡们就都跑了出来，大声呼叫“捉活的，捉活的！”孩子们也跳着、骂着。有的伪军气得向山上嚷嚷：“有种你们敢下来。”民兵就快乐地回答：“有种，你们敢上来。”接着，手榴弹便扔下去了。

这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反“扫荡”中大破袭战的日子。在完、唐、望三角地形的边缘，晚上，你可以听到平原道沟里的狗叫，和更远处火车的嘶鸣。但是，在同一时间里，跟这些声音遥相应和着的，是嗓杂的人声，是铁锹相击声。原来许多山口子，涌出来几千百个黑影子，好象山间浊流倾泻到平原；他们铁锹扛在肩上，剪刀、小刀、小钳扦在腰带上。月亮西斜时，民兵们每六个人抬一根电杆，唱着歌回来了。当他们进入安全地带时，号声也响起来了，这是胜利的收工号。敌人也许要打几枪，那号就会吹得更响。自从敌人修起公路，挖了道沟以后，破袭战也就从那时开始。敌人白天修，民兵夜间破，破一夜，敌人要修三天，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青纱帐茂盛之际，就是全面破袭战展开之时。

近一年多以来，在反“扫荡”中更盛行的是地雷战。敌人一

听到地雷爆炸便头痛，地雷是他们的死对头。去年北岳区三个月的反“扫荡”中，各县的民兵巧妙地布置了地雷阵，到处叫敌人车毁人亡。反“扫荡”头一个月，共击毁敌人汽车四十一辆。后来敌人改用坦克开道，但是坦克也被炸毁了两辆。北泉敌人进犯独山城，前头部队三十名进了村子，被炸死二十八名。关平李家沟某家有两个南瓜，敌人来取瓜，马上三个死在瓜旁。敌人搬凳子挨炸了，大街上敌人敲鼓也挨炸了。在青源，敌人选择已炸过的雷坑旁休息，又被炸死了。尤其使用了天雷（将绳子系到地雷的引火线上，从山顶上吊下去）之后，敌人走路爬山，地雷会从头上腰间突然飞爆开来。敌人怕地雷，不敢走正路，于是走麦苗地，走河滩，走山尖；在完县，敌人甚至打穿槽，从桥洞里钻。可是，这也难免被炸。民兵们可以少至一个人活动，有最大的作战机动性，这样，地雷也就变活了，会追随敌人运动。敌人曾宣布要以牲牺一百个“皇军”的代价，来活捉爆炸大王李勇。边区的孩子们到处唱着：“李勇变成千百万。”去年五月反“扫荡”后，我们把李勇的经验总结起来，又推广下去，到秋季反“扫荡”，李勇就真变成千百万了。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北岳区秋季的反“扫荡”，伤亡在民兵手下的敌伪军，共达一千八百零一名。

冀中的人民

应当说，冀中是敌后斗争最频繁、最紧张、最残酷的地区。这是四条铁路包围起来的一块棱形的平原，所谓四战之地，里面有蛛网似的一万多公里的公路，有一千八百个敌伪据点。点线碉堡，互相联结，中间空隙平均在五里上下，最大空隙不超过十五里。如以沟线与点碉之间联锁相计，全冀中即被分割为二千七百小块左右。去年十月间，敌人选择了任丘、高阳、潴龙河两岸的地区，

妄想来一个彻底屠杀镇压（叫做建立“联庄组织”），实行所谓“淘水战术”：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要把水煮干了才好打鱼”。可是敌人虽用尽了一切血腥的“示范”，和无奇不有的刑罚，“淘水战术”还是失败了。敌人所到的村庄找不到人影，最后只好要求：“八路军来了只要点火”。于是各村都普遍点起火来，四面八方都是火。敌人又只好通知：“不要点火了”。

人们都知道冀中有地道战，这完全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最初是在据点附近开始的。由于敌人的“清剿”太频繁，人们在灶底或炕边挖下可以藏人的洞。后来邻家与邻家从地下打通了。再进一步，村与村之间的地道便纵横交错地联通起来。从洞里向洞口看是明的，从洞口向洞里看却是黑的，这就使得敌人不敢往地道里钻。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敌人大“扫荡”冀中时（这次“扫荡”，敌人准备了一年，冈村宁次亲自乘飞机指挥），在定南北疃村发现了地道，用毒瓦斯毒死了八百多人。为了防止各种可能的意外，地道战术日益发展：增加出口，打好几层，加强撤退与防御的组织……，总之，做到极少可能被破坏。有一次，六个干部在村内坚持了七天战斗后，敌人突然发现了洞口，但不敢下去，于是用刺刀强迫伪军下去，干部便向洞外放枪，敌人最后从洞口放进大量毒气，洞里的人便转入第二层地道去了。这个地道有五个口子，六个干部安然在内坚持着自己的阵地。敌人无可奈何，只好留少数人陪着这个洞口，“守株待兔”。敌人在冀中到底杀害过多少人，这是无法统计的。敌人只能以恐怖与虐杀来“降服”中国人民，这就要锻炼其士兵的“胆大”和残忍，甚至强迫士兵吃人肉（这点有许多外国朋友还不相信），发明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暴刑。然而冀中人民对所遭受的种种残害，早已认作是理应发生的事情——从没有人去讨论它。经过五、六年的斗争，无论男女老

少，都明白一个真理："你不杀敌人，敌人就要杀你。凡敌人所想知道的任何事情，一定是对边区不利的事情。"去年春天，敌人包围安平一个村子时，毒打被围的老百姓，要他们指出抗日干部，结果没有一个人哼声。敌人就拉出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当众严刑拷打，小孩的母亲便在旁边大声高喊："不准说！"敌人将她抓住往另外一个地方，这位母亲仍然边哭边喊："孩子可别说呀，咱娘俩就是死在一块，也不能留骂名。"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死去活来五次，终没说出一个字。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指着大家说："没法子，你们都是八路军。"

环境越困难，斗争越残酷，群众越感到需要抗日政权来保护他们。冀中抗日政权，由村到专署，在群众面前都是公开的，甚至某些敌伪汉奸也明知抗日政权的存在，而无可如何。事实证明，当群众真正结成一条心时，任何狡猾残暴的敌人也是无计可施的。

去年秋天的大胜利

去年秋季，敌寇对北岳区进行了历时最久、空前残酷的"扫荡"。反"扫荡"战从九月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五日，整整三个月才结束。敌伪动员兵力达四万多，企图用残暴狠毒的手段，从经济上毁灭我全体军民的生存条件：破坏我秋收、秋耕与征收，洗劫我粮食、资财，毁掠我人力、物力。边区军民采取了各种斗争密切配合的对策，特别是主力与民兵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反"扫荡"与政治攻势结合，军事斗争与其他斗争结合，这四种结合形成了对敌寇强有力的"总力战"，保证了最后的胜利。

九月底神仙山的战斗，我守卫部队四百余人抵抗了敌伪军四千多人，苦战十二日，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围攻。其中金龙洞战斗，敌人一千五百多，我们只是一个连，持续了八天，结果杀伤敌人

一百八十三名，被地雷炸死的五十六名。我们付出的代价，仅仅七人伤亡（这里面还有三人是摔坏的）。我们又创立了以神枪手组成的飞行射击组，他们配合主力狙击敌人，以极少或几乎不付出牺牲换得极大代价。民兵的地雷战收效很大，前一个半月，敌人因地雷伤亡的占其部队人数十分之一强。三个月残酷斗争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模范。河南区队在政治主任杨世明领导下，三个月内捣毁同蒲路机车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们发明了许多破坏铁路的办法，现正为各地部队效法着。猎人李殿冰一个人杀伤了七个敌人，他的故事已编成剧本，在边区到处演出。今年一月的群众庆功大会，共有一百零四个战斗英雄和模范受到奖励。

这次反"扫荡"中，最足以表现各种复杂斗争相结合的，是秋收、秋耕、征收和救灾工作的完成。一方面要抢收、抢种，一方面要同敌人争夺已被抢去的粮食。主力、民兵要打仗，要担任警戒，有时还要亲自动手收割。总之，要把握敌人各种活动规律，要善于利用敌人的一切空隙。所有专署、县、区、村各级干部，都分区、分组、分村配备下去，组织群众武装护秋。除子弟兵的配合行动外，白天由基干队和游击小组同敌人坚持作战，掩护群众转移休息，夜晚即分队率领男女劳力集体收割，随收随打，随运随藏，并由粮主自行约定适当的工资制度。秋收的坚壁工作，规定干部负责制。到十月中旬，大部抢收完毕。被敌人抢去的粮食，则率领群众夜间抢回。王快据点，一夜之间过河十二次，连续三夜，把二百多亩稻子抢收完毕，又把敌人割去的十二捆稻子也抢背回来。完县临近唐河的许多村子，仅神南一个地方，就动员了五百多民兵，七天中抢收了一千三百亩。各地秋耕种麦的成绩，在许多地区比过去的一年还要好。这次三个月"扫荡"中，尽管敌人疯狂烧杀破坏（共杀害我同胞六千多人，烧房屋五万四

千多间，毁掠粮食二千九百多万斤，抢走耕牛一万九千多头……），边区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反“扫荡”结束，各县公粮征集都已次第完成。部队或机关无论走到怎样的穷乡僻壤，粮食供应从未间断，冬衣也都普遍得到解决。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晋察冀日报在整个反“扫荡”期中，照常出版。

今年年初，边区军民发动了空前的大生产运动。为了生息民力，坚持抗战，北岳区今年还减轻了公粮（冀中、平北等区适当减轻）。去年秋季所遭受的创伤，正在复原之中。

生产带来了新气象

今年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给各方面带来了新气象。干部的思想转变了，人民的认识提高了。特别是提倡拨工互助，牲口贷款，实际帮助群众解决了缺乏劳力、畜力的困难之后，群众的生产与战斗情绪就更加高涨了。许多村子设立了催人早起的钟或鼓。村与村、组与组，甚至父与子都订有竞赛计划。拨工组织，灵寿占全劳力的百分之五十六，孟平占男劳力的三分之二，唐县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九。参加拨工互助之后，劳动效率有的提高一倍，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按户计划各地都进行了。拨工在游击区也相当普遍开展起来，有的村子的土地互相被沟墙圈成两片，于是沟外的与沟里的换地变工，更增加了两村之间的团结。许多过去逃荒的灾民，也都纷纷回来。游击队与拨工组结合，白天耕地，夜晚练习埋地雷。为了使第一线（最靠近敌据点的）的村庄安心生产，各地都在发动村联防制，普遍设岗哨，村干部轮流检查，一发现敌情，就互相接应。许多距敌碉堡最近的村庄，由于拨工组和战斗任务组织得好，都能昼夜抢耕抢种。现在干部到村里，群众都争着让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自动请干部审查生产

计划。群众都自愿突击耕种抗属的土地。在基层工作的干部都普遍参加农户劳动。

阜平上庄的人民，更是建立了健全的生活制度。据三月间统计，全村一百四十五个男劳动力，参加拨工组的已达一百人，分为二十一个组；一百一十八个女劳力中，已有五十人组织起来，分为十一个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另有一人专负责政治和文化学习，没有课本，多是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或是复习夜校的课程。文化课主要是识字，拿着什么农具学什么字，干什么活儿学什么内容。拨工组与游击组统一编制，平时分散着的游击组，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一个拨工组；战时以行政组为单位，过集体生活，实行集体拨工。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每七天开一次检查会。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包括生产、战斗和学习的纪律或公约。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民校仍旧坚持，学习情绪很高，男人晚饭后上课；青年妇女早上拨工、送粪，早饭后上民校。童子军每天把街头打扫得干干净净。妇女拨工组还订了卫生公约："早饭后，一定要扫地，刷家什。"战时要保护鸡、猪和牲口，并看护伤病人。

这里只是给这种战斗、生产与教育相结合的农村，描画了一个轮廓。这种新的农村生活，目前一方面是普及，一方面是内容的日见丰富。

七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我边区子弟兵（民兵在外）与敌战斗二万零五百余次，粉碎敌人千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大小"扫荡"一百一十二次，其中历时最久最残酷的大"扫荡"共有四次：一为一九四一年八月，敌以十万兵力对北岳区持续两个多月的"铁壁合围""扫荡"；一为一九四二年敌四万兵力对冀东三个多月的"扫荡"；一为同年五月，敌五万余兵力对冀中的"扫荡"；一为去年九月，敌四万兵力对北岳持续三个月的"扫荡"。总共毙

伤敌伪十八万余人，缴长短枪五万八千余支、各种炮百余门、各种机枪八百五十余挺。我军亦伤亡指战员八万余人。

今年以来，敌人弱点暴露更多：兵力不足、分散配备、纪律废弛、士气下降与伪军矛盾等等，都在发展。边区各地，特别是北岳与冀中，敌伪据点与堡垒大量被我攻克与逼退了（一、二月份统计，两区共达四百五十五座）。许多敌占县城，惧怕我军攻袭，常将城门关闭，敌伪军不敢出城一步。伪军更如鸡卵，一碰即碎。我们恢复了许多地区，新开辟了许多地区。冀东许多游击区已变为根据地；冀中不但恢复了一九四二年“扫荡”前的局面，而且更发展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进攻是不会一日放松的，今后敌人必然会搞出更多的新花样、更残暴的罪行。然而敌人最根本的弱点是没有人民支持，日益孤立，连伪军也越来越靠不住了。去年“扫荡”北岳区三个月，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搞维持会。抗日政权有人民拥护，军民团结如一人，这就是我们致胜的根本之道。当然，越是接近光明，斗争越是残酷，这一点，敌后军民是很明白的。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待克服。冀中许多战士就靠刺刀、手榴弹和敌人拚，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他们还时常攻入县城。由于敌人的摧毁性破坏，许多地方军民仍感衣食不足，甚至有的还过着半穴居半露宿的生活。他们多年来就是这样伴随着困难和斗争生活过来了，一个外来的人看了也许会惊异得目瞪口呆：“你们怎么打仗的？”百炼成钢的冀察晋边区军民确实是习以为常了。然而，不管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居住边区很久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就表示了他的意见：“晋察冀军队的效能及人民的组织既然已发展到目前的程度，那么限制着晋察冀作战努力的因素是粮食和军火。其中军火是基本的问题，因为只有有了适当数目的轻武器及弹药供给，才能使日寇出动抢

劫成为得不偿失，才能使中国方面收复并完全控制除了日寇九个最大的据点以外的平原富饶区域。如果除此以外，军队还能有摧毁堡垒的新式轻便大炮及少数空军的援助，那么敌人就可以被打退到铁路线上，并使他们不能利用华北的资源。甚至日寇沿铁路线的交通，倘使他们不大大增加其兵力，也是很难保得住的。今天同盟国还未给八路军以他们需要的比较少数的军需供给，是同盟国家对日作战努力中物资分配的失策。”

这样的意见正说出了今天边区军民的希望和要求。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十一日《解放日报》）

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

当你站在根据地边缘的山岭或高地上，不远就可望见密密层层的堡垒，矗立在封锁沟的两旁。敌人企图用这些东西来划定敌我边界。黄昏来临了，封锁沟两岸烧起了篝火，敌伪军如狼一样恐慌地呼喊着，唯恐有一个八路军接近身旁。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跟前走过，他们是由当地党政军民干部和子弟兵组织起来的工作队。他们在走向敌后之敌后。他们的枪声，扑灭了沟线两旁的火堆，把敌人逼退到堡垒里去，随着他们的足迹，抗日斗争的烽火，在敌占区、游击区燃烧起来。

当武装工作队出现在敌后人民面前的时候，他们用快乐的眼泪来接待自己的亲人："你们可来了！"在伪满国境内，当人民看到祖国的军队时，被压抑了十几年的痛苦心情一变而为不可遏止的喜悦。后来他们又亲身看到这支队伍个个精明强干，能文能武，捉特务，拿炮楼，开大会，讲时事，摧毁敌伪政权，组织人民武装，实行抗日民主政策，处处为人民打算，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人民称他们是"祖辈上也没有见过的好队伍"。依靠这种良好的军民关系，武装工作队驰骋在点线如网、碉堡林立的敌占区、游击区，任凭残暴奸诈的日本法西斯跑断腿，奔袭合击，"扫荡""清剿"，也不能阻止他们英勇的进军。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是太平洋作战的一周年，日本法西斯强盗为了夸耀它的"赫赫战果"，和宣布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的“终结”成绩，准备举行隆重的扩大纪念，从中作进一步“协力大东亚战争”的欺骗宣传。边区军民为了打击敌伪这个政治阴谋，于是组织闪击式的宣传进攻战斗。从十二月一日到七日一个星期中间，在北岳区展开自外而内的进攻，冀西所有敌占县城和较大据点，几乎全部遭到我们的闪击，我们逮捕了一批伪组织下层人员，给他们以抗日政治教育。我们的五十万份宣传品，普遍发到敌寇认为早已确保了的中心城镇和“治安区”。保定敌人下令三天戒严，城门紧闭，到处搜查。井陉城闭门三天，煤矿停工，火车停运。敌人演大戏的会场，散满了我们的宣传品。正太线火车上贴满了我们的传单、画报，直开石家庄，把石家庄车站和敌警备部队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以为第二个百团大战又来了。结果敌人的纪念大会一个也没有开成。曲阳城只开了一个二十几人的大会。唐县城的敌人派了六七十个伪军到附近村庄（三百多户），强抓了五十多个老头妇女去开会，路上跑的只剩五个人了。完县城敌人原计划开伪保甲长六乡人员扩大会议，可是那些赴会的人都被我们抓来了。七天的战斗中，子弟兵连战连捷，攻入行唐、望都等县城及正定车站，袭击堡垒九十六处。民兵游击队普遍活跃，围困堡垒，收割电线，逮捕特务汉奸。敌占区游击区的敌伪惊慌失措，人民抗日英雄气概普遍高涨。游击区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率领十五个党员，赤手空拳，乘敌不备，打死了几个守备的日本兵，烧毁了堡垒，缴获的东西十六个人没法拿完。

一九四三年一月，边区又开展了一次反对敌寇用“高价收买”政策掠夺敌占区粮食的政治攻势。我们的方针是把反对掠夺粮食和打击伪钞结合起来，向敌占区、游击区人民说明粮食是人民的命根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基本条件；伪钞是在敌人刺刀尖上发行的，一旦风吹草动，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号召人民

不要伪钞，保存粮食，不但把敌人高价收买的阴谋打垮了，而且把伪钞的价格打得跌落几倍。敌北平宪兵司令部不得不出布告，禁止谈论伪钞不值钱。敌北京公使、伪联合银行总裁慌忙跑到广播台作安定人心的演说，最后不得不从东京拿了两万万日元的老本来支持伪钞。

今天在敌占区、游击区广泛开展的堡垒喊话，是一种与敌伪军短兵相接的宣传战斗，一般由八路军、武装工作队、武装宣传队联合进行。他们预先作了调查研究，了解了堡垒中每个伪军的职别及日常表现，对那些群众最痛恨的伪军就指名喊话，将他的罪恶一一讲出，要他当场答复改正错误，不然就要用他的生命来赔偿群众的损失。对敌军喊话等宣传工作，由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同志进行，使日本士兵了解到八路军里朋友“大大的有”，八路军捉住“死了死的没有”。有些炮楼喊话中，双方互相欢迎，唱起歌来了。当解放联盟的同志们离开炮楼时，日本士兵还叮嘱下次再来。现在交换慰问袋、接受宣传品，已经是比较平常的事了。这种面对面的堡垒喊话，所起作用特别大。用喊话逼退伪军堡垒，已不乏例。因喊话而镇压了伪军特务的气焰，感到当汉奸的可耻和没有出路，动摇逃跑，倾向抗日，不敢放肆勒索，因而减轻了群众的负担，等等事例，更属常见。现在喊话，已不只是由武装工作队执行了，民兵、游击小队，甚至少数村干部，都敢于接近炮楼，进行喊话。许多小孩子游戏时，用纸烟盒叠成碉堡的样子，爬在地上对着喊：“你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你为什么抓我们的人？”政治攻势已形成广大群众性的运动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北岳区反“扫荡”战役，对敌政治攻势更提高了一步，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了，沟外封锁线同根据地中心区的斗争结合起来了。

敌人每次“扫荡”战役，总企图从物（经济）、心（思想）两方面摧毁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资本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依靠物质技术上的优越条件，居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三分政治、四分经济”的办法，妄想挑拨我军民团结，散布厌战失败情绪，满以为闯进了中心区，边区人民是会听信靠刺刀说的话的。

但事实正好相反，迎接日本法西斯的，是地雷的爆炸和神枪手的射击；同时我沟线外政治攻势猛烈开展，边区政府的布告和宣传品，不但贴在许多敌占城镇，还贴在保定的大街上以及敌司令部、伪河北省政府等敌伪首脑机关门口的布告栏里。接连几次的宣传闪击，直到太平洋战争两周年，敌人的纪念会又没有开成。沟线外的军事胜利和反抓丁抢粮的胜利，削弱了敌人战斗力，援助了中心区人民的艰苦血战。中心区的斗争，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教育了被抓来的民伕，回到沟线外，到处宣传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善战，使敌伪在游击区、敌占区的威风大减。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军民利害息息相关，民族友爱倍增。在根据地战争中举行政治攻势，过去是没有做到的，这次是做到了。比如在阜平十区干部带领民兵游击组爆炸组逼近敌人，先埋地雷封锁路口，然后就在山头喊话，伪军围火静听，一枪未发。敌军一部企图出扰，踏响地雷，死伤十余人。又如在某交通要道上，四角插日本文小旗，中又插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旗，敌人把四角的小旗都拔了，一位“勇士”拔去中间的大旗，地雷一响，死伤十二人。有的地方绑草人竖在村口上，写着：“谁要来碰我，就和谁抵抗”。敌人一碰，地雷爆炸了。阜平城内大小地雷经常爆炸，使敌人两个月不敢进城。在紧张的反“扫荡”斗争中，也建立了政治工作。如阜平在护稻战斗中，群众集合，动工之前或收工之后，作简短的宣传鼓动，传播国际国内消息和反“扫荡”捷报，揭露敌寇暴行，

公布抢收成绩，宣布奖惩办法和明日计划等，收到很大的效果。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运动，更是一件坚持民族气节的大事。如曲阳的三不运动：不向敌伪报洞子、报粮食、报干部和八路军。参加者有四十五村，一万余人。阜平更为广泛。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在受到敌人包围，掩护群众突围的前夜，领导群众作庄严的宣誓，号召坚持民族气节，非常动人有力。

虽然敌人费尽心机，企图挽回败绩，但笔写的文字，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如敌宣传品中说："皇军把你们的粮食运到和平区，是为了饿死八路军，欢迎老百姓到和平区来领取。"群众一个都不受骗，把传单撕得粉碎。反"扫荡"末期，一连串的大惨案，正是表示敌人政治上的可耻的失败，和边区人民为保卫民族的尊严而勇敢殉国的崇高英雄主义。反"扫荡"胜利之后，普遍开展的控诉复仇和拥政爱民、拥军运动，大生产运动，子弟兵连战连捷，掀起了边区军民新的政治攻势热潮。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和汹涌澎湃的红军攻势，使边区人民喜上加喜。在今年的日本樱花节和中国清明节，发动了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削弱了敌伪军的战斗意志。第二战场开辟后，与子弟兵军事出击的同时，政治攻势的火力越加猛烈，武装工作队、艺术宣传队活跃在平汉、正太各线两侧。在敌占区、游击区摧毁了的堡垒地基上，召开群众大会。攻进敌占城市，到处传播第二战场开辟和红军及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政治攻势不是孤立的，同其他各种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人民的爱国心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边区军民同敌占区游击区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以坚持敌后战场的斗争。今天你再站到根据地边缘的山岭或高地上望去，碉堡线已支离破碎了，许多封锁沟墙被人民平毁，长起了茂壮的庄稼。我们的武工队已不需要象最初那样从根据地出发，早出晚归；他们已在沟线

外生了根，在群众中生了根。他们正继续向前挺进，一直活动到敌占大城市的近郊。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晋察冀的民兵

每逢反“扫荡”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民兵——游击小组便漫山遍野地出动了。他们大都是背着一个手榴弹袋，不规则地扛着各式各样的枪，急忙奔向各自的岗位。人们一看见他们，就自然觉得有了依靠。

他们是部队的耳目，给部队带路、侦察、警戒和扰乱敌人，有时还要肩并肩地和部队一齐作战。反“扫荡”要靠子弟兵（边区以此称呼正规部队），但子弟兵再多也不能分散到边区每个村子。所以打起敌人来，就要靠民兵配合着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特别在敌人围村搜山时，群众更要依靠他们保卫生命财产。

他们通常是以村为单位甚至以个人为单位来活动的。这样，好处就在于灵活、目标小、不易伤亡，在于能真正发挥麻雀战的精神。他们拿了一支枪和几个手榴弹，就可以任意活动，拣最有利的地形和时机打击敌人。正象完县一个曾经一次射倒三个敌人，还牵了两头驴子回来的游击组员所说：“得手就打，打不过就走。”这就是他们战术的原则。他们可以一个人在最保险的山头，打半天枪，不让敌人发觉；或者跟敌人兜圈子，从正面、侧面，又绕到敌人的后面去。唐县五区的一个抗先队长，去冬反“扫荡”时，一个人跟一小队敌人蘑菇了五十里地，打死三个敌人，打伤三个伪军。象这样一个人打死三、五个敌人的事，在晋察冀是并不稀奇的。

民兵们最感兴奋的是能够拿到步枪。战时，一个村子往往能分到几支或十来支步枪，暂时属于村子里最坚决最勇敢的游击组员使用。所以在出发时，都争着要背大枪，认为是一种光荣。他们是很善于将大枪与土枪配合作战的。今年春间，一个村游击小组探得有九个日本兵，押着满载米面的六辆大车和子弹，从县城出发，送往据点。他们集合了七个人埋伏在村外石桥附近。组长久经战场，非常沉着，他吩咐大家，三支步枪和四根短家伙要连起来打。当敌人经过他们的埋伏圈内时，被打死了四个；但三根土枪却打不响了，组员们急得发慌，而另外五个敌人已就地卧倒，向这边打得很紧，于是组长传令："大家随我大声喊，××团第二营六连七连，冲锋，捉活的！"××团的威名，该地敌人是很害怕的。五个敌人听了这一阵呼喊，爬起来头也不回，就向据点的方向跑去了，内中只有两个没有丢枪。

民兵们象对自己生命一样爱护枪，情况紧急时，吃饭、睡觉、收割庄稼，都和枪在一起。他们真是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当唐县敌人搜索石门南山的时候，村武装部长和十几个游击组员，正在半山腰监视敌人，他自己到山头去看地形时，敌人已经爬山了。他掩护着几个村干部先退，一个人跟敌人战斗，当他把所有的子弹打光，两个敌人尸首滚下山脚时，敌人用机枪扫得更凶猛，子弹终于从他的胸部穿过。后来敌人退了，发现他把枪紧紧抱在怀里已经死去，袋里还装有几发子弹壳，他是期望着用子弹壳换子弹的。

军区唐参谋长最近作报告，讲了一个民兵们甚至没有枪也同样能打敌人的故事。冀中文安县的姜村，有个敌人据点，每天一大早，总有一个敌兵开门出来换哨，别的敌兵则都还死猪样地睡着。这个情形被当地民兵探悉了。一天，天还不亮，他们就带着

斧头、镐头，藏在堡垒门外边。一会儿，门开了，他们象一阵大风闯进去。那开门的敌兵眼睛还迷迷糊糊的，他们就一斧头一个，把还在睡乡的鬼子砍死二十多个，剩下的也都做了俘虏。这次除步枪外，还缴了一门钢炮和两架重机关枪。就这样把那个王八窝打毁了。

手榴弹更是好东西。边区好多民兵就靠手榴弹捉过日本兵，缴过三八式。敌人搜村时，将它挂在大门上，鬼子闯进来准被炸死。有些村子的民兵特别勇敢，为了使得进了村子的敌人得不着片刻安宁，他们这里一个手榴弹，那里一个手榴弹，敌人又没法找到他们，有时被吓得绕来绕去不敢进村，或者匆忙退出。这样，我们的村子就自然少受损失。至于埋地雷，展开爆炸运动，更是民兵的拿手好戏。冀中一个时期就出过许多“爆炸大王”。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浑源的敌人企图到我们的寒风岭按据点。武装部就派了民兵游击小组，到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了两个地雷，不大一会，敌人走了上来，当指挥官、小队长和伪军正经过时，地雷轰然一声爆炸开了。游击小组趁时赶到，迎头射击了一阵，等敌人增援时，又迅速转移了。这次敌人共伤亡十余人，直到傍晚才踉跄地走到寒风岭。当天夜里，计算好了敌人的出发方向，民兵又去埋了地雷，第二天一早，敌人又遇炸了。接连几天，地雷到处爆炸着。敌人每天出来搜索，连小路、野地也不敢走了，总是鬼鬼祟祟走山上的腰坡，还强迫一群老乡在前面带路，到处捉人，问那里有地雷。

在可能情况下，民兵们是集中起来活动的，但这多半应用在破路和武装保卫秋收的时候。完、唐县山前被敌人盘据过的土门、大悲、神南、龙泉关等村庄，近百顷的庄稼，和沿沙河、唐河一带的稻田，去年秋收就是靠这些带枪的游击组员掩护，抢着收割

的。平沟时，动员的规模就更大，场面也更动人。月色微淡的夜里，通到平原的村口，都站满妇女和儿童，唱着歌，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扭起秧歌，欢送自己的兄弟。出发的民兵们则一路互相应和，群起呼喊："我们要拿今晚上的胜利回答你们！"每当部队和游击小组将各据点封锁和包围后，平沟的队伍就开始动作了。堡垒里的敌人，因寡不敌众，只有躲在炮楼里，冷落地打几阵机枪。这时，民兵们遵守着习惯的纪律，沉着而迅速地挥动着镐铲，一面平沟，一面摧毁道路。另外，抬电杆的，背铁丝、电线的，紧张地来往传递。太阳刚出地平线，各村口又早站满了欢迎者，兴奋和愉快的情景，更甚于欢送的时刻。

深泽敌人，今年一月初在城西一里地的道上，修了一座两丈多高的岗楼，想据此逐步蚕食打通深泽至无极的道路。强大的晋、深、极的民兵，就在这岗楼底层告竣之夜，各村自动集合了六百多人，将敌人这经营了一个多月的岗楼，拆了个一干二净，连未用尽的几千大砖，不少木料，也都扛回来了。敌人第二次修筑时，一面在附近架好机关枪掩护，一面在城西关外筑墙挖沟，晚上并派伪军看守。其间经过我们民兵的三次扰乱，才又将三层高的岗楼修起。但在二月中的一天夜里，二百多民兵带着上千个秫秸，配合区的独立小队，抬着两个头号的拉火地雷，又出发了。武装的民兵埋伏在围墙外不远的田地里，准备袭击城里出来的敌人，此外由几十个民兵将秫秸塞进岗楼的底层，并在中层安置好地雷，点起火来，一拉绳，岗楼就从根到顶，炸个粉碎了。

敌人的"扫荡"和对付根据地的办法，一年比一年残酷，我们的民兵也就越来越勇敢，越顽强，越灵活，越能主动打击敌人。"游击打得好，是决不会吃亏的！"这就是我们晋察冀民兵的信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解放日报》）

新山东的成长

山东地少人多，是中国会门的发源之地。会门在六十种以上，多数是农民的带反抗性的组织，有些甚至是半武装组织。许多沿海的人民更有抗倭的斗争传统，胶东的海滨现在还可找到防卫倭寇的寨堡的遗迹。"民国"以来，山东与日本帝国主义结仇日深。东北沦陷，关内创痛最深切的是山东人（迄今最困难条件下，胶东每年收入东北汇款尚以万万计）。山东又是历年南北军阀混战的场所，长期处于张宗昌、韩复榘黑暗统治之下。深刻的民族仇恨，军阀的残暴，山大王（地主恶霸）的淫威……这一切灾难及其反抗，武装了山东人民（民间存枪三十万决不是最高估计），丰富了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从这些束缚的罗网中解脱出来。

抗战爆发了，日本鬼子以前所未有的武力向山东压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底德州失守，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退出黄河北岸，十二月二十四日济南失守……。韩复榘的三路军望风南逃，县长们纷纷开小差，汉奸乘机活跃，抗战无人领导。山东这时正如一只遇到飓风大浪、快要沉没的航船。山东的共产党员义不容辞地出来领航了。

徂徕山起义

远在抗战以前，从延安开会回去的山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就

筹划着日寇进攻时，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敌人还没有进入山东境内，全山东各个地方党的组织便着手开展游击战的具体布置。敌人攻占黄河北岸时，省委书记黎玉同志来到泰安，同有三、四十个党员的泰安县委，一起筹划山区的游击战争。仅有的武器是一支有毛病的盒子枪和两支“汉阳造”。除开从山西来的一位红军青年干部外，全部人员对打仗都一无所知。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第二天敌人占领泰安），他们和一群平津流亡同学，按照计划，往徂徕山下的山阳村集合。这支三杆枪的队伍便叫做山东人民抗日自卫队第四支队第一纵队。这个村子有一个本地同志，他早就集合了四、五十个农民，有二十多条土造和三支钢枪在等待着，叫做第二纵队。他们一汇合，便上山去，住在徂徕山上的一个大庙里。当时大家所具有的只是满腔热血和金石不移的决心，至于仗怎么个打法，前途到底如何等等，还是有些茫然。因为力量不足，名义还不敢公开。然而周围的老百姓却传开了，说：“红军、八路军来了，有好几千！”“咱们得救了。”于是几天之内，附近一百多农民，都扛起土枪、大刀、红缨枪上山来了，他们要求参加八路军，“打日本，保家乡。”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往东走了几十里，和同时发动的新泰、莱芜、泗水的三个纵队相汇合，四支队就成为一支四、五百人和一半持枪的队伍了。随着试探性地在寞里、良庄等地打了几次小仗，这样名气就更闹大了。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和动员群众，又分成南北两个纵队分散行动。三月底，北纵队打开了莱芜城，打垮了维持会，他们请专员秦启荣派人来当县长，并帮助成立保安队。一个多月以后，以反共为业的秦启荣便“过河拆桥”，驱逐北纵队出莱芜。这支还没有经验的山东本地农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抗日军，忍气吞声地退往博山一带。南纵队在新台公路的四槐树打了个埋伏，炸毁敌人三辆汽车，鬼子死伤

四五十，这个胜仗兴奋了鲁南各阶层的人民。老百姓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他们情愿挨饿，吃煎饼，而不收老乡送来的馒头；下雪天，"官长"的鞋子都给战士穿；学生们打赤脚，吃地瓜也不叫苦，又真能同日本打硬仗。农民对他们实在高兴，都固执地要求参加这个队伍。五月间，南北纵队又在莱芜集中，近一千人了，都已经穿起新做的军装。秦启荣仍占据县城作威作福，准备打他们，说他们是"乱党"。他们再一次忍让着退到泰安、莱芜的边境，主观地想"以诚动人"。对秦启荣深恶痛绝的本地老百姓，可不满意这种退让，他们都要求这支好队伍对秦启荣的无理进攻，进行必要的自卫。他们说："你们越让，他就越欺负，跟这种混蛋没道理可讲。"有的气愤地说："你们打，硬馒头、肉，什么都有；不打，连煎饼都不送。"

四支队后来进入鲁南，配合徐州战役。今天就是山东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第四旅。

能战斗　能胜利

济南失守前后，韩复榘政权、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地方民团，以及各种会门搞起来的武装组织，名称复杂，为数不下二百六十股，大多数是藉此要钱、要粮，或奉命限共、反共的。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开始打仗以前，全山东各种武装组织中是找不出任何具有抗战胜利信心的。山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尽管绝大多数没有作战经验，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团结人民同敌人坚决战斗，才能取得抗战的经验和办法。一九三七年底到三八年初，一个多月以内，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民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不下二、三十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胶东的地委书记李琪同

志，集合了十七个人，两支枪，在文登天佛山的小庙里，组织了一支军队。不到两个月，便发展成为六百多条枪和一千多人的队伍。一九三八年的二月十三日，他们以十分之一的力量，晚上九十里急行军，于第二天雪后拂晓，闯进牟平城，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将伪县长宋健吾枪毙了。下午两点钟，他们在离城不远的雷神庙歇下。敌人很快增援反攻，五辆汽车，二架飞机，共六百多人。因敌人来得太猛，有二十五个主要干部来不及撤往山中，他们就以庙内的房屋作阵地，跟凶骄的敌人顽强战斗，一直打到天黑，他们之中有好几个是过去农民暴动时的神枪手，于是每一窗口，每一房顶，都发生剧烈的争夺战。外面进入山区的部队，用步枪打下了一架忘形低飞的飞机，击毁了三辆汽车，有力地援助他们。他们最后冲出重围时，李琪同志牺牲了，有十来个负伤的。敌人伤亡了五十多人，也不敢久战，仓促撤退了。这是第一次振奋胶东人心的大胜利，不但老百姓，就是在徘徊观望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也发觉敌人并不可怕。这支英雄的队伍，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又攻占了福山城，汉奸武装三百多被缴械，伪县长陈昱被俘。之后不久，他们与清河来的起义队伍（后来的八支队）汇合，恰遇敌人在龙口登陆，他们就抢先占领岸上阵地，同敌人打了十天，用古老的土炮打沉了敌人一艘小型装甲兵船，终使敌人这次未能在龙口登陆。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最初也都是这样战斗着，壮大起来。

山东的人民是纯朴而英勇的，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选择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从本地生长的八路军，作为他们战斗和生存的依靠。到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已略具规模，成立了九个支队，共达三万人左右，攻入和收复过十几个县城，在胶东蓬莱、黄县、掖县建立了最初的抗日政权。鲁西北党的组织，帮助“抗

战老人”范筑先，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县和由一个营发展到三十六个支队的抗日局面。

夹攻中奋斗

山东人民就这样蜂拥地武装起来了，山东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全民的姿态站立起来了。航船冲破风浪前进着，然而还得时时防备无数的海中暗礁。

一九三八年秋，沈鸿烈来到鲁北，奉命与河北的鹿钟麟建立反共的“冀鲁联防”。从此山东风波迭生，环境日艰。山东的人民和共产党、八路军，因而长期过着两面夹击的生活，其中曲折、隐痛、艰苦、忍辱，实难一一描述。沈鸿烈首先公布了严重损害抗战团结的臭名昭著的三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准扩大，要接受改编，要划定防区。随后用各种卑劣手段阻挠鲁西北抗日工作的发展，对范筑先将军的坚决抗战和进步设施加以种种限制。最后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聊城之役，驱使范筑先孤军守城，断其后援；这位民族老英雄终于作了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壮烈牺牲，鲁西北的糜烂局面，直到罗荣桓将军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于一九三九年春进驻后，才转变过来。

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是山东磨擦最频繁的时期。这时山东反共军内流行着三个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另外还传布三种对待抗日人民的办法：“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国民党反共派的将军们都忠实执行了这一套做法，向八路军大小规模的进攻、暗杀、活埋等等事件，几无时无地无之。如一九三九年四月博山的太和事件，秦启荣部惨杀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指战员三百余人，内有政治主任、营长及连排长以上干部七十多人。同年八月在莱芜的

雪野，乘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之时，秦启荣亲率所部向该支队雪野后方合击，使军民遭受严重损失。这里有一个山东纵队一九三九年六月到十二月，在顽敌夹击形势下的统计数字：

与敌人战斗209次，毙伤敌4,545名、伪253名，俘敌伪532名，缴枪1,037支。我伤亡1,234名。

国民党反共军进攻90次，杀人1,350名，扣人（大半无下落）812名，烧房子仅寿光一村达100家。

一九四〇年山东国民党反共军完全停止了一切抗日行动，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这一年，八路军因此所受的损失，超过对敌人反“扫荡”的损失。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动，是敌后斗争环境所决不允许的，这种不幸的局面更促起人民的觉醒：非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便无法生存，无法对敌进行斗争。到一九四〇年底，山东已有七十多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型，八路军比一九三八年秋扩大了两倍，群众组织已达三百万人，成立了各级参议会，选举了山东最高政权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战时行政委员会）。尽管夹攻的形势没有改变，然而山东的面貌却焕然一新了。

转变工作的关键

一九四一年的局面更艰难，国民党反共军公开投敌事件日益增多。敌人增加了三个独立旅团，配合十二万伪军，“扫荡”空前频繁与残酷起来，特别是十一月开始对沂蒙区两个月的大“扫荡”，和接着第二年春天对各地延时几月的轮番“扫荡”，使山东根据地的形势发生逆转：基本区缩小了，敌人占去成千的村庄；战略区被割成几块；军队和干部遭受相当的损失；特别严重的是许多群众组织遭受摧残。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形式主义、太平观念、骄

傲、麻木、粗枝大叶……都露出原形。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以求进一步改善工作。转变的关键是群众工作——一切工作的基础的深入和巩固，必须从解决切身困难来动员和组织群众。

经过深广的思想动员，有一千多干部被派下去，帮助农救会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鼓舞和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和冬天，给广大农民带来无限兴奋和喜悦，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讨论减租减息的问题。佃户们在农救会领导下，编成小组，自己算好账，集体带上口袋去地主家退租。如费南县的张李庄，新改选的农救会长团结了全体佃户，大家一致宣誓："一定要退回租子，谁都不要溜沟子。"八十多个佃户来到最顽固的地主王希富家里，有三十多个说了话，王希富理屈词穷，只好答应退租。这一天，有九家地主都自动答应退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底四十五天中，莒南县彻底完成减租的有一六二村（包括退租、订约、取消一切额外剥削、进行教育等），减租的业主五八三户，佃户一〇四〇户。共进行了反贪污、反恶霸、反官僚主义等斗争一百多次，农会会员扩大四七七一人。斗争进行最热烈时，攻克了黑家岭据点，农民都携带最好的白米和鸡、肉，前去劳军。滨海其他地区退租后，农民每天站岗放哨更为积极；对于冬学中所讲的吴满有、郑信等劳动模范，感到很大兴趣；有的村子大家还集资为民兵购买枪枝子弹，作新衣裤。

除开对极少数最顽固地主进行必要的斗争外，农救会进行减租减息工作一般都采取说服、调解方式。为了照顾各阶层利益，富农收入除成本按八折算负担；外在地主，政府用各种方法通知

前来领地租。各地又普遍召开了主雇座谈会。雇工提出在战时要切实帮助雇主藏粮藏草，帮助人口转移；雇主也认识到自改为粮食工资后，雇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上半年，鲁中与滨海区已经基本完成，胶东、渤海、鲁南去年都次第展开，正积极完成中。山东原有的和重新动员组织起来的群众（民兵、自卫队在内），去年已占基本区人口的半数。民兵总数已达五十万。贫农、中农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滨海区去年春天收容敌占区逃来难民六万多，清河垦区收容难民十一万以上。中上阶层对新的民主政权也有了信赖，许多外逃地主回家了，开明地主、士绅则参加了各级三三制政权，与其他阶级一起为抗战事业奋斗。

新的英雄主义

山东八路军的武器有一半以上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他们对敌作战最感困难的是子弹缺乏，他们不得不拣子弹壳，自己设法做手工弹头，装土药，翻造使用；此外，还用土法造手榴弹和地雷，并且供给民兵一部分。落后的装备并不能妨碍八路军和民兵打漂亮仗，他们是以新的英雄主义武装起来的，这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九四二年一月的郯城歼灭战，采用了集中火力、突破一点、急行奔袭的战术，在整个攻城战中，八路军仅伤亡了七个人，然而所获的代价呢：攻下据点十余处，俘敌官兵七名，俘伪军六百余名，缴步枪八百余支，其他重要军需物品数不胜数。

同年十一月十日泰山区的“扫荡”中，三、四千敌寇紧紧包围了博山东部一座极其险要的马鞍山岗，在百米外的山头上，敌人配置两门平射炮，对准马鞍山的寨门，不断轰击，飞机更轮番

轰炸，火光、烟雾、爆炸声，笼罩着整个山岗。山上二十八个守卫者，镇静而坚定地掌握着自造步枪和土炮，抵抗攻山的敌人。从黑夜到天明，他们一息不停地坚持了两天，打死了一百多敌人。直到弹药用尽了，山顶的碎石投完了，他们只得进行白刃战，用枪托打敌人。领导战斗的王排长将最后一粒子弹打入自己的胸膛，战士们也先后携枪堕崖殉国。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在山上避难的冯老先生，他向全家人说："我们不要让鬼子活捉了去。"他和他的女儿、儿媳、两个孙子都随着八路军的英雄，跳入深崖。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去年十一月南北岱崮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对粉碎敌人的"扫荡"起了决定作用。距滋阳四百二十米的两个崮顶，敌人用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一直疯狂进攻了十八天，炸弹炮弹花费了四十万磅以上，还用了烧夷弹和瓦斯弹。这场战斗的抗击者和坚持者——八路军的指战员九十三个人，面对着四十倍之敌，取得敌我伤亡十五与一之比的辉煌胜利，最后全部人员安全突围。其中最壮烈的是南崮南门的保卫战，敌人八架飞机整日轮番轰炸，八个骡子拖的重炮昼夜集中轰击，交通壕被炸平了，掩体被炸烂了，蓄水洞里的水缸开始震烈了，个别防空洞门口塌陷了。战士们被炸得抛离地面，身体较弱的震得口鼻流血，却仍然个个坚守岗位。他们只有一个决心："南崮南门是我们的，至死决不退缩，等敌人上来，一刺刀戳下去。"受了伤的拒绝休息，整天吃不到饭，后来几乎喝不到一滴水。最后决定突围时，战士们都很惊诧，抱着怀疑态度听干部的解释。

一九四〇年的孙祖、五井歼灭战，四一年的大崮山保卫战，四二年对崮峪、南墙峪的保卫战，以及清口十八勇士的壮烈牺牲……这些大无畏的精神，新的英雄主义，为全山东人民永远景仰，

永远歌颂。

七年来，山东八路军伤亡是很严重的，总数在六万人以上，据去年统计，其中百分之五十七为干部，百分之四十五为共产党员。如以步兵连计，七年来连排干部因伤亡而整批调换者不下十余次。山东现有兵员共七万人，几乎百分之百是山东人，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东人。

山东伪军哪里来的

一方面是可歌可泣的战斗，另一方面则干着遗臭万年的勾当。一九四二年是山东国民党反共军变化最大的一年，投敌自保、借刀杀人的办法越来越普遍，结果，这些“兼祧部队”（打起抗日招牌，实际公开或半公开接受敌人番号，进行反共）都被敌人改编成正式伪军。太平洋战争初期，速胜论受到打击后，失败论空前增长，反共军公开投敌者接踵而来，荦荦大者，有鲁中吴化文，滨海厉文礼、张步云，胶东秦玉堂，鲁南荣子恒，清河周胜芳，冀鲁边曹振东，湖西孙良诚等。反共军的投敌，使山东几年来伪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增减比例，成为令人极其痛心的数字。请看这个统计：伪军数——四〇年八万，四一年十二万二千，四二年十五万七千，四三年十八万。国民党军数——四〇年十六万六千，四一年十二万，四二年八万，四三年三万（连鲁西区五万）。现在山东是华北伪军最多的地区。

去年三月李仙洲部入鲁了。三月十日李部进入鲁南的第一天夜晚，便包围了滕峄边黄子口的村民，从深夜到天亮，用崭新的新式机枪和步枪，“痛剿”民兵，并把全村的粮食抢得干干净净。十五日，该部又由南北两面，大举围剿，滕峄边尽是逃难的群众，这时敌人和汉奸队也向南配合着进行“扫荡”。不管春荒怎样严重，

李仙洲的副官们到村子里就挥动着木棒，么喝着："没吃的也得给，就是这么回事。"老百姓偷吃一点高粱皮和树叶混合的"糊浆"，也成了"犯罪"行为。有的地主原盼望着中央大军进山东来，现在他们伤心地唱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由于同人民如此尖锐对立，李仙洲部当然吃不上粮食，也穿不上衣服。进攻八路军被捉去的俘虏，好好放回了，连伤兵都医治了。这样，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都破产了。于是，李仙洲部士兵逃亡的现象日益严重。一个开小差的连长说，他那个连逃的只剩两个兵。李部入鲁时共二万五千人，去年八月离鲁时，仅剩下五千人！

事实证明，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中，既不抗战，又同人民作对，这不仅危害国家民族，就是执行此种政策的人也会"自食其果"。

进入新时期

一九四二年以来，山东敌伪据点增至二千五百个以上，封锁墙沟达八千四百多里、公路一万三千多里。敌人抽出一万以上的兵力经常机动，炮火增强，兵种加多，对山东各区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频繁普遍的分区"扫荡"。计一九四二年大"扫荡"十九次，小"扫荡"七十九次；一九四三年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五十次，其中九月下旬开始的二万五千兵力的三个月轮回"扫荡"，敌人自称为"对华六大战役之一"。经过最近二年的苦斗，山东八路军终于在去年秋季，将军事主动权夺取过来，配合着政治的绝对优势，在一元化领导与广大人民结合之下，各战略分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敌伪展开攻势战。鲁中歼灭了山东伪军主力吴化文的大部，完全控制了沂鲁山区，使鲁中根据地联成一片。鲁西经过击毙刘桂棠、刘国桢，击溃荣子恒等战役，将敌人从其所控制之我

中心地区完全驱走，收复了滕峄边，并打开了邹东、滕东、邹北、邹西边联区，收复了古山区。滨海区攻克赣榆城，活捉李亚藩，完全粉碎敌人沿沭河的封锁线，南部保持了原来形势，北部有新的开展。渤海区恢复了小清河以南地区，摧毁了利（津）博(兴)边封锁线，改善了冀鲁边一二分区残酷的斗争局面。胶东一般保持原状，南海方面较有开展。总计抗战第七周年，山东八路军共攻克据点八百余处，解放村庄八千余个、人民二百五十余万，收复地区三万平方公里以上。

在军事和行政上，山东目前分为五个独立区域：鲁中、滨海、鲁南、胶东、渤海（冀鲁边与清河合称），共设有十七个专署（据最近材料，滨海又新设二专署），管辖五十五个县政权（包括新县治，海阳一城尚在我手）和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民（全区总人口二千九百万）。我们现在所指的山东根据地，其范围是津浦路以东，北迄天津与冀东衔接，南至陇海路与华中新四军为界。除渤海区为辽阔的平原外，其余各区均为群山起伏，间有小块盆地渗杂其间，其中沂蒙山区则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中心，南可协助鲁南、滨海，北（东）可支援渤海、胶东。在滨海、胶东、渤海三区，尚有为八路军所控制的七百多里海岸线，其中有某些小港口可停船舶。

一年来的胜利攻势，山东根据地形势已大为改观，大部已恢复到一九四〇年状况，并有新的开展，掌握了某些战略支点，部分改善了过去被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相当缩小了敌人占领地区。但敌人的兵力仍甚强大（敌伪兵力在二十万以上），战略强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敌人的机动力量较前更有增加。因此，优势兵力“扫荡”的突然性必然会增大，其手段也将更加残酷，某些地区也仍有被分割蚕食的可能，困难尚未过去，还有一段更加艰难

的路程。今天山东的任务是巩固已得胜利，生息自己力量，不失任何打击敌人的时机，粉碎敌人更疯狂的进攻，熬过最后难关，准备迎接最后反攻的新的斗争局面。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山东捷报

跟节节败退的正面战场相反，广大的敌后战场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兴奋，那里是不断的胜利，不断地向敌占区前进。现在我们只就山东六月以来的胜利，略加论列。

今年春夏之间，中原告急之际，山东军民先后获得鲁中讨吴逆化文、鲁南讨荣逆子恒两次大规模战役胜利。入夏以后，山东各战略区继续组织保卫麦收和扩大地区的战役攻势，主力与民兵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积极主动打击敌人；主力兵团深入敌占区，围攻据点，猛烈活动。鲁中方面，连续获得三次大胜利，保卫麦收攻势结果，伪吴逆化文残部独一旅，除六十余人逃窜外，全部被歼；伪高松坡旅被俘人枪八百余。共收复据点二十余处、村庄三百余个，解放人民二十多万。继之，该区粉碎了敌五十九师团主力对鲁山、新蒙的“扫荡”。该区主力一部，以沂水城为主要攻击目标，发动秋季战役攻势。据本月十七日晨第一次所得战果报告，我军已完全占领沂水城及其外围各据点，俘敌山田等十五人，俘伪剿共军司令兼沂水县长牛逆占元以下七百余人，缴步枪六百余支。滨北讨伐李逆永平战役，已解放诸（城）胶（县）日（照）边纵横百里的广大地区，攻克据点三十余处、炮楼三百个，击退敌军四次增援，现已成立诸胶边和莒马两县。临沭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密切结合，共解放村庄百余个，敌占区人民纷纷买枪，准备起义。鲁南则挺入邳北、郯西丰饶的

产粮地区，攻克据点二十多处，解放村庄一百多。原在渤海区广（饶）寿（光）一带的伪军一千六百人，于上月二十一日在其司令王道率领之下全部人枪反正，并随即配合我军攻势，解决周围其他伪军，两日战果，解放地区三千方里，攻克及平毁据点岗楼十七个。本月十七日夜，渤海我军克复利津县城，毙伤俘敌伪一千六百余人，缴步机枪千支。以上共计八个胜仗，据不完全统计，敌伪毙伤俘及反正者共达九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光复县城两座、国土近万方里，解放同胞数十万。

这一连串的胜利，告诉了我们一些新的事情。

第一、沂水为山东根据地中心城市，是敌人切断我鲁中与滨海联系的极重要的据点，利津则为联系小清河与冀鲁边的枢纽。这两座县城特别是沂水的收复，意味着我有计划地突破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以及敌人之日渐缩小与孤立。作战过程，证明我军素质的提高，虽装备窳劣，仍能攻破敌人设防强固的据点（滨北李逆所筑两城据点，耗工四十五万个，费时十个月，此次亦为我攻克）。本月初，山东军区特务团举行大检阅时，会场中即摹仿鲁中、滨海敌伪最坚固的据点，筑成一座围寨，以供表演爆破。其他技术方面的提高，如特等射手的实弹射击，最高纪录已达百分之九十六，战士们三十米的投弹，平均命中百分之三十三；全副武装的二千米越野赛跑，纪录为九分十秒；北海有的战士一气刺枪四个钟头，能刺四千五百枪。由于指战员技术的普遍提高，因之每次战斗，我军都能以少胜多，进行白刃战时，日兵总是敌不过我们的战士。

第二、此次沂水战役中，值得特别一书的，是歼灭守城敌军五十一人，除击毙三十六名外，俘虏十五人。记得今年三月苏北的车桥战斗中，我军歼灭敌一个增援大队（约八百余人），激战一

整夜，俘虏日军四十余名。这在中国战场上是罕有的纪录。这次守沂水城的敌人也是全部被歼，虽然数目较少，俘虏却达百分之三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证明敌人今天纪律松驰，士气败坏，江河日下。我们的敌军工作无疑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三、伪军王道部一千六百人反正后，随即配合我军攻势，获得很大战果，这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敌伪之间的矛盾与伪军动摇程度的增长，这一新情况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敌人施之于伪军的伎俩，如挑拨离间、怂恿作恶、吹牛撒谎等，已濒于破产；另方面是伪军逐渐认识了我军之力量与宽大政策，对我向望日深。王道"告同胞书"中说道："投敌后无日不受日寇驱使、削弱、痛打。鉴于今日抗战胜利在望，又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光明磊落英勇抗战方针的正确，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宣传，深觉到当汉奸是死路一条，只有反正抗日，参加八路军，才是活路。"这种思想，在伪军中是日益普遍了。讨吴战役中数百被俘的伪军官，他们中毒较深，原先连自己的履历和职位都不敢说出，当亲身经历过短时的民主生活后，他们现在都要求多发给笔纸书籍，上课时如果有一个不注意听课的，就会激起全体公愤。山东是伪军最多的地方，尚有十六七万，敌人利用他们，以补自己兵力之不足。现在伪军大批反正，这对于敌人是很重大的打击。相信山东军民必当进一步发展瓦解伪军的工作。

第四、滨北讨李战役，在整个战争的组织过程与军民合作上，成绩特别显著。各地人民和政府对军队全力支援，在战斗开始前，给养、担架……，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大饼户均组织起来，每天有新鲜大饼运往前线。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各种精致、实用、动人的慰劳品一批批送到战士手里。民兵参战都超过计划，庄里岗哨由儿童团担当，各村找不到一个闲人。战士们在战斗空

队和行军休息时，过着愉快的文化娱乐生活，前线记者团出版的《前线小报》，成为战斗以前最好的鼓动材料。刚解放的区域，一律停免本年上半年田赋和下半年的给养，并迅速进行农村调查，准备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抗日防奸保家。如此密切的军民关系和健全的组织工作，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胜利之道。

与以上捷报同时传来的，尚有令人极为愤慨的消息，那就是国民党留在山东的地方军赵保元、张里元部，自六月初以来，即有计划地向我胶东、鲁南等地区发动进攻，大小不下二十次，至今尚未停止。如张里元集结各团队五千余人，向台邳之咸楼、邳北之大桥头、沛七区之西万一带我军进攻，当时我向邳北敌伪发动战役进攻之际，张里元配合敌伪夹击我军。又如赵保元部乘我袭击大山房（海阳西）时，以一团兵力犯我贾格庄（海阳西北），并配合敌机十余架进攻侦察，六月初向我栖海莱地区进犯，将我于山（莱阳东南）南数十村抢光，烧光，杀老百姓百余。山东国民党军队这种配合敌伪两面夹击我军的行径，一九三九年以来，始终继续着。究竟是那个“不打日本人”，那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岂不明明白白么？

山东的地区和人口，将近一半尚在敌伪手中。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缩小敌人，孤立敌人，隔断敌人；扩大我区，联系我区，更进一步巩固根据地，为反攻奠立基础。但今日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山东敌伪军兵力尚在二十万以上，敌人仍控制着主要交通线与经济中心，其机动部队的力量较前更有增加。据今晨电讯，敌寇为进行报复，以万余兵力四路侵犯我滨海区，目前我滨海军民正展开大规模反“扫荡”战。因之，我某些地区仍有被分割蚕食之可能，困难远未过去，还有一段更加艰难的路程。我们决不能因胜利而稍有骄傲自满，我们应当更加沉着，不断研究

敌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贯彻中央十大政策，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不断的胜利。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社论）

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

山东敌后战场一九四四年对敌展开全面攻势，获得极大的胜利。解放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人口增加九百余万，控制海岸线一千五百里，正规军和民兵都增加三分之一以上。敌人在这一年中，遭受到惨重的损失，主要数字如下：拔掉和迫退敌伪据点过其半数（敌伪据点原数为二千五百余处）；全部切断或平毁公路六千余里；敌军和伪军伤亡反正者，为山东敌军总数的六分之一，伪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敌军原数三万人，伪军十五万人）。现在山东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总数已占津浦路东百分之七十二，海岸线占境内二分之一，各战略区之间及其内部的被分割局面，已大大改观。

山东过去敌占地区逾全境之半，存有不少战略空隙；伪军数目在华北为最多，这是跟其他老解放区——晋察冀、太行等不同之处。因此，山东解放区去年的胜利发展，对今年继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山东过去一年胜利中的首要特点，乃全体军民的积极攻势作战，掌握了战役与战斗的主动权。总计去年主要战斗三千五百一十四次中，共有百分之七十三为主动打敌的进攻战斗。

春夏秋冬四季，除粉碎敌人四十九次“扫荡”外，各战略单位都组织了一连串的攻势战役，此起彼落，互相呼应；此区遇有“扫荡”，彼区立即发动进攻。敌人则陷于被动，忙于应战，忙于

"报复"，折兵失地。其中有十几次特别出色的攻势战役，如滨海区的歼灭朱逆信斋，讨伐李逆永平，收复莒县；鲁中区的讨吴逆化文之战，保卫秋收，攻克沂水；渤海区的夏秋两季连续攻势，收复广南益北地区，攻克利津、乐陵、临邑三县；鲁南区的讨荣逆子恒战役，越津浦路解放微山湖东，粉碎滕东封锁线；胶东秋季攻势，攻克文登、荣成，摧毁烟青公路，打通四个分区的联系。由于有了这些出色的攻势战役，才改变了各战略分区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解放区的面积才得以扩大一倍有余，敌伪特别是伪军才会遭受严重的削弱，我主力与民兵才能扩充与提高。山东经验告诉我们，掌握主动的进攻极为重要，必须在战役和战斗上使敌人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在有利的条件（如敌守备薄弱）下，应当坚决组织较大规模的攻势战役，以逐渐改变敌我形势。这种条件今天敌后各解放区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

在消灭伪军方面，山东去年有特殊重大的成就。被消灭的伪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包括装备最好的伪军的核心吴逆化文及荣逆子恒、李逆永平等之主力。全年俘虏伪军总数达三万六千余名。此外，还有大小六十余股伪军共一万一千余名，在伪长官率领之下，携械反正。其中莒县伪军莫正民率部三千五百余人、渤海伪军司令王道率部一千五百余人、荣成伪军滕品三率部六百余人反正，并配合我军攻下莒县，收复渤海广大地区，未费粒弹而得荣成，成为伪军工作的三个范例。曾经为虎作伥的伪军，今日为何能"回头是岸"呢？王道"告同胞书"中说得好："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宣传，深觉到当汉奸是死路一条，只有反正抗日，参加八路军才是活路。"大部伪军中下层人员，或为生计所迫，或为敌人抓丁强编，或为国民党"曲线救国"的谬论所欺骗，真正死心塌地事敌者是少数。但是过去几年在国民党"曲线救国"

的错误政策之下，伪军的数目大大增加。为了准备反攻，对敌后战场这七八十万伪军，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山东的经验告诉我们，争取大股伪军反正以配合我军攻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自然，争取伪军反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须日积月累地进行艰苦的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前面摆着一条光荣的出路。而对那些甘心为敌效命、累经争取无效者，就需要给以坚决打击，以促其觉悟。

山东去年的攻势作战中，一共收复了沂水、利津、临邑、乐陵、南皮、莒县、荣成、文登、栖霞等九个县城（一度攻入的不在内），这是抗战第八年中很大的胜利。这九个县城中的莒县（山东第一个大县，有人口九十万）和沂水，都是敌人配有相当强大兵力的重要战略据点，有堪称近代化设防的城市。前者的收复，反正的伪军从内部配合具有决定意义；后者则经过强烈的攻坚战，全部消灭了守城之敌。其他几个县城的收复，大都经过军事进攻和争取伪军两者的配合；而荣成的收复，更是由反正伪军开城迎我。因此，山东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目前我虽无近代化装备，但依靠我军的英勇善战、军民团结一致和正确的敌伪军政策，便能攻下敌伪虽设有强固工事却兵力不足与斗志低下的城镇据点。从敌人内部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一种办法。目前敌人于“蚕食政策”失败之后，改分散配备为“重点主义”，集中兵力于某些机动地区，以巩固其交通干线及战略支点，但是敌人这些为数众多的所谓“战略支点”——铁道线之外的城镇据点，大都依靠伪军，一般守备薄弱，这就是我们进攻的目标和要收复的地方。去年敌后不少地区都这样做了，今年敌后战场形势必将更有利于我，更要敢于拔敌据点，收复失地，迎接反攻的到来。

以上我们谈了山东过去一年的胜利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的紧密结合。我们采取这种方针，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未根本改变，我军虽装备差，兵力较少，却具有其他一切优越条件；敌人装备虽好，采用碉堡主义，却兵力不足，不能不依靠那明知不可靠的伪军。这就是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结合的根据。这两者结合收效之大，莒县等城市的收复，可为明证。鲁中区去年成绩尤为辉煌：共解放村庄五千五百余个，伪军被争取投诚回家者七千余人，逮捕教育了五百多个伪乡村长。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武装工作队是最能经常和有效地进行政治攻势，进行敌伪军工作和敌占区工作的一种组织。武工队员智勇双全，能克服千难万险，钻入敌人的心脏地区，进行长期经营。也许一时难见大效，但到一定时候，其作用是惊人的。鲁中区去年纯粹为武工队收复的村庄，即达一千八百多个。关于武工队，应当深刻认识其重大作用，和普遍加以推广，要舍得下本钱，拿出干部，长期打算，深入坚持。

去年一年，不仅是山东，其他各解放区也都是大胜利大发展的一年。胜利最易带来自满，我们决不可存有丝毫轻敌观念。要知道我们面前的敌人还是强大的，狡猾的，又最凶残的。我们的任务是将自己操练得棋高一着，巩固已有的胜利，在有利条件下继续发展胜利；同时，时刻注意隐蔽和积蓄力量，时刻记得过去吃过亏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一定会更加壮大起来，敌人就一定会更加削弱下去。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加强伪军工作

一九四四年，解放区军民对伪军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的统计，伪军反正者三万四千余人，比一九四三年增加一倍以上。伪军反正潮流，开始从下层官兵波及中上层军官，从伪地方武装与杂牌军波及伪正规军，从伪陆军波及伪海军，从个别的零星的反正发展到数千人的大股反正。由于伪军反正潮流的开始高涨，我军得以较小的牺牲，收复了解放区周围很多强固据点及若干中小城市。"里应外合"的打法，在一九四四年前是少见的，一九四四年一年，则见之于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场。

去年敌后战场上伪军反正潮流的开始高涨，与正面战场上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去年在正面战场上，许多国民党军投降敌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衡阳守将方先觉所部的第十军；许多国民党军在"曲线救国"的"政策"之下变成了伪军。这种鲜明的对照，决非偶然，而是抗战中两条路线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去年各解放区的伪军工作成绩，应当给以极高的估价与极大的赞扬，这种成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有可能取得；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与失败主义的方针之下，只能产生"曲线救国"之类的东西。

比起去年来，今年的形势更加有利了。解放区军民有可能在瓦解与争取伪军反正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为此目的，我们提出几点意见，供敌后军民的参考。

现在敌后战场上的伪军，数量还是很庞大的。据去年十一月以前的统计，共七十八万，其中伪正规军三十八万，伪地方武装四十万。如果加上伪警伪自卫团，全部伪军当在九十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新沦陷区如河南等地的伪军在内。所以瓦解和争取这些伪军，还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艰巨的任务，决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

进行伪军工作的条件，现在比从前更加有利了。有两条最为显著：第一，敌伪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了。敌寇为“彻底掌握”伪军，对伪军采取监视、清洗、整编、削弱等办法；由于不信任等等原因，几年来被残杀的伪军人员，为数很大。沦陷区经济的破产，使伪军生活极端恶化，军纪极端败坏。伪军与敌寇之间的矛盾空前加深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敌寇在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敌后战场的军事挫败，更加深了伪军的普遍动摇。第二，由于执行国民党反动派“曲线救国”论而大批投敌的伪军官兵，亲身经历了当汉奸的痛苦，目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逐渐觉悟到“曲线救国”论是亡国亡头的谬论，想等待国民党反动派到沦陷区去“收复失地”时“反正”做官，已是“此路不通”。我们解放区几年来有重大发展，拥有七十三万军队，二百余万民兵，一万万左右人口，不仅紧紧地包围着沦陷区的一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且成为全国抗日救国与民主力量的中坚。解放区军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了。这种种情况，促使很多伪军认识到，若想得到一个光明前途，便非依靠我党我军不可。山东渤海区光荣反正的王道旅长说得好：“华北到处都是八路军”，“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会成功，因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掌握真理。”

这些有利的条件，便利于我们更大的开展伪军工作。去年我们伪军工作的成绩，还限于若干地区，和若干伪军部队方面。今

年应当更普遍的做，不论是什么地区（包括交通要道及大城市、新沦陷区和旧沦陷区），不论是什么队伍（包括伪正规军、地方武装），凡是有可能，都要去进行工作。

在进行伪军工作的时候，根据以往的经验，加强对伪军的调查研究，甚为重要。只有对于某一伪军部队，想尽各种方法，进行深刻的调查研究，工作起来才会有好的成绩。

另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所进行的政治攻势，对于瓦解和争取伪军，收效甚大。政治攻势唤醒了敌占区的人民，也唤醒着伪军中广大的抱有民族意识的分子。今年把我们的政治攻势更加发展起来，对于伪军工作的进行会有帮助的。

第三个经验，就是必须在伪军的下层进行工作，同时也必须在伪军的中上层军官中进行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有其重要性，二者不可缺一。同时，我们一方面争取伪军，另一方面对于少数作恶多端的、屡次争取无效的、死心塌地的汉奸武装，必须坚决打击和歼灭之。这两方面也不可缺一。以山东为例，我军先后打死刘桂棠、荣子恒等汉奸，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对于死心塌地的汉奸的致命打击，则争取工作是困难的。

伪军工作是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谨慎与耐心，要坚决执行精干隐蔽政策，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切忌急于求成。必须时时教育干部人员警惕；我们的工作愈是刺入敌寇的心脏，敌寇对我们防范也就更加严密，更加毒辣，一点疏忽，就可能使我们遭受极大的破坏。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攻势

一九四五年的头三个月过去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军中，只有国民党战场依旧挨打溃败；粤汉路南段弃守，遂川、赣州基地群弃守，南阳、老河口弃守。不出三个月，国民党又丢掉大小城市近二十座。与此相反，中国解放区战场，继续捷报频传。南自广东海滨，北抵热河赤峰，我英勇苦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继续发动新的攻势，压缩敌人，扩大解放区。

三个月来的解放区战场，获得如下辉煌胜利：山东光复泗水、蒙阴两城，打死荣逆子恒，消灭伪第十军。太行挺进道清路两侧，解放沁、卫两河以北国土七千方里；又转战于沦陷七年之黄河北岸，将沁河南敌据点碉堡一扫而光。冀鲁豫攻克大名。晋察冀解放灵邱城及其全境，攻克距北平百里的产煤区东西斋堂。晋绥收复方山、岚县二城，完全解放方山全境及岚离公路。苏中拔除兴（化）高（邮）宝（应）盐（城）间敌五大据点，摧毁敌伪自称之"水网坚城"。苏北完全收复灌河以北灌云以东滨临黄海的广大地区。灌北进击游集据点，俘伪官兵一千五百余，攻占宿蒙公路重镇南平集（距宿县城十里）。豫西解放渑池全县，直扑洛宁城下。

三个月来解放区战场形势表明：我军继续开辟新地区（新老沦陷区），解放区前缘向敌占城市与铁路线推进；继续拔除敌伪强固据点，破袭重要公路线，更加孤立敌人，我基本区日益巩固。

太行挺进道清路两侧之役，所解放的晋冀豫交界三角地带，

曾被敌寇与庞孙二逆蹂躏八年，现已建立四个新的抗日县政权。这个地区形势极为重要：背枕太行，东面平汉，南襟黄河，中贯道清。自此，我太行山区与冀鲁豫平原区，可以经过这里衔接起来了；以新乡为交点之平汉、道清、新汴（新乡至开封）三条铁路，遂暴露在我军夹击之下。鲁南、鲁中解放泗水之后，乘胜向西推进，扫除曲阜外围据点，逼近津浦线。

三个月来解放区战场的另一个特点，是我军继续拔除敌伪插入我腹地之点线，华北、华中各解放区这类胜利很多。其中应特别指出的，乃晋绥之收复方山、岚县，全部占领岚离公路。岚县、寨子、普明、东村等据点，同为敌人分裂我晋绥一、三、六、八分区的楔子；长达百余公里的岚离线，更如一把匕首插在一、三、八三个分区之间。敌人在此线素屯重兵，我内地区受其直接威胁，且隔断我晋绥与太行两大战略区之联系。据晋绥军区司令部公布，这次大胜利之后，"一、三、八分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晋绥军区敌我形势因此起了一个根本变化。

其他如太行光复马坊之役，使平定、昔阳、寿阳二千方里的游击区变为巩固区，二分区形势焕然一新。山东蒙阴的解放，拔除了敌寇深入我巩固区的心腹据点，泰山、沂蒙两区相联更紧。东西斋堂收复后，平西解放区益形巩固。

所有这些大小胜利，显然是由于我军战斗力与战争艺术继续提高增强所致。

泗水、蒙阴战役，都是攻坚的范例。该两城敌设有强固工事，经过步炮工兵几十小时的奋战（蒙阴第二次攻克又经过一周战斗），终将守敌全部歼灭。蒙阴毙敌中队长以下官兵九十五名，生俘敌九名，毙俘伪军十二个中队一千二百余人，这是中国战场近年来罕有的纪录。

攻克大名，进击游集之役，则为里应外合的范例。前者由旧伪军长王天祥率部反正，帮助我军作战，当场打死新伪军长刘逆岷；后者由伪中队长胡士遁配合内应，首先解决另外两个顽固的伪中队，使据守该重镇伪官兵一千五百余名全部就擒。

灵邱全境的解放，则又是另一种战法，完全归功于我广大军民长期围困，迫使敌伪撤退。岚离线之役，则为全面攻势——围困、攻袭、爆炸的成功。二月以来，主力、武工队和民兵，即在岚离全线展开普遍有效的爆炸运动，岚县、方山等大小据点周围的道路河沟，密布地雷，同时于各据点之间积极击敌，断敌运输联络。一部主力更连续袭入方山、岚县、寨子、普明等据点（如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三夜，三袭岚县城），使守备敌伪极度动摇，敌伪矛盾严重激化（攻克岚县之前，岚县伪军几全部被敌缴械逃散），经过最后的激烈围攻，终于完全收复这些地区。

在去年攻势胜利的基础上，经过练兵运动，今年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攻势比去年发动更早，地区更普遍，规模更大；头三个月中，胜利的果实就极为惊人。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敌寇目前还是强大的，它一定还会对我解放区作残酷的进攻，因此我解放区全体军民，一方面要继续扩大解放区，从敌伪手中收复一切可能收复的地方；另方面要提高警惕，准备随时粉碎敌寇的进攻。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加倍努力，要求改组经常打败仗的国民党统帅部与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以便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

（一）

截至今年四月底，在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路线下，全国沦陷的城市共有九百三十多座（东北四省在内），占全国城市总数百分之四十七强；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大城市，都落于敌手。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区战场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除使敌后城市无一不被我军民包围外，八年英勇血战的结果，到最近为止，从敌人手中完全解放的县城共有五十五座（除此尚有九十六座为我一度收复，攻入城市的作战，八年中近四百次），占沦陷区城市百分之五点七。现依收复先后次序，按区统计如下：

华中共五座：阜宁、武康、德清、嘉山、泗阳。

晋察冀共四座：阜平、涞宁、灵邱、任邱。

晋冀豫共十三座：平顺、涉县、武乡、黎城、榆社、林县、沁水、陵川、沁源、阳城、晋城、左权（辽县）、和顺。

冀鲁豫共十三座：寿张、阳谷、邱县、清丰、朝城、莘县、内黄、濮县、濮阳、大名、南乐、南宫、新河。

山东共十座：海阳、栖霞、利津、沂水、乐陵、文登、荣成、临邑、莒县、蒙阴。

晋绥共九座：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岢岚、方山、岚县、五寨。

河南一座：渑池。

以上五十五座县城中，江苏境内占二（阜宁、泗阳），浙江二（德清、武康），安徽一（嘉山），河北九（阜平、肃宁、任邱、清丰、濮阳、大名、南乐、南宫、新河），山西二十一（灵邱，加上晋绥九、晋冀豫十三座中除去涉县、林县），山东十六（濮县、邱县、阳谷、寿张、莘县、朝城、加上山东区之十座），河南四（内黄、林县、涉县、渑池）。

其中去年收复者十六座，今年收复者二十一座，其余十八座均为一九四四年以前即已收复者。五十五座县城中至少有二分之一以上，如阜平、阜宁、沁源、任邱、兴县等城，八年来敌我来去，均经过反复数次的争夺。

其中又应特别指出者，如莒县、濮阳、大名、南宫、南乐、晋城、左权、阜宁等县，均是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形势重要的地方。

（二）

收复这些城市的意义何在呢？

敌人对解放区实行所谓“囚笼政策”之后，为保护其交通干线（铁路），分割蚕食我解放区，乃在交通干线外围，安设据点，构筑公路。一方面保护其交通干线的安全，一方面作为“扫荡”与“蚕食”我巩固区的屯兵点，对我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将这些据点拔掉，以减少敌人对我之进攻，和突破各解放区内部之分割局面。自一九四三年开始，特别自去年以来，这种伸入我腹地、插入我解放区之间的敌人的战略支点（这不仅是县城，还有许许多多相当于或次于县城的据点），便逐渐被我拔掉了。例如胶东与滨海间的莒县；滨海鲁中间的沂水；渤海内部的利津、

乐陵、临邑；太行的榆社、左权；太岳的沁源、沁水、阳城；晋察冀的灵邱、任邱；晋绥的岚县、方山；冀鲁豫的濮县、大名、邱县、清丰等等之收复，都是为着这个目的。

各个解放区内部的分割局面正在或大部改观了，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求得各解放区之间不同程度地联成一片，这就是今年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攻势的目的之一。例如晋城收复，对太行太岳间的联系；五寨收复，对晋西北与大青山的联系；乐南收复，对冀南与旧冀鲁豫（冀南现已包括在整个冀鲁豫解放区内）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过去为了破坏敌人的经济掠夺，配合反抢粮、反“清剿”，以及配合反“扫荡”作战，我军民均积极出击，夺取县城或各类大小据点。如去年九月冀中攻克肃宁，即为配合潴龙河反抢粮、反“清剿”作战，夺回粮食四百万斤。又如清丰为冀南平原小麦的中心产地，去夏伪道尹准备在该县存粮九百万斤，我军即将其攻取，伪道尹伪县长和伪军千余一齐俘获。敌人大举“扫荡”我巩固区时，我外线部队和邻区部队，为配合反“扫荡”作战，牵制敌人兵力，亦夺取或攻入县城。如去年八、九月配合滨海区反“扫荡”，渤海我军攻克乐陵与临邑二城，胶东则收复文登、荣成二城。

（三）

这些县城都是怎样收复的呢？

最普遍采用的战法，便是军民长期的严密的围困。事实证明这是在我们现有（目前还是如此）条件下，战胜敌人、夺取城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主力、地方部队、民兵结合广大群众，将敌据点日以继夜地团团围困，断敌补给线，削弱其周围支点；爆

炸运动与冷枪运动，使敌人毫无行动自由。敌人为了维持日常生活，须付出很大代价，最后终至得不到给养与外间任何支援，而陷于绝境，于是只能突围而逃，或被我打走。有名的沁源围困，城关居民一万二千人转移山地，全县无一人“维持”敌人，九百天中单民兵就作战二千七百三十次，毙伤敌伪三千零九十八人（炸死炸伤在外），活捉从外县派来的汉奸特务二百四十五人。敌人最后不敢住在城内，退守城西山梁碉堡，在四十颗石雷的包围阵中，敌人困守了二十八天，最后终于滚出了沁源。总计今年收复的二十一座县城中，约二分之一是用的围困战术。

次一种战法是经过长期的敌伪军工作，主要采取里应外合，如莒县、大名、嘉山等地的收复。或则全为伪军据守（或仅有少数日军配合），伪军战斗力弱，我军一面攻打，一面争取，双管齐下，如莘县、清丰、利津、肃宁等县之收复。

另一种战法是突然进击攻夺，如对付临邑、濮阳等县。这些地方，有的伪军遭我不断打击，非常恐惧；有的外围据点被我拔掉，城内失去支援；有的伪军调防，我军抓住时机攻取。在我猛力突然进击的情况下，敌伪有的弃城而逃，有的全部被俘。

此外还有一种在有利条件下，以强攻为主的战法，即以相当强大的兵力，花一两天以上的时间，经过猛烈搏斗，压倒敌人，敌伪或全部就歼，或一部就歼一部窜逃。如攻夺沂水、蒙阴、南乐等地战役。这些县城多为敌伪合守，兵力较大，且筑有强固工事。打下这些地方，必须将敌之碉堡、壕沟、铁丝网、鹿砦等等破坏，消灭敌人的火力窠，甚至最后必须将敌炮楼碉堡完全炸破，全部消灭守备之敌，才得攻克。因此我军也得付出相当代价。

总之，攻占这些县城，在战术上并无一定成法，需依据对象、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而异。一般是围困、强攻、突袭等战法灵

活配合运用，又几无不配以敌伪军工作；同时也是较现代的作战方法（步炮工兵的联合），与纯粹东方的古老形式（地雷爆炸土炮冷枪）的密切结合。

目前由于我军装备不好，尚不可能收复敌之战略重地——大城市。但由于我们实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有广大的群众支援，广大的民兵作正规军的助手，我军不仅在政治素质上，而且一般在战术和指挥上优于敌人，加以正确的敌伪军政策，尽管武器低劣，仍能攻克有强固设防和相当兵力守备的敌伪城市和要镇。毫[illegible]“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武器装备，它就会更加无敌，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迎 接 新 局 面

我们刚庆祝过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现在我们带着同样愉快的心情，来庆祝中国解放区战场今年春季的光辉胜利。

解放区战场在今年四个多月之内，已收复县城二十一座（超过去年的数目，解放区现在共收复县城五十五座），切断或毁除敌之重要公路十六条。这是五、六年以来的新局面。我们已逐渐将深入解放区腹地的敌人驱逐出去，已将胜利带至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已能解放大名、晋城、左权（辽县）、阜宁、南宫这样较重要的城市，已逼使敌人在白晋线立不住足而拆除铁路。这是今日中国战场上头等重要的事情。

回忆一九四一、四二两年，那时解放区所处环境是何等困难何等严重。敌人停止进攻国民党战场，集中进攻解放区战场。敌人时常企图用“三光”政策消灭我们，用堡垒主义困死我们。留在敌后反共的国民党部队，则在此时配合敌寇，进攻解放区，接着大批公开投敌，伪军突增。因此解放区缩小了，部队减员了，加以天灾为害，军民生活困难万分，在这样严重的关头，解放区全体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创造了许多新的制胜敌人的方法，团结更坚，战斗更韧，但也遭受了巨大的牺牲与痛苦，抗日战争中这一段最艰险的路程才得以熬过，我们革命的航船，终能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鼓浪前进。到一九四三年，我们便开始脱出退守和缩小的局

面。去年我们发动了普遍持续的胜利攻势，大部分地区又都恢复或超过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局面了。

自毛主席宣布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之后，各解放区都有计划地按照各自具体条件，继续向敌人进攻，攻势之规模之成果之巨大，都超过去年。

目前解放区战场的整个形势，有些什么新的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首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我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下，敌人终于敌不过我军民长期的围困、破坏和不断的攻击，而开始被迫自许多中小城市撤退了。对较为次要的交通线如白晋铁路，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治安状况极为不良”，而忍痛拆除了沁县至长治一段（今晨电讯，敌已被迫拆毁津浦路兖济支线）。总计今年收复的二十二个县城中，约有一半是敌人在我长期围困进攻中被逼退的，如沁源、岚县、南宫等城。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即各大战略解放区内都被分割的局面在逐渐改变。例如晋城收复之后，晋冀豫太行、太岳两区从南部联结起来；冀鲁豫平原区，则经过解放后之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与太行衔接起来；南乐城与十滩等据点完全占领后，卫河大部被我控制，冀南与旧冀鲁豫的隔断便成过去了；五寨收复后晋西北与大青山两区联系加强；蒋坝等三大据点的攻克，使敌人分割我两淮联系的阴谋被粉碎了。大营镇的收复，使晋察冀与晋绥之间的联系比过去容易了。

同时，开辟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地区，和收复了许多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带。前者的例子，便是挺进道清，控制豫北，和苏浙军区的建立。豫北处在平汉、道清、新汴三路之交会，现我军已解放为三条铁路所环抱的原（武）阳（武）平原；平汉路西黄河

北岸济源、盂县、温县、沁阳等县已成孤城，并占领白坡、坡头等重要渡口，黄河天险已不能阻断我南北两岸解放区之联系了。长江三角地带历来是中国经济重心，现为敌寇侵华军事与伪宁总部所在地，将来盟军登陆，这里可能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苏浙军区的成立，对于中国战场反攻事业，无疑会有很大贡献。

关于资源地带的收复，如太行西麓之晋城、阳城，以及平西的东西斋堂等地，都是有名的产煤区；晋城、阳城、陵川等地煤层都夹带铁矿；岚县西马坊产锰矿；特别是晋城，煤矿产量在山西占首位。至于其他平川或平原产粮区，如南宫、南乐、岚县等地，在新解放区中，比重也是很大的。过去敌人将我挤向山地，我们所占的多是贫瘠之区，如今这一情况也开始有了变化。

此外，还出现敌伪矛盾更加尖锐，伪军日益动摇的情况。岚县光复之前，城内伪军四百余人被敌缴械，经我多方争取，全部瓦解。阳城光复之后，伪军四百余，伪县区人员二百六十余，只有二十余人随敌逃走，其余都向我投诚。解放南乐、阜宁之役，生俘伪军官兵前者达三千余名，后者达二千余名，这是今年两次较大的战果。挺进豫北时，随军记者的通讯说："伪军望风而逃"。嘉山伪保安大队惧敌改编，起义反正，我军外合，解放该城。这些例子，都是上述情况的最好说明。目前许多伪军对于日寇败局已定，抗战胜利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曲线救国"是亡国亡头的政策这些真理。由于亲身经验，都有所认识；加以我军不断胜利，欧战又告结束，今后敌伪矛盾必更增长。因此争取和瓦解伪军的有利条件更增加了，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综上以观，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战斗，胜利进攻，已造成这样的形势：解放区天天扩大，沦陷区天天缩小，敌占城市和交通要

道日益陷于孤立；各解放区的胜利攻势稳步而持续地开展着。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敌人在目前还是强大的，敌人还可能向解放区进攻；敌人不独不会放弃对平原的争夺，就是山地，必仍将进行疯狂的挣扎；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尤其沿海要地，敌人更不会放松争夺，更会加强控制，以对付盟军登陆。例如在冀热辽区，自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九个月之久，敌人的“扫荡”从没有停止过；在山东，敌人已开始作全面性的“扫荡”。因此各解放区军民切勿因胜利而稍生骄傲急躁之心，我们一方面应该继续“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另一方面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新的形势为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毛主席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和在中共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指示我们：“要把沦陷区的工作提高到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色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时，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这就是说：要团结群众，准备力量，等待时机，实行武装起义，以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朱德同志在他的军事报告中指出今后军事任务的总趋向：“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所已指出了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到了现在，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上逐步地去准备实现的时候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对于目前的实际工作要有适当的部署，对于将来的变化，要有预见，要有打算。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解放日报》社论）

介绍晋察冀的劳动互助合作社

晋察冀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七、八年的激烈残酷的战争，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是很高的。去年在大生产运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他们把拨工队的组织提高了一步，在曲阳、阜平、涞水、涞源、易县、龙华、定唐、孟平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的劳动互助合作社。据晋察冀来延的同志谈，这些劳动互助合作社办起来后，得到群众的欢迎，对敌后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作用很大。目前正在典型试办中，虽无完整的经验，但根据现况，值得加以研究和介绍。

一

在没有谈到劳动互助合作社本身之前，关于产生它的环境和基本条件，需要作番了解。

敌后解放区“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游击战争”这一条，就是首先要加以说明的。

抗战以来，日寇对我人力、畜力、物力的掠夺破坏，是极端严重的。加以疫病的流行，水旱蝗灾的影响，以及将近全人口百分之二的青壮年参加抗战工作，就使得敌后农村中的劳动力大量地减少了。据北岳区农会一九四二年不甚完全的材料统计：北岳区劳动力比战前一般减少百分之七以上，某些地区甚至减少百分之十六以上；耕作牲口更是减少百分之四十至七十（而且畜力质量

大不如前）；肥料减少三分之一以至三分之二。因之，不论在巩固区和游击区，耕地面积和土地产量都大为减少。一九四三年敌人两次大“扫荡”，北岳区又受到空前损失。历年虽经政府贷款救济（仅去年二十二个县的统计，补充牲口即达二万二千余头，补充农具二十六万余件），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劳力缺乏的严重困难。

人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不仅是由于劳动力的缺乏，还由于战争的残酷和频繁。不论春耕、夏锄和秋收，以及进行其他生产，敌人都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群众迫切要求有效地对付敌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

须要再说一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提高了农民生产兴趣），尽管客观上具备了最成熟的条件，人民的“组织起来”，还是不可能的。

二

这种劳动互助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大体是以原来的拨工组织为基础，内容上由农业互助到副业、运输货易等的拨工；时间上由一个季节到长期的（由平时到战时）拨工；组织上由单人、单畜到几户之间的家庭合作互助，再发展到一个村的劳动互助合作社。但也有经过深入动员，以村干部为骨干，一开始便组织成为劳动互助合作社的，如曲阳郑家店的例子（去年六月十八日本报有过介绍）。

晋察冀的人民过去就有拨工的习惯。去年春耕运动时，经过政府的号召和领导，人力、畜力的拨工甚为普遍。但这种拨工一般规模很小，在组织和发展过程中，遭到了许多困难。如对象是不固定的，易合易散；只限于男劳动力，妇女、儿童不能参加，

或参加不普遍；缺少牲口的和劳力弱的，不容易组织进去；其他小活与手工技术拨不成；特别是许多没有劳动力的孤寡和抗属，根本谈不上拨工。这些困难是普遍存在的。经过干部和群众的努力，创造了家庭互助组和劳动互助合作社，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基础。

唐县田竹林的家庭互助组一共三家，其中赵丫丫土地多、人力少、畜力弱，田家则人强力壮、牲口好。三家合作后，全体劳动力都能因材使用。强的牲口耕地，弱的送粪；赵年纪老能扶耠子；老年妇女早起做饭，青壮年妇女背土、垫圈、推碾子；三家六辆纺车一起纺线，情绪高，又省油。阜平皂火峪的家庭互助组原共九户，现已成立劳动互助合作社。

灵邱王巨村的劳动互助合作社是经过一个自然阶段发展起来的。合作社重新整理后，首先为群众解决公粮运输，由抗勤的无代价变为合作的有代价，许多贫苦社员的生活得以改善。去年春耕开始，合作社干部参加组织拨工。夏锄拨工改由合作社领导，共有社员互助小组十个，全村男劳动力百分之九十三、妇女儿童劳动力百分之六十一都参加了拨工。各种会议、惩奖、折工制度都坚持的很好，民主互助精神随之发扬，如替抗属代耕利用早晚集体做。修滩时，需要更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于是村社抓紧时机，号召社员组织劳动互助合作社，得到全体赞同。随即动员社员存粮，解决了三十三个劳动力的吃粮。同时利用农闲，调剂剩余的劳动力，从事其他副业生产，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组织起来。合作社办有供给、信用、运销、染坊、磨坊等业务。磨坊节省了妇女推碾功夫，有四十个妇女便被组织在做鞋组和纺织组中。现在王巨村社已成为全县的模范合作社。

三

劳动互助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和办法，据目前情况，主要有以下五项：

（一）人力、畜力、实物、钱币都可以等价换工和作股。正如涞水范家台合作社社员说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

入股折工办法，以成年男子劳动力一个整工为准，各种劳动力、畜力、实物与钱币的折合率是公议的，不长期固定，按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规定其比例。物股与钱股，大体按一个整男劳动力一天吃的米饭和当时工价合计，作为一股。这样使人工与畜工都有了价值。粗工能变细工，细工能换粗工。女童工或别的技术工，可用其生产额等价顶工，如木匠作一个锅盖、妇女作一身单衣都顶一个工。没有劳力的户可以现金或实物入合作社，按工资折合用工。劳力多的人，与其他人拨了工，也可支取工资或实物清工，也可向合作社存工。

拨工是建筑在私有财产制上的，因之等价交换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先小人，后君子”，大家遵守，以免发生纠纷，妨拨碍工的发展。晋察冀有许多村庄，为了求得等价、计工方便，在街上钉一个木桩，按日影来定作息时间。同时又把一天分成五节，早饭前为一工，早饭后至午饭为两工，午饭至晚饭为两工。必须发扬互助精神，但只有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才能作得好。

（二）以户为单位，分别自愿编组，统一领导，分散活动。

户是农村生产的单位，组织拨工时，必定以户为基础，才能巩固，也才能与家庭生产计划相结合。编小组不能强拉硬牵，要按自愿的原则。不过一般要适当照顾以下情况：有牲口的与没有牲口的，有人力的与没有人力的，地远的和地邻的（战时可互相调

地），懒汉和勤快的，以及亲属关系等等。小农生产，土地分散，活计零碎，每组户数不宜太多，否则不便拨工。

合作社以小组为基本组织单位。拨工必须坚持“定组活拨”的原则。有了活先从本组内拨，实在拨不开，再从别组内调剂（战争时，经大家同意，可以各组混合编制）。由于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地之远近、劳力技术好坏强弱不等，所以领导拨工是个很细密而又需要很灵活的工作，领导干部必须有大公无私的精神，真正做群众的模范，否则互助组不易巩固，甚至垮台。曲阳范家庄打枣虫时，外村工资比本村高，因此许多社员都到外村打短工去了，以致影响枣收。这是因为村长兼合作社主任是一个富农，压低工资、贪图私利所致（后来群众开会将他罢免了）。合作社计划全社拨工，同时还要组织余工发展其他副业，总的领导人关系特别重大。

（三）拨工、调工和雇工的统一。

拨工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整拨整还。就是人还人，牲口还牲口，人还牲口，牲口还人，工资抵工，总之一个整工还一个整工。这种拨工方式是主要的。

整拨零还。这种拨工用于缺劳动力的户，人家给拨重活，自己用轻活慢慢分期还。或由合作社垫付工资，由用工户作各种手工活，赚了钱分期来还。

零拨整还。无劳力户先给有劳力户做轻活，将来换工，或者做粗工换细工。有的贫困农民向合作社借粮食吃，积欠到一个工，将来或替合作社做运销（即搞运输贸易）抵工，或给别人拨工。

这样的拨工对各阶层农民都很有利，同时也容易把妇女儿童的轻劳动力及各种副业都吸收到合作社来，同其他业务相结合。

调工由合作社根据不同的活、不同的技术，和各组劳力不足或有余的情况，有计划地实行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的调剂；照顾

庄稼的紧缓先后，集中调工；以及对贫苦户和抗属的互助轮调。调工的好处是可以很好组织劳力，计划使用，不误农时，不浪费劳力。但调工一定要注意技术条件和等价问题。开始时要多作解释，说明调工决不是派工，今天调你一个，一定在明天或短时期内还你一个。

单纯的工拨工，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还需用雇工（工资抵工）的办法来使用余工。有些贫农地少，除拨工外，还需要打短工；有些富农参加拨工后，还得雇工。这样合作社可统一包工（外来短工由合作社接待），农忙时的工资也易于平稳。这对富农是很有利的。

拨工、调工和雇工的结合运用，应以拨工还工为主，辅之以调工（建立在小组拨工上的调工）和雇工。这样可以克服劳力的不平衡，调剂各种不同的劳力，使其等价交换。

（四）制度是根据实际需要规定的。

计工算工一般以户为单位，及时由小组长给各户计工。本小组内的拨工，可不经合作社计工。调工和包工（雇工）则需经过合作社计工。同时要按期齐工，农忙时一般七天或十天一齐工。齐工制度促进大家拨工，欠工多的人得想法还工，所谓“勤拨勤还，再拨不难”。

通过健全的会议（和汇报）制度，才能很好掌握劳动力，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同时还可增进团结，进行教育。小组会、小组长联席会和社员大会，会期应根据农业季节的需要而定。计工拨工，一切大小问题和困难，都可在会上求得解决。

其他惩奖制度、劳动公约和按期分红等，根据具体情况规定，都是必要的。

事实说明，劳动的分工越严密，劳动的效能要求越高，则各

种适合时宜的制度就越需要迫切。

（五）农业生产与其他业务相结合，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增加人民的财富，使合作社更发展更巩固。

现在出现的这些劳动互助合作社，除以农业生产为主外，还进行了多少不一的各种副业生产，包括运销、供给、信用、织纺、作坊、医药，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运销能利用农闲时的畜力和人力，并代运公粮，帮助坚壁。供给解决社员的日用品，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信用与政府贷粮救济配合，吸收社员存粮存款，贷与贫苦户，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医药合作，减少疾病和死亡（敌人破坏带来严重的疫病流行），间接帮助了生产。作坊是根据当地群众需要而开的。其他业务上创造很多，如许多村社与社员合伙养猪和鸡，皂火峪村社的养老入股、结婚入股等，兹不一一例举。

由于敌后农村不单处于自然的而且处于人为的（敌人封锁破坏）环境，人民一般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运销，就日甚一日地仰给于自己动手解决。因此，敌后农村的小型合作社朝向综合性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四

根据以上所谈的组织原则和办法，劳动互助合作社比一般拨工、包工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前进了一步，集体化的程度更高了。概括起来，从五个方面补足了一般拨工、包工队的弱点，使得今天处于“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的人民经济生活，得到较快的发展。

第一，有固定的社员，拨工互助是长期的。

这个优点使一年四季的农作活动——农忙和农闲统一起来。

正如去年晋察冀农民中流行的话："往年不组织拨工没活干，组织了拨工老干不完。"农闲时，编席、织口袋、刨药材、纺线织布、压绿肥、跑货易……活儿确是干不完的。从而各户以至全村的生产计划的完成，也得到保障。而且社员之间，经济关系结合得更紧，相互关系便日渐亲切，互助组织易于巩固。

第二，一般拨工队在生产中都能起取长补短、调剂有无的作用，但不如劳动互助合作社的广泛，即一切劳动力、生产手段和工具，都通过合作社被组织起来。

例如邓家店社阎作祯一组，被称为"三益台"。一益：一个抗属有地有牲口，缺乏人力；二益：阎作祯两家有劳力，但缺牲口；三益：三家的土地都在一道山沟里，种地方便，战时还能继续拨工，不误生产。

又如曲阳涧子村社，在打枣虫时，人力都下了地，牲口在家闲着，合作社就抽出四个会赶牲口的，专门照顾全村二十四头牲口跑运输，这四户的地由合作社拨工耕种。涞水岭西村的三十多个小学生，农忙时，由教员率领抬水，保证全村每家一天连吃带用的水都够用。合作社还组织小学生打毛袜，织带子。

第三，互助范围扩大，各种不同的劳力、钱力和物力，依等价原则通过合作社实行交换调剂，保持了一定的分工。农村过去是有分工的，如木匠、铁匠，但他们自己的地往往种不上。抗战后，人家雇不起，卖工活少，使固有的分工逐渐失去联系。有了分工，才能各显其能，促进小商品经济的发展。

例如涞源范家台村的寡妇刘丑子，儿子十二岁，女儿七岁，种地九亩，自己又是长期病人，去年对生产很发愁。后来她加入了合作社，入玉米三十六斤、边钞三百七十元、小猪一口，全部土地都种好了。锄苗时，合作社给她拨去九个人，完成十四个工

的活。有劳力剩余的社员刘月华，他会修盖房屋，女人会做针线，夫妻二人共计入三十多工。女人纳鞋底五十双，共得工资米十斗；还抓紧空隙，从合作社预支工资小米，开了四亩荒，生活得到保证。又如社员刘学镜，春季到外县贩布，这时正锄头苗，合作社即找有剩余劳力的社员帮他锄了，他以后还工或还钱。

第四，劳动互助与一般供给、信用业务结合，从生活、农具、种子等方面，保证了人民再生产的能力。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连年荒歉，晋察冀一般贫农，春耕时缺吃粮，顾不上自己种地，许多都出外打短工。政府的贷粮救济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需民间自己调剂。合作社信用业务扩大，富裕者存款、存粮能分利，战争时又可免自己坚壁；贫苦农民则由合作社借到粮食，不会再荒地了。农具和种子的供应调剂，合作社更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第五，根本没有劳动力的孤寡、病户，以及抗战勤务和抗属代耕等，都得到合理的解决。

农村中无劳力的孤寡，有史以来就是命定的灾民，他们的生活是毫无保障的。抗战后，孤寡、病户的数目增加，曾成为敌后农村中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劳动互助合作社成立后，为他们调剂劳力，代垫工资，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上从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曲阳涧子社社员阎秀成，全家母子四人全病倒了，合作社调工为他们把庄稼种好，他们病好后再慢慢还工。社员甄生尔母子二人，既无劳力又无吃的，合作社借给小米，并调工帮助，收买他母亲作的鞋，以盈余抽还。

抗战勤务与生产劳动常发生矛盾，为抗属代耕过去也存有缺点，现在这两项工作都由合作社统一筹划，出抗勤户的生产不受影响，抗属的家务也能建立起来，无形中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总结起来说，劳动互助合作社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一切劳力、物力和财力，都尽可能最广泛地被使用了，使得农民的生产力和小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五

广大的农民已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之后，毛主席说："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这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些劳动互助合作社所在的村庄完全得到证明。现仅举出平西过去经济文化最落后的涞水岭西村的例子，以见一般。

经过全村群众大会的讨论，岭西村的学校、社教都由合作社统一领导。合作社添了一个教育股，负责解决教室用具等设备。合作社会计也教课，小学教员帮助会计算账。教育经费存到合作社，用时就支，还能生利。合作社的包药纸，先让学生写了字再用，解决了纸张困难。教育与人民的实际生活联系得很紧，如妇女组讲怎样种菜、选种，抢秋组讲坚壁。政府一切政策法令，传到村子里先进行教育。家庭会议开得好，婆媳和睦了，两口子不吵架，打骂孩子的现象也少见了。有一个赵振其受了感化，在社员大会上坦白承认了一九四〇年敌人大"扫荡"时，他支应敌人，烧了赵致忠坚壁的东西，甘心愿意赔出，因此解决了一个悬搁几年的旧案。全村旧有的私人借贷关系共有十几家，积年未清，弄得人同人、户同户之间很少来往。后由合作社出面清理，欠债户算是欠合作社的，放债户算是在合作社存款，双方都不吃亏。这样解决后，大家笑得合不拢嘴，双方都说："以后咱俩还得亲着点。"由于卫生工作做的好，合作社的医药又方便，去年八月疫病流行，许多村

子的人病了一半，岭西病倒的却只三个。现在不管问到岭西哪个人，他们都说："咱们村什么都合作了。"

上述生动的事实，说明农民经过集体劳动的生活，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人与人的关系起了变化，他们不独对从事经济有了兴趣，对政治文化生活同样有了兴趣。岭西村的社员说得好："人们有了饭吃，谁不愿意识几个字！谁不愿意干干净净过舒服点！"

六

农村中"任何经济文化事业，必须通过合作社才能完成好"，我们前方后方的经验都是如此。但要注意一点，就是合作社不能代替所有的工作，不能把一切工作都统一于合作社，变成"一锅粥"。合作社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核心，同时对农村中其他各种政治、武装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动的作用。

劳动互助合作社之异于现在一般的合作社，是它以组织农业生产为主。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的农村，生产非以农业为中心工作不可。合作社在组织上虽不必强求与拨工合一，但要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在业务上则必须以帮助农业生产为主，如粮食救济、农具种子的解决等。如果只以运销、贸易、副业生产为主，它的作用就只限于农闲，限于为一部分人谋利。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应为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和雇农解决困难，使得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所以就这一方面来说，劳动互助合作社的意义是特别大的。

七

根据现有的材料(到去年十月底止)，这些劳动互助合作社还

没有遇到什么根本的困难。晋察冀有些县已提出，这是一般村合作社努力的方向。这主要由于这种形式的生产团体，与今天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和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完全适应的原故。

劳动互助合作社虽然集体化的程度高于一般拨工队，但它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拨工性质(不过拨工的方法、时间、样式不同)，并未超越私有财产制度(生产手段和生产品都是私有)。

它便利于个体农民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贫雇农和中农，而且也有利于富农。晋察冀许多贫农，几年来耕不上或耕不好(耕不深锄不好)自己的地；雇农也常吃工资不平稳的亏。如今拨工调剂了牲力，锄草起码两遍，不会再有人操纵工资，缺粮可先向合作社借，剩余劳力也有地方使用了。富农则不愁雇不到短工，农忙时工资不会太高涨，而且劳动效能提高，缩短了农作过程。总之，合作社组织了所有的劳力、物力和财力，使各尽其能，自力更生。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中，劳力不足和被敌破坏封锁的严重困难，就得以突破，得以克服。

今天敌后农民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他们乐于参加这种互助团体，我们就必须警惕、防止产生“左”的倾向——无视今天低下的生产力和被它决定的私有财产制，对于集体化程度和农民觉悟程度的影响。去年陕甘宁边区出现的苗店子式的“集体农场”，将土地、工具和劳动力，以及日常生活“集体化”起来，结果收获减半，“集体农场”闹得个不欢而散。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指出，晋察冀的劳动互助合作社的出现，除其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还必须具有基本群众的优势、一定的干部和一定的拨工基础这几个基本条件。同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所在地的村庄都是一百户以下。人烟稠密几百户的大村庄能否实行，还有待将来的实践证明。

私有财产、个体生产和集体计划、分工经营，本来是矛盾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人为地克服这种矛盾。但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一环一节、一点一滴发生障碍（如领导者为私，牲口未得到爱惜）便影响全局。"组织起来"不单要有基本条件，而且要根据具体条件，决不能不看对象，照样模仿，犯形式主义。否则，不但劳动互助合作社搞不起来，连一般的拨工，群众也不愿意。

以组织全村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为主，逐渐向综合性发展，晋察冀的劳动互助合作社为这个方向起了示范的作用，值得我们重视。但由于目前还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以上写出的材料和意见，还有待事实修改和补正。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十三、十四日《解放日报》）

晋察冀对敌市场斗争

没有市场，就没有贸易阵地。因此集市的斗争，便成为敌我金融、贸易和税收争夺战的一个焦点。

曲 阳 的 例 子

敌人在曲阳城内设立了“满洲株式会社”，专吸收皮毛等军用必需品，并有权调动敌兵出外抢劫，随时以武装斗争配合经济斗争；又设立“兼松洋行”，企图实行商业垄断，另外利用城关据点中某些知识分子经营商业，来往于曲阳北平间，以繁荣市面。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在城内、燕赵、下河等地的集市确曾繁荣一时，如在六区南留营一个庙会上，敌伪收税达五千余元。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敌下令禁用边钞（边区发行的纸币），并特别召开伪村长会议，“限二十日内一律停使”，“违者严惩”。接着就在各个集市上派员搜巡，没收与故意撕毁边钞。这里的老百姓原是以边钞为本位币的，敌人这样做自然引起群众更大的不满。我们于是一方面发动合法斗争：“不用边币买不到东西，没法过活。”同时动员群众不赶伪集。恰好这时敌人为征调伪军，在下河集抓夫十九名，并有伪军在集市周围拦路行劫，我们就抓紧时机宣传，派武装封锁集市，四区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经常出来袭击，敌人的集市很快就萧条了。伪县长无法可施，曾几次建议敌方缓禁边钞，也没有得到结果。

由于敌人集市萧条的影响，斗科牙行对敌人的集市也没有大兴趣了。事实上也证明，抗日政府是真正欢迎和保护敌占区商人正当营业的。经过说服争取，下河镇的斗行便都过来了。没有了斗行，下河集随着就垮了台。

其间还交错着税收的斗争。敌人要大税（牲口、斗、猪、划头捐……等），从前是向各村要，在下河曾雇人收，后来改为招包。税率是伪钞六分，按边钞合价，伪币纳税。最初有人一集出款两万，没有包成，后来燕赵镇的张某等贿赂伪县长二千元，以六千元包下了。南留营庙会上那次收税款五千元，我们地方武装马上出动，将税款夺过来，从此燕赵镇伪收税的也不敢来收了。下河集垮了台，税收更谈不到。

敌据点集市的萧条与纷纷垮台中，我们的集市就大大繁荣起来。有的地方原来十天三集，每集不过千余人；现在隔日一集，每日达二千人以上了。边币信用更加提高，税收也跟着增加。据曲阳两个区一个月的统计，用各种方法从敌区贩来的货物：粮食七百余石，食盐五千八百余斤，土布七千八百余匹，火硝四千二百余斤。老百姓在我们集上能买到便宜的必需品。

攻不破的阵地

某区通往保定的大道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市，附近四、五个县的货物都在此聚散。这集五天一次，货物是相当可观的：入口的盐每集不下两万斤，火硝五、六百斤，火柴五、六百包，有时还有各种军用品；出口则有山货、生猪等。每逢集日，人山人海，似乎都忘记了不远就是敌人的封锁沟。

敌人常利用汉奸造谣“炸集”，武装截击货物，奸商囤积必需品抬高价格，或是直接以武装包围，企图把我们的集市打垮。可

是这个集市在战斗的锻炼中，已有很好组织，有情报联络，建立了山头哨，规定信号，划分了防空区与撤退方向，有坚壁货物的设备。

集上原来驻扎着县公安局的派出所、边区公安局的检查站和贸易支局的贸易卡，起初大家是各自为政的。集市“炸”了，都有点莫明其妙。后来就联合起来，化装成老百姓去赶集，三个集以后，发现了卖凉粉的瘦小个子、担盐的老头子等，原来都是领头喊“鬼子来了，快跑呵！”的，把他们抓起来，搜出伪钞一大卷，他们就伏首贴耳供出是受城里敌“宪兵队”的收买干的。因而满集都哄动了，“原来是特务分子捣乱”。此案破获以后，就再没有发生无故“炸集”的事了。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的重现，又将集市化整为零，找了片树林隐蔽营业，彼此相隔半里，集期改为两天，变大集为小集，并建立了秘密锄奸小组。集市也常常搬家。

但对于敌人收买本地小贩侦察我贸易路线截击货物的阴谋，起初是感到相当棘手的。虽然曾在路上规定各种暗号，设转运线，仍归无效 。几次经验以后，已观察到毛病在几个小贩身上，因为每当敌人出来截击的日子，他们一定不在。以后就改变了旧贸易路线，在新线中间增加许多小型交易站，买卖双方不直接交易，即使一个站被破坏了，还不会影响全局。过封锁沟的方式也多样化起来，大批必需品过沟时，就武装保护一番。

贸易前线的战士

各个集市所以能冲破敌人封锁，取得大量物资交易，主要还是依靠那些众多的勇敢善战的小商贩和脚户。敌人常以武装封锁要道路口，捕捉截挡他们，不仅没收货物，有时连性命也不保。但是由于广大敌占区商人对敌仇恨的增长，以及抗日政府对他们

的帮助保护，这些小商贩、脚户都紧紧团结在我们集市的周围。他们熟悉敌伪的特点与规律，有很多巧妙的办法来应付敌人。在敌人据点中有各种“暗集”，这是一种不定时的秘密的分散的交换场所，哪家有盐，哪家有煤油，小贩、牙纪和脚户们都知道，从早晨到夜晚，暗地进行着交易。从甲据点往乙据点运货时，沿途设有歇货的地方，敌人是无法破坏的。他们每人赶着一两头牲口或连背带担，瞅着敌人的弱点与空隙，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冲破层层封锁线，来往于线外与根据地之间。如以每个牲口驮百五十斤、每斤驮价一元五角计，三天往返一次就可得四百五十元，脚户如兼小贩，利钱当然更大。

政府对这些小贩、脚户予以各种帮助和保护，公营商店（多为分散的转运、货栈性质）和合作社都尽量吸收私商、小贩、牙纪参加，常贷给他们资金；货栈则招待客商宿食，代替他们买货卖货；私商小贩卖不掉的货，可以交给合作社代卖，或存放靠近游击区的货栈，都只收很低的经手费，并可为他们办护照，兑货币。小本借贷根本不收利息，只在赚了钱以后分一点红。

接敌区的贸易只能分散活动，我们团结了广泛的私商小贩，坚持了我们的市场。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关于统一累进税在晋察冀的实施

一

统一累进税是合理进步的税收制度。它的实施，廓清了中国过去税收制度上的混乱芜杂；废除了过去那些耗费巨大、层层中饱的林立的税收机关；取消了那种看起来好象是征收了商品制造者和商人，而实际上却经过商品价格的提高，完全转嫁到商品消费者亦即大多数贫苦人民身上的间接的商品税。统一累进税是按财产和收入，确实征收财产所有人和收入所得人的直接税；并且还确定了按照财产和收入的增加而递增税率的合理的累进办法。因此，实行统一累进税是税收制度上的一大革命，是真正符合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合理原则的。

实行统一累进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远在中共成立之初，一九二二年五月所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大会的宣言上，就向全国指出：必须"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之后，在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政纲"中，又明白规定了："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抗战以后，一九三八年中共扩大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更清楚地指出："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

无疑的，这一税收制度若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便能使中国财政走上健康、合理、正规的道路；便能促进抗日战争的早

日胜利，使得新中国的建立在一个方面有了具体保证。

二

晋察冀边区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件伟大的工程——统一累进税制度。这是值得全国人民庆幸和注意的一件大事。

晋察冀边区一九四〇年八月颁布的施政纲领上，就规定要实行统一累进税。九月以后，开始进行动员工作。边区政府为着慎重起见，该年十二月曾颁布“统一累进税办法草案”及“细则”，多方征求各界意见，几经修改，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布“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细则”仍旧）。根据这个“暂行办法”，归纳起来，约有下面几个要点：

一、规定边区所有经费，全依统累税办法直接向财产所有人、收入所得人征收。征税对象分为财产税和收入税两种：农业部分，以财产与收入合算为原则；工商业部分及其他财产和收入，以财产与收入分算为原则。规定了何者征税，何者免税。

二、规定土地的“计算单位”为“标准亩”，其他各种财产和收入的“计算单位”则为“富力”。所谓“标准亩”，是以三年平均产谷十二市斗（一六二斤）计算，以地租为产量千分之三七五做标准。规定自营地每一标准亩为一富力，出租地每一亩半为一富力，佃耕地每二亩算一富力。其他各种财产以市价折算，每二百元算一富力，其他各种收入每四十元算一富力。

三、分税等为十二等。第一富力为第一等，二至三富力为第二等，四至六、七至十、十一至十五、十六至二十、二十一至三十、三十一至四十、四十一至五十五、五十六至七十五、七十六至一百一十五富力，分为第三至第十一等，一百一十五以上所有富力为第十二等。从第一等起至七等以零点一为累进率，从七至十

二等以零点二为累进率。规定征收单位为"分",按富力定分（第一等每一富力以一分算，二等一分一厘，至十二等为二分六厘）。到十二等即不再累进，是谓最高累进率。同时，规定以一个半富力为免征点，各项财产收入合计每人不足一个半富力者免征，超过一个半富力者，只就其超过部分征税。但因各地富裕程度不同，人民生活水平有别，又规定免征点升降，以行政村为单位，纳税人口不得小于百分之七十，或大于百分之九十。

四、规定分数的计算与征收方法，不论男女老幼、大口小口，均以一人计算，工商业和合作社以一户论，寺院、族田、村公产以一户一人论。

五、规定调查评议办法，以及区村组织审查委员会等。

晋察冀统累税工作的全部进程，可以分为三个互相连接、互相交错的阶段：一是宣传动员试验阶段，二是调查统计阶段，三是征收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一九四〇年九月到十二月）的工作，又可分为三个步骤：一、动员干部研究试验；二、向群众深入宣传动员；三、组织党政军民的力量，完成调查工作的一切准备（如组织、干部、以及事务等方面）。在这个工作刚开始时，有些敌探、奸细分子在群众中进行造谣破坏，说:"累进税就是累尽税，要把每个人的家产累完。""每人除一免征点后，要将所除的收入一下征去。"更有以"左"的面目出现，说:"过去有些不负担的人，今天也负担上了，这个合理。"诸如此类诬蔑，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以后，很快就消灭了。

第二阶段（一九四一年春夏）的工作，可分为调查、计算、审查、评议、统计、总结等六个步骤。调查统计的详实与准确，对于统累税的完成，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繁杂而艰巨

的工作。冀中我政权能到达的计有三十五县、六千六百九十八村，完全以暂行办法进行调查的计达四千二百〇七村，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未调查财产只调查土地产量的占百分之八点三；只调查土地亩数的占百分之五点二；不能调查单凭估计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由此可见，冀中如此被残酷“扫荡”的地区，都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能完成调查统计工作。

第三阶段（冀中六月到八月完成，北岳区稍迟）的工作，分为分配、动员征收与入库结账三个步骤。去年全边区分数共一千六百六十万分强（冀中一千万分，北岳区六百六十万分），每分负担小米一点三五（北岳区）至一点四市斗（冀中区）。

关于负担面，冀中负担人口达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二；北岳区平均百分之七十四点四，有的县超过百分之八十，最低的百分之六十。冀中的纳税富力占总富力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各阶层负担的数量是不同的，据冀中两个代表村的统计，单钱粮两项（草及地方款未在内），地主负担占其总数收入百分之二十二，富农百分之十八，中农百分之十，贫农百分之三点五。

实行统累税后，各阶层的负担相对地减轻了。因为负担面扩大，纳税人口增加，每人负担数量便相对减轻。雁北的地主说，“早实行统累税三年，我们就不会逃亡”；冠县一富农说，“我卖了六个母鸡的蛋就可以完税了”；一般贫农说得更轻快：“打一两天柴就够完税了。”晋察冀的老百姓谈到统累税时，莫不眉开眼笑：“边区真有聪明人，想出这样好的办法。”因此，统累税最后的征收工作极其顺利。冀中原定两个月完成，结果个半月完成，有些地方不到三天就完成了。

三

晋察冀去年实施统一累进税，总结起来，有哪些方面的成就呢？

首先，使各阶层在负担抗日经费上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纠正了过去负担面狭小的缺点，使各抗日阶层的团结更加巩固。

第二，规定了适当的免税点，保证了极贫苦户最低限度的生活；停止了过去的累进率，减轻了地主、富农的负担，进一步保证了一切抗日人民的地权、财权。

第三，废除了统一累进税、出入口税和田房契税以外的一切税收。

第四，奖励了工商业与农村副业的发展。

第五，逐渐整顿了村财政，使财政制度更加健全，向正规化的道路进了一大步。

为什么统一累进税在晋察冀能获得胜利实施呢？边区政府主任委员宋劭文总结其原因道：

“一、我们把统一战线进一步贯彻到税收政策里边去；进一步把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具体化；进一步照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团结各阶层人民坚持敌后抗战，扩大负担面至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二、统一累进税是凭调查、凭估计的，这比过去合理负担一般凭估计不凭调查好的多。谁钱多谁钱少，调查是最好的证人。按照个人的财产收入来定分，按分数来征税，当然是公平合理的。并且在全边区又运用了统一的办法，平衡了各县的负担，废除了田赋等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实践了一年征收一次，进一步保障了财源。

“三、边区人民一般都是经营农业或兼营农业的，而我们农业累进税的办法，克服了土地难于调查、地价难于估定、货币购买变动力太大（在战争环境下）等困难，把土地及其收入的计算，统一在标准亩与富力的单位之下。我们的这一创造，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四、边区广大人民一本爱护边区坚持抗战之旨，忠实于政府法令，并坚决执行，特别是过去三年来一向没有负担的比较贫苦的人民，以民族国家为重，爱护边区，不肯后人，勇于负担，不生怨言，更值得我们同声钦佩。而我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在发扬民主作风、反对本位主义上亦有很大收获。凡此都是统累税实施胜利的重要条件”。（见“统一累进税则的修正公布”一文，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晋察冀日报》）

四

不过，统一累进税究属初次创办，缺乏经验，又处敌后战争环境，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旧法规（“统累税暂行办法”）有以下重要缺点（均参考上文）：

一、在农业方面，没有照顾到复杂的租佃关系，与出租地不同的租额。以地租都是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假定出发，规定出租地与佃耕地的税法，把租佃关系简单化，因而发生地主、佃户的收入税与收入脱节，以及自耕农与佃农相较，土地税与土地脱节之弊，故使得地主的负担过重，租额在土地产物百分之十以下者，甚至尽其收入不足纳税；同时低租佃户的负担较轻，高租佃户的负担较重。而同一土地，自营所计富力与出租佃耕双方所计富力不等，也是不妥当的。

二、在税等累进方面，纳税人口最大的富力层在第一和第二

税等。这两个税等的纳税人口，占全部纳税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只分了两等，因而等距长，累进缓，贫者吃亏，稍富者便宜。纳税人口在五十五富力以上的人数就很少了，因而九等以上的各个税等的划分是不妥当的。

三、工商业、合作社及家庭副业，因战争频繁很容易遭受损失，且其消耗大于农业，旧法规税率嫌重，致影响其发展。

四、在免税点方面，为达到纳税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负担面，去年规定以行政村为单位升降，这在去年是权宜之计。百分之八十的负担面应就全边区计算，以行政村为单位是不妥当的。

五、在计人口方面，旧法规规定在外县财产的收入，或财产在边区、全家均在边区外者另列户，一户均按一人计算。这样特别加重了大地主等的负担，致发生收入不足纳税之弊。

边区政府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贯彻了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精神，特将税则加以修正。使得人人的收入都够纳税，纳税后人人都能生活；使得军需民生更进一步充裕，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并且适当减轻地主的负担，保障其财权、地权；再适当扩大一些负担面，贫农只有低微的负担，以保障群众生活。

税则的重要修正，兹略举数端说明如下：

一、首先是免税的财产、收入面扩大。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凡不雇工不雇伙、利用农闲进行的家庭副业，与合于合作社组织条例经政府批准的合作社，其财产与收入完全免税。其次是商业资本存谷（不是存在家里的）、放款、存粮一律免税。这些都有利于边区经济发展。

二、财产税与财产合拍，收入税与收入合拍。在农业方面，土地与土地收入分算，土地所有人负担土地税，地主之地租收入及

经营农业者之收入是收收入税。土地多的多纳税，少的少纳税；收入多的多纳税，少的少纳税，一矫去年某些收入税与收入脱节、财产税与财产脱节之弊，使得负担更公平合理。

三、降低标准亩（由十二市斗改为十市斗），并改变标准亩的作用。去年，标准亩是农业累进税的计算单位，现在改为单纯计算土地的单位，这是由于财产收入分算造成的结果，一矫过去标准亩混淆财产收入之弊。标准亩的降低，只是计算单位的缩小，这对于征税上并无直接影响。负担面的适当扩大，是由于实际免税点降低而造成的。

四、缩短等距（十二等改为十六等），缩小累进率。等距短，累进率小，使统一累进税更进一步公平合理。由钱少少出到钱多多出是递加累进的，这样钱少者可以负担得起，钱多者更可负担裕如，一免过去等与等间跃进之弊。

五、工商业税减轻了。财产以四百元计一富力（去年为二百元），总收入除消费（每一经营人员每年平均三百元计）后，每六十元（原来四十元）计一富力，总收入四十元为一富力。这样比农业收入税较轻，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六、免税点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升降取消了。北岳区、冀中区每一地区的免税点一般都是一致的。今年北岳区的免税点为一点五富力，冀中区为一点八富力。按新税则富力单位，今年的一点五富力比去年低零点三富力。这就是说，在冀中实际免税点同去年一样，在北岳区则尚低零点三富力，这正是北岳区负担面要扩大的所在。

除税则规定者外，还有一些特殊问题非税则所能列入，也有个别规定解决办法，以边府命令行之。如“以山坡地种莜麦者，因其种子、肥料、农具、牲畜之消耗较种植其他谷物为大，其消耗

特准按耕地总收获物三分之一除之。”“低租地其租额不及耕地总收获物百分之十五者，其财产税以收租每六市斗谷之土地计一富力。”凡粮价过低（低于中心地区二分之一者）的地区，可将工商业及各种收入折谷以计富力，但亦只限个别解决。

五

统一累进税是高级的合理的赋税制度。欲求其实现，根据晋察冀的经验，必须具备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首先就是群众已经真正动员和组织起来，普遍实行了民主政治，以及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等社会政策得到贯彻，并有坚决抗日的民主的政权和军队为之保证。这是最基本的。

其次，根据地必须相当巩固与固定。在残酷“扫荡”的游击区环境，实行这种严密繁复的办法，比较困难。

再其次，当地物资生产（主要是粮食）足够需要，或相差无几；财政相当健全，各种正规供给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第四，金融货币制度相当稳定，至少金融上有一定基础，能控制金融市场、调剂对外贸易。否则，币价不定，物价常变，预算不好做，统累税的实行就会受到影响。

最后，就是深入的动员，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统一累进税在晋察冀去年之能实行，并能获到成功，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解放日报》）

统累税则名词浅释

与“税则”同时修正发表的尚有“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施行细则”，因限于篇幅，特抽出其中要点，作为“税则”的名词浅释。——作者

耕地——指可耕的土地。无论公、私田，代管或没收汉奸之土地，一律征财产税。因敌寇挖路修沟等所占去的土地，都暂免财产税。

金银——供装饰用的金银手饰免税。现洋以白银论。

畜养——包括马、牛、驴、骡、猪、羊、鸡、蜜蜂、蚕等。

家庭副业——指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副，不雇工，不雇伙，利用农闲进行的事业。

地租——指土地所有人将土地出租出佃，或半租于人而收取定额地租，或分得一定比例之收获物而言。

农业收入——耕地的总生产物，除柴草秸根不计外，其余无论正副产物，一律计算在内。

临时经营事业——即非营业之个人，或未设商店的商人，而作不定期的买卖者；以及买卖与本业务无关物品，而其收入又不在本业务收入项下计算者。

谷——指去糠后，可得小米六成之谷物而言，不及六成或超过六成者，按其成色估计，照此标准折算。

平均年产谷——以抗战以来耕地的常年产量为标准。但以耕地种植的烟叶、蓝靛、棉花、药材或草木，以及主要以出卖为目的的蔬菜、棉麻等农作物，均按其实际收入折谷计算。并以县为单位。

消耗——指经营土地的种子、肥料、农具、牲畜等所费。此项消费如由地主、佃户双方或单方付出者，依习惯由双方或单方收入中除之。

纯收入——指地租、房租、渠租、利息，或其他租息，公营工商业的纯盈余，以及证券收入。

总收入——收入全部，不除任何消耗。如工商业的总收入包括纯收入、呆账收入及职员工人店伙工资、薪给、酬劳金、伙食费等项。

除免税点问题——免税点不分大口小口。或谓壮年吃亏，老小占便宜；其实俗谚“大口小口一月一斗”，也是平均计算的。故免税点采平均数算法。（附带对奖励生育也很有意义）

脱离生产合作社人员，在家不除免税点；不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者，在家除免税点。农业雇工在九个月以上者，在雇主家除一免税点；半年至九个月间者，在雇主雇工家各除半个免税点，不足半年者均以短工论，在雇工家除一免税点。公费或半公费受训学生，满一年者，在家不除免税点；不满一年者，一律除免税点；公费不及一半者，在家一律除免税点。

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

中国农民于自然界最感受威胁的，就是水灾和旱灾。一九二一年以前，全国平均每年水旱灾歉的面积，为一亿六千余万亩。抗战前的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每年增加到二亿七千余万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五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农业研究所的官方统计）。这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怎样迫切地需要建设水利，来克服水旱两灾的威胁。现在我们要向全国报导一件大喜事，就是在烽火连天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内，水利事业已获得空前的成绩。

根据本报最近几个月电讯的初步统计，今年春季以来，华北、华中解放区已完成的水利建设，其受益田亩最低估计在二百万亩以上（详见附表）。其中大工程，有保障皖中江北七县人民生命财产的黄丝滩新堤，长十三里，费工百余万；有蚌埠、临淮关间大堤，长三十七里，为淮河流域最大工程；有淮北淮宝县人字头河与大汕河合流处宽达一百四十丈的险要的人字头工程，费工三十余万；有湖北汉川湖区六十一里垸堤，费工十二万；有淮南路东高邮湖边圩堤一一七里，费工三十余万；有太行清漳河两岸的三道大渠，全长六十七里，费工十一万。

以地区而言，鄂豫皖区的水利建设，主要是灌溉与防洪，分为圩、塘、埂、沟、闸五种。按一九四三年统计，全区征收公粮土地五百万亩，有灌溉设施耕地达二百八十万亩。这就是说，该

区今后即遇旱灾，也可保证一半以上的收成。淮河流域自古就是我国主要农区，自黄河入淮之后，淮北、苏北的水利建设，即集中于防汛和下游各河道的疏浚。皖中各县地势低洼，人民以全力兴筑江堤、普修圩埂和改建水闸。因此，江淮河汉之间的解放区，水患已大为减轻。太行区将开渠、修滩、筑堤运动同救灾相结合，既建设了水利，又解决了灾民的衣食。一九三九年春季，晋察冀北岳区就提出“变旱田为水田”的口号；一九三九年大水灾后，展开了大规模的修滩运动；一九四一年发动“开小渠运动”，成效卓著。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的统计，北岳区单水渠一项，整旧开新，就有五千一百五十八道，因水利建设受益田地总计一百零五万余亩。自一九三九年敌寇制造大水灾后，冀中区河堤决口一百八十五处，被毁良田十七万顷，农业建设的中心，始终就在治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修险工七十一处，筑堤六百四十三里，堵决口三百零九处，疏浚河道一百七十三里，其中多为“民国”以来少有的大工程。

以上仅是近年来我华北、华中解放区水利事业的一个概观。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建设中的若干特点：

首先应当指出的，就是这些工程大都是在紧张的对敌斗争中完成的。例如兴筑蚌埠、临淮关间大堤的六十八天中，新四军彭师主力在铁路线上积极出击，牵制敌伪；成万修堤群众则在工程处流动指挥下，与敌伪隔河对峙；彭师主力并派遣部队前往参加和保卫筑堤。敌伪军曾几次偷袭我工程处，都扑空失败了。太行三大渠道修筑过程中，遇到敌情紧张时，民工夜里怕敌人包围，都到野地里睡觉；离敌人据点最近的开渠地方，敌人一出动，就进入战争状态；一九四三年夏季，敌人对太行“扫荡”二十多天中，整个修渠只停工三天。

其次，是在极端困难的技术条件下，完成了巨大而险要的工程，其中有许多是过去几十上百年所未能完成的。所有这些地区，都缺乏水利工程师。遇到困难就向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学习；缺乏钢筋水泥，就以好的岩石和灰砂代替；缺乏近代工程器材，就利用铁轨等战利品改制；运输则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几百年来，黄丝滩堤曾向后退建了九十多次，"民国"初年和一九三一年两次出险，有几百万人遭受灾害。这一次在战火中退建堤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坚实：底宽十一丈，顶宽二丈四，高一丈九；新堤几与江流平行，因此今后或许可能不再退建。

第三个特点，便是完工时间的迅速。我们可以将上述工程同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水利工程比较一下：有名的陕南汉惠渠，共长三十一公里，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动工，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才完工。且不谈战争环境、其他技术条件等两者不能相比，长度和工程艰难远超过该渠的太行三大水渠，费时仅十个月。黄丝大堤原订四个月完成，起初当地许多人都不相信，因为过去每次退建，最多不过六七百丈（此次二千一百三十丈），最少也要费时半年，特别是距敌太近，工程之难，远非昔时可比。然而，这一工程三个半月就完成了。

这里让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国民党近年来的水利建设工作。本届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政府农田水利报告的决议云："历年大型小型农田水利，赖有银行贷款，颇有成绩，唯以物价不断上涨……遂至现时不但新工程不能举办，即正在进行中之工程，亦多停顿。"这个"颇有成绩"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据《经济建设季刊》说："现在后方各省（按指豫湘战役之前）之耕地面积，在五万万亩以上，而其受水患灾歉之面积，平均每年约一万万亩。故站在国家农业政策之立场，推进农田水利工程之计划，应以一万万亩

为最高目标。唯以往利用农款推进之工程进度，每年不及二十万亩（按这一数字仅及解放区今春以来水利建设二百万亩的十分之一）。现时各省正在施工之工程，统计虽属二百万亩，然其中一部分为数年前兴工未完而本年度（指一九四二年）继续施工者；一部分为筹备开工，预备明年或后年竣工者（按与"亦多停顿"一对照，便知这种"预期"落空了）。故实际本年度之工程进度，约五十万亩。照此计算，需二百年方能完成一万万亩工程之目标。"（见该刊一卷三期"后方各省办理农田水利概况及今后推行方针"一文）据国民党政府农林部的统计，各省近年来（按指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其中间有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的数字）完成水利建设的总数，是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九百二十七市亩。依此计算，每年完成水利设施的耕地面积，不过三十六万亩。这两项材料，就概括了国民党政府全部水利建设的成绩。按参政会决议中"亦多停顿"四字来说，国民党当局今天的水利建设，虽在大后方和平的环境下，并在工程技术和物资供应等条件较之敌后解放区优越得多的情况下，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了。

在水利建设的绝对数字和工程进度方面（尚不论其为何人谋利），今天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同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解放区，其优劣悬殊之势，与目前国内两个战场上的军事形势，也毫无二致。

我们最后还必须考察一下，在敌后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为什么还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呢？其根本原因何在呢？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看看国民党政府修建汉惠渠的情形："沿渠人民均视征工为虐政，视筑渠为多余"；"鬻工卖伕，层见迭出，克扣工资，习以为常，于是伕不堪命，相率潜逃"。（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正中日报》通讯）可是敌后解放区的水利建设（一切

经济建设亦莫不如此），跟国民党这种为极少数人谋利的封建剥削、官僚营私制度根本不同，是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因之，各阶层人民都愿全力参加这一工作，再加上正确的领导和强大的部队劳动力的支援，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仍以黄丝滩大堤为例，该堤迅速完工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吸收各阶层代表参加工程委员会的领导；（二）实行“均伕”制度，废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剥削，使人民负担公平合理；（三）全解放区人民的遇事协作互助，打破了过去邻县彼此间的不相闻问，大家一致出钱出力；（四）彻底纠正了过去退建中官僚主义的领导，废除打骂，严禁贪污，全体工作人员同民工同劳动、同生活，在突击期间，临江几乎全部县区干部，都上堤劳动，因而群众情绪振奋，展开热烈的劳动竞赛运动。苏北大规模开浚河道，各阶层人民都得到实惠，贫农以劳动所得，按垦荒权利，获得了土地；地主的土地则增加了收益。他们都说：“共产党帮助我们开河，我们睡觉都笑醒了。”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生产事业上的胜利和发展，给予全国人民以奋斗的方向和信心。现在从水利建设的成就，又得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不仅能打日本，而且有能力来建设新中国。我们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忠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解放日报》社论）

附：今春以来华中华北解放区水利建设初步统计

根据地别	县别	何种工程	工程简述	受益田亩（旧制亩）	耗工数	备考
苏北	盐阜	疏浚河道	开浚永丰、潭洋、鲁滨等八条河流，共长80里，平均宽3丈，深1.5丈	145,000	约23万余土方，劳动者5万人	去冬今春两季完工
	灌云	挖河排水	灌云中心区东西40里荡田，地势低洼，常遭水淹，挖河道排水	200,000		三月完工费时半月
	淮泗	挖河筑堤	蒋集区挖泗河20余里，筑河堤二里	20,000		三月十七日完工历时四月
	沭阳	开港	五区咸卤田甚多，开港九里，宽3丈，深7尺	22,000	27,000	四月完工历时半月
	射阳	疏浚河道	疏浚18里长的建华河（以区长名）将500顷薄咸地变成好稻田	50,000	50,000	六月完工历时七一天
		筑堤	在马家荡（位苏北苏中间）中建筑大堤改造地形，长600余丈			四月完工历时仅三天
	宿迁泗沭	疏浚河道	浚通横贯两县之崇河			四月完工
淮北	凤阳	筑堤岸	蚌埠、临淮间大堤。长37里，为淮河流域最大工程		100,000	
	同上	修闸	修复北淝河与淮河接口处10余丈宽之三洞大水闸，洞高2.4丈，阔1.3丈			

续表 1

根据地别	县别	何种工程	工程简述	受益田亩（旧制亩）	耗工数	备考
	盱凤嘉	修堤	修大沟口河堤	30,000		三月完工历时八天
	同上	筑堤	汴涟两河间之洪湖大堤，长16里	2,000		三月完工
	洪泽	开沟	仁和乡长 6 里之出水沟	4,000		三月完工
	泗县	筑堤、开沟	于双沟镇西淮河筑陈宝毛嘴两堤，3700弓长。开干支沟共26.5里	20,000	29.000	三月完工
	淮宝	修堤	加修新沙里堤十里			
	同上	修筑堤渠	今年共修筑大小圩堤河渠1,617里		共50余万土方	至六月完工
	同上	筑堤	筑成人字头河与大汕河合流宽达 140 丈的最险要浩大工程	300,000	300,000（日夜工作者万人）	六月完工
淮南	天长	筑塘蓄水	汶洞区筑宽 6 丈、高1.5丈大堰一座	1,500		五月完工
	同上	修筑圩堤	高邮湖边间塔区，修筑圩堤共117里		300,000	五月完工历时一月半
皖中	无为	筑堤	修建黄丝滩新堤，长13里，堤高1.9丈，顶宽2.4丈，脚宽 11.9丈。此堤屏障皖中江北七县人民生命财产	14,000（直接控制田亩）	1,031,958	五月六日落成，费时三个多月

续表 2

根据地别	县别	何种工程	工程简述	受益田亩(旧制亩)	耗工数	备考
	无为	改建闸	改建位石涧区季家、陈家、黄树三闸，今后三十年内闸内30万亩田可保水旱无虑	300,000		三月完工
	同上	筑　堤	五区青山圩新堤	3,000		
	同上	挖　河	石涧区龙王乡兴挖小河，长4里，宽1.5丈，深8尺	7,000	5,000	五月完工
	和县	修　闸	修长江边新桥闸	120,000		四月完工
	临江	修筑陡门	兴修陡沟区陡沟坝大陡门	32,000		五月完工
	同上	筑　堤	懒蒲滩防水堤		1,000	
	同上	修筑江堤	修建七洲江堤、永宰大圩堤等共23.5里		10,000	四月完工
	同上	挖　沟	开挖浃北乡通小江北沟	5,000		六月完工
	巢南	修　圩	巢南边缘某圩，加高6尺，加宽2.4丈，共一里		3,600	四月完工共十天
	繁昌	建　闸	高安桥石闸，动员民伕3万6000人			六月完工去年九月开工
	和含	筑　堤	陶运区完成新兴圩600丈	2,000		四月完工
鄂豫皖	汉川	修筑垸堤	修筑倪养二乡15个垸子，全堤长61里	20,000	120,000	四月完工二月开工

续表 3

根据地别	县别	何种工程	工程简述	受益田亩(旧制亩)	耗工数	备考
	天京潜	开沟	实验乡开沟19条，长50多里，修桥20多座。其中一条大沟宽2.2丈，深1.2丈，长30余里	12,825	22,622	六月完工
	安陆应山等八县	塘、圩、埂、沟、闸	据不完全统计：挖修7,747口塘，修建1,106座圩，修筑153条沟，新开57条沟，修建207座水闸	1,400,000	1,363,308（石工在外）	去年一年总计
晋察冀	建屏	开渠	开源泉、民生等四道渠	10,000		四月完工
	平山	开渠	开渠共65道，共长153里	9,000	66,700	四月完工 二月开工
	同上	修滩		3,000		四月完工
	北岳区各县	整理旧渠	共2,798道	304,146		以上均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的统计
	同上	开新渠	共2,320道	412,641		
	同上	打井	共5,538眼	125,163		
	同上	修堤坝	共183道	55,277		
	同上	修滩		153,279		
	冀中区各县	修险工	共71处			

续表 5

根据地别	县别	何种工程	工程简述	受益田亩(旧制亩)	耗工数	备考
		筑坝	共643里			以上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总的统计
		堵决口	共309处			
		浚河	共173里			
晋西北	临南	开渠	某区共开渠21条，长30余里	1,000		四月完工
	临县		杨家坡变旱地为水地	800		四月完工
	岢岚	开渠	城关附近共开渠三道	977		
	兴县	开渠	白改玉村水渠长5里，有8个石洞，3个水槽	516		四月完工费时半月
	同上	同上	一区某村两道水渠共400余丈	860	239	四月完工变工节省431工
太行	涉县黎城	筑渠	清漳河两岸三道大渠。全长67里又60丈，渠底宽5至7尺，面宽1丈，有25%以上渠道系从绝崖、峭壁、山坡、架桥、凿洞中开凿通过。桥100余座	9,858	112,100	八月完工历时十月

统计说明：

一、以上统计材料均系根据今年本报电讯辑成。其中除已注明之鄂豫皖八县去年一年之统计，及北岳、冀中二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两项统计外，余均为今春以来完成之工程。

二、受益田亩在五百亩以下者，均未列入本项统计。

三、今春以来完成工程中之受益田亩，按上列统计中已标明之数字统计为一、三三八、四七八亩。其他漏掉受益田亩之工程，按最低估计加进，受益田亩总数至少在二百万亩以上。而各根据地报导水利多系举其

荦荦大者，是以实际数字当更远远超过此二百万亩之数。

四、鄂豫皖安陆、应山等八县去年一年水利建设，受益田亩为一百四十余万亩。

五、晋察冀北岳区各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水利建设，受益田亩总数为一、〇五〇、五〇六亩。

六、一九三九年敌人在冀中制造大水灾，决堤决口达一八五处，冀中农业建设中心即在治水。以上统计所列冀中各项，均为“民国”以来少有之大工程。其受益田亩无统计，总数当超过北岳区数倍。

防旱与水利

目前许多解放区都在紧张地进行防旱工作。这项工作需要从许多方面去进行，其中又以农田水利最为重要，乃防旱的根本之道。

农田水利建设的条件，黄河流域当然远不如长江流域。但即以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而言，境内尚有无定河、延河、葫芦河、洛水、环江等河流及其众多支流水流常年不断，兴修农田水利的条件仍是充分具备的。抗战以来的事实也证明，不论社会的（如敌人破坏）与自然的条件如何困难，华北各解放区的水利建设，都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绩（请参看今日二版发表的去年九个解放区的统计）。

依现有情况来说，开小渠、打井、修蓄水池和凿泉，这几种水利工程，各个地区都能普遍推广。这几项工作如果进行得好，在抗旱时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关于开小渠，依据晋察冀的经验，比开大渠合算得多。如曲阳沙河大渠（荣臻渠），全长十四公里，灌溉七百顷，早在一九四〇年即开始兴修，后因敌蚕食破坏未成（最近电讯，又重新兴工，明春可能修成一部分）。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提出开小渠运动，很快就在全边区推广，灌溉面积已超过原计划三大渠的好几倍，减少政府贷款好几倍。据原在晋察冀农林局工作的陈凤桐同志谈，其原因有三：一、开小渠技术简单，大家一商议就可动工，用不

着测量。二、小渠工程量小，按股摊工，各家吃各家的，多数不需要贷款。较大工程方由公家贷粮款。三、渠道土地问题，管理和水量分配问题，都容易解决。因此，能灌两三亩、七八亩的小渠，两年内已布满全北岳区（去年北岳区开渠达一、一七〇道）。所以，只要能把河水引到田里，能灌几亩地的渠，都应该动员群众办。历年遭受灾荒的太岳士敏县，今年水利建设动手最早，现已修成大小水渠七十九条，能灌田五千四百亩。

打井比开渠更易普遍进行。平原地区、沿河平川地、甚至高原塬上的某些地点，都可打井。高原地带，打井乃是水利的主要办法。土质好的地方打土井，不能打土井的就打砖井（有石头的地方，用石砌比用砖更经济方便）。一口水深的井，一般能浇六七亩地，水浅的也能浇四亩地。天旱时，正是人力闲的时候，能浇多少，就浇多少，倘能采用畜力水车，则收效更大。打井成功的例子很多。冀南一九四三年（灾荒的第二年）夏天仍然苦旱，政府发下了打井贷款，掀起热烈的打井运动，结果全区打砖井四千余眼、土井五千余眼，终于战胜了旱灾。胶东北掖，去年共打井六千至八千眼，浇地五万余亩，去春胶东天旱，很多县到六月还没有种上春苗，北掖却早就种上了，而且产量远超过一般不浇地，北掖从此不但不怕旱灾的威胁，而且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去年四月十六日本报社论"学习全万明"中曾说："用十年八年继续不断的努力，全陕甘宁三十五万户，做到每户一井（或根据有利条件，开渠、凿泉、筑蓄水池），这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水利工程。做好了这件工程，以后不仅吃水再没有问题，而且可以永远不怕旱灾，子子孙孙再也用不到逃荒，陕甘宁边区再也不会是'地瘠民贫的地方。'"（当然这里应该补正一点："每户一井"是提得太机械的，事实上每户都应根据有利条件，兴办一种水利建设，如

井、渠、泉、蓄水池等）在目前备荒运动中，各地区正宜根据具体条件，推广打井运动。

修蓄水池（一般叫水窖，晋察冀叫水汪），是另一个可以普遍推广的好办法，沿河两岸、小山沟等处都可以修。一方面可解决吃水（一个两、三丈深的水窖，可供一年四五户人家之用），另外可兼浇庄稼，至少可帮助种菜。修窖方法应尽量利用地形，由四面八方掏沟引水入内，春夏秋三季可以积雨，冬季可以积雪。就在天旱年，有了水窖，只要下了点雨水，就充分被利用了。凿泉一项，只要是山区，一般都可进行，可惜山泉听其自流，很少人去利用。

水利建设，方面甚广。以上几项，较易见功效，易普遍推行。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很好注意，否则，或易遭失败，或事倍功半。

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使群众自觉自愿，决不能单纯主观规定任务，强迫完成。太岳安泽石渠村一道二里长的水渠，去年四月起即开始修筑，但参加人数由一千二百余人减到一百三十人，最后终于失败了。据报导，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群众思想问题”，“领导方面对人们认为‘沁河水不养人’的迷信没有打破；能浇地的地主家不愿修渠”，“召开地主会议时，每次去的都很少，在会上也没发表意见，便主观决定动工了”。于是，“虽然组织了竞赛奖励，发动妇女、儿童慰劳唱歌，但因许多思想问题没解决，开渠情绪是巩固不住的”。

其次，必须特别照顾贫苦农民的利益。贫农是最有剩余劳动力的阶层，如果不能将广大贫农（以及中农）发动起来，打井、修渠等运动便无法开展。这里首先要解决贫苦农民的受益比重，和工程进行中的吃粮问题。去年春天，晋察冀繁峙修水渠，冀鲁

豫观城打井，都取得很大成绩，就由于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如繁峙新修水渠的受益地户，贫农占百分之六十六强，受益地亩贫农占百分之四十五。观城一般贫农都有了垫底粮，打井情绪因之高涨，有十五个村打井五十五眼，参加的共一百九十五户，贫农占百分之七十。

第三，必须合作互助。打井、修渠都是重活，特别要求劳动力高度组织起来。北掖去年打井，打破了过去各干各的办法，由五家至六七家邻居自愿组成小组，或几家地邻结合起来轮流打，按照地亩人力出工出钱。另一种是由三五家有经验的贫农组成包工队，专门包工打井，这样又快又省钱。修渠则更可将拨工、包工、雇工等办法统一进行。在合作互助中，干部首先响应，亲自动手，是推动运动的决定环节；而部队劳动力的支援，也能起很大的作用，使群众信心更高，工程更能迅速完成。冀南打井运动中，部队曾作了惊人贡献：他们组成了打井队，自带粮食，为老百姓义务打井，全冀南近万个井，他们几无一不参加。

第四，还必须防止一些偏向。如考查和估计水量，是开渠的主要条件，如果不顾水量，上下都开渠，结果水不够用，渠户争吵打架。或者工程潦草，讨小便宜，坏大事，一场大雨就把渠冲坏了。水利建设是一件细腻的工作，即在一个很小的入水口上，也要建筑得很牢固。

华北与西北，在地域上接近蒙古沙漠，气候本来干旱；抗战后黄河改道，敌寇滥伐森林，雨量不调，旱灾更易形成。因此“年年防荒旱”，就必须列为我们的经常工作。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只有逐渐兴修水利，才能逐渐消灭旱灾。一口井、一条渠都是“人定胜天”、战胜自然的武器。在干旱时期，正是加强领导建设水利的好时期。目前动手开小渠凿井，还可赶上秋播。领导

推动这项工作特别要依靠县区乡干部的努力。我们的县区乡干部，不仅要成为农业生产的组织者，而且应当做水利建设的指导者，应当好好团结在这方面有成绩的劳动英雄、模范党员，向他们学习，并帮助他们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同时在必要地点，可由政府出资兴办一些水利事业，为群众示范。

只有逐渐兴修水利，才能逐渐消灭旱灾。让我们赶快动起手来，根据现有条件，广泛发展水利建设，来战胜旱灾的威胁。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社论）

附：一九四四年敌后解放区水利建设统计

解放区名	工程简述	受益田亩（旧制亩）	备考
淮北	修建大小堤、坝、渠、沟、河414条，长4226.5里	3,789,200	
淮南	重修高邮湖西长数百里之大圩	300,000	
鄂豫皖十三县	挖塘7,790个，筑堤坝3,014个，筑畦1,096个，挖堰78个等	847,533	
苏北	疏河、筑堤、开港等	437,000	不完全统计
皖江	筑堤、挖河、改建闸等	484,600	不完全统计
北岳	修滩7,900亩，开渠1,170道，打井4,000眼	174,000	开渠溉灌仅95,000亩，恐不止此数
胶东	打井11,286眼，引河灌溉，疏河等	109,989	疏河受益田亩无统计
太行	清漳河三道大渠全长67里又60丈	9,858	
晋绥二分区	开渠	4,400	
总计		6,156,580	

统计说明：

一、以上统计系根据去年末今年初各地区一九四四年发展概况电讯，及去年十月三日本报发表之"今春以来解放区水利建设初步统计"辑成。

二、各地区材料均不够完全，故实际数字（以上九个解放区）当远不止六百一十五万余亩之数。

晋西北三年来的生产总结*

三个时期

晋西北新政权成立不到三年。二年多的生产建设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九四〇年一月行署成立到九月二次行政会议。这一时期由于新政权本身机构尚未健全，加以敌人几次大规模空前残酷"扫荡"，人民生产受了很大影响，政府虽注意了农工商业及合作社的发展，但武装斗争和动员工作仍占最主要地位，因而在经济建设上，不能发挥充分的力量。第二时期，从二次行政会议到三次行政会议（一九四一年八月），这是经济建设工作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时期。在这时期，政府工作步入正规，社会秩序日渐安定，生产建设被定为三大中心工作之一，并有具体计划，政府对春耕、水利、工矿、合作社、地方工厂等贷款及投资共七十万元，人民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第三时期，从三次行政会议到现在（临参会开会前），政府工作更加正规化，经济建设成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地向前发展。关于开荒、水利、发展合作社、种棉、发展农副业、群众工业、矿业生产等，一九四二年度均定有具体数字，并指出完成计划的保证办法，修正补充了许多适于发展生产的法令。群众生产在这样条件下继续向前发

---

* 原编者按：本文系根据晋西北行署向临参会所作"生产建设工作报告"整理而成。

展了，公营工厂特别是纺织厂，生产量迅速增大。还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在改良技术方面，得到一些收获。

发展农业生产

晋西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吃饭穿衣靠农产品，发展农业生产是生产建设的中心一环。

三年来，敌后战争环境空前严重困难，可是在房屋被敌毁坏、部分壮丁伤亡致病的条件下，不但维持了生产的进行，而且日益恢复和上涨，这很明显地表现在下列三年来的事实：

一九四〇年，农业生产受战争影响最大，荒地增加了。

一九四一年，农业生产很快回升。人民生产情绪有很大的提高，劳动力虽然减少，而耕地面积增加，不但农民增加耕地，就是原来不劳动的地主、商人以及机关干部许多人参加了生产。从以下具体数字可看出该年所获成绩：

开荒（二十五县）　共开三十万零五千零九十亩。

植树（二十二县）　共植五十一万八千二百零六株。

水利　半年内增开水地二十六万五千二百六十四亩，超过计划百分之三十二点六。

种棉（除第八区）　共种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亩，产净花五十八万斤。

家禽家畜的增殖　牛驴增加了七分之一，增猪约为原数一倍，增羊为原数十分之四，鸡超过原数一倍以上。

产量也提高了。例如兴县五个川地村租进山地产量的调查，平均如下：每垧产细粮，一九三八年三斗一升，一九三九年一斗

九升，一九四〇年二斗，一九四一年三斗一升。

一九四二年，农业生产继续上升，因材料不全，暂举下列数字：

开荒　十二县不完全统计（实际不止此数），共十八万九千七百五十五亩，已超过原计划七万四千三百七十九亩，与全晋西北开荒计划十八万三千一百七十五亩比，尚超过六千五百七十九亩。

水利　九个县不完全的统计，新开水利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亩，已超过原计划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四亩，与全晋西北水利计划二万三千一百一十亩比，尚超过三千五百五十四亩。

种棉　六个县统计，共种棉五万七千六百九十九亩，比去年增加二万五千八百零八亩，不足今年种棉计划七万一千零一亩，但其中临南一县即比原计划不足一万三千九百亩，原因是临南只是三十个行政村的统计，实际种棉仍可能完成计划。

畜力增加　十三个县，计增加牛六千三百一十头，超过原计划一千六百四十头；九个县增加驴一千八百七十头，比原计划不足四百二十头。

农家副业大体上也完成计划，十三县增加猪一万七千二百三十头，超过原计划二千四百三十二头；十二个县增加羊六万一千零五十六只，超过原计划一万零一百五十六只；十三县增加鸡十万零三千一百七十六只，比原计划差六万八千一百七十九只；十县植树成活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三十六株，比原计划差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株。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什么获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首先是由于政府有正确的农业政策，颁布了各种奖励和保护生产的法令。如奖励开荒，开生荒三年（熟荒一年）不交公粮，五年（熟荒二年）不交地租，开河滩地三年不交公粮，五年至二

鸣

十年不交地租，地方上还有特别奖励，如宁武开荒，县府供给莜麦种子。奖励水利，新开水地，仍按旱地产量计算公粮等。奖励特产，如棉、蓝（染料）收入只按一半算公粮，试种全免公粮（还负责赔偿损失一半），担水种棉免抗战勤务等，如麻、枣收入打七折等。奖励繁殖牲畜，保护副业，规定牛、驴、骡、马、猪、牛一概不征公粮，新生牛、驴、骡、马一头，政府发奖金十元，自境外购入者，发奖金二十元，禁杀耕牛、母猪、母羊等，以及保护树木等。

其次是开展了春耕群众运动，解决了春耕困难问题。集中政府、民运、部队和政府机关的力量，成立各级春耕委员会，共同布置春耕，扩大宣传动员，提高生产热忱，发动群众互相竞赛。政府发粮发款：一九四〇年贷粮款很多，惜无总的统计；一九四一年拨春耕水利贷款二十万元，贷粮一千大石；一九四二年又增拨贷款三十万元，增贷粮二千三百五十大石。各级政府和贸易局并设法调剂耕牛、农具、种子等，例如一九四二年四区贷牛一百六十条给群众，静乐发动互助种子二十三石，岢岚调剂杂粮五十万零二千二百三十五小石贷给贫民抗属等。春耕期间，政府并颁令尽量减少差务。

第三、加强技术指导。如建设处编印关于种棉、种麻、水利、选种……各种技术问题的小册子。农事试验场亦于一九四二年春正式开始工作，将于一九四三年扩大试验范围，向民间推广。

第四，组织优抗代耕，劳动互助。规定按户分配代耕，耕不好要赔偿损失。劳动互助的原则是："自由结合．等价交换，适合日常关系。"一九四一年十五个县报告，共组织了四千三百四十九组；一九四二年五县报告，共组织了三千一百八十七组，四万一千零二十户，其中大多是老百姓变工性质。

机关、部队、团体工作人员亦参加农业生产，一九四一年以生产三个月食粮为目标；一九四二年部队以自给一半菜金一半津贴、政民机关以自给全年菜金一半津贴为目标；有些机关部队人员直接帮助附近民众春耕秋收，如宁武县长亲自担粪，部队帮助高家村修水渠用了三千多工。

民间工业生产

民间纺织业于一九四〇年受敌人四季"大扫荡"，影响很大。如临县有改良机二百余架、土机两千多架，完全停顿；洋布占入口总值百分之六十。但到第二年，纺织事业便有计划地大量发展起来，并超过抗战前产量。政府确定发展纺织为主要方向，奖励私人投资，负担不计母金，只计子金；妇女纺织不征税；同时奖励大量种棉，并指定二区、三区为纺毛区，四区、八区为纺棉区。敌人封锁，布价高涨，更刺激了纺织事业飞快发展。可举几件事实说明：一九四〇年八月，全四区开工织机有九百架左右，而一年以后，开工者达三千八百架（共有织机四千一百九十五架），比前增加四倍。兴县过去有三百架纺织车，几次战争损失过半，后由政府及纺一厂制纺车六、七百架，兴县群众纺织就大量发展起来。临县县城等处有私人开设制机厂，市场上出现大批纺车，这是战前所没有的。据临县督都和刘家庄两个村的三年来土布产量调查，一九三七年是二千八百匹，一九四〇年四千五百匹，一九四一年三万三千五百九十匹，产量比战前增加十二倍。岢岚、河曲、静乐等产毛区，手捻毛线制衣裤等，代替布匹很多。部队机关每人捻毛线一斤，军政民大部用了土布，洋布减到极少数量。一九四二年纺织业受到政府极大奖励，如对经营纺织事业的私人工厂、作坊或家庭副业，其收入免征公粮三年等，另外在贸易上

提高洋布入口税，降低土布出口税，因之纺织业更加蓬勃发展起来，例如：半年内在临县区训练了二百五十个纺织妇女，临南、临县增加改良机在五百架以上，开辟了三个新的纺织区（一、四、五区）。临离等三县创办了二十七个纺织合作社。临县一个转运栈，半年出售土布即在二万四千匹以上。四区一九四二年春输出土布，据不精确统计，达十万匹以上，该区全年生产计划三十五万匹，八月间估计已完成十分之八。

晋西北抗战前纸的产量很大，但成色很低，多是祭祀用的烧纸等。战后纸业一度衰落，临兴县东关、河曲平泉等六处调查，战前共有造纸一百七十二户。一九四一年以后因政府奖励资助，造纸业又飞跃发展，前述六处纸场已恢复到一百四十二家，总生产量赶上战前十分之九，特别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出品再不是烧纸，而是印报纸、印票纸、卡片纸、书皮纸、漂白纸了，各机关办公用纸大部分采用了土产麻纸。一九四二年春，河曲平泉纸场由二十四户增至二十八户，已达战前水平。保德杨家湾纸场从十三户增至二十五户，比战前超过五户。

各种手工业、作坊、矿业都有一些发展。煤窑由一九四〇年一百八十五家增至一九四一年二百一十二家；铁矿、磁矿也有恢复，造铁厂由十二家恢复到十八家，但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兴县油坊，战前三十五家，一九四〇年十家，一九四一年二十四家。兴县、保德两县，七种作坊统计，一九三七年春一百二十一家，一九四〇年春六十五家，一九四一年下季九十四家。

总之，民间工矿业在政府扶植和奖励政策下，突破战争环境的困难，已逐渐由恢复走向发展，特别是过去依赖外货的工业品，因为实际需要的刺激，很快的达到战前水准，过去自给或出口的工矿产品，则因量重价高，销路有限，发展较慢，尚未达到战前水

平。

公营工业生产

凡人民力量所不能办的，较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则由政府和军队办理，供给军民需要，而且负有改良技术、指导和推动民间生产、在厂内培养人材、准备工业扩大发展等任务。

一九四〇年接管旧厂和建立新厂，当时共有纺织、造纸、笔墨、化学、火柴、纸烟、修械等十二个厂，都具初步规模。一九四一年九月前，鉴于战争环境，遂改集中领导为分散经营，或由建设处直接领导，或由专署、县署领导，或与部队合办。为了部分解决纺织工具，成立了工具厂，做出织布机十架、纺纱车五百二十架、七七纺纱机二架、自用工具二百余件，并创制络纱机一架，可增产量五、六倍。火柴厂资财亦全部运至安全地带。各厂制度与技术均有显著改进。

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次行政会议）后，主要是扩大旧厂，并集中力量向纺织工业发展。公营工厂资本比一年前增加了二倍半。纺织业资本比重，从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增到一九四一年的百分之八十五，资本比一年前增加百分之五百五十六，产量也在扩大，每月出布共六千五百一十匹，特别是纺织一厂有飞跃的发展。各地方工厂也在扩大，并建立小型工厂，如六专署之铁工厂、造纸厂、离石纺织厂等。各厂进一步建立了正规化的制度，如各厂干部及杂务人员与工人数平均达到一与四之比。技术改进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化学厂已制成功铅印油墨、红蓝颜料、药皂、肥皂粉等，工具厂试验木镟床完全可用，铁轮织布机完成八架。

但由于财政困难，工厂资本不够，以致生产计划常不能贯彻。

今后将预定生产资本，并号召私人投资公营工厂。

发展合作事业

一九四〇年各地开始建立了许多合作社，但真正群众性的很少。如离石曾成立二十四个，临县十二个，临南六个，方山一个，离东一个，以上共四十四个合作社，实际上是冒名的商店，有商人合股的，有机关部队解决自给自足的。直到该年夏季反"扫荡"后，行署颁布了合作社条例，积极扶植奖励生产合作事业，并取缔这些冒名的合作社，规定旧有合作社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底前整理完毕，于是真正为群众谋福利的合作社才出现。

一九四一年三月后，统计共有合作社八十五个，社员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一人。一九四一年度公粮条例中曾规定符合规定的合作社，不征公粮，并确定扶植合作社为贸易局三大任务之一，例如兴县贸易分局在三个月内供给二十二个合作社货物值十五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元，帮助运货五十驮。

合作社成绩，主要是部分解决了群众困难，如出卖余粮，购买必需品价格便宜，组织了妇女纺织等。其次在农村建立市场，收买土产，收用本币，起了巩固金融的作用。再其次是在工作中锻炼了干部的能力，转变了老百姓对合作社的看法，知道合作社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合作社主要缺点，是领导不健全，特别是社员尚缺乏民主生活，政府、民运分不清责任。

今后的方向

一、发展农业生产，这仍是生产建设的中心一环。两年来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已有很大成绩。今后除部分地区劳动力有余，仍应开荒外，一般的要注意提倡精耕，施肥，讲究水利，增加产量。

同时继续扩大种棉区，保证纺织原料自给。因此，就要贯彻执行奖励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各种办法，从研究与改良技术上指导生产，以及发展群众合作互助组织。

二、发展手工业，争取工业必需品的自给自足，是当前迫切的任务。首先是发展纺织业，努力解决经纱问题，研究机器纺纱及群众的精纺土纱，以代替洋纱，同时扩大纺织区，发展毛织。第二，研究与扩大各种代用品的制造，如油墨、染料等。第三，炼铁工业要主动地推动发展，以解决军械原料及农工业工具问题。第四，公营工厂除本身生产外，应更多注意从业务扶植及技术指导上帮助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三、发展合作事业。合作社是繁荣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组织，需要普遍发展。发展的方向：第一，使其真正成为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吸收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第二，合作社在组织群众力量对敌进行经济斗争上有极大作用，特别要重视游击区合作社的工作，使游击区人民能买到必需品，卖出剩余品。经济上脱离对敌占区的依赖，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的政治力量。

四、团结专门生产技术人材，奖励技术研究发明，在学校增设职业班，以培养生产建设的干部。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

（一）

边区是多灾之区，抗战以来，黄河改道，产量减少，连年歉收。前年冀南曲周、邱县，冀鲁豫沙区，连遭水、旱、病、雹、蝗五灾，再加上敌伪的残酷掠夺，接敌区、敌占区人民流亡，土地荒芜。今年又遭受空前未有的蝗灾。

五月初，冀南的企之、广曲、邱县、曲周、馆陶、大名等地，开始发现蝗蝻，逐渐变成飞蝗，向东南蔓延。六月底太行山的大批飞蝗，越过平汉路东来，豫东飞蝗跨过陇海路北犯，至七月滏阳河以南，陇海路以北，边区纵横数百里的广大土地上，几无一县幸免。冀南和沙区，最为严重。智（馆陶）邱（县）公路两旁，一百多个村庄地里，全都铺满了蝗蝻。企之县一亩地有打蝗蝻四百斤者。曲周有些村庄蝗蝻把墙壁道路染成了褐色，炕上锅台上也都爬满，一棵高粱上爬了六、七百个。在沙区，飞蝗飞来，遮天蔽日，落地则大地变色，危急形势，有如黄河决口。

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束手无策，悲观失望，有的抱头痛哭，甚至有的悬梁自尽，跳井自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边区的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捕蝗运动。群众在党政军的领导之下，克服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打破了区村户的界限。男女老幼，日以继夜，反复扑灭。部分秋苗虽被蝗虫吃尽，但马上补种了豆子、荞麦。至八月底，根

据地内大部蝗虫宣告消灭，保住了秋苗六、七分的收成，拯救了数百万群众的生命，造成历史上的奇迹。

（二）

蝗虫初来，在群众中存在着“天灾不可治”、蝗虫是“神虫”的迷信观念，对剿蝗缺乏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在这种情形下，党和政府号召动员，说服群众，干部起模范作用，组织积极分子，开展捕蝗运动，保护秋苗。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具体例子来教育群众，终于把落后群众引导到了积极剿蝗斗争的行列中来。在卫东，干部开始时与群众一块拜神，但蝗虫仍不走，干部提出“哄一哄”看，但哄也没有用，干部又提出某地大家一齐打，保护了秋苗，于是群众同意打的办法，结果捕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鄄北县有些群众起初坚决不打蝗虫，只是烧香拜神，结果，别人的苗子保全了，他们的苗子却被蝗虫吃的很厉害。这时，干部率领捕蝗队，帮助他们挽救了秋苗，他们最后也宣传“烧香不顶用，不打真不中”。这些活生生的例子，经过报纸和干部广泛的宣传，最后克服了群众的迷信思想。

在剿蝗运动中，须掌握时机，及时提出适当的口号进行鼓动，以保持群众的斗争情绪。初期提出“打一个少一个”、“打蝗有饭吃，不打就挨饿”、“坚决消灭在本地，反对一哄了事”；在打的过程中，又提出“服从指挥，争取模范”、“不分你我，大家互助”；在大部分蝗虫被消灭后，又提出“不打完不心安”。这些口号在群众中发生很大的作用，变成群众的行动。

在剿蝗的领导上，从专署到县、区、村各级，都成立剿蝗指挥部或剿蝗委员会，统一指挥。在清丰还临时设立中心村，由附近相邻的十八个自然村组成，县、区干部分散在各中心村，亲自

领导。每一个中心村都成了一个独立作战的单位，可以互相援助，随时集中力量，到最严重的地方去。其他各县采取联防组织办法，也收到同样效果。各村指挥部或捕蝗委员会，以村长、合作社主任、小学教员、开明士绅等人组成。各阶层男女老少，都分别组成许多不同的分队、小队，民主选举队长，制定规约，每天起床、吃饭、集合上工，都以吹哨、鸣鼓、敲锣为号，大家过着集体生活，一切可能动员的人都吸收到剿蝗组织中来，特别是向来被轻视的儿童妇女，发挥了很大作用。妇女有耐心，儿童有高度的争胜心。一般除挖沟外，他们在捕打上，都可以与青壮年并驾齐驱。在分工上也很科学，广曲有些村庄，青年为正规军，专负责挖沟封锁；妇女老头为地方武装，一块一块歼灭；儿童为游击队，哪里发现一块，他们就跑去哪里突击，结果收效很大。在鸡泽用同样的方法，五天计划，三天就完成了。群众高兴地说："八路军游击战，用在打蝗上真起作用。"

为了贯彻这一运动，干部都亲自动手，并照顾贫苦群众，奖励模范。中共冀鲁豫分局黄敬同志，军区宋司令员，年逾花甲的行署曹副主任，都亲自参加捕蝗，给干部和群众很大的鼓励，信心与决心倍增。在长期捕蝗斗争中，有很多贫苦群众生活无法维持，政府规定以蝗换麦与按地出夫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这一办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濮县郭庄，以前每天只打十来斤，规定这个办法后，两天打了八百斤，参加人数占全村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曲周、观城、鸡泽等县，实行这个办法后，大批儿童妇女都参加了捕蝗，青壮年便能抽出时间开苗锄地。奖励模范的办法是各村每天总结一次，选出捕蝗英雄，奖励三斤小米。在连队或远征队中，每天也提出前三名给以奖励。由于实行奖励，竞赛运动普遍展开，班、排、连战士，各村群众，组与组间，儿

童团与妇救会，甚至夫妇之间，都举行竞赛。就是刚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内黄城区附近，在政府与军队帮助之下，也组织了剿蝗委员会。城内商人自动停市，学生停课，一致参加组织了一千三百人的捕蝗队，八天之内，将蝗虫全部消灭。因之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有天分，自古从没有办法治的事，现在都有办法了。"

由于发动了全体群众参加捕蝗运动，保护了秋苗，群众认识了"人定胜天"的真理，创造了丰富的捕蝗经验。在捕蝗的办法上，采用了露捕、围歼、火诱、网捕、毒杀等有效办法；根据蝗蝻活动规律，普遍挖沟封锁，早晨正午赶打，午间天气温和时，蝗蝻喜爱跳跃，则用围攻慢打办法。

灾难面前，大家更加团结，根据地内蝗虫没有去的地方，群众都跑到几十里以外有蝗虫的村子去参加捕打挖沟。观城张扶村，打完本村蝗虫以后，立刻自动组织远征队到游击区。高水县十一个村子五百余人集合起来，由民兵掩护，到接敌区桐村一带捕打，挽救了那里的灾难。边区子弟兵二十一团，在烈日下，四天之内，捕蝗三万二千斤，不喝群众一口水，不吸群众一袋烟，老百姓过意不去，纷纷推着西瓜、甜瓜到驻地劳军。

从五月初到八月底四个月来，在边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下，获得了灭蝗的胜利。功岔三区三十一个村子，共消灭蝻子十万五千斤（每斤二千余个）。曲周全县动员了六万二千人，从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二日五天内，挖了大小封锁沟二百一十里（宽二尺，深二尺半），消灭在沟内的蝻子达一百八十万斤。在宁南三区十个村庄，十天之内，共捕五十四万七千斤。馆陶南区三万九千人，挖沟一百二十里，捕蝗九十五万六千斤。元城、冠县六月下旬至七月下旬，合打飞蝗二百万斤。党县五月份内，消灭蝻子六十万斤。由此可见，边区捕蝗运动规模与成绩是何等伟大。

（三）

正当我根据地进行捕蝗运动的时候，敌伪用一切办法进行破坏，四出抓丁，开炮射击捕蝗群众。敌占区鲁西郓县城张殿庄附近，秋苗被蝗虫吃光了，敌人仍唱戏作乐，根据地六区群众不忍坐视，集合前去援救，又被张殿庄敌伪打回来。濮阳汉奸孙良诚盘据区域，首次发现蝗虫，三天把庄稼吃尽了。后来又发现，群众接受根据地经验，也想组织起来捕打，但敌伪到处抓壮丁，破坏了群众计划。郓城伪县长刘本功，一面布告禁止捕打，一面又以十万元伪钞请戏子唱戏，戏唱完了，苗也吃光了。

由于敌伪纵容蝗灾的发展，蝗虫吃完敌占区庄稼后，又成群地飞到根据地来，加重了根据地捕蝗斗争的困难。群众都说："要不是敌人，蝗虫早被我们打光了"。因此，随着剿蝗斗争的开展，群众对敌斗争也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从芦沟桥退到独山

——抗战中的国民党战场

在抗战八年中，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好象指南针一样，总是向南跑的”，跑得真是远，从芦沟桥一直退到贵州的独山。在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阳，重庆动荡时，据外国记者报导，蒋介石曾准备到加尔各答去搞流亡政府。

蒋介石的抗战，仅仅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翌年八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曾有过比较积极的表现。但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于仍旧反对发动广大人民参战，限制人民的民主活动，和怀着消灭异己保存实力的阴谋，也曾招致了许多痛心的失败。

平津是在“屡战屡和”的局势下沦陷的。南口天险“以战略关系，自动放弃”。平绥全线不战而弃。刘峙在平汉线作了有名的一退六百里，从保定一直退到安阳（有的县城敌兵根本没去，有的只去了几个骑兵）。津浦线的韩复榘降战不决，终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不战退出山东全境。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李宗仁任指挥的国民党军（非蒋之嫡系部队）在台儿庄算是打了一个胜仗，但随之就是徐州大撤退。由于八路军平型关、忻口几次胜利战役，在山西曾阻滞了敌人正面前进；但十月二十六日娘子关失守，太原遂于十一月九日在极度紊乱中撤退。“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了三个月，士兵的英勇牺牲是可歌可泣的，但论者无不谓有违战略原则：在一个狭长地区内使用数十个师，采取挨打主义，死守在

敌人高度火力集中线上，蒙受重大无谓牺牲。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后，上海全线立时崩溃。南京守城用“街亭式”战术，以十五万大军死守孤城坐以待毙；六天功夫，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沦陷。南京撤退更是惨痛，抢先逃跑的部队互相开枪，无数军民被践踏而死。无数的人又被挤在江心淹死。“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钢丝床和沙发都在急运之列，各码头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妆台……。”(长江:“感慨过金陵”)

徐州撤退后，为防止敌人由中原进攻武汉，蒋介石命令在中牟将黄河决口，以数十县人民生命、田园、财产之浩大代价，将敌人暂时阻隔于豫东。脱离人民的消极挨打战略，终于让敌人沿长江两岸跃进，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占领武汉。与武汉失守同时，日寇于华南登陆，十天占领广州，沦陷之速，举世震惊。自此，抗战第一阶段基本上终结。朱总司令对这一阶段国民党的抗战评道:“反人民的政治制度，实施了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国民党手中有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遭受着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论解放军战场»)

对于这种巨大的失败，蒋介石卑劣地将责任完全推给手下将领，譬如他说:“我们又要反省到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不是敌人力量如何强大，也不怪我们下级的官兵不肯牺牲，而是在我们高级将领无决心，或是有了决心而决心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劣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只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又说:“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虏

掠，实在都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没有指挥的学力和技能，一班官长没有掌握部队的能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上讲）

蒋介石这时说了一点人话，甚至几次提到北伐时期，还提到学习共产党。譬如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的演讲中说：“共产党能够同人民共甘苦，人民没有饭吃，他们情愿自己不吃，先使人民吃。不好的地方，人民不能建设，他们替人民建设。遇有艰难危险的事件，他们为人民先锋。”蒋介石当时之所以要讲这些话，无疑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为了息众怒。他杀掉了一个保存实力的韩复榘，这是因为韩不是他的嫡系，对他有二心，而对于更甚于韩之刘峙辈，则又保护唯恐不周。事实上谁都知道，在抗战中保存实力的首领，就是蒋介石自己。

就在这第一阶段，当国民党军大批溃退的时候，华北、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则以人民战争向敌后进军，不断取得胜利，牵制了敌人，建立了敌后解放区。这对日寇正如一把利刃插入心脏，迫使敌人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战场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而将主要兵力放到解放区战场，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残酷“扫荡”。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的失败情绪，将公开的卖国贼汪精卫弄到南京成立伪政府。因此就出现了解放区战场与敌人残酷斗争的抗战中的战略相持阶段。

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后，对日作战从此采取消极政策，保存军事实力，积极反共反人民（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以所谓“曲线救国”，唆使几十万国民党军改旗号做伪军，与日寇合作，进攻解放区。

从武汉失守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役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之久。整个国民党战场

并没有严重的战争，敌人只作过几次战役的进攻。如一九三九年二月陷海南岛，三月陷南浔线，九月陷湘北。一九四〇年六月陷宜昌。守宜昌的陈诚狼狈逃回重庆招待记者时，埋怨何应钦不发补给，其他友军观望不前。一九四一年、四二年、四三年，日寇在长沙、南宁等地实行自称的"活塞"战法，早来晚归，打一下又缩回，"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以打配合诱降。

一九四四年四月到十一月，日寇发动的河南战役、湖南战役、桂黔战役，其目的是想占领交通要道和美空军基地，消灭国民党的野战军，来一次最大的压迫蒋介石政府投降。这一次不是"活塞"，而是"死塞"了。

河南战役中，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以四十万号称精锐之师，打不过五六万敌军。汤恩伯的装备是超过了一切所谓杂牌军的，可是当时只有武器较差的杂牌军（刘恩茂、孙蔚如、马法五等）抵抗了敌人；汤恩伯的几个集团军都是不战而溃，损失二十余万。胡宗南的军队更笑话（胡军全部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从来没有抗过战），两个师去"增援"，与汤的溃军在豫陕边境发生误会，全部碰垮。汤军溃逃时，七八百辆卡车大部用来搬运军官们的太太、少爷和细软家私。汤恩伯在河南驻扎了五年，不打敌人，专门搜刮老百姓。河南人悲愤地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河南人民痛恨汤恩伯比痛恨日寇更厉害，因此溃军被农民整连整连地缴械。

豫战未已，湘战又作。陈诚、薛岳总兵力亦不下四十万，也是装备最好的军队。湖南水田交错，山峦重叠，敌人也使不上装甲武器。陈、薛兵力三倍于敌，且有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全力相助，结果同河南战役一样惨败。原因是薛岳受命保存实力。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转载战地通讯："衡阳某总司令答记者说：薛长官来

电指示，劝告我谨慎行事，不要使我们为少数敌人而花大的损失。”从四月至六月，豫湘两个战役，丧失洛阳、长沙两个省会，六十余个县城，日失一城。

之后就是桂黔战役，桂林失守，柳州失守，南宁失守，梧州失守，敌人一直打到贵州高原的独山。这几个战役撤退的紊乱，远甚于抗战初期。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广西日报》的社论说：“此次敌人窜犯湘省，远在千里之外，所表现的都是一片慌乱，大家作逃难打算，逃得愈快愈好，逃得愈远愈妙。”逃跑时，国民党政府统治一切运输工具，官吏更是趁机发疏散财。桂黔战役撤退极其悲惨，四五十万难民拥塞路上，火车厢坐五层人，许多人现在说来痛悸犹存。

豫湘战役中，蒋介石依然趁机消灭非嫡系部队，“借头”以息众怒（杀长沙守将张德隆），而对在衡阳降敌、后又被“礼送”回渝的方先觉，反大大嘉奖。蒋介石的“抗战”真面目，世人也就看得更清楚了。蒋介石这时再也不象抗战初期还讲几句人话。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厚颜无耻归咎于“军事装备落后”，甚至说豫湘战役的失败，比过去败得还好些。不管他自己怎样狡辩，蒋介石集团这个烂疮脓包的腐烂恶臭，中外皆闻，华盛顿与伦敦也嗅到了，连丘吉尔（当时是英国首相）也深为痛惜地说：“尽管美国给中国丰富的帮助，但该国仍遭受严重的军事挫败，是个极大遗憾。……这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烦恼的事。”（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演说）何应钦被当时纽约的《先驱论坛报》描述为“执行半法西斯政策的极端反动派”。中外舆论一致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则更特别受到外国舆论的攻击。

因此中外人士愈益相信中国抗战的主力是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大部分海岸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所控制的事实，为美

军情报机关反映到华盛顿后，罗斯福总统就催促蒋介石与中共合作，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史迪威将军（当时中缅印战场总司令）逼迫蒋改组政府甚紧，特别指出包围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必须用来打日本。但是蒋介石对于罗斯福总统要死狗，要流氓，史迪威将军因而离职（这就是有名的史迪威事件）。此后继任的赫尔利、魏德迈，就一变而积极执行了美帝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豫湘桂黔战役之后，一九四五年一月，敌陷粤南沿海诸县。一月及六月，敌又两次夺赣南美空军基地，三月鄂北、豫南之役，又连失襄阳、南阳等十余县。国民党吹嘘的所谓滇西收复龙林、松山的战役，实际上蒋日两军的损伤，简直不能比拟。松山是一个小地方，敌守军只一百人，打了四十八天，敌军还跑了三十人，蒋军一万二千人，只剩下两千人。龙林敌守军三百人，蒋军用两个军才打下来，损失很大。

豫湘战役不计，抗战第八周年中，蒋介石尚丧失国土三十万方公里、城一百十二座。而在另一方面，到一九四五年七月为止，蒋介石用来包围、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则由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六十万增加到一百万。抗战第八周年间，蒋介石向解放区千人以上兵力的进攻，竟达一百零六次，使解放区军民对敌反攻作战受到很大的牵制。

蒋介石在抗战期中反共反人民，暗中与日寇勾结，一切坏事做尽，但他的狡诈就在不放下抗战旗帜，不公开投降。这就使得当时的人民不能提出倒蒋的口号，而且不得不支持他抗战。英美当时是很害怕蒋介石投降的，蒋介石也就利用这点要流氓。日本军阀很了解蒋介石，抗战初日寇叫的口号是“反共灭党”，后来就取消了“灭党”。但是日寇为什么后来又从黔桂撤退了呢？原因就在记取了中国共产党创造解放区的经验：哪里日军来了，蒋政权

垮了，哪里人民就起来了，真正的抗日政权就一定出现。因此蒋介石既不愿公开投降，日寇也就不愿把蒋搞垮，而自讨苦吃。

不过，蒋介石在抗战最后两年的军事失败，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就更加证实了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伟大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意义。

（一九五0年七月七日《新湖南报》）

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

根据教育部最近的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除去留在平、津、上海的十个学校以外，还有八十五校，分布在西南以及陕甘（仅数校）各省，学生约三万余人。（战前一〇八校，学生四二九二二人）

这三万多大学生是怎样受着教育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须明白什么是今天政府所进行的教育方针，它在专科以上学校中是怎样实施的。

国民党的临全大会，以及三年来的各种教育法令，都告诉我们，“三育并重”是教育实施最基本的方针。

什么是“三育并重”呢？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在“抗战一年来之教育”（《教育通讯》第十七期）与“战时教育方针”（对中央训练团演词）两文中说得很详细，这里简单摘录几节：

“按我国自古以来教育向持三育并重之原则，为教育不易之原理。自所谓新式教育倡行以来，一般大势所趋，偏重智育，所谓教育几完全以书本知识之传授为限……

“如何使三育并重？我以为是必须要恢复六艺教育的精神。六艺之中，礼乐是关于德育方面的陶冶；射御是关于体育方面的锻炼；书数是关于智育方面的培养。

“在训育方面，制定具体方案，推进导师制度。无论大学中学，每一教师，除课业外，兼负学生十人至十五人训育之责任，使为

人师者不特为知识之传授者，且兼为学生生活之指导者。务其师生之间，家庭与教师之间俱有密切之关系，为人格表率；同时并制定德育纲领，列举道德之标准及训练之方式，以为各级学校之遵循。

“至体育方面，更制定具体方案，注重学生生活之规律与饮食之营养等等，以养成学生健全之体格并与社会溶成一片，提高全国人民体格健康之水平。”

我们现在就来进一步看看所谓“三育”是怎样“并重”的。

可怜的智育

先说从来最受偏爱的智育。

记得抗战刚开始时，许多大学的学生曾热烈地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向校长请愿。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两先生的回答倒是很老实的：“我在外国这么多年就没有听见过这个名词，你们要战时教育，我们的教授先生怎么教呢？”等到武大要搬嘉定，学生必须填写一份“安心读书”的志愿书，才准许踏上入川的轮船。后来，各个学校要求战时教育的呼声，也就随着岁月而消沉了。

另外有许多教育家在抗战初期主张过：“战时教育不是把平时教育完全取消，而是在平时教育基础上增加一些与抗战有关的东西。”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空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战时教育的争取，而是连求得完整的“平时教育”也不可得了。

现在大后方一般的大学生，最感缺少的就是一个象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据说中央大学搬到四川的五十万册图书，为了怕轰炸，只有二万册破旧的放在外面供人阅览，而图书室小得只能容

纳二三百人。四川大学迁移到峨嵋山，理学院的学生一年不能作实验。唐山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开课时，什么仪器也没有。西南联大的情形更糟，仪器大部收藏起来，学生看书和听课都要抢，因为宿舍无书桌，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联大的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道："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门口等着许多人等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好几次，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脚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又得挤到台前抢书。时常等了一个多钟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没座位，书也到了别人手里。男同学还常因'抢'动手打起来。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经费较充足的国立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当可概见。

读学分，考分数，这仍旧是今天大学生的天然职责。教授在讲，学生在听，在写，在考试，一切照"常轨"在进行。学校外面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社会上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教授先生不会也不可能去告诉他们的学生，大学教育与实践脱节，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文、法、理等学院表现得最明显，被人视为最"实用"的工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不幸也听到土木工程系的学生这样诉着苦：

"以现在抗战期中的情形来说，因为自己出产水泥及钢铁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代替，但在学校里对于木材及石料构造的课程虽有，然而太不注意了。

"教授们的虚构设计及不令学生观察、研究实际的建筑物，真是缺点。同时于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多省略不讲，这便使毕业了的学生在外面工作时感觉到与未读大学一样。"（见《读书月报》第十二期）

农学院的情形大致也同工学院差不多。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图

艺、耕种、病虫害、蚕桑等学科，一半是全讲理论，一半是理论与实习并重，但是所谓“实习”，尽是一些敷衍门面的玩意儿，仅止于画图、看显微镜、答问题而已，连挑粪、拔草都只讲理论。课本讲义又是八、九年前的舶来品，农作等物的品种也都是外国的品种。因此讲起特征和习性来，也都是外国的而不是中国的了。

但是我们大学里的课程并不是没有丝毫变动的，譬如党义，现在就列为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了。中央大学的党义课，由校长罗家伦先生亲自讲授，虽然只有一个学分，从学生们的负担来说却是很重的。国立师范学院党义的必读参考书，包括以下十种：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历届宣言、唯生论、民生史观、国民党史、抗战建国纲领。此外，还要做“读书笔记”。很多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告诉我，党义课点名最严，但仍有许多同学在下课前五分钟赶去补到。

高廷梓先生在《中央周刊》上“论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一文中说：“十年来本党主义尚未能普及到全体国民的缘故，实在是党德之未充分的表现与实行。”这的确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个议案：“规定中国古籍及精神讲话书籍若干种为修养读物，师范学院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每人每学期至少须阅读两种并作札记。”（见《教育通讯》三十四期）于是“四书”也列为大学国文系必修课程，每周三小时，按三学分计算了。

抗战后，教育部为了使全国各地中学毕业生都有机会进大学，实行了“统一招生”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引起了大多数学校的不满，认为降低了入学学生的水准，上海的交通大学曾经登报拒绝接收分配的学生。各学校一致的不满并没有影响统一招生的进

行，因之各大学就实行自己的办法了：新生入校后就先来一次甄别试验，主要学科认为太差的，需补读一年甚至二年。有许多学生便只好忍痛来一个“五年计划”或“六年计划”。因此，去年中央大学六百个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三分之一，能全部课程及格直接升级者，仅一百七十人。发生这种情形，我们是不能光责备入学水准太低的；功课的繁重与枯燥，缺乏好的教授，乃是今天大多数学生的程度比抗战前低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一群大学生向《全民抗战》的编者叙述他们学习的痛苦：“英文现在是二年制，一、二年级的学生还要回到中学时代，整天忙着英文，因此兴趣减低，研究专门知识的时间也没有。真正有学问的教授实在太少，很多是‘滥竽充数’，要从他们学得什么绝不可能。一般同学连我们在内，对于所选的课程大半不满意，换来换去都是一样。最初是认真地记笔记，做报告，看参考书，以后就是消极地应付。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到处听见新生在打听什么课程容易，准备下期改选。我们对功课引不起一点兴趣。”（见《全民抗战》一一三期）

至于考试制度，抗战后更趋严格。各学校开学的时候，各科教授都要奉命宣布本期如何小考，几次月考、期考，会考如何严格等等。复旦大学每逢月考、期考或国文、英文会考，训导长必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解释“考试规则”，至今传颂的名言便是“上考场如上战场！”过去在这方面较为自由的北大（北大从不以分数作鼓励，文法学院多无月考），现在也失掉了这个优良传统。西南联大常常为功课不及格而开除学生。最近教育部更规定大学毕业的总考制和竞赛办法，四年的主要科目全要考，于是大学教育就简直成为大考教育了。

不必更多的引证了，这就是三年以来（抗战的三年呵！），大

学教育中"智育"的成绩，也就是某些人恬不知耻地所颂扬的"建国教育"的成绩。如果说学生的意见难免主观片面，那末，这里也有大学教授的见解：

钱穆先生在"四十年之北大"（见《益世报》）一文中说道："由政府来统制全国教育，并非坏事，毋宁说是政府之一种进步的表现，但私人意见，仍望政府能采取较宽的自由主义。……否则这种统制将成为空洞无物。"

"学术研究自由"，这决不是某些教授和学生的无病呻吟，这乃是当前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陷入迷途的德育

再看现在正被高唱入云的德育。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重庆的《大公报》社论"学校与学风"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妨全部录下：

"教育最大的责任，是给师生以自由的园地与空气，以最大的可能去培植学生向各方面发展。……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师生间的精神和行为的悠久的感召，而不宜于统制与干涉；因统制与干涉只能收思想行为表面上的效果，而内心上每每还加重其反感。……至现代化的秘密侦探的方法，尤不可让其侵入教育的园地。因为这种方法不但不能收统制思想行为的效果，而是徒助长不良分子的不良倾向，使一学校中由少数人去任意执行钳制工作。……主持教育的人，要知道最大部分的青年，都是最具有敏感而也最有会心的，你不论用什么方法，都容易被他们看穿，都容易诱起他们发生恶性的适应力；将来社会国家所需要的正义感与清明性，都将被这种教育上偶然的不良措施，轻轻地无形中摧折断送。至于用金钱来奖励一部分学生，作为

这种刺探钩拒的工作，其流弊尤为可怕；这是既不能得着预期的效用，反将受利用的学生完全诱惑坏了。因为潜心读书与这种工作是不能并立的，他因此便受特许的，先虚掷自已的时光。他们练习着以特别深刻的另外的眼光来看同学，他想在他们身上看出点什么可报告的事件以邀功，在必要的时候，还不惜无中生有造作事实来塞责，这是做情报暗探工作常有的流弊，而于青年人便易于仿效感染。学校施行奖励，已是一件要慎重的事，金钱的奖励，尤须特别注意到其可能的影响。凡属这一切，我们不要以为是可以随便尝试的，这是对于民族国家未来要负责任的"。

这些话说得很严肃，很含蓄，令人玩味；同时也证明今天大后方大学教育空前可怕的反动一面，连"半官方"的报纸也不能再隐饰了。这方面的情况，相信读者一定还希望知道得更具体一些。

这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发生的事情，为了使全国的大学生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各个大学的校长都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的委员，同时各个大学都开始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分团部，或者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了。于是许多大学的校长现在都成为各该校分团部的直接领导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因此在各校迅速地发展起来。譬如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先生制定的登记表，很快发出了几百张，他领导的党义研究会(会员必须是党员)也很快有了二百多会员。同时，团员、党员在学校内也很快成为一种特权阶级，他们可以"任意钳制"所有校内的学生组织，用"警察的方式"去干涉他们所认为不顺眼的团体和个人。由此，学校中一切团体(从学生会到各系系会)的负责人必须由团员或党员充当了。一系列怪事都发生了：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毕业的团员，虽经教授反对，但仍大批留任

助教；四川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团员可以当农学院的助教；而朝阳大学的三青团更可以左右学校的行政；至于学校的公费免费生，团员和党员当然该有优先权。去年重庆被大轰炸时，各校学生都踊跃参加救护宣传工作，罗家伦校长召集全校学生讲话，只说到“三青团员都去参加救护”。当时即有学生反问：“难道只有三青团员才能参加吗？”这一反问弄得罗校长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其他如“情报暗探工作”、“金钱的奖励”等等，这已是十多年来大家熟悉的“家常便饭”，不过如今更甚罢了。

这里还必须费一点笔墨谈谈教育当局自我欣赏的“导师制”。教育部所颁布的“导师制纲要”中说明“导师制”的创设，系参考我国儒家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办法规定的。古代的“师儒旧制”，暂按下不谈，仅仅依据“导师制纲要”中主要的条文，来考察一下是否合乎所谓“牛津精神”。

“导师对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身体状况各项，应依照格式详密记载，每月报告学校及学生家长一次，其缴学校之报告，主管机关得随时调阅之。”（第五条）

“学生经导师认为不堪受训时可令退训；再经退训时，即由学校除名。”（第八条）

“学生毕业时导师应出具训导证书，于学生一切言行详加考语，以为后日升学就学时供关系方面之参考。”（第九条）

人们知道，牛津大学对学生的学习是采取极端的放任主义的。黎考格在“我所见到的牛津大学”（Oxforx Asj see）一文中说：“牛津能训练出世界上最典型的学者，它的方法是古老的，它有永远不授课的先生，和永远不听讲的学生，它没有政府颁布给它如何教授的法令。然而牛津给予它的学生却是一种崇高的生活和思想方式。”牛津学生对思想信仰有绝对自由权，不管什么党

派信仰，政府和学校向不干涉。可见，中国政府现行的“导师制”，与“牛津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导师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大学校的训导长和训育员，教育部规定了必须是“国民党员才得充任”。导师也要尽先让国民党党员充当。那末，导师的日常工作（假如他负责任的话）是不难想像的。中央大学的六百新生，一个月以内，每一个学生经过导师和军事教官的个别谈话后，三青团员因此增加不少。据说，现在全校二千多学生全部实行军事管理，政府特派来一连教官，每个教官管二十个学生，书籍、信件、日记，一切东西都要按时检查。四川大学的办法也并不比中大“落后”，现在全校学生一律被编成小组，组长由学校指定，对同学有监督权；此外，还制定一种表格让学生填：“你经常和什么人接近？你为什么和他接近？”“你最佩服谁？”“你最爱谁？”（包括学生和教授）复旦大学的导师郑学稼、李建芳，同学生个别谈话的内容，常常是这么一套：中国共产党如何没有前途，如何破坏抗战，斯大林怎样不懂得农民问题，不懂得中国革命……国立师范学院的公民训育系主任兼导师袁哲，则强迫全系学生加入国民党。这样的情形，曾引起马寅初先生在中央大学讲演时，痛骂导师制之反动，束缚学生思想与人格之独立发展。关于“导师制”实行以来的另外许多功绩，《大公报》另一篇社评“新政与新人”作了这样一个总结：“少数无聊教员，平常学问人格都有问题，则借‘导师制’的美名，与学生酒食徵逐，于是教员博得学生好感而地位稳固，学生也以得与教员交结而不愁学分不够。这样将给学校造成一片颓风，且以彼此厮混之故，益增派别斗争波澜。”

我们的教育部对学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一九三八年十月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发了“注重精神训练”（见《教育通讯》二十八

期）的训令，其中一项云："专科以上各校学生，特由本部颁发青年守则，仰即转印分发并随时由各该校主持训育人员，严加考核，务须每生均能熟读背诵。"什么是青年守则呢？"青年守则即党员守则"（原训令）。自此早晨升旗时，军事教官必领导学生大呼"党员守则"。连前面所说的建立党与团等等，这仍只是加强"党化教育"的一面。另一面呢？被认为"思想不正确"或"思想危险"的学生，在校内的行动，甚至看一本书，与人接谈等，都要受到重要的干涉和监督；而且毕业以后，那怕是本系教授保荐，也常为学校当局所阻难，他们的职业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去年中央大学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学生被介绍到南开中学去教书，后来罗校长硬通知张伯苓先生不收聘他。同时许多大学当局常常发表许多"危害国家民族"的谬论，这里仅仅举一两个例子。下面是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在纪念周讲演的经常内容："苏联帮助中国完全是做生意，将来一定会压迫中国给它利益的。"

"抗战时期根本不能谈民主宪政，你看德国、英国和法国都是军事专政。"

"共产党是工人无祖国，现在参加抗战已经脱离了他们的阶级。"

"川大根本没有共产党，只有人民阵线分子，所有的人都是国民党的信徒及拥护者。"

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在一次纪念周上向学生郑重地报告："周恩来在政治部已经赞成'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也在一次纪念周上严重地告诫学生："听说我们学校共产党很多，现在'马日事变'就要来了，你们还不快自首，我可以替你们向政府圆通。"

"防民甚于防川"。这就是大后方大学教育的"礼乐之教"的

德育呵！任凭你怎样歌颂在“培养建国人材”吧，谎言总是掩盖不住事实的。

饥饿的体育

陈立夫先生在“学生健康比赛之意义”(«教育通讯»第三十五期）一文中，曾谈到今后学校体育教育的任务：“吾国学校之所谓体育教育，其病在务门面而不重实际，一若运动之目的为竞赛，体育之培养为选手者，而于健康教育之宜如何推进，卫生知识之宜如何灌输，则阙焉不讲，今后于青年之健康，务需切实敦励，借为国家培养强健之人民，以增进民族之力量。”

这样的话既然由教育最高当局亲自说出，所谓含有“新内容”的体育教育总该比以往有所进步吧。然而历史偏偏安排了这样的讽刺：专门培养体育师资的两江女子体专，由于学生不愿饿下去，罢了课，结果教育部将这个学校解散了。

整个大后方的学生，长久以来嗷嗷待哺的情形，政府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其严重性：“现在有些地方的学生，竟至每饭难得一饱……物价腾贵，以致各级学校膳食发生困难，从而影响青年学生之营养，实在是一个急待解决的教育问题。”（«中央日报»载潘公展“论教育上两个迫切问题”）

根据教育部关于贷金的统计，现在全国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拿贷金的。贷金的数目，每月每人顶多十元。今天在后方十块钱是无论如何吃不饱饭的，何况许多学生并不见得能按月领到。让成千成万的学生饿死总不成体统。报载蒋委员长曾经拨款十万元救济过昆明的学生，我们就来看看西南联大的学生怎样生活的吧：

“伙食由十块涨到十四块，厨子嚷着不够，同学们叫苦连天，

米涨到六十多块钱一公担，从六月起（一九三九年）伙食还要加七块呢（注：现在当增至二十多元一月了）。经济来源断绝的战区同学，贷金又不发下来，吃饭简直成了大问题。

“饭煮得熟，够吃，就满人意了。有时候饭煮少了，还只吃到一碗呢。菜，两块小小的豆腐干也算一盘菜了。说到汤，好听点，就等于白开水放点碎白菜，再加点盐就算是汤了。

“这个年头谁都会打算盘了。在饭堂门口和过路地方，你可以常看到‘出让《逻辑学》一本，价格××，接洽处××寝室’，或是‘摩登白色高跟皮鞋三双，新度百分之八十，价格八元、十元……’之类的条子，此外出让衣服、纸张、墨水、笔以及一切日常生活用品，无不尽有，出让者多半是战区经济来源断绝的同学，有的是什么都卖光了。”（见《战时青年》二卷四期）

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情形也并不见得好些。许多学校已改吃“混合饭”了（菜和饭混合到一块的稀饭）。有一个学生，他这样描写没有油吃的生活：“三百多人每天还吃不到几斤油，所以同学们嘴都干裂了，在茅厕里蹬着的人，直是‘唉哟，唉哟’地叫苦。”（见《战时青年》三卷二期）

这种悲惨的情形，大后方的学校无一例外。浙江大学（现迁贵州）某教授曾说，他们的师范学院，可改为“稀饭学院”，因为学生每日都以稀饭充饥。最近滇、黔、川、桂各地学潮不已，有很多是由于学校当局克扣学生伙食费，侵吞公款，将贷金按下不发（以便存银行放息），以及学生遭受种种虐待而引起的。

我们大后方的学生，时时在同饥饿作斗争呵！

这仅仅是关于“食”的一面，“住”的问题也同样是不合“营养”与“卫生”之道的。各校普遍都是几十人或几百人睡一间泥土地的大草房，挤得密密的双层木床，夏天臭虫与蚊蝇的猖獗可

想而知。中央大学的学生，夏季都跑到教室里或露天下“打游击”。各校更少有医疗设备，顶多也不过有一两个挂名校医或看护，守着江湖药摊式的医药室。因此，猩红热、霍乱等传染病易于流行，学生病重了只有“坐以待毙”。虽然手边没有精确统计材料，但各学校学生的患病率、死亡率比战前大大增加，自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学校的经费固然比战前困难，但无谓的浪费，不合理的用度与层层贪污，是造成经费困难最大的原因。譬如西南联大花了四十万元，在昆明城边盖了二十多栋草房，目标大，容易遭受空袭；这全是为了教授和学校当局的方便，而加重了学生生活上的困难与生命的威胁。上下课时，学生要在新旧教舍之间“急行军”；课堂坐位总是不够，宿舍没有书桌（根本就没有自修室），画图室与实验室拥挤不堪，空气恶劣。体育运动方面更是设备简陋，甚至很多学校没有操场，过去那种“选手制度”的体育，倒是用不着我们的教育最高当局担心了。至于其他文化娱乐，等于缘木求鱼。生活指数在不断上涨，学校制度不见改革，不难想象，我们的“体育”，今后必将每况愈下。

教授的悲哀

大学教育的政策和制度，抗战后既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物资生活又是如此艰难，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一向视为“清高位置”的大学教授的情况了。

抗战后曾有这样两类人离开了大学教授的位置：一类是当汉奸去了，如钱稻荪、柯政和周作人、樊仲云、陶希圣之流；一类是当官去了，如胡适之、蒋廷黻、梁实秋等。现在我要谈的是留在校里的教授状况。

事态的变化是一九三八年全国教育会议之后，一方面各大学都要成立党与团，“要加强学校与党务之联系”（此语见朱家骅“告全国教育学术团体书”）；另一方面，如此“重任”，当然要有执行者。“识时务者为俊杰”，善于处世的人，自会欣然加入这个不光彩的行列。也有首当其冲者，不得已被迫加入。然而中国许多大学教授，受欧美民主思想的感染较深，欲全部大学教授都填一张表，到底不大可能。于是我们的学府就涌进了一批党棍和政客了，他们声称负着“党国使命”，要来“训练青年”和“纠正错误纷歧的思想。”这类以“训练青年”为专业的先生，在四川大学、中央大学、新创立的几个师范学院内，数量是很可观的。由于他们不学无术，所有的本领无非“秘密侦探的方法”之类，当然不受学生的欢迎。四川大学去年曾发生过这么一件小事：生活指导主任叶叔良在教“条约论”时，出了这样三个题目给学生答：中日战争胜利了，条约应如何制定？中国战败了，应如何订？双方皆愿和平了结，应如何订？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些先生们为什么不受欢迎吗？

大多数不甘心吃“党饭”受“闲气”，也看不惯这些“训练青年”的新贵们的行当的教授们，又由于物资环境太差，难以专心治学，于是一天天陷入生活的苦闷，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有些人就干脆“借酒浇愁”，如在西南联大，所谓big game（“大玩意儿”——麻将）Small game（“小玩意儿”——朴克）便在很多教授中间盛行起来。此外，也有经营副业的，昆明有许多教授开饭馆，开玩具和文具商店；四川北碚生意最好的原德福饭馆、美的西餐室、滋美中菜馆的老板们，都是我们的大学教授。

某教授写信给他的弟弟道：“这四川真是闷人，前线在拼死活，这儿却一些不紧张。旁的人混得安心，我却总不安心，这心上总

有些惭愧……。现在不是一个贪图安逸与舒服的时代，既打定做实际工作，就不能徘徊。该走哪一条路就走哪一条路，绝不可骑墙。离开了明确的立场要作实际工作，在目前是很困难的”(《战时青年》二卷五期)。象这样关心抗战、爱护青年、尊重个人气节和学术研究自由的教授，现在在大学内也渐渐难于立足。朱光潜、张宗元等十余教授据说是被迫离开四川大学的。复旦大学的教授马宗融曾在教室内被三青团员检查他的私信，胡风、章靳以也接过不少的恐吓信，伍蠡甫主编“中央日报”的副刊一个月，就有人说他是共产党。

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所通过的提案:“保障讲学自由，以便学术开展，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针对着如何提高和培养师资人格，倡导思想自由这个问题，而向政府提出的正面抗议。

没有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精神，历史便不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提倡学术自由的北京大学，同时也不会有过去大学教育中相对的民主传统。

今天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同样地失去了“人”的自由!

三 个 危 机

被我们权贵们歌颂的大学教育的内容，现在是赤裸裸地摆在社会的面前了，漂亮的“方针”与它们实质的对比，是一种何等的讽刺!

现在让我们将这暴露无余的历史上空前的大学教育的危机，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方面它在向“五四”以前的道路倒退；另一方面将今天为世人唾弃的最反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反理性的盲从与卑鄙的特务手段，援引到大学教育中来。这二者的结合，将过去大学教育

仅存的一点民主传统和历史光辉，一齐摧毁，大学相对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蒙上了反动统治的黑幕，逐渐失去了它多少推动中国社会向前进步的作用，加深与增长了中国殖民地化的危机，这是第一。

第二，“学非所用”，大学教育与抗战的现实一天天疏远。大部分学生对抗战建国没有什么认识，所愁所虑的只是今后个人的出路与薪金，而当局也以此勾引学生，由于“使一学校中由少数人去任意执行窒息钳制的工作”，“现代化的秘密侦探方法”，“侵入教育园地”，更造成同学间政治上的猜忌、怀疑与恐怖心理的滋长；加上物资生活的不安定，使得大部分学生陷入一种苦闷、颓废、消极、麻木的情绪与生活中。

第三，这种种残酷的现实，也使得大部分教授走上悲观苦闷的道路，不安于自己的工作；同时，大学内混入一批不学无术、陷害青年的寄生虫，大大降落了大学的师资人格。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让这样严重的教育危机再继续下去的。大后方广大的舆论界，已为这种危机发出了严正的呼声；同时许多大学的学生和优秀的教授，已向教育当局发出了“你们究竟要将我们牵引到什么地方去呢?”的愤怒的疑问，他们无限欢欣地看见“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显出地平线了”，他们正在同这“阴云越来越昏暗、越来越低地落到海面”上的环境沉默地搏斗着。

（《中国青年》一九四〇年第二卷第九期）

国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和学生

（湖 南 通 讯）

自从一九二二年南京高师合并于东南大学以后，专门训练中等学校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除硕果仅存的北平师大（现已并入国立西北大学）以外，其他如武昌、广东、成都、沈阳等高师都逐渐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抗战以后，教育部公布："各大学原有之教育院系分别改为或改属师范学院……。"如是过去以教育系推翻高师，现在又以师范学院代替教育院系了。中央、西南、西北、中山、浙江五个国立大学，都已附设师范学院，另外在湖南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师范学院。对于更多培养中学师资，这似乎是件好事。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扼要地谈谈这个新成立的学院的几个特点，以说明教育部为何如此重视师资的培训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师在湖南的蓝田正式开学。现在有二百多学生，学生的宿膳费一概免缴；共设有七个系，毕业期限五年。各系课程分"普通基本科目"、"教育基本科目"及"分系专门科目"三种。第一学年全校学生的必修科目有一门党义，包括的教材很广，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历届宣言、唯生论、民生史观、国民党史、抗战建国纲领十大类。学生除必须读完这十大类的参考书以外，还要做"读书笔记"。党义教授由公民训育系的主任兼，这位主任过去是上海

市政府的中等教育专员，抗战后做过国民党战干团（战时干部训练团）的政治教官。上第一课时，他对全校的同学说："为什么师范学院的学生都要上党义课呢？因为你们过去只学得片断的党义知识，将来你们出去都是为人师表，所以必须坚定对于本党的信仰。"他平常谈话，总离不开"本党"二字（这也是国师的院长、教授们讲演、行文的作风）。公民训育系，这恐怕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创举，目的在培养中等学校的训育主任和公民教员。这位主任曾经在他的一篇大文"公民训育系之设立宗旨及其教学目标"（载《国师季刊》创刊号）中说过："今后教育之实施，必须以训育为重心，训育之成功，亦即为全部教育之成功。"第一年这一系只有七个学生。这位"本党"主任爱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有一次将七个学生全部都找去，很郑重地告诉他们，将来中学校的训育主任和公民教员必须是"本党"党员，于是单刀直入地要他们集体入党。据说当时这七个学生都没有应允，后来只有一个战区的学生，由于生活困难所迫，这才勉强加入了"本党"。主任为此事当然不高兴。有一次月考出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各述对国民党的意见及今后对国民党应有之态度"。考试的结果，一位全校作文最好的同学，在卷子上发了一些牢骚，竟没有及格，主任将他叫去大大训斥了一顿，并且勒令重读"党义"一年。第二年，这系有两个学生和院方打了几场官司，才被允许转系。

谈到考试，国师的学生莫不毛骨悚然。每次月考必停课四天，让学生准备。学期考试的威严更可想而知了。有几个教授好象以出难题而自豪。第一年，全校有半数以上的学生英文不及格，有一个学生的分数是五九.九（这是全校皆知的事实），结果当然要补考，而且补考者要预先经过院长"test"（检验），四十分以上的才有补考资格，四十分以下的必须重修，这就是说留级。学校

规则上订明："主要学科一门不及格者留级。""分数学院"这个名词现在已由校内传播到校外去了。

英文和国文有半数以上是要背诵的，学生如果在讲堂上背不出来，就会遭到极难堪的待遇。英文作文一点钟当堂交卷。国文是两点钟交卷，并且"缮写必用毛笔，必整洁，而潦草者不阅"（作文规则）。英文教材所选的差不多全是古典的东西。"古的才靠得住！"这是英文系主任的口头禅！国文则规定"四书"为国文系必修课程，每周三小时。"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实为吾国人伦、道德之根源，一切社会秩序，直接间接无不受其支配，而先总理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开宗明义，尤斤斤于中国固有道德之培养成长，而揭大学之整齐修诚，以发其风，而端其本，至少国文系之师范学生，不可不身体力行，深明斯旨。"这一段话是系主任钱基博先生在"国文系课程研究"中所特别提到的。既然自院长至所有的教授都爱古，这所大地主庄园的校舍也就弄得更古香古色了：从大门到教室，到礼堂，都贴满极"工整"的对联，有如纪念日的标语，学校出的季刊后部也填满了教授们的诗词歌对。

校当局注重考试和分数，英文和国文要背诵，每门课的参考书又多，还要做"笔记"，于是学生中的读书空气自然特别浓厚。学生就容易受到以下这些思想的支配："读书救国"，"我们是建国人材"，"抗战的前线去，读书的后方来"……很多学生干脆自动废除礼拜天。"读死书"的风气一盛行，当然对教授的要求和挑选也就同时增高，学生都热烈地希望有"好教授"。去年有一位也是"本党"的经济学教授，因此受到很不客气的待遇：全体学生都坚决不上他的课，最后闹成僵局，学校只好应允下年换人。自这次事件发生后，在学生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流行病——都想转学。

去年暑假以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准备转学，学校着了慌，动员全院的导师，详细调查之下，开除了七个“私自”转学的学生，并且向全院学生宣布：不准中途转学，否则通知全国各大学不收容，并追回在校时的学膳费。

象现在实行的所谓“导师制”，实是中国教育界特有的奇迹。全院有一个训导主任(或名主任导师)，另外聘请许多教授为导师，每一个导师管理学生五人至十五人。导师做些什么事呢？“训导概况”上写得很清楚：“各导师应充分利用个别谈话机会，及随时随地观察学生，以注意其思想与礼貌，为训导之中心工作。”为便于说明问题，还是摘下几则“训导概况”吧：“大学生之性情思想，及一切行为，有赖于训导之处，不唯不比中小学生少，或尤过之。抗战以还，教育行政当局特别注意训导，制定青年训练大纲，颁发导师制纲要，训令各级学校奉行。”“凡在集会中有人第一次称用总理或最高级领袖时，应全体起立致敬。”“在院内任何处所，凡是师长入室，或与来宾同行时，均应起立致敬。”“学生经导师多方劝告，并经家长协训，而认为无效时，当即以退训处分，由院重新分配于另一导师，如仍无效，则由院长致最后警告于该生，促其改善，设再不悛，即令退学。”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生活行动，训导规则中无不一条一条定好范围。每个学生的学期成绩单，都载有导师写的“操行评语”。学生毕业后，教育部根据导师的证明书和全部成绩单，才介绍学生的职业。所以导师的威严极大，学生同导师的关系就如父子一般。院长廖世承先生第一次纪念周就对学生说过：“怕，是人生之大敌，先生怕学生就管不住学生，学生怕考试，考时就心慌。”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校内碰见他的导师忘记敬礼，衣领又没有扣好，被那位导师骂得“狗血淋头”，这个学生当场痛哭起来。学生的成绩又大部受导师的“印象分数”

的限制，就是说你的功课本来能够及格，导师对你的印象如果不好，便没有及格的希望了。这位挨了骂的学生，后来他那门功课就只好再补考一次。导师找学生个别谈话，据院方解释，这是"牛津大学的风气"，为了模仿得更"象"一些，有些导师也常找学生聚餐。刚开学不久时，全院师生是"共食一堂"的。学生伙食六块钱一个月，当然相当的坏。教授兼导师们一方面要表示同学生共艰苦，过"战时生活"，但另一方面又要不亏待肚皮，于是蓝田镇上饭馆的生意就大大兴隆起来，并且一天一天都市化了。吃风一涨，学生也就更享受了"牛津的风气"——一学期总有这么一两次聚餐的机会。

除导师制之外，全院学生整个五年都实行军事管理。早晨起来升旗，由教官领导高呼"党员守则"，进食堂吃饭由教官指挥整队，要待全体入席后，教官发了口令，才能动筷子。晚上自修也由教官点名，一定时的内务检查，当然更是应有的公事。所以军事教官的威严比导师还要来得大。有一次检阅，军事教官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威严起见，将湖南中学校的军训乱骂了一通。有一位多事的湖南同学站起来申辩了几句，他说明湖南学生的军训在全国要算是最好的。于是引起教官的大怒，认为是侮辱了他，随即向院方报告，结果这位多事的湖南同学只好缴还制服，捆起铺盖行李"滚蛋"。同学们的气愤无处发泄，也就只好放了许多鞭炮来欢送这位同学。不过，同样不幸的事也降临到三位教官中的一位，因为他逛窑子，生杨梅疮，被学生发觉了，也只好滚蛋！

还有一个被开除的学生，也应该顺便提及。这是一个英文系的学生，他在这个"学院"读了半年，大概是感怀颇多，又无人可告，国文作文中写出来有些不方便，于是写了一篇很长的英文文章，大大发泄了一下，内中也许有些对"院方"颇为不恭之处。

这篇文章被英文教授交给了院长，院长大为震怒，在这一怒之下，他也就只好捆起行李"滚蛋"了！

国师的女生很少，一个个比男生更拘谨，更胆小。在这样古香古色的学院内，男女同学之间，那怕是同班的，就是随便谈谈话，也唯恐不合于"礼"。国文系另一位老教授，他在一次纪念周上讲演，特别讲"礼"，后来又写成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妙句："余友有子曾因婚姻之不适意，亦狂呼礼教杀人，余乃告曰：苟汝父母不以'礼'相结合，则无待礼教杀汝，汝早无生命矣！"因此，自由恋爱之事，在这个学院我们暂时还不必担忧，不过以后也很难说，因为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虽然很少接触，可是全院二十几个女同学，每一个人在男同学中间都流传了一个诨名，而且也有一些男同学远远地跟在后面叫的。

关于这个新创办的"学院"，我想也不必再多赘笔墨来介绍了。最后它的所在地——蓝田，是值得提一提的。蓝田是靠近锡矿山、湘中的一个有名市场。长沙大火后，有十个左右的公私立中学（学生四五千人）都迁移到这里，国师当然很象鹤立鸡群。开始一个时期，这些中学的高中学生都特别加紧读英文，一时形成一个"考国师"的热潮。然而过不了多久，"分数学院"的名词传出来了，国师的学生同这些中学生有了来往，于是热潮变成了冰流。

如果你现在去问一个蓝田的高中学生，问他愿不愿考国师，他一定在摇头之外，还会给你讲一套道理或者一两件趣事。

（《中国青年》一九四〇年第二卷第五期）

鄂西联中的"整顿学风"

武汉危急的时候，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为实现"青年统一训练"，将湖北所有公私立中等学校，联合组成一个"联合中学"。这就是引人注目的鄂西联中。这个"联合中学"包括分校二十五所，学生一万多名，分布在鄂西恩施周围的十几个县内，由教育厅厅长兼任校长，原来各校校长任分校主任。因此所谓鄂西联中，实际上就是抗战期间整个湖北的中等学校。

自武汉撤退两年多以来，这所"联中"实行了一些什么"统一训练"呢？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七日，陈诚在湖北省教育厅发表了一篇关于鄂西联中的讲演（刊在重庆《中国青年》三卷六期），首先谈到"两年来省立联中的检讨"：

"过去一般人对于我们湖北的教育有三种批评：一是派别多；二是学风坏；三是程度低。现在我们拿联中的情形来对证一下，真是一点也没有冤枉我们。别的不说，单就学风一项而论，固然也有几个学校很好，但是一般的都是很坏。甚至有些学生公然违章犯纪，毁行败德；对校务则妄加干涉，对师长则任意侮辱。或偶以细故，罢课要挟；或聚众赌博，败坏校誉。其他种种颓废浪漫行为，真是不一而足。"这段话里面是透露了许多消息的。

联中的"每况愈下"，使得这位省府最高当局亦不得不"惭愧之余，更觉万分痛心"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来纠正这种"学风"呢？"对于屡犯校纪，怙恶不悛的学生，则分别轻重，严加惩处；

或令学校当局，立予开除；或调往前方，服役自效。如果一班或一校的学生，犯于积习，恃众要挟，政府宁可令其全体解散，决不姑息。”（以上引号中语，均陈氏讲演原文）所有这些“整顿学风”的措施，是怎样执行的呢？从大后方来的人，告知我们有关联中这样一些零星情况：

建始等地的学生，从今年春天起，每天就只吃两顿稀饭，而且还要象上海西牢过称的办法，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十二两米。学生们则坚持以往的数目，每天一斤。学校当局不答应，于是发生抢饭吃的风潮。省政府知道了，居然派保安团来镇压，说是学生要暴动了。于是抓人，于是书也读不成，有些学生为了免得吃官司，便不得不“逃难”了。

后来学校当局叫学生每周到山里背柴一次，称之为“社会劳动服务”。这件事如果办得好，倒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学校中的“青年团”（绝对不许说“三青团”，此乃密令）的领导人，为此在纪念周向全体学生训话道：“现在前线的战士一闹便几天没饭吃，还有很多流亡的同胞饥寒交迫，而我们还能安安静静在这里求学，而且还有稀饭让我们吃得饱饱的，这不能不感谢我们的陈主席，我们应当加紧劳动服务来报答他。”

吃的“饱饱的”，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至于“聚众赌博，败坏校誉，种种颓废浪漫行为”者，无非也是这一小部分人。这些人是陈主席的嫡属：“青年团”的要人，学生中的贵族兼宪兵。他们最重要的职务是“盯梢”，以“吃馆子”为饵，引诱年幼同学替他们“盯梢”。这种工作差不多是日以继夜的。恩施高中一个学生，家在本城住，每逢星期六下午即由校返家。有一天，回家路经某地（该校所在地金字坝与省政府之间的一个地方）时，有两个人在背后用手巾将他的眼睛蒙起来，这个学生以为是同学们故意开玩

笑，还骂着不要寻开心，但随即他的手摸到一支冰冷的手枪，他被拉到一个坟堆里左弯右转，命令坐在一个圆凳似的石碑上，又猛转了一阵，才又上道，东拐西拐地拉进一间秘密的房子里去了。然后解开他的眼睛，一顿威胁恐吓，要他将学校中某教员思想怎样，某同学看些什么书，等等，全部讲出。审问完毕，又同来时一样做法，将他送到原来地方。

今年（一九四一年）年初，这种秘密办法似乎不解决问题了，于是各校都发生了公开大肆逮捕学生的事。开初，是军事教官和训育主任将平时比较热心救亡工作或比较活动的学生叫去谈话，要他们"改过自新"，只要说不再受"特种汉奸"利用，只要承认过去错了，便可无事释放。但被叫去的学生都莫明其妙，不晓得"特种汉奸"是什么，更无从谈起"被利用"；所以一次、二次乃至三次谈话，都毫无结果。于是第四次便不要你谈了，由真正"特种"机关派来的人将你押去关禁。鄂西联中大批青年学生，就这样变成了抗战时期的"政治犯"。

捕人多半是在晚上进行的。第二天早饭后，往往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里，听训育主任和"特种"机关的人训话。训话内容就很露骨了："你们要相信，我们有力量打败日本，也有力量来剿共，来消灭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这里经常有很多密查，他们是来负责整顿'学风'的。你们看来或许是一个卖柴的，或许是一个挑粪的，也许是一个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以后不准三个、两个在一起，不准在街上逛来逛去；假若发生误会，我们学校绝不负责。"

最大的一次"整顿学风"，要算是今年三月在建始三里坝建始高中发生的。该校已逮捕过两次学生，第一次十个，第二次七个。这一次如临大敌，开来大批军队和"特种"人员，将全校包围起来。按照"名单"，将三十多个学生一一绑起，然后集合全校学生，到

校后一个荒山上举行"公审"。公审时，用皮鞭、木棒将三十多个被绑学生打得不成人样，有的手骨被打断了。这是一幕惨绝人寰的杀鸡吓猴之戏。六百多个同学，第一次饮泪吞声，但又不敢痛哭。有一个同学，因受刺激过深，从此得了神经病。

在大后方，这类"分别轻重，严加惩处"的"整顿学风"，今后不知将演变到何种地步！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解放日报》）

“百年树人”的大危机

——谈大后方学生程度低劣的原因

据西南联大、中央、武汉、浙江四个国立大学今年（一九四一年）联合招生的成绩统计，应考学生共六千四百零六人，录取者一千七百八十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七。其中第一名的平均成绩只有六十五分，五十分以上者仅四十三人，四十分到五十分者三百零三人，三十分到四十分者一千四百四十二人。三十分以下到二十四分者四百一十二人，入先修班。二十四分以下者落第，共三千四百零八人，其中成绩最坏的，由零分到十分的有三百六十三人；而英文一项，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零分；国文、数学十多分者，也占三分之二。（材料来源见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国民党《中央周刊》四卷十一期、《大公报》十月八日读者投书）

中学毕业生程度低劣的征象，其实早在去年的统一招考中即已显露：“七百零五人中，若以五十分为及格，则不及格者，国文占百分之五十，英文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四，数学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三。”（见《今日评论》一卷五期郑毅生教授文）又据中央大学徐仲年教授的统计，以英文为例：四川白沙区共有五百六十二份试卷，零分者一百九十七卷，三十分以下者二百二十四卷；合川区共有四百三十一份试卷，零分者八十卷，十分以下者三百二十卷。同年，广东文理学院招生，有一史地试题为：“美国在一八九九年对

中国问题宣布门户开放主义，而今年六月七日，美总统罗斯福关于门罗主义之声明，又大唱'亚洲人之亚洲'，前后有无异同？中国所受影响若何？"曲江一百三十一个考生中，完全了解者竟无一人；茫无所知者七十七人，几达百分之六十；其余五十四人也是一知半解；算了解'门户开放'意义者有四十三人，知道"门罗主义"的只得四人。（见《教育新时代》二卷三期林砺儒教授文）由这一个例子，更可看到抗战以来的高中毕业生，政治常识何等贫乏！

目前各大学多设有补习课程，如国文、英文、数学等，几乎全部学生都要分别补习。中央大学有升入四年级的学生，还在读"补习初级英文"的。因赶不上班，而受到"辞退"或"留级"处分的学生，每校年必几十甚至百计。这在抗战以前是不可想象之事。

国民党当局的文告和某些论客，都责备学生，说是学生"误解自由"，"嚣张跋扈"，"不知崇礼守法"，因而"不肯专心读书"，遂至"学风萎惰"，云云。显而易见，这是反本求末的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学生读书，离不开教师和环境，即离不开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考察一下近年来学生程度为什么会如此惊人下降。

据大后方舆论界一致的意见，"师荒"已成为目前学校教育中严重问题之一。因为待遇太低，生活无法维持，许多教授、教员改了行。"譬如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各级学校林立，中学校几乎到了请不着教员的程度。"（《大公报》十月二十三日社评）有些学校的重要课程，整期整年都没有人教。学校既然留不住教师，只好"滥竽充数"，到处拉夫，选择教师的标准大大降低。也有些教师将教书当作进身之阶，无心认真教书。还有的教师实在为生活所逼，兼任好几种课程，当然影响到教学质量。然而在这方面更严重的

问题，却在将师资的选择与办党的陋习混淆起来；大学、中学内混进了一批学问、道德都不足为学生表率的党棍，他们在校内兴风作浪，专事"特务式的侦探，威胁式的恐吓，今天开秘密会议，明天侦察某几个人的行动。"(《华西日报》九月八日文章)弄得人心惶惶，无日以宁。而许多认真传道解惑的教师，不是被摒诸校外，便是只准讲一套不犯忌的东西。因此，教师的质量不仅无从提高，反而每况愈下。提高教师待遇问题，今后如能得到某种解决，教师来源可能有所增加；但是"害群之马"不予清除，自由讲学、兼容并包的风气不提倡、不培养，则教师质量问题恐终于无法解决，学生的程度又焉得不"江河日下"？

说到学生生活的困难，无分朝野，众口一词。国民党当局拨了些款子，使得战区学生免为饿殍，这似乎是一件"德政"。但是学生的食宿生活，实令人言之心酸。重庆的公立学校，近来由政府发给平价米，每人每月"新斗"二斗一升，米中的稗谷、虫子、砂粒，多得无法下咽，而且远不够吃，于是不幸的饭厅争斗，愈演愈烈。其他各地的学校，还比不上重庆，还沾不到平价米的光。许多国立中学学生，天天同有限的稀饭相依为命。学生的衣、住两项，同样不堪闻问。几十上百人挤在同一间屋子，冬有寒风，夏有臭虫。痢疾、疟疾、伤寒、白喉等等疾病，常年流行。有些学校学生的患病比例，竟达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国立二中、六中附近，死亡的战区学生，已是墓碑成行！教学工具更是普遍缺乏，一般中等学校几乎同图书馆、实验室绝缘。大学生平均要四、五十人才能得到一本参考书。学生买不起书，学校又不发讲义，乃至纸笔墨也成问题。上述种种情形，如果再不认真加以改善，不独学生的课业程度会日益低落，而且将缺乏身体强健的民族后代了。例如"湘省三千受过高中集训的学生，体格适合航空标准的

只有七个。"（薛岳在湖南防疫会议上的演词）国民党当局决不应满足于"已经花了不少钱"、"救济"了不少学生的现状。事实上，教育经费目前仅占国家总预算百分之一，是需要大大增加的。同时，各地学校有关学生生活情况，应切实予以检查；对于那些贪污、腐化、虐待学生的校方，更应严加惩处。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求得学生生活的改善。

当然，仅仅物质方面的困难，不会使得学生读不好书。抗战初期的许多战时训练班，难道有什么好的设备？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游击学校"的物质条件，难道还胜过大后方的学校？延安的学生今天还不是吃小米、住窑洞、用土纸？为什么人们都称道这些地方的学生紧张活泼、团结愉快、学习蒸蒸日上呢？这就是由于中国的青年学生最富于爱国精神，探求真理之心最切，只要思想之门大开，让他们与时代呼吸一致，与抗战事业息息相通，让他们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任何艰难困苦，他们都是能够克服的。

可是今天的大后方恰恰背道而驰，实行统制思想的党化教育。社会上各种恶劣的风习，日益侵入"百年树人"的园地。正如方东澄教授所说的："无形中把学生分为两垒，另成一团。一垒是'与者'，是'二八佳人'，许以利益，授以特权，结果是娇纵不学；一垒是'非与者'，是'螟蛉之子'，加以防范，予以虐待，结果是造谣、闹宫、黉宫。……所用手段，委实不正大之至，漫骂、捏造、假冒、攻讦、挑拨、出卖……无所不用其极，简直不象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子孙所应做的事，没有一点儿大国民的风度。"（见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大公报》）近来，这种"党化教育"闹得厉害的学校，如各地的国立中学、鄂西联中等，校内竟设有监狱，教官执掌刑具，与当地特务机关串通，对学生拷打审讯，关入"劳动营"，乃至暗杀，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做得出来。请问青年

学生在这种环境下，如何能安心读书？

病因查清楚了，对症下药原不是难事。可是我们不仅看不到有效的药方，反而发现以种下病毒的细菌对病人更加猛烈注射："今后，应视办党与办学为同一事，以达到党部学校化，学校党部化的程度。"(西安《西京日报》九月四日社论)执掌一代青年命运的先生们，你们有没有看到六七千学生中，只有一个是考六十五分的？你们有没有听到蒋委员长说的："苟吾人严格检讨过去之种种，即知我国家精神物质上所有之力量，至少有一半以上或十分之八，尚未能分充发挥。至于本党同志，负有革命成败、国家安危之大责任者，更必须反省缺点，力求进步。"(国民党九中全会开幕词)"反省缺点，力求进步"这八个大字，难道对于今天大后方的学校教育政策不是说得颇中肯吗？

今日的万千学生，正是将来担当抗战建国的人材。青年学生爱国家，更请国民党当局为国家前途爱学生，纠正目前党化教育的弊病，给学生良好的读书环境，让他们自由地研究学问。幼芽没有阳光和水分，是开不了花结不了果的呵！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为大后方大学教授呼吁

大学教授是中国知识界的精华。他们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人材，一方面研究学术，地位和事业都是崇高的。然而近年来，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却遭到许多不幸。首先，就是物质生活的严重威胁。例如，武汉大学教授钱歌川这样说道：

“每次朋友来信劝我努力加餐，就使我感着一种隐痛。现在当教授的，谁不是一饭一粥在过日子呢？……因为请不起奶娘，在这儿大学教授的家里，早已有小孩子饿死的事。至于无钱送儿女上学，那更是普遍的现象。我们有一位同事，讨的美国太太，会做洋点心，目前她做了许多炸面卷，要三个小儿子在大门外设摊零卖，每个定价一角，名叫救命圈。街上的人都丛着看，但没有人买，结局是购买者既用不着这个去救命，而大学教授也就不能赖此来救命。此情此景，岂一个‘惨’字了得！”（见“救命圈”一文，载《星期评论》十四期）

大学教授的薪俸，抗战以来，“不仅分文未加，而且要打七折，月薪收入，不够买一石米。”（前文）据说国立大学教职员最近增发了米贴，但整个收入，按票面增加恐仍不到一倍，而米价已较战前超过三十倍。杯水车薪，当无济于事。所以目下大后方教授生活的困苦情况，远非一般人意料所及。中央大学胡庸焕教授主持的《中大周刊》，曾介绍了一些关于该校教授的日常生活情景：

“本校某院长近购买玉米一石，磨粉充饥，制成糕饼，色黄，类鸡蛋。

“L教授因支出日增，停止子女读书，并典卖太太首饰。T教授已将太太皮货、自已之照相机，托拍卖行拍卖矣！

“C教授鉴于生活日高，难以维持，而太太大腹便便，有添子之‘危’，乃使太太吞食金鸡纳霜数十片，并未奏效。Y先生因生活困难，使太太打胎，所打下之婴儿竟活一日，其象甚惨。

“教授中赤足而草履者，现有一位；有袜而着草履者，计有三位。”

不管生活是怎样日益艰苦，各大学设备如何简陋，今天许多教授先生仍以讲学为乐事，埋头于图书馆、实验室，或者整理抗战史料，或者研究汽油的代用品。这种坚毅笃实、任劳任怨的精神，正是中国人士最好的一种品德。不过，所谓“安贫乐道”，也只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弄到三餐也成了问题，有限的精神耗于柴米油盐，就难免不影响日常教学和生活情绪的安定。近年来，大后方商贾之风日甚，社会上群以物利相征逐，对于完全脱离生产和利润分配的知识阶层，不免多少起些波动。因而近来教授改行业商或从政之类的事，也时有所闻。政府当局实应速谋妥善办法，保障教授的物质生活。除粮食和必要的副食等能予补贴外，还应当注意其他方面的调整，如薪俸较低的讲师和助教，以及家庭负担特别繁重者，需要给予更多补助。

其次，较诸生活的逼迫更严重的一个问题，便是学术思想研究的统制和束缚，使得素来在中国还算是被注意的师道，受到严重损害，这是民族的一个危机。

中国办近代大学的历史虽短，但总还有几个大学保有某种传统的优良校风，还不能不说是“民国”建立以来，屈指可数的事

业之一。这种事业，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主义”有很大关系。蔡先生于有名的“致林琴南书”中，曾提出他的关于教育的两大主义：

“一、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违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就北大而言），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

不料这种极可宝贵的传统，竟于二十多年后半壁山河沦陷的抗战期间受到斵伤。抗战前夜，北平曾发生“解聘五大学教授”的事件，当时激起全国教育界和舆论界的抗议。不意抗战爆发之后，许多著名的教授，如清华的张申府，北大的尚仲衣（已故）、马叙伦、许德珩、陈希孟、杨秀林，平大的李达等，都被解聘。而四川大学更易校长不到二年，最受学生欢迎的二十多位教授，如朱光潜、张宗元、熊子骏等，都被迫自动离去。此外，如西北大学教授沈志远、章友江、曹靖华、韩幽桐；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教授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焦菊隐；朝阳大学教授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复旦大学教授吕振羽等，以及其他许多名列“黑单”的教授，也都前后遭遇同样的命运——不得已而离开了他们亲爱的学生和庄严的讲坛。马寅初教授更受到宪兵“绑架”的待遇。这些事实，实在是中国教育界的不幸，抗战中的耻辱。

一方面，许多受学生欢迎的好教授被迫离校；另一方面，“近年以来，结党挟众的风声，侵入了教育界，教师的尊严大失。”（《时事新报》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评“优崇教授”语）一九三八年“全国教育会议”后，大学教授被命令入党入团，或抽调受训；同时，许多负有“纠正纷歧错误思想”使命的先生们，挟其恶劣

的习气，“侵入”了最高学府。这些先生们带来的不是科学的学术，而是党派的成见；不是为人师表的人格，而是“侦探特务的作风”（《大公报》评语）。于是大学内大批逮捕学生的事情发生了，纳粹式的纵火事件出现了，教授们也经常被“考察”了，许多在校教授不堪其扰，或者心灰意冷，或者愤然离去，最近大后方许多大学接二连三发生学潮，更可说明上述情况的进一步发展。

大后方的舆论界，如《华西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今日评论》等，久已为这个严重的危机发出呼吁。国民党教育部颁布“部聘教授办法”之后，《时事新报》对于目前教授情形评论道：

“在学术研究上，国家必须保证思想的独立与自由。一个学术研究者必须有他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他的思想必须自由。这才能在学术研究及作育人材上不为偏见所囿。……学术思想的研究，必须有自由，让教授们在研究时可以从各种角度着手，而不怕被请去‘考察’。否则，研究不能自由，教授照着一套不犯忌的大纲去念一遍，写一点，教育成了刻板。这样，我们此后的文化就不能逃过刻板的命运。”（“优崇教授”文）这些意见虽未能畅所欲言，但都是中肯的。为国家的高等教育要求学术研究自由，让大学真正成为“兼容并包”、探讨真理的园地，这已成为今日大后方公正舆论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了。

至于“部聘教授办法”，表面上似为尊崇教授，实则该”办法”最后一条：“部聘教授于讲座设置外，得由教育部于学年终时调动。”即泄露其中天机。一个教授终老于一个大学，这在外国是常事；中国服务于一个大学达一、二十年的教授，也曾由这个教育部公布了“褒奖”名单。一个大学真正良好校风的建立，同该校教授的劳绩是分不开的。根据北大、清华过去的一些情况，便可得到证明。本来各校教授都由校长延聘；现在改为由部聘，就是

教授也变成了一般的公务员，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结果，从这个学校调到那个学校，调来调去，使全国的大学丧失其有限的独立的传统精神，而终于“逃不脱刻板的命运。”这也就是教育部热心于“部聘”的实质所在。

必要的物质条件原是精神活动赖以持续的基础，今天大后方的教授却缺乏最低要求的有保障的物质生活，自由研究原是探求真理的钥匙，今天大后方的教授却在被迫放下这把钥匙。在文化落后的中国，培植出一个大学教授是何等不易。据教育部一九三九年的统计，全国专科以上教职员共九千九百六十一人，估计其中教授约占三分之一，只是三千人左右。同偌大的中国相比，这是一个何等微小的数目！目前对待大学教授的种种束缚、伤害，实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不但危害大学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国家民族前途也有大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应当顺乎民情，深自检讨近年来的教育政策，予以具体改善。为了民族的后代，国家的士气，我们不能不向全国人士呼吁，向国民党当局建议：爱护文化，爱护专家，给教授以生活保障！给教授以学术研究自由！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綦 江 大 惨 案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先后在武汉、西北、江西、湖南等地设立了四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吸收了全国上万的青年参加。当初主要是为训练军队中的排长、会计军需人员，后来改为军队政工人员的训练机关，直属于军委会政治部。武汉失陷前，最初成立的战干一团即徒步到达邻近重庆的綦江。在綦江毕业了两个大队，并继续招考了数千新生。

一九四〇年的六月底七月初，平静的綦江就涌起恶浪了。

战干团当局宣布有人告密，接着就在检举“异党和汉奸”的名义下，大举搜捕。先是第三中队，然后是第二和第一中队。在重庆公演“李秀成之死”出名的忠诚剧团，也被调回綦江，全部人员被扣押。

罪名宣布了：“异党分子”有四百零四人，“汉奸”有一百八十七人。这时，有一部分毕业同学被调回来，也全部被扣押。同时，内外厉行封锁消息，在外地的同学一个月以内都不知道这回事。

于是审讯开始了。拷打的残酷情形是无法形容的，除了穿指甲、吊打、踩杠子等等以外，还有电刑。一部分同学以为性命已经难保，受不住如此非刑，只求速死，于是竭尽心力杜撰名单和口供。可是一经印证，即毛病百出，毫无事实根据。审问人大为愤怒，于是又继续用刑。后来有一位“好心肠”的长官，不忍坐视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且不愿使这场官司多费周折，就异想天

开创造了一套假口供，组织、名单样样俱全，每人发一份，被劝告一致承认。这个办法开了一条“放生之路”。所有受刑者的唯一希望就在借此及早定罪，从速发落，免得再受逼供的苦刑。结果，法官们对这一致的口供满意了，不久就一一办了打手模等手续，确定了罪状。

一部分人判了死刑，执行枪毙时的情况是极其悲惨的。那天早晨，押解死囚的士兵扬声高喊：“吃饱点！再没有吃的啦！今天就得上路受训去！”（按：老兵于执刑之前，往往习惯地暗示犯人，使他们不致于在不知不觉中离开世界）这些年轻的孩子，那里懂得这些奥妙，都信以为真，大吃一饱。出发时，被蒙上眼睛，反缚两手，一个连一个，骗向野外。起初走公路，后来走上崎岖小路，就这样且诱且逼，到了预定的刑场，叫他们停下来休息。这时，前面挖坑声不绝。有一个同学似乎觉得不对，起来高呼：“这不行，我们不走小路！”但不及举手，枪声一响，他就首先倒地了。于是全体都惊慌逃跑，但眼手既经蒙缚，方向不辨，也无法跑。顿时周围机枪声大作，一百九十多个欲投身抗战的中国青年就这样被惨杀了。据说忠诚剧团的负责人，“李秀成之死”中扮演李秀成的李英，身中数弹才毙命。

綦江的士绅目睹耳闻这一惨剧，群情悲愤，想不到抗战根据地的四川，竟成为屠杀民族精英的屠场。这些被难同学的家属有不少是在军政界服务的，他们同儿女间的音讯隔断后，各方探问，才得到消息，自然悲愤异常，群起呼吁，要求当局复审这一场肆意残杀青年的冤狱。

国民党当局不得已，指定宪兵第三团、军法执行总监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三机关，组织军法会审。那时枪毙和拷打致死者，已经占半数以上。复按前供，仍觉矛盾百出。这些候审者，形状

已成半死之人 作供时，更如癫如痴，前后所供不一，而又不象是故意推托。问他们为什么作假，他们才放声大哭，缕述过去受刑时之痛苦及冤曲。幸存下来的几百人中，神经错乱、伤重残废者为数不少。一个法官对外人说："这里面已经没有一个完人了。"

复审的结果，认为"汉奸"是全无其事，有"党派嫌疑"的也不过十人。担任复审的法官们只好请当局将制造冤狱的四个战干团高级负责人绳之以法(据说这四个人早已潜逃)；死者应予抚恤，伤者送医治疗，其余回团受训。但听说仍有一部分关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未予释放。

最近，据军委会政治部令，表示对战干团毕业同学不甚信任，必要时可予拘捕。因此，綦江惨案虽成过去，而各地屠杀青年的大小惨案正方兴未艾，其它三地的战干团学生亦不知道真况究竟如何。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延安《新中华报》)

悼念涂正坤同志

今年六月十六号左右，我（在邵阳）见到三个在湘鄂赣边区参加（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青年朋友，他们是被迫离开的。涂正坤同志有一封介绍短函（十一日写的），说明他们原先在新四军工作，而不见容于现在的部队。

他们十三号晚上经过平江嘉义。离嘉义十多里的路上，碰到一个熟识的老乡，匆匆告诉他们：昨夜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六个人全被住在对面的杨森的特务营杀了，有几个还是活埋的。里面有一个是"涂书记"。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个不可想象的消息。虽然抗战以来，湖南发生过很多磨擦事件，但从来没有如此严重之事。当时我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极力找理由，认为老乡报告的不可靠。我们共同认为最大的根据是，新四军通讯处和各方的上层关系都很好，尤其是涂正坤同志，不单是地方老百姓爱沿用历史回忆亲热地叫他"涂书记"，就是平江的地方政府与各友军也都很尊重他。住在通讯处对面杨森的特务营，虽然常使人很担心，但通讯处同他们处得也相安无事，经常同他们的长官有来往。

尽管我们都从"这是不可靠的流传"来设想，然而沉重的不安和凄然之感终究压在我们的心头。那三个年轻的朋友受了我的影响，感到这个消息带来了一个如何严重的后果。他们三人怀着无限深情，谈起"涂书记"的种种来了。说涂跟他们见过几次面，

怎样和蔼、细心，怎样安慰和鼓励他们，怎样帮助他们了解社会，说服他们的急性病，教导他们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问题，注意工作和生活作风，特别谈到平江的老百姓怎样敬仰“涂书记”，涂在平江的威望如何高，等等。我越听他们讲下去，心便越沉重，越痛苦。这三个受了不少艰苦和折磨的青年，显然是带着最崇高的感情，来怀念这位他们的前辈和地方群众的领袖了。

我很谨慎地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告知湖南省委的同志），大家都不敢相信，然而都很焦急地等候着确切的消息。

一连几天，办起事来，我的精力总不能集中，老是爱回忆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同涂正坤同志见面的情形。那正是武汉沦陷后长沙动荡的日子，差不多每天有警报。我们在长沙一个仓库的防空壕内开始了谈话。他的个子很高，我们弯腰坐在洞口。我们是同乡（我是平江长寿街人，离嘉义只二十多里路），互相都有着特殊的喜悦。然而我当时的喜悦跟他的不同，是他所不知道的。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社会上一般对平（江）浏（阳）大都怀着一种恐惧不安的心理（平浏是出共产党“暴徒”的地方），可是，在我的心灵中，早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已对这些艰苦斗争中的人们怀着模糊的英雄崇拜，并且有过各种各样甚至一些幼稚可笑的想象。如今同这个高个子蹲在一起，我象一个小孩子经过一场哭吵获得了他所心爱的东西，贪婪地来端详这个高个子说话的神情和他的动作。我们畅谈着家乡的一切，关于我的老家那个地方的情况，他比我清楚得多。他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者，平江的山山水水，人情事态，他了如指掌。他谈到抗战爆发后，奉令在平江县整编零散的游击队伍，准备开赴江南前线时，地方上的震动是多么大，发生过一些什么令人发噱的笑话，他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种极自然的笑，并没有一丝骄傲与讽刺，而是充满了安

慰与宽大。我们又谈到平江的现状以及一般民众和青年的情况，他充满了乐观与希望："好的特别好，坏的也特别坏；但是对于坏的，我们仍旧是尽量争取他们到抗战队伍中来。就是那些杀过我们的亲属、害怕我们回去报仇的人，我们也是用最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们，让他们彻底了解我们是不算旧账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他还谈到平江农民的斗争性，一般群众有丰富的打游击战的经验。他的沉着而急速的语调，使我感到千万平江农民正站在他后面响应他的号召。

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已乘车走了。

这样沉重不安的生活经过了六、七天，终于确切的消息传来了，平江的"快邮代电"到了我们手中，我怎样再去寻找"不可靠"的根据呢？

当我的手战栗地拿着那张"快邮代电"时，我马上想到那本《日寇暴行实录》中那些悲惨的画面：手执钢刀的"皇军"，被绑着活埋的中国人民……我没法抑制我的愤怒，我不敢也不忍去想象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被枪杀、被活埋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悲痛更残酷更令人不敢置信的事件。

听说平江的民众愤怒极了，当地政府以及（其他国民党）各部队中大部分的人也都极为不满。墨写的说谎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我们不必要待历史的定评，我们只要去问一问湘鄂赣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问问平江几十万农民，就知道这一次亲痛仇快事件的损失有多么巨大！

涂、罗等几位同志的遇害，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也不仅是新四军的严重损失，而且是中国全体同胞在抗日救国伟大事业中沉痛的损失！湘鄂赣边区的千万人民尤其直接感到这对

他们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打击。

为中国民族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涂正坤同志奋斗了一生，因此也就引起了日寇汉奸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涂正坤等同志在汉奸的屠刀下牺牲了性命，然而他们的神圣事业、光荣传统和英勇作风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为我们后辈的楷模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编印的

《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纪念册》）

注：（在邵阳）等括弧中词句系后加的。当时湖南地下党省委机关在邵阳。

纪念何斌同志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费尽心机开了个小规模的追悼会，纪念平江惨案中殉难的烈士。新华日报第二天登出了醒目的新闻；匆匆印出的纪念册，也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散发了。这同现在禁锢得象罐头一样的情形相比，是令人感慨无已的。

就在这个追悼会的前几天或后几天，我在红岩咀同何斌见了面。他刚从鄂南逃出来，光着头，穿一套黑布中式短衣裤，象一个商店的学徒。

何斌同志原名何功伟，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武汉被通缉，离开学校到上海去了。之后，我们便通起信来，然而一直没有见过面。所以在这次短短的一个多月的相聚中，我们尽情畅谈，似乎要弥补过去三、四年的阔别。

他是一个没有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在家乡的青年中却有很大的号召力。武汉失守之前，他便回到鄂南去了。战争来临，他曾同地方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动员和组织鄂南人民，投入战争。可是历史的不幸阻碍了他们的英雄事业。几个夜晚，他详细地同我谈到他在鄂南一年多的生活，从开辟上层，深入农村，直到几个同志的被杀和自己的亡命。他谈得很缓慢，他经过的那些事情会令人觉得同这个学徒的外表如何不相称。我所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是越来越重的；我头一次严重地意识到自己的“少不更

事”。我们离别前的一次长谈，是在临江的一个小茶馆中。他苦恼于自己的神经衰弱和恋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羡慕我的身体好，祝福我们的新婚。当时我是很不安的，深深愧仄自己的“庸人多福”。这种心情我没有告诉他。我们谈得远远的，肯定他会找到很好的伴侣。我们做着美丽的梦，设想几年后形势的变化，大家相聚的快乐。他起劲地笑着，脸色也不显得那么苍白了。

他决定回到环境日益艰难的鄂西去，便搬进城里住了。我也没法最后送他上船。

延安的生活是安静的。由于不直接接触第一线的成败斗争，人有时也会因循起来。然而对于南方故人的悬念是与时俱增的。去年秋末，便听到何斌在鄂西被捕的消息。据说他是可以避免这个遭遇的，他早就该离开那个地方，他自己已经知道有十几个家伙在跟踪他。

在南方，虐杀青年的事情，年来愈演愈烈，大小屠伯们都在磨他们的钢刀，死者遍布于大后方各个地方。例如重庆的防空洞也变为拷打审问的场所，这是取其“秘密安全”与阴森恐怖，企图以此影响受难者的心里。据说武汉时代互讲统一战线的青年，如今竟在这种场所又碰了面。但情形却大有改变：一方面是主子，被训练着以杀人为业；另一方面是奴隶，被教育着不慑于死之恐怖。这是如何惨痛而严正的史画。

当权者未能变更其“死之恐怖”的政策，这倒是极其可悲的；他们永远想不透革命者虐杀不完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呢？地位、金钱、女人、亲属……任何东西的引诱都失去作用？市侩与战士的分野就在这里：前者奴颜卑膝以贪生，后者为真理而从容赴难。

“马日事变”后的长沙街上，常有“帝打打帝打打帝帝帝”的

冲锋号音吹过，几个或十几个男女青年，被粗绳捆着，有的是赤膊，颈后都插了一支朱(笔)标，被一大群如临大敌的兵士推着跑。不管跑得怎样急，这些青年总是激昂地一呼一应地高叫着口号；这些口号如同闪电划过暴风雨中的黑夜长空，令人惊心动魄。这种情景，给予我——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的撞击，是英雄的崇敬多于死的恐怖的。这种封建遗产，对死囚临刑前豪语的“恩惠”，现代权力者早已醒悟对自己的不利，知道恐怖和威吓只能慑服“良民”。抗战以后，虐杀的方法就更转为绝对的秘密。“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一定比当众而死更寂寞。”（鲁迅语）是的，从群众中来的人，他总希望当着群众表明他的结局。不过近年来，这种“暗暗的死”，对于战士已极其熟悉，他们随时准备着尝受这种“寂寞”。当死已成为时刻在威胁着的存在时，死的方式真也就无足轻重了；何况死者自己会知道，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不能不写出，我们的战士，二十六岁的何斌的死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最近证实了，他在去年十二月被枪毙了。

何斌被捕后，便关在当地的“劳动营”中。后来地方最高当局（这是抗战初期颇负“重用青年”盛名的一位将军）找他去谈话（按：地方最高当局，系指当时国民党的湖北省主席陈诚），许以“领导”该地青年的全权。这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最后将何斌年老的父亲迢远找来，“说服”这个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但是这位老人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带出了他儿子的两封遗书：一封是向他的心灵所寄托的队伍告别；一封是给他的比他年青的妻子，他寄挂着她刚刚生产。

何斌一生中最后一年的经历，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这一点点，然而这也就够了。

他的告别辞，他向我们，他的亲爱的战友们说了些什么呢？虽然我们没有亲见遗书，但我们是如闻其声的。

“先烈的‘死’，是后人‘生’的唯一的灵药。”鲁迅的话，也正是向着我们说的。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附：挽歌唱起来吧

黄　　钢

当台上挽歌唱起来的时候，何斌同志的孩子小斌在别人手里睡着了。这一岁多的孩子，右臂上系着黑纱，没有听进挽歌，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事情在进行。

孩子的母亲，许芸同志，右边的头发上加结了淡咖啡色的短绒绳，左臂上也系着黑纱。挽歌唱着，大家又静默着，她头发上的短绒绳有一点点抖动了，因为，她的面孔抖动了，因为，有两滴眼泪从她眼里流出了。

不要回忆，共产党员的妻子，不要作哀痛的回忆！

宁可想起些别的事情。

想起那家乡武汉的街道吧；那街道上现在还留下什么遗迹？好多年以前，不是何斌在那里活动吗？他由他自己出钱翻印过"田中奏折"，他散发着那小册子，一面散发一面解释，他是这样进行宣传的。过去了，一二八战争的那一个严重的时期，武昌街道上的叫卖报纸号外的声音，商家们为祝贺上海抵抗的鞭炮的喧腾。何斌长大和成熟起来，在有倾向的课外读物中，在自己所组织的秘密群众团体里。他带引过我们，（你忘记了吗？湖北的学生，）他带引我们往建设厅去请愿，还有，露天睡在汉阳门江边，教给我们什么精神？

不要回忆吧，宁可想起些别的事情。

不必要往他遭难的地方想去，那并没有什么好看的景色。有二十八个特务在一个地方追踪着他，这中间有两个是他中学时期的“先生”——军事训练课教官，现在作着特务，要捕捉从前在操场上见面的学生。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不要回忆吧，宁可想起些别的事情。你是到过武昌近郊的农村的（呵，假如你到过），你在一九三七、三八年去那里寻找何斌吧，在一片稻田旁边，一些村落里，和一些农民中间，何斌和他的同志们在作些什么事情？

你说，这是正大光明的，这是每一个救亡工作者经常的生活。你说，在武昌许多工厂里，那时候都能够找到何斌的踪迹。你说，在工人们当中建立共产党的支部，这不是很正当的吗？你说，我们，自由中国的人民，应该有这些权利。

然而，不。

这是另外的人们用武器和刑罚这样来回答的。

还是不要回忆吧，宁肯想起些别的事情。再想想何斌的幼年吧，他是地主的儿子——他并没有带共产党员的证明信件走到这世界来的。共产党员有什么罪？地主的儿子，何斌，他的祖父，爱给他城市里的糖果吃，这齲坏了他的牙齿，却没有混乱他的心，终于，他把心交给了穷苦的农民和工人。这有什么罪？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吃糖果的人，厌弃这食物了，为了要想大家都有些这一类的好东西吃。

一切同这相反，同志。一切同这相反，同志。

学生到街道上来做什么？市民们，到农村里去，到工厂里去做什么？你自己有了甜美的食物还不好么，还不好么？

我们的何斌，你说，“将军，先生，我们的想法在最后的那一

点上跟您有些不同。”

你说，“我们不但赞成三民主义，而且已经在很多地方实行着三民主义……”

你说，“这一切都证明了我们没有放弃共产主义，反而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叫我们这样做的……”

你说，“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在别的任何信仰下面受别人的雇用而做事。”

于是，在黑夜里，何斌同志就因为作了这样的回答，在牢狱里遭枪毙了。

于是，在我们这追悼会里，只看见他的画像，但没有棺木。于是，在我们这追悼会里，它最初的召集人是刽子手及其绞架的看守者，而不是我们这些在延安发出开会通知的人。

我们是受攻击的，我们的同志死了。我们是被迫而发言的，我们的喉音里尽是委曲。我们是站在黎明的那一边的，因为全中国的人民是站在那一边。

我们同志的妻子许芸还在这里，他们的孩子小斌也还在这里，小斌在人们讲演的时候醒过来了，他睁大了他的无知的眼睛张望这会场。

他的母亲走上讲坛去了。有人把小斌抱到远一些的地方去。怕什么？同志，你怕小斌听懂了他母亲大声的讲演么？不要怕，同志，反正这些革命者的后代人总是要知道的——有一天，小斌总会重新在他母亲口里再听到这些话，如同今天在会场上她所讲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我是感觉光荣和骄傲的，因为我的丈夫忠实地执行了他对党的宣誓……”

“我是感觉光荣和骄傲的，——有一天小斌会这样说——因为

我的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

挽歌唱起来吧，再大声一些，再大声一些，让一切的，一切的敌人都听见吧，让他们的耳朵仔细来辨别，这到底是给谁唱的挽歌吧。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解放日报》

湖南灾荒纪实

"一面造灾，一面救灾；
造救之间，唯我发财"
——湖南民谣

"鱼米之乡"的湖南有七百万人民，以草根、树皮、观音土（又名白土）等物充饥。就连草根、树皮、观音土等物，据笔者所知，现在也大体挖掘干净，灾区日益扩大。

沿粤汉路、湘桂路、湘江流域、资江流域、滨湖一带地区，多数田地尚未春耕；农民没有耕牛，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没有赖以劳动的口粮。农事失时，秋收无望，如此演变下去，将何以结局！

灾区内除少数富户外，几全以野草、树根掺合糠皮煮熟充饥。祁阳、常宁及零陵各县，灾区达三分之二，草根树皮剥食已尽，饥民匍匐山脚掘食观音土。常德、华容一带，十分之六七人民无粮，十分之二仅够吃粥。衡阳市九万人，平均每日饿毙九人。康安一家七口误食毒草，竟举家中毒，七窍流血而亡。邵阳武冈各区饥民因吃糠皮日久，大便不通，暴卒者日必数起。耒阳一十岁灾儿，偷米一把，被警察一脚踢死。长沙乡民挑米进城，途中被饥民围抢一空。……近来米价突飞猛涨，草此文时，长沙五万元一石，衡阳六万，零陵八万五，或则有价无市。半月内各地米价普遍涨一倍或两倍。现距秋收之期，尚有四个月，还未到青黄不接之时。全家饿毙及全家自杀的事在此间报上已不是新闻了。

随着灾荒而来的是，脑膜炎、恶性虐疾、痢疾、霍乱、天花，

……邵阳桃花坪痢疾猖獗，平均每日死十五人。不论大小城乡垃圾如山，死尸无人埋葬。高利贷则趁机兴起，特别是在农村，借款一万元，一个月后须还两万元，两个月后四万元，息上加息，利上生利(叫蹒蹦利)。现时借谷一石，新谷登场时须还两石。耕牛一头价二十万。多数田地无人承佃，任其荒芜，农民扶老携幼，弃田离乡。田间偶或发现少数农民四人一组，三前一后，以人代牛。

开始尚可卖妻鬻子，而今妻子已无'市场'。各地水陆码头娼妓麇集，十三四岁幼女也接客营业。乞丐更是满街遍野。不但黑夜时有盗窃，就是白昼也发生抢案。最近被捕的行劫饥民，声泪俱下地陈述道:"请你们剖开我的肚子看看吧，我肚子里若有一粒米，我不是人，我肚子里都是草，我是禽兽啊!"

在省境内现有政府军队二十六万余人，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游杂部队不计其数，此外尚有日本战俘十一万人。他们都索吃白米。十万火急派购湖南的一百六十万石军粮，政府在日夜摧缴。现在湖南没有一家工厂开工，没有一个士兵解甲。

民间灾情如此严重，大人们的酒席却不能不吃。长沙、衡阳等城市，餐厅、酒家、饭馆雨后春笋，布置得富丽堂皇，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一席三五十万金，尚属区区。某权贵大公子结婚酒二十八桌，名贵菜肴，中外俱备，闻所未闻。省政府特示"节约"，欢送吴奇伟离湘、欢迎王东原来湘的一个'茶话会'，预计只用五十万。吉普车满街跑，平均五天辗毙一人，谁说我们没有汽油?

因为饥死难熬，迫不得已，善良的农民挺而走险了。常德、桃源、临澧一带灾民，成群结队，背了米袋饭锅'吃大户'，他们把地主的米仓打开，谷米摊分。若地主出面干涉制止，他们就会把他打翻在地。邵阳新化等县发现武装农民抢粮运粮，农民拿起

土枪、梭镖（一说有轻机枪三挺），打进土豪家里，夺取谷米杂粮等食物。华容灾民成立“打粮队”，先向地主富户商议借粮，男妇老幼跪哭于前，哀声震野，如哀恳无效，农民就自己动手分粮，衣物首饰则丝毫不动。多数地方灾民提出“宁可坐牢不挨饿，宁可枪毙不饿死”、“米仓里不能饿死老鼠”等口号。湖南农民们在起来争取神圣的吃饭权利，风起云涌的起来了。

这种史所罕有大灾是谁造的呢？是一九四四年中央军不战而退后，日寇的盘剥蹂躏；是去年天旱时农民为苛税所压，无力及时抢水灌溉；是胜利前各式游杂部队竞相搜刮榨取，以致存粮食尽（重庆派出的什么别动队、地下军、正义军、先遣军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以挺进队、忠义军特别“著名”，农民曾赠他们对联多副，有一副上联说：“挺鱼挺肉挺鸡婆正当道理”，下联说：“挺金挺银挺法币义不容辞”）；是胜利后大批过境部队勒取米粮，甚至连春耕时用的种子也被迫拿出；是高级将领拦扣粮船，囤积操纵，特别是发了国难财又来发胜利财的当权人物，运粮出境，供求失调所致……这是连小孩子也能得出的结论。这饥荒是人为的，是人造的呵！

至于救灾的衙门倒是蛮多：有救济分署、湖南救灾会、联总驻湘办事处、难民服务处、急赈工作队、儿童保育所等，名目庞杂。今天假某酒家开成立会，明天茶会招待各界；今天提计划，明天草方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灾情如燎原之火，日益扩大。联总运来一批西装与高跟鞋，委员老爷说：“灾民不能穿这些东西，让我们拍卖出去发他们钱吧！”但拍卖至今，迄无下文。救济署也运来了面粉，还没有到灾民的口里，已源源以三百元一斤的好价流入大饭店的堆栈里去了。这里拨款救灾，那里举办农贷，一时说粮来到，再时说赈款来，熙熙攘攘，象煞有介事，在肥鱼

大肉的盛筵上，畅谈灾况。可笑的是救灾委员，你也喊涓滴归民，肃清贪污，他也喊严杜中饱，禁止勒索，正如一幕“贼喊捉贼。”而七百万灾民却支撑着一把柴骨奄奄待毙。衡阳粥厂里死尸横七竖八，无人掩埋(吃粥需设法到乡保长处活动登记后，始能领得吃粥证)。粥少僧多，蜂拥而至，一扫净光。甚至有父女争食，父亲把女儿扼死的情形。邵阳某救济机关每月开支款项超过救赈数目一倍。联总驻湘办事处主任何福民（美国人）视察衡阳儿童保育所时，见列队的灾童衣服手巾都是新的，何氏非常惊讶，但在后院房子里却发现三百多个破衣烂裤的儿童在烤火。所有这些还是城市的救济，至于比城市惨痛千百倍的乡村呢？只有天知道。无怪人民说这救济是“救济救济署”的。近来民谣满街：“一面造灾，一面救灾；造救之间，唯我发财。”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冀热辽日报》。此篇刊头为“长沙通讯”，是否当时北平转来或摘编国民党报刊材料，已记不清。）

敌寇统治地区农村破产实况

被日寇以旷古未有的残酷手段统治着和统治过的地区，农村经济究竟被破坏到何种程度，表现出哪些特征呢？农村的阶级关系又起了怎样的变化呢？

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全面的系统的解答。但根据各方比较零星的材料，可以看出，八年来敌寇统治下的农村经济，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劳动力大量减少，人民负担奇重，耕地面积剧减，生产总量急降；以及因此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试作一大概的叙述。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中共北岳区党委一九四二年秋所作的北岳区农村调查中游击区部分，和太行区党委一九四二和四三两年所作的太行游击区的调查。前者包括二十一个县四十二个村，后者包括十几个县的抽查；其中不少是敌占据点和老“爱护村”（这些地区现多已转为我占优势）。此外则是散见于最近两三年的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中一些文章和新闻的摘引，以及部分敌伪官方公布的数字（注）。

对劳动力的掠夺和破坏

敌寇对人力的掠夺和破坏，一方面是无止境地抓丁与屠杀，一方面是无休止地征过度的劳役。

劳役是敌占区、游击区人民感觉最痛苦的一种负担。其中以修路、挖沟、筑堡等为主，随军"扫荡"支差最苦，其他如盖房子、烧木炭、站岗放哨、为村公所帮工、替据点敌人做饭等等，任何大小事项，敌人莫不强迫征伕。

据太行调查，劳役最重地区，每一壮丁每月出伕二十五天，一般也在十天到半月左右。特别在敌人赶着筑堡、挖沟、修路时，则一切人力均被榨取。昔(阳)西敌人修城时，八岁到六十岁的人力全部被征，每人每天给米六两，不许回家，受不住饥饿与皮鞭者，躺倒后甚至被埋于城壕中！

下面是晋察冀六个村庄一九四二年对敌劳役的统计（全工数即所有劳动力全年的总工数），其中小西涨、庞白土是老"爱护村"，西回舍是敌据点。

县村名	全村人口	劳动力数	对敌劳役占全工数之百分比	一个劳动力一月内平均对敌劳役数
定唐小西涨	1,395	553	48.44	12.11
定唐庞白土	918	285	51.03	12.75
完县五里岗	1,237	381	42.66	10.5
行唐南张吾	626	120	22.98	5.75
曲阳木台北	593	149	12.84	3.22
平山西回舍	1,163	465	90.32	22.58

这个统计是不完全的，有的村庄只计了出伕数，未计伪村公所"办公摊"上的人数，这种"办公摊"有的每天要四、五十人才行。敌强迫去受训的，亦未计入。从这个材料可大略看出，对敌劳役有最重、一般和最轻的三种情况，这种区别是由对敌斗争的强弱、据点的大小和周围据点的多少而决定的。

最能表现敌人之有意识进行劳力破坏的，即是敌人常选择农

忙时派伕，而且要“净门伕”（全家人力均得出动），迫使农民生产无法进行。

造成农村人力枯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敌寇之无止境地抓捕壮丁。据山东新华分社估计，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止，五年中华北被敌掠夺的壮丁为数在六百万以上。伪“华北劳工协会”发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份华北输出劳工数为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四人。去年年初敌伪在北平举行之一年一度的“外出劳工输送会议”，决定一九四四年度输送数目为一九四三年的二倍。山东分社的估计未言及来源，或过高一些；但由上述几个数字看来，八年来敌寇从华北抢夺的壮丁，包括送往伪满、内蒙等地的，编充伪军的，以及强迫在华北各矿山、工厂中劳役的，等等，总数当极为惊人！

敌寇在广大游击区的严重屠杀镇压，始于百团大战之后，这是敌人“确保统治”的重要政策。这一笔血债难作估计，现举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太行调查：敌在寿阳前后共屠杀万余人；柳林背全村人口二百一十一人，一次被杀者七十一人；另外一个村八十户人家，就有八十一个寡妇。屠杀最残酷的是冀中平原，惜无统计数字。北岳灵寿第一大镇慈峪（去年七月敌被迫撤退），抗战以来遭敌杀害者达二百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七，这是很一般的情况了。

疾病死亡等间接的灾害也是很大的。据北岳二十九个村庄，自抗战开始到一九四二年十月不完全的统计，疾病死亡率为百分之六点四九，即是说，一千人中约病死六十五人。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敌新“蚕食”地区，灾难空前，病亡率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大。灵寿灾情最严重的第三区三十二个村一九四三年八月的调查，已病死者占未“蚕食”前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尚有多于

此数的人在死亡的边缘上。病死者之众多，显然是由于敌人的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降低，营养太劣所致。在敌人抢掠最严重的地区，老百姓没有吃的，更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遇上灾荒，情形就更为严重。老百姓说："没有敌人，灾荒来了还可以撑住，有了敌人，简直撑不住。"冀南自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接连大旱灾、大水灾（敌寇决堤造成）和大蝗灾，据估计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死亡竟达百分之四十六！加以逃亡，人口减少几达百分之七十五！

关于敌寇对畜力的掠夺和破坏，抗战初期敌"满铁"在河北境内平汉沿线的调查，自称："耕畜征发甚多，马骡既全归军用，牛猪亦全充军粮。"在涿县"马减少百分之七十七，骡减少百分之四十，牛减少百分之十七，其他牲畜减少百分之八十"。由于此种情状之继续，农村畜力根本无法恢复。据北岳区四十二个村庄的统计，骡马减少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而骡马正是这些地区主要的耕畜。又如和(顺)西四个村，一九四二年同战前相较，牲畜共减少百分之四十一。牲畜减少原因，支不起差卖掉是主要的，其次为敌人的抢掠。抢掠的严重情形可举一个相反的事实来说明：一九四二年曲阳的游击区，曾发动一次夺车的斗争，总计经过各种办法夺回的大车，达一万二千余辆（牲口在三、四万头以上）。

牲畜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质量大为降低，一般都是不愿养好牲口，大换小，好换坏。

至于敌寇对房屋、林木、农具等之破坏焚毁，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无止境的敲诈勒索

人力畜力的减少，对生产是一个直接的破坏；无止境的物资

负担，也起同样的作用。

敌占区人民对敌物资负担的苛重与复杂，是使人很难想象的。负担对象大体有敌、伪、政（地方伪政权）、村（本村一切开支）、教（带有特务性的教门）等等。总之，任何敌伪人员都可以任何混账的名义，向老百姓敲诈钱财。敌伪苛捐杂税有百余种之多。负担项目大致归纳，可分以下几种：县款，包括田赋派款等；村公费，伪干部薪金及村公所费用；村杂支，修筑碉堡用费，据点粮秣军需，区公所的不定期征收粮款等。但负担比例以勒索为最重，一般占全负担一半左右。勒索方式因地区而异。在敌占优势地区，主要通过特务伪人员，勒索以小费为主，如伪军伪人员来往浪费，随意需索、送礼等，是比较零星与经常的。在我能控制之游击区，多由敌人直接出动，以敲诈为主，如加以“通八路”名义，随意捉人等，比较不是很经常的。

在游击区，由于我们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人民对敌负担轻重也非常不平衡。根据太行的调查，一般有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一）敌占优势地区，人民对敌负担重；我们能掌握地区，对敌负担轻（游击区人民对敌负担，超过对我负担三四倍、七八倍，乃至十倍、数十倍不等）。敌占优势地区之交通要道与非交通要道，几个据点统治之交叉点与非交叉点（交叉点同时向几个据点或碉堡负担），轻重亦有很大悬殊。但这种悬殊，在敌人压榨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已逐渐走向平衡。

（二）敌新“跃进”“蚕食”之地区对敌负担重，敌巩固占领地区对敌负担较轻。如临城两个不同村庄负担指数比较（以一九四〇年为一〇〇）：新蚕食区，四一年为七〇〇，四二年为一六二〇；敌巩固占领区，四一年为二二五，四二年为七五〇（由此又可看出对敌负担增长的速率）。新蚕食区新修封锁墙沟等，需要

大批人力、物资，同时敌人又有意识地加重这些地区的负担。如在临城，敌曾追索五年田赋。在武乡提出“治安区”负担十分之一、“准治安区”负担十分之九的口号。但年来由于我解放区之扩大，敌人已大大加重其“治安区”的负担，甚至向汉奸身上挤压，这种轻重差别就日渐减少了。

（三）主村的负担轻，副村的负担重。前者掌握派款、派伕的大权，更多地照顾本村利益，欺压外村，这是在游击区比较一般的现象。经过我们工作的开展，这种情况也在变动过程中。

但不论何种地区，不论何种情况，人民对敌负担在逐年增加，特别在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人已完全走向赤裸裸的公开的抢劫，绑票行为无时无地或止。同时对敌负担的轻重，基本上取决于对敌斗争开展与胜利的程度。要了解敌人剥削压榨之严重，还必须对比人民的负担与收入情况。现将北岳区几个对敌负担较重的游击区村庄，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这两年是这些地区被敌蹂躏的顶点）对敌担负和全村收入，比较如下（总收入为一〇〇）：

村名	对敌负担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庞白土	149.93	257.42
白　沙（完县）	191.5	52.83
东于家庄（完县）		116.02
东五里岗（广灵）	65.62	88.79
温子东堡（应县）		103.39
白旷北堡（平定）		78.51
迴城寺（平定）		107.53

这个统计中的一九四二年对敌负担计算到十月止。十月以后，由于敌疯狂抢粮，负担更重。事实上大大超过一九四一年的负担。庞白土、白沙、东于家庄，对敌负担都超过了国民的总收入，这些

村庄当然破产。

又如晋西北忻县的阎庄村，一九四三年每个老百姓对敌负担数目，占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些地主的负担，竟超过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敌人负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曾照顾地主富农利益，但在其苛索日急、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这种有限度的阶级差别就必然逐渐减少，以至根本不顾，刀锋自然转向富有者，向地主富农身上挤负担。因此，敌寇统治地区，实际上不论贫富，都同样负担苛重。

为了更清楚了解敌人统治下各阶层人民破产的实情，我们再找出北岳庞白土、小西涨、文德（曲阳）、贾庄、东孙家楼（灵寿）、西回舍（平山）、柏家庄（应县）七个村庄，贫农十户、中农十户、小地主四户、富农六户调查的负担与收入的平均数，则可以看到以下的结果（单位市石谷）：

阶层	每人平均收入		每人平均对敌负担		对敌负担占收入的百分比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贫农	1.727	1.384	0.62	0.535	35.809	38.666
中农	4.117	2.183	2.649	2.075	61.473	95.094
富农	7.556	6.42	10.595	5.185	140.22	80.762
地主	4.95	3.561	4.646	4.17	93.858	27.101

说明：富农一九四一年对敌负担特别重，是因有几户被绑勒索甚重所致。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贫农一年所入不及一石！中农以上阶层，所入是不敷出的。据其他材料证实，近年来地主对敌负担一般均超过其总收入者，并非个别例子。山东纪凤区一个有二十多户地主的“爱护村”，一九四二年因敌勒索过重，内中有十多户无法过活而全家下关东。

耕地缩小，产量剧减

劳动力大量减少了，劳动能力大大减弱了（女的种田增多，有的地区甚至雇用女长工），生产工具整批被破坏了，榨取的日益严重，单纯的再生产农民也无力维持。加以敌人对土地的直接摧毁掠夺，诸此原因，就必然引起耕地面积的缩小，土地质量与产量的急剧下降。

敌寇在华北强占摧毁的土地，据聂荣臻同志一九四二年底的估计，仅"将敌寇已修成的铁路、公路，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护路沟，铁路公路与护路沟之间占地面积，以及封锁墙"，"这六项合计，占地至少在八万五千八百方里以上"（见"暴行与惨败"一文）。

如加上一万多个据点、碉堡，以及飞机场等所占田地，华北民田被敌摧毁者当以千万亩计。

但整个耕地面积的减少还不止此数。据敌昭和十八年版《北支年鉴》及《满铁北支年鉴》公布的数目，河北、山西、山东及苏北一部，小麦、小米等十一种作物的耕种面积，一九四一年较平年（指战前）减少百分之十六，共三百五十万公顷，大约五千二百余万亩。因敌伪实力所及地区有限，由此数字更可概见耕地被摧毁之严重。

土地荒芜在敌占区、游击区，已成比较普遍的现象。据和西四个对敌负担较轻的村庄的统计，荒地占全村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五。临城三个老"爱护村"，荒地面积占全部耕地的一半。半数耕地被荒芜，在冀南更是普遍现象。

土地质量的变坏，最基本的原因是劳力缺乏，与敌寇扰乱破坏。如挖沟后水脉被隔断，耕种不能按时，秋天地翻不过来，不能大量积粪造肥，等等。于是大量水地变旱地，两季变一季，上

等地变中等，中等变下等，下等地则大部荒芜。庞白土与小西涨两村各等土地的产量，一九四二年时下降到这样的程度（以一九三七年为基期）：

水地：上等和中等百分之六十，下等百分之五十。

旱地：上等百分之二十八强，中等百分之四十，下等全部荒芜。

又据太谷、平顺一带调查，一九四二年水地每亩产量比一九四〇年降低百分之六十，比战前降低百分之八十；旱地降低数则为百分之三十与百分之六十。

关于农业减产情形，敌寇自己公布的数字仍可作为参考。一九三九年敌寇在华北制造大水灾之后，自称是年华北各省均减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以后两年略有增加。但到一九四二年，由于敌之破坏勒索空前加重，据前述统计，情况显然比一九三九年更坏。华中方面，据敌派遣军特务部一九四一年的稻米收获调查（四二年敌国议会曾发表此项材料），如长江中游平汉沿线和镇江附近等地，产量为平年百分之四十，常熟、江阴、杭州附近仅百分之二十。如此项材料可靠，稻米可作一般农产代表的话，则华中敌占区农产情形或较华北尤为恶劣。

至于曾为敌寇企图增产的棉花（太平洋战后，重点转为“增产食粮”），据《北支年鉴》所载，华北各省棉田面积，一九四〇年时（以后敌伪官方未再发表统计）仅及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二，收获额则为百分之二十。华中江浙两省（据敌《棉业汇报》等刊），一九四二年之棉产仅及战前百分之四十七。由此可见，一般农作物耕地的减小，并未移充于棉花的种植。为敌人所抑制的农畜生产的代表——蚕丝的减产，更为惊人，据敌《蚕丝日报》称：一九四二年江浙两省蚕茧产量仅及战前百分之五点七；长江三角洲一带敌占

区桑圃，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改为农田。

最近两年，敌伪高唱“增产运动”，称此为“决定胜败存亡”的关键。但敌伪与日俱增的掠夺政策，自然使所谓“增产运动”以“空前的减产”（伪《申报》今年元旦评论）而宣告惨败。伪《新中国报》说得老实：“在现状之下言生产，似已无从说起。工业生产则动力不给，农业生产则治安不维（苛捐杂税实治安问题之一）。如此现状，如何能言生产！”（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社论）

由这些敌伪报纸的自供，不难看出敌寇统治优势地区农业减产情形，最近两年比一九四二年只有更加恶劣。（转为我占优势的游击区，由于去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当有相当程度的恢复）

土地大量减少，产量又大大降低，人民的农业收入当然锐减。庞白土全村一九四一年降至战前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四二年更降至百分之三十点六。小西涨则四一年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四二年为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农村副业和工商业的收入情形更坏。敌伪大吃大喝，农民再也不敢多喂养家畜了；苛捐杂税、配给制度的结果，工商业萧条不堪。据小西涨、养马等六个村的调查，副业收入，一九四一年降至战前的百分之二十六，四二年为百分之二十五。工商业收入（小西涨、白沙等六个村），一九四一年为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九，四二年降至百分之八。

收入减少了，而且最大部分还要为敌人所掠夺，这自然引起人民生活的极端恶化。从下面几个农家的调查中（磁县是一九四一年，和西是一九四二年）可看出人民一般收入与支出的降低情形（以一九三九年各种指数为一〇〇）：

地　区	磁　县	磁　县	和　西
成　份	富　农	中　农	中　农
收入指数	26	57.8	71.4
生活指数	28.3	30	69.3
粮食支出指数	100	80	66.6
负担指数	132	142	125
再生产指数	60	不　详	21

这个统计中负担指数不完全，勒索敲诈等均未计算在内。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地区生产力的破坏还不算最严重。

人民生活水准之低，决非亲临其境者所能预料。临城材料，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不少新老"爱护村"富裕中农以上的吃糠户，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曲阳的养马村，位于平原，素称"麦库"，一九四三年吃树叶的很普遍，不少人都往山地巩固区逃荒（过去只有山地往平原逃荒）。

各阶层经济全体下降

所有上面叙述的材料，极鲜明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敌寇统治下的农村经济已经完全破产，这场历史的浩劫，农村中各阶级阶层无一幸免。阶级关系变化的总趋势是全体下降，但在各种不同条件与不同情况下，程度又有差异。

据北岳区四十二个村庄的调查，由于敌我力量之消长变化，表现出三种地区的三种趋势：

（一）游击区。这些地区多处于平原和山缘地带及大河流域，过去经济生活远较山地富裕。其中除少数敌占据点外，绝大部分是一九四一年敌人大"扫荡"后，才完全变成游击区的。对敌负担重，但我之政策一般能执行。到一九四二年止，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时间由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再到四二年，以下仿此）：

地主经济很大下降：户数在总户数中的比重，由百分之一点六九到百分之一点五八，再到百分之一点五；土地占有上，由百分之十点四七到百分之八点四一，再到百分之七点六一。

富农的下降如地主一样显著：户数比重由百分之七点九五，到百分之六点九七，再到百分之六点八一；土地占有由百分之二六点九五，到百分之二二点〇二，再到百分之二一点一五。

中农由上升到停滞（一九四一年是转变点），如户数由百分之三六点一四——四一点〇一——四一点九三。贫农则四一年后有增加，由百分之四一点六五——四一点九三。

工商业大不如战前。如曲阳文德村战前年产土布十万匹，一九四二年仅一万匹。完县五里岗的手工业是典型的例子（由一九三七年到四二年）：纺织由四十五户减到二十三户，荆货由三十九户减到十三户，磨坊由三户减到一户，小商业由十七户减到十三户。

（二）老“爱护村”。这种地区，敌寇势力很早就占着优势，屠杀破坏比较厉害；抗日工作开辟较晚，基础很薄弱，跟我们的政策一般能执行的游击区不同。根据定唐的小西涨、庞白土，寿阳的解愁、橙桥沟，广灵的大深口五个典型老“爱护村”的调查，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各阶层全体下降，全体破产。

地主大多数陷入破产：户数比重由百分之二点八三——二点〇九——二点〇五；土地占有由百分之八点三五——六点三六——六点二八。此外，地主的存粮和衣服财物之被敌掠夺抢劫，为数特巨。

富农急剧下降：户数比重由百分之四点九九——三点四四——三点五二；土地由百分之一七点四一——一〇点九八——一一点二三；劳动力占有，人力由百分之六点一一——三点八〇

——四点〇六，雇佣人力由百分之八五点二八——七五点一四——六五点七二。

中农在户口中的百分比，由百分之三二点二八——三二点一五——三三点四。数字上虽略有增加，但这是由于地主和富农下降的结果，并非由贫农上升。贫农则急剧增加：在户口中的百分比，由百分之四三点六——四七点八五——四九点八九。贫农的增加，是农村破产最显著的标志。

手工业大不如战前，或完全破产；工商业更是萧条不堪。这种地区，证以和西某村的材料，也大致相仿。如地主由六户减为三户；富农由四户减为二户；中贫农大部离村，有八户竟已死绝！

（三）“无人庄”（五台的南沟、暖腰、砖庙、平山的田兴，共四个典型村调查）。这是一九四一年敌人大“扫荡”时，以最残酷的“三光”政策所造成的。在这之前是巩固庄，一九四二年秋后又已开始恢复。但经此浩劫，农村面貌已远非昔比。

地主经济急剧下降，又显回涨：户数中之比重，由百分之二点八七——二点五四——三点〇三；土地由百分之二一点九九——一六点五二——一三点五八。

富农经济飞速下降：户数由百分之九点六八——五点〇八——三点一七；土地由百分之二八点八五——一六点六一——一〇点五二。

中贫农情形是急起直落：中农户数由百分之三三点一三——三九点七六——二九点八三；土地由百分之三三点〇一——四四点七九——三三点六五。贫农则反是，户数由百分之三四点〇四——三〇点四九——三八点一五；土地由百分之一五点四六——一六点八一——三一点三一。

另外还有一种为数极少的敌人殖民地秩序较为巩固的地区，如辽(县)西某镇，一九四二年调查，地主与富农在经营上没有什么转化与变动（生活水平则下降），中农下降百分之十四，富农迁走约百分之十，商户迁走百分之五十，只有几户掌握伪政权的富裕中农上升为富农。但由于最近两年敌对其“确保区”负担加重，这种地区各阶层变化趋势，必向前述老“爱护村”看齐。

关于农村各阶层变化的具体情形，在游击区，虽敌人压迫勒索很严重，因我们的政策一般能执行，基本群众是占优势的，所以变化规律基本上是两头向中间挤，而不是全体下降。如北岳四十二个村庄，自一九三七至四一年这一阶段：雇农上升为贫农的百分之三十，上升为中农的百分之二点七一。贫农百分之八七点七八保持原来地位，百分之十上升为中农，很少一部分下降为雇农（但一九四二年敌统治优势时，上升中农又极为困难）。中农变动不大，有百分之五点四一降为贫农或雇农，上升者极少。地主、富农的下降，亦多降到中农为止（前者百分之八点三三，后者百分之一二点四四）。但在老“爱护村”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上述五个老“爱护村”的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这个阶段：雇农没有上升为贫农的。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只有百分之一点〇四。中农下降为贫农者则占百分之七点三七。地主变为富农者占百分之四，降为中农和贫农者竟各占百分之十二。富农变中农者百分之二二点七三，降为贫农者占百分之九点〇九。由此看出：在老“爱护村”经济上升者，到贫农为止，下降者又大都降到贫农。所以阶级关系变化的规律是两头向贫农看齐；是中农停滞（百分之九一点二三的中农保持原来地位），而不是富农停滞（前述游击区百分之八一点七六富农保持原来地位）；是全体下降，而不是地主富农下降。

但必须说明的，就是有些阶层，形式上能保持原来地位，实际生活则濒于破产，如太行九个县二十一个主要地主的调查，现能维持原状的地主仅二人，甚至依附敌人的地主亦不能幸免。又如橙桥沟的地主、富农大多不能维持生活，大部分中农要下煤窑做工。庞白土地主、富农破产，部分土地流入贫农中农手中，但对敌负担太重，中农贫农生活并未改善。特别是封建势力依然把持政权的地区，摊派不合理，中农贫农之破产，就愈为深重。也有个别买地的暴发户，这多是城市中的汉奸、特务和投机商人。

总起来说，在敌寇统治着和统治过的地区，虽有情况和条件的不同，但各阶层的经济发展有一总的趋向——经济都在下降，已经破产或濒于破产。地主的收入比较战前减少的比例，比那一阶层都大（利息、租票、商业等收入，或微不足道，或完全没有了），下降最显著。富农在土地经营上所受的打击摧毁比较厉害，下降程度也不亚于地主。中农生产力经不起破坏，破坏之后不容易恢复，是经常遭受敌人打击掠夺的对象，特别是人力负担最重。贫农经济上所受摧毁与中农同，他们最受不了打击，恢复生产也最不容易，因此离乡外出者数量最多。雇农实际工资降低（太谷调查低四倍），生活最苦，无法顾家，由于农村雇佣者总数减少，有不少改为短工，生活更是漂泊无定。

租佃关系与土地占有的变化

异民族的暴力摧残破坏了农村经济生活，使农村的阶级结构起了变化，因此抗战前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与半封建的地主经济势力，就逐渐受到削弱。这主要表现在封建剥削关系的变化上。

从租佃关系来看，据太行、北岳调查，有以下三种不同情

况：

第一种是受破坏不严重，负担不过重，生产力还可维持的条件下（这种地区是极少的），旧的租佃关系没有什么改变，封建剥削没有减轻。在产粮普遍降低影响下，租额虽然没有增加，租率却增加了。例如武（乡）西两个村十一个佃户的平均租率统计：一九四一年为百分之五十八，四二年为百分之六十三。

第二种情况是负担勒索较重地区（这是最普遍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这里的租额、租率均有显著减低。佃户要求退佃，地主不得不在租额上有所让步，因压榨过重，不少地主允许"认粮种地"（种地者代地主拿对敌负担，不出当价），甚至"倒贴钱"租出土地，或"白送地"。磁县一地主租出土地七十亩，拿出三百元钱分给佃户，并订立租约，约定五年之内不收租。这种情况在平汉沿线已经不是局部现象，而且在普遍发展着。

第三种情况是在敌人的暴力屠杀镇压之后，旧的租佃关系完全破坏了，随着社会秩序与我们工作的恢复，租佃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依据昔西某村调查：一〇二件租佃契约中，新建立者占百分之七十八，旧约未变者仅占百分之二十二。出租土地与租入土地者之成份有了新的变化：二十八户出租户中，富农三户，中农十五户，贫农十户；三十七家佃户中，富农八户，中农十五户，贫农十四户。贫中农租出土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大破坏后一时不能恢复所致。（这里附带说明了这种地区执行减租的复杂性）

从高利贷的剥削关系来看，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放债人起了变化。战前债主大部分是三位一体的地主商业高利贷者，战后敌占地区商业倒闭，金融停滞，严重影响到地主的收入，因此他们无力放新债，旧债亦大都停付利息。新产生的一批债主，是投机商人、汉奸、毒贩和个别附敌地主，放债总数量

与战前相差甚远，且只限于敌占点线之内，未能普遍发展（但高利贷剥削则较战前更残酷）。一般游击区的借贷关系实际已陷于停顿。

在土地占有的变化上，其变动规律与战前不同（与东北亦不同），农村破产结果，土地并未走向集中。

抗战以来，敌占区、游击区抛出土地最多的，不是中农以下的阶层，而是地主与富农。据北岳区庞白土、白沙、西回舍等三十一个游击区村庄的调查（到一九四二年止），五年中卖出土地四千七百九十六亩中，地主约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八（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五）；买入土地四千三百一十三亩中，中农占百分之五十二，贫农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当出土地五千二百九十七亩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六，富农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六）；当入土地四千五百六十一亩中，中农占百分之五十四，贫农占百分之三十八；抽回地一千六百五十一亩中，贫农占百分之六十一，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九。

土地价格跌落甚大，据长治、榆次、临城、武安四县的调查，一般比战前跌一倍至六倍不等。特别自一九四二年我发动政治攻势后，土地几无买卖。负担过重地区，土地则完全停止了买卖。有的地主宁愿倒贴钱典出土地；过去典入押入土地的，都无代价要求原主赎回。磁县一地主七百元债权押下的地，后来倒贴三百元将地退回。各阶层都怕要地，因有了地要出负担。所以土地纠纷不是争地权问题，而是推出地权问题。

地主富农出卖当地及地价涨落，是与对敌伪负担程度直接相关的。能保持对敌斗争胜利地区，极少出卖地现象。形势好转后的游击区，往往一亩水地由白送人而涨到数千元。

虽然敌人利用封建势力，也有一部分封建势力依附敌人，但

在敌之普遍的压榨勒索过程中，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仍然逐渐被破坏着。

结 束 语

本文只就被敌统治着和统治过的地区，农村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陈述了一个事实的概要。城市的情形和敌寇政治上的压迫等都没有谈到。特别是最近两年的材料较少。然而仅是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到：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是与全中国的人民为敌的，它的统治基础建筑在刺刀与屠杀上。今天由于它的武力优势尚存在，所以还能在敌占区和部分游击区立足。敌寇的“确保统治”与加重压迫是一对双生子，这就使得它与中国各阶层人民——从地主、资本家到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越益发展起来，这就使得民族矛盾越益深刻化。

敌人破坏了各阶层人民的经济生活，驱使他们走向贫困，受尽苦难与牺牲；然而这又正为他们的日渐团结一致，坚决战斗，准备着一切。八年来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的敌后划出两个世界：一个是光明、建设与繁荣，一个是黑暗、破坏与衰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个是日本法西斯强盗统治的殖民地社会。八年来这两个世界两个方向，一天比一天激烈地进行生与死的斗争。广大的敌后人民在这个斗争中受到考验，受到教育，他们由亲身的经验看到哪一个一定会胜利，哪一个一定会灭亡。

（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解放日报》）

注：敌伪公布数字，大多间接引自《经济建设季刊》三卷一期“沦陷区农业生产之变化与战后复员救济问题”一文。

人性的毁灭

（敌后报导辑钞）

"敌人越接近死亡，便越变得狂暴。"

一踏进所谓"治安区"内的牛城村时，首先发现一个少女的尸体横躺在村边，紫色的血仍不断从腹部流出来。这是敌人昨夜从老百姓家里强拉走的一个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她全家人都被押到城里去了；她是走到村边，死力抱住一颗大杨树，咒骂着戏弄她的敌人而被刺死的。另外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妇被二个禽兽（老乡已惯于这样称呼）轮奸后，割去一个乳房，然后才死去。二个兽兵还将割去的乳房挑在刺刀尖上，一边跑一边狂笑狂喊："大大的葡萄哇，大大的葡萄哇。"从行唐西瓦仁村过来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婆子，也被五个鬼子轮奸而死。

这种残忍至极的惨事，今天在华北被敌人反复"扫荡"的地区中，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妇女在敌后战争中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来得重要，她们在体力等方面究竟不如男子，所以她们遭受敌人的虐杀和凌辱，近年来愈益严重，简直达到令人设想不到的地步。

去年秋末冬初，敌寇兽蹄踏进了平山。在冷泉村，四十个妇女被剥光了衣服，逼着扭舞，野兽们在旁大乐一阵以后，用刺刀把她们一个一个从胸到腹开了膛。在北洋沟，敌兵百余轮奸三十个妇女，其中一部分也用同样的方法处死；另外一部分则被关在

一个堆有木柴的窑洞内，从洞外掷进点燃的草把，都被活活烧死，烧焦的尸骨黏结成堆。滹沱河北岸的玉儿沟和东黄泥一带，敌人将老弱妇孺包围起来，用机枪扫射，留有气息的，再用刺刀乱刺一顿。据不完全的统计，这次大屠杀，仅仅平山洪镇一带几个村，死者即在二百三十名以上，伤四十多名；东黄泥一带十二个村，死者超过三百五十名，伤者仅黄泥村即四十六名。在东黄泥村一个巷子里，一家七口人全被砍碎；街道上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死尸：被剖开肚腹的女人，孩子的残破的肢体，焦黑弯曲的头发，炸裂的白色脑浆，没有眼睛的头颅…………。

敌人挖空心思，付出无数代价，几年来，仍无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最后就只有采取这种极端恐怖的政策，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抢掠。所谓"来时草木不惊，去时鸡犬不留"。往往在"扫荡"初期，暂不大烧大杀，以麻痹群众，而到退却时，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腥暴行，便有计划地进行了。这里还可以举出今年二月到三月，晋东南太行区遭到"扫荡"以后的一些统计数字：仅桐峪街市中，被杀的老弱婴孩共八十多人；后庄、王家峪村的老百姓，更无一逃生；三家峪瓦砾中，为石头击毙的尸首共有七十多具；石门村一百多人口，只有一个牲口逃出来了。损失最严重的是武乡东全县，该县一区有自然村七十三个，受灾者六十九村，据不完全统计，村民共被杀死一百九十七人。东五区被杀者八十一人，耕牛、牲畜、农具等几乎全被拉光或焚毁。

完全失掉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匪徒以虐杀方法来发泄兽性。"扫荡"武乡东时，在二区石门村，竟以蜡烛油浇在被俘者头上，燃火烧死。当时该村村长也被捕去，途中敌人以刺刀向他全身随走随戳，体无完肤，倒毙在路旁。在二区拴马村捉住一个留有长头发的人，用绳索拴住他的头发吊在树上，扭动他使之乱转，最后头

发一根根拔断了，坠地死去。在交口地方，敌人将刺刀刺入小孩腹中，举起来绕场而行，两只小手渐渐停止挥动，幼小的挣扎声音消失了，取乐的禽兽们才散去。此外在各地搜山时，匪徒们更以烟火熏死或烧死躲在窑洞内的民众，如武乡二区溪庄一个窑洞内就被熏死十九人，洪水附近一个窑洞内被烧死五十多人。

晋东南三月间召开了一次敌占区文化人座谈会，他们都表示："过去还可马马虎虎混日子，'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以后，敌占区的人民更活不成啦。"谈到敌人那些可怕的残暴，昔(阳)西的一位小学教员说"……杀人的方法，有三十几种。点天灯、四马分尸等是最常用的。有次一个被俘的情报员，被铲刀截成三段，还将尸体喂狗。盘家庄被捉去的二十几个青年，强迫他们的父母妻妹架起干柴来烧死他们。这个村庄现在有四十个没有丈夫的妇女……。"

这是一种怎样令人发指的惨痛场面！

与虐杀的方法同时竞争的，是各种各样出奇的酷刑。这次座谈会中，临城的一位先生说："去年在临城挖'治安沟'，有五十个壮丁的村庄，一定要派去一百名，从天明到黑夜挖十二小时。有次一个村子的老百姓，因为山路远，去的稍微迟了些，敌人勒令他们排成队，不论是父子叔侄，对着脸互相打嘴巴，一直打到流血才停止。禽兽们却坐在旁边拍掌大笑。"

在晋察冀叫做"封锁沟"，敌人常在"治安区"内，强征十二岁到六十岁的男女老幼去挖沟，东伏流村有次两个孩子迟到了，除开脱光衣服排成队互相打脸外，沟旁另外为这两个孩子预备了刑场。两把刺刀埋在地下露出八寸，将孩子从昏眩了的母亲身旁拖出来伏在上面，慢慢加上大石块，两个小生命一直支持了三个小时。

三月间，灵寿某村有个游击小组长被俘，敌人灌他许多冷水，肚子膨胀大了，然后仰卧在地上，用板子来压，压得肚子里

水从口中射出。这种刑罚被叫做“人造自来水”。所谓“睡钉床”，是在木板上钉满尖头的铁钉，受刑者裸身躺在上面，用皮鞭抽，使他乱滚，另外有种叫”拉蜈蚣弓”：地上插把长刺刀，刀尖向上，使受刑者弯腰，刺刀紧接着肚皮，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的引线人如支持不了时，稍一向下，刺刀即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便被扯断。去年冬天，阜平敌人遍设水牢，被捕者全身脱光，吊在九尺多深的坑中，坑中灌一半水，因为气候严寒，如经过一夜，人便会活活冻死在冰里。

除开这些闻所未闻的屠杀外，敌人还在退出的地区散布毒药或毒气。今年“扫荡”太行区撤退之后，辽、黎、武、涉等地，都先后发现毒药和液体糜烂性的毒瓦斯。涉县河店一个水井内，发现敌人放了毒药，人畜喝下去立刻死去。糜烂性毒瓦斯放在门板、炕席、粮食或柴草上，稍一接触，身上就红肿糜烂。井陉薛家村敌人组织的“爱护村”，三月初旬发现，凡吃了发下来的食盐的，大都鼻孔流血，面部浮肿，终至烂死。

敌寇今天在华北的残酷暴行，是罄竹难书的。手边还存有一份晋东南二月间的电讯。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带有深刻的崇高的历史意义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死与生的分野：中国人民的必然胜利，与日本法西斯匪徒的日益接近死亡。

“武乡东型唐村一老妪，闻敌逼近，即带着两个女儿上山转移。在一个狭窄的山路上，她们不幸遭遇了敌人。强奸的威胁使老妪失去了母鸡护雏的能力，忍心将两个亲生的爱女推下数丈高的山崖。当时敌人见此，羞愤交集，于是执着枪刺向老妪扑去。一分钟后，这位老年英勇的母亲，也就安心躺在自己的血泊里。”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敌 伪 之 间

（敌后报导辑钞）

炮 楼 小 调

通常，人们总习惯于把敌伪相提并论，其实，在他们之间，是有极大差别的。例如：鬼子吃“两米饭”，伪军却吃小米饭；鬼子可以任意奸淫掳掠，伪军却不准“公开”放火杀人；鬼子白天不站岗，伪军每天却得摊岗五、六班；鬼子遇见伪军，可以摆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武士道”架子，伪军遇到鬼子，则须做出低声下气、让路敬礼的亡国奴的丑相。诸如此类，都使伪军深刻地体验到：“中国人终究不是日本人，亡国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因此，有的伪军，在凄凉的深夜，靠着炮楼哼着这样的小调：

“独坐炮楼闷沉沉，

马马虎虎当个兵呀，

真是没有劲。

一呀呀得儿歪得儿歪呀，

真是没有劲！”

有的伪军军官对伪军讲出这样的话：“我们干的这叫啥差事呢？真太给中国人现眼了！干不好倒霉；干得好，鬼子也不过只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弟兄们，杀人落得两手血，我们图得什么？”

“伪军的心大大的坏了”

打仗的时候，伪军侦察、冲锋、追击、堵炮眼，似乎已成为一般的规律了。可是，伪军并不象鬼子想象中那样坚决勇敢，去为他们效劳。有一天，曲阳城里的敌人，带着伪“警备队”到李家庄“讨伐”，被我们一个突如其来的排子枪打得乱七八糟。这时，曲阳伪县府的顾问掏出手枪来，铁青着一张狰狞可怕的面孔说：

“警备队向前冲，快快冲的！”

伪“警备队”的教官扫视大家一遍，用怀疑的目光盯住顾问说：“要冲大家冲！”

“拍——”的一声，一颗子弹从顾问手枪飞出来，从教官的右肩上穿过去了。于是，所谓“讨伐”，又不免损兵折将，狼狈回窜了。

又有一次，望都的敌伪要“扫荡”白塔一带，鬼子深怕伪军“心怀不测”，分两路前进，让伪军先出发。伪军按时出发了，可是他们还在半路的时候，鬼子已到白塔村边了。这时，村子里静悄悄的，鬼子以为一定是伪军先到，便大摇大摆向街里走去。不料刚到街口，屋顶上扔下手榴弹来，敌寇狼狈逃跑，小队长也负了重伤。伪军们听到枪声大作，一溜烟跑回望都城去了。晚上，伪军班长以上的干部集合到日军的队部，敌寇中队长涨紫着脸大骂：“八格牙路，为什么你们的人死了的没有，我们人死了死了大大的！”直到班长们咬紧牙退出来的时候，还隐约的听得见：“伪军的心大大的坏了！”

敌人于是觉得把枪枝子弹交给中国人，简直对自己是个绝大的危险。因此，伪军被缴械的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去年旧历年底，我某部袭击曲阳隥林据点时，敌寇害怕伪军

反正，把伪“警备队”通通捆起来。直到第二天半晌午才算解绑。最近，敌寇把伪军的枪全部收锁在一间屋子里，只有在“讨伐”和站岗时，才发给一枝破套筒和一些坏的子弹。从前只有伪军防守的岗楼，现在也添加了日军。

“我们打错了”

“爱护村”的自卫团员，经常被派去看守封锁沟。鬼子要想考验自卫团看沟忠实的程度，便异想天开伪装了几个“八路”，去破坏封锁沟。自卫团员以为是真的八路军来破路了，便照旧不管。

日本兵可恼了，气势汹汹地走到自卫团员的面前：“八格牙路的，八路军来破路不管的！”一面说，一面拳打足踢，将他们重重揍了一顿。之后，自卫团员的警觉性便提高了。

几天以后，鬼子又用这同一的拙笨方法来考验自卫团。自卫团员早已打听清楚，商量好了办法。

果然，几个装模作样的冒牌的“八路军”摇摇摆摆地走来了。自卫团的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象饿虎扑食似的，拥了上去，举起了大棍，没头没脸地便打了起来，一面打，一面高声喊着：“打八路军呀！”鬼子们在大棍挥舞下，痛苦地叫着：“皇军的，不要打的……！”自卫团把它当耳旁风一样，连听都不听一下，仍然用棍凶狠地打着，把那几个倒霉的鬼子打得叫苦连天，满地乱滚，幸而堡垒里面的几个鬼子听见了，赶紧跑来，这一场滑稽的“全武行”才宣告结束。

挨打的鬼子，躺在地下呻吟着：“为什么不认人的，打得这样厉害的！”

一个聪明的自卫团员，陪着笑脸向他们说：“对不起皇军，

我们打错了!”蠢笨的鬼子，倒高兴得笑嘻嘻地说：“好的，大大的好的看沟的，打得没有关系的!”

“上　不　了　天　堂”

盂县的敌人对红枪会的组织用了很多心思。

每天晚上，菩萨殿上挤满了红枪会的会员，一个个在打坐。他们都有点半信半疑：“打坐，天天打坐，心诚就能够上天堂。”就这样，他们有的一直坐到天亮。

有一天，到下半夜了，都抵不过困，照例不住地在点着头。突然菩萨背后薄薄的木板墙的那边，送过来留声机清快的音乐和女人清脆的歌声。这象吗啡针似地把这群昏迷的人们的精神提起来了，酸痛的腰也直起来了，低着的头也抬起来了。

一个楞小伙子跑出去，要到菩萨殿后边院子去看，在门口被敌人的特务打了两个耳光子，骂了一句：“你的心不诚，上不了天堂!”

想去看又看不见，但是美妙的音乐，仍一阵阵送过来。有的就念起佛来了，直说“阿弥陀佛，这可真是上了天堂!阿弥陀佛……。”

化　学　子　弹

还是在盂县的某村，村边一块广场上，聚集了一百多个光着上身的红枪会员。他们有的脸发白，有的腿直抖，站成了一排，等待着试验自己修练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了。

广场对面小坡底下，敌人的机枪支了起来，接着“哒哒哒”朝着这些光着上身的会员打来了。原来敌人用的是化学做的子弹头，打出去以后，子弹头就化了。红枪会员们出了一身冷汗，结

果很高兴地跑回去了，因为没有受伤的。真是修练的刀枪不入了。

过了几天，红枪会为了抓捕地方上的村区干部，拿上了大刀、宝剑在敌人的前面出发了。在离村五、六里地的小土坡上“嘿呀嘿呀”的冲下来，对面山上的子弟兵大声喊着：“不要上鬼子们的当啊！你们回去吧！我们不打你们……”光着上身的红枪会员们没有听见似的，一直冲下来，我们的同志没有法子，只好往天上放了几枪，吓唬他们一下。哪知道他们听见枪声一响都不害怕，就要冲上来了，逼的山上我军放了两排子弹，眼看着光着身子的一个、两个倒下去了。这一下象山崩一样，一个个都跑回去了。看一看少了六个。还少一个练的挺好的大师兄呢。他们一伙一伙地偷偷议论着：“怎么回事啊？皇军的枪和八路军的枪怎么不一样啊？……”

一 个 骗 局

三月十六日，唐县城十九个“治安军”，坐一辆大汽车到温家庄来看戏，快到温家庄的时候，车上的“治安军”看见不远的路旁，有一堆老百姓在那儿光着膀子挖沟。便停下车来，问老百姓：“村里不是在唱戏吗？你们不去看戏，还在这儿挖沟？”

经验使得老百姓谁也不愿意先开口，免得惹出是非。旁边一个监工的特务低声下气的说：“皇军让他们来挖沟。”“混蛋”，一个“治安军”骂起来，“什么皇军不皇军的，他妈的，明天再挖不行吗？去看戏，有事我担当，说是县城刘队长说的。”

汽车又停在温家庄的炮楼门口，“治安军”先不下车，把汽车按的嘟嘟叫。炮楼里那个名叫黄井的日本小队长，急急忙忙跑出来，将炮楼里外的特务警备队什么的都集合起来，然后跑到汽车

前面，规规矩矩敬了一个礼。车上的“治安军”这才一个个抖着威风下来。

这些，老百姓都看见了。

挖沟的老百姓有的早回家了。有的将铁铲倒挂在肩膀上，跑到戏台前看戏。

这时，有三个日本兵，前前后后在人堆里横冲直撞。撞到一个背铁铲的老乡跟前，便狠狠地吼叫起来：“挖沟的你们跑了，看什么戏的……”正准备用枪托朝那老乡打下去，从斜刺里突然跳出来一个“治安军”，“混蛋，不许动手！”他好象早埋伏好了的，很威风地为老乡保镖。

老乡们为这个“治安军”捏把冷汗，可是奇怪，三个日本兵被吓唬住了，瞪了眼不说话，接着悄悄地从人丛里钻出去。

于是“治安军吃得开，能管得住日本鬼子了”的话，便在老百姓中间传开来。村里不三不四的白面客，也拍起“治安军”的马屁了。不上两天，整个定北区都在传说这件怪事。

过了两天，城里下来了命令，说是二百户以上的“爱护村”要送三个人到城里去当“治安军。”有的伪村长，不必象从前那么到处费唇舌、干嗓子，这回很快就交出了三个人。但有的村子却在犹疑，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

又后两天的夜里，八路军的武装宣传队，三三五五，象燕子样飞到几个村子里，才揭穿了鬼子的“治安军”以及特务串通好了的这幕骗局。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敌寇“五次治强运动”

十月初旬，华北敌伪宣布实施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据称目标有四：“一、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二、剿灭‘共匪’，肃正思想；三、确保农产，减低物价；四、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这种“治强运动”，自去年三月以来，华北敌伪已施行过四次了，围绕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几个方面，每次都提出几个中心口号。表面看去，这些口号似乎大同小异，老调重弹，但细察其当时环境及实施经过，则在程度和内容上，均大有差别。这就是说，日寇对占领区和我根据地的统治、封锁，掠夺和破坏，以“治强运动”分期，是一次比一次加深的。

面临着希特勒东线失败，同盟国将转守为攻的局面，日寇为了垂死挣扎，不能不对其“产业基地”、“兵站基地”的华北，寄托最大的希望。这次“治强运动”第一个目标，就说明日寇企图依靠华北，来解救其目前所处的困境。几年来，敌人在华北对人力物力的掠夺，占领区的统治，以及割裂我根据地等，确有某些收获。然而整个华北的民心（包括一般伪军及伪组织中人员）是日益背敌向我的；抗日根据地不独无法摧毁，反更精干坚强，特别是最近半年，各根据地对敌普遍展开政治攻势和反“蚕食”斗争，获得很大成效。而敌占区情形却每况愈下：农村凋敝，生产低落，粮食恐慌，物价高涨，伪组织内部日趋不稳……。在这样一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敌寇的“第五次治强运动”，自然会露出其更狂

妄、更贪馋、更残酷的面目。

"剿灭盘据华北的共产党"，这是敌人无日或忘的梦想。这次汉奸头子王逆揖唐又奉令狂言："对华北建设障碍之敌人共产党，现已非自卫时期，应改为击灭时期，最低限度亦需将其地方组织迅速除去。"天津敌使馆寿田参事官，更这样表示："过去本运动向以'中国'(指伪组织)方面为主体，而日本则处于协助地位。此次将总动员在华北之四十万'雄兵'，不只是限于支援运动方面。"大家知道，过去在每次"治强运动"中，敌人的二十五万军队，每次都扮演主角，可是"成绩"实在微弱，敌参事官的话颇带有遮羞之意。但另一方面，这次敌寇下了大决心，要对我发动更毒辣更惨酷的进攻，将着重点放在摧毁我下层组织，特别是必更广泛地直接使用其军事力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据闻敌寇在华北最近采取了许多新的设施：如在冀东伪满边境造成所谓"国防肃清地"；扩大"无人区"，各县平均设若干"剿共模范地"，设"示范县"、"示范村"；加强秘密特务活动，企图打入我下层组织；以及最近对华北各地区反复"扫荡"后，又分期进行"清乡"活动等。敌人对我进攻方法的日新月异，手段之毒辣残暴，大屠杀之连续发生，这是我华北军民必须时刻注意警惕的。各级领导机关应针对敌人活动方法，更进一步巩固我下层组织。在这方面，我之主动的反"蚕食"斗争，打垮敌人的据点和伪组织，使敌人在根据地及其外围无法立足，是有决定意义的。

食粮不足，亦是华北敌寇感到极严重的一个问题。四次"治强运动"号召的"勤俭增产"，寇占区老百姓"勤俭"不起来，其他一些"开发计划"又无以解救燃眉之急。所以这次提出"确保农产"，实际上就是要大举抢掠全华北的农产物。今年秋收之前，敌人在占领区各地即已进行普遍的农产物调查，于各县组织"食

粮保管委员会”，建立仓库，计划在华北“囤粮七千万石”（包括从我根据地抢得的粮和从敌占区强收的粮）。目前敌占区农村中已相当普遍实行“食粮配给制”，在北平等大都市中，亦已开始局部施行。这种对华北同胞最低生活权利的剥夺，已使敌占区的人民，不管农民地主或商人，都痛切感到“活不下去了！”敌占区全村逃亡、全家自杀的事件，近来不断发生，自动不“维持”，自动破路和帮助我军的出击等，更比过去踊跃。

这种“活不下去”的感觉，事实上已扩大到一般伪组织人员中。今年伪军瓦解反正的数字，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伪组织人员中“暗抗日”者，也在逐渐增加；许多汉奸被敌处死，引起伪组织人员中“兔死狐悲”情绪的滋长。因之，敌寇这次特别强调要“肃正自由主义思想”。关于所谓“革新生活，安定民生”，敌伪自己有很好的自供：“过去一般人的生活方面，因为自由主义长期影响之下，多年是浪费的、无纪律的、个人主义的。这决不适合于战时体制的现在。今后无论官吏工农商人或知识分子，都要厉行勤俭节省，灭私奉公，革新生活内容和方式。”（伪“新民报”社论）可见日寇目前所进行的“肃正思想”，“自肃政策”，“行政简素化”，都是为了要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统治、镇压和预防其内部动摇。闻“态度消极”的各省县伪知事，现已开始大批“淘汰撤换”；在职伪官吏，甚至伪警务人员及特务，现在均被看管很紧，普遍进行所谓“训练”、“考试”、“监察”和“调动”。伪新民会高级顾问铃木如此坦白供出：“尽量使中国人立于第一线，日人为其后盾，使中国人于默然中接受日人之领导。”所以今后伪军伪组织人员中惶惶不安的情绪，一定会大大增长，敌伪间矛盾必然愈加深刻化。

敌占区人民和伪军伪组织人员，一方面在切身经验中感到在

敌寇压榨统治下"活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就自然更加怀念祖国，希望祖国的军队去解救他们。根据地过去对敌所发动的几次政治攻势，曾使得敌伪内部大大动摇，使得日寇在敌占区游击区人民中日形孤立。武装出击配合宣传攻势，这是我们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今后我们不但要主动给日寇以军事上打击，同时要在政治上精神上严重打击它瓦解它。

敌人曾宣称"治强运动"要一次一次继续推行，但是两个根本无法克服的矛盾：广大人民的仇恨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不稳，必然会随着继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独无法"剿灭"，反而一天天坚强。华北人民反"蚕食"斗争与政治攻势的开展，对敌斗争艺术的日益进步，尤其是当前正在广泛开展的反对敌寇抢粮斗争，这一切都使得敌寇的"治安"根本无法"强化"，相反的，只有一次比一次更接近自己最后崩溃之日。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社论）

南霸天发家史

热河的土地改革进行一年了。但迄今为止，各地对地主阶级的详细调查材料还不多见。今天本报发表了建昌县要路沟南霸天的发家经过与罪恶事迹。由于日伪多年统治，比这残酷得多的恶霸地主，在热河多得很。南霸天的材料，是热东这次复查中，搞典型村才整出来的。可见要发掘地主的详细材料，与我们的工作深度分不开。

在目前彻底消灭封建、深入发动群众的运动中，对地主阶级特别对典型恶霸地主进行详细的调查，考查其发家历史、剥削方法，以及各种大小罪恶事迹，是十分重要，有很大意义的。这种调查本身，就是一个阶级教育的过程，一个掌握政策的过程。由此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群众运动发展的深度，可以决定对各种不同地主打击的程度，从而可以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

一提起南霸天，要路沟的男女老少无不切齿痛恨。全区大小地主九十七户，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大小恶霸，其中数南霸天郑家四代，最是“一手遮天”。郑家当匪通匪，勾结敌伪，所有产业都是用“老虎牌子”和其他讹财害命等手段得来。群众反映：“打不倒南霸天，要路沟百姓没法活。”贾杖子村群众对南霸天的斗争，从去年春季即开始。一年多来，经过反复曲折，走了许多弯路（南霸天曾孙郑森，解放后还当过村长），直到今年七月才将他一家斗垮。斗争大会开了五天，诉苦的群众痛哭流涕。要路沟

其他大小恶霸也无不拉杆通匪，把持乡政，雇用一批流氓走狗，强行霸占土地，随意谋财害命。血风腥雨，遍布人间！今春复查之后，尤其七月召开的要路沟全区农代大会上，翻身代表挖根诉苦材料甚多。兹据大会搜集材料，将南霸天发家经过和主要罪恶事迹综述如下：

弟弟当匪发财　哥哥夺产杀弟

“南霸天”家祖父郑思谋当世时，要路沟区非常荒凉，土地还大多数没有开辟。郑思谋当年即贾仗子首户，起初还是个勤俭致富的富农，但人很狡猾。他的两个儿子郑广、郑会，性格大不相同：郑会是个老实人，常常因郑广的狡猾欺人而吵架。他们弟兄壮年时就分了家。

郑广在村中事事占上风，全村大小争斗事情，必须请他来排解，群众称他外号“大爷”。郑广有三个儿子，国恩、国荣、国仓。郑国恩较老实，郑国荣最坏，郑国仓当马达子。他们弟兄三人年青分家，分家时还是富农。郑国仓吸大烟产业败尽，三十岁时去宽邦（绥中县）当土匪，常常经郑善（郑国荣之子）由宽邦驮回银子和其他财物，均由郑国荣经理（因郑国仓之妻是破鞋）。郑国仓四十岁，在宽邦带五十人投降官府，当队长，不到二年，来乾沟驻防。郑国荣替其弟保存财物，早有吞财之意。见其弟合理合法归来，便起歹心，鼓励贾杖子村跟郑国仓有杀父之仇的陈国栋，去凌源县告状追命，并作陈后台。当年（一九一三年）郑国仓终被判，给陈国栋父陈万金偿命。于是，郑国荣独吞郑国仓全部财产，并卖其妻，又得一笔钱，便开始收买土地，财源大发。

南霸天一手遮天　老虎牌子数郑善

郑国荣有子六人（寄、善、明、海、印、雨田），为了遮掩耳目，将财产分为六股，每股一顷地，并自留养老地一顷及其他财产。他们一家开始在贾杖子村一手遮天，勾结官匪，放高利贷，滚"老虎牌子"地，霸占产业，人们开始叫他南霸天。现在先表郑善罪行。

郑善一家共有十五口人，四顷地，其中二顷多是"老虎牌子"。他到处想尽办法放利，每逢从地里过，就注意谁家的地好。如张三地好，他回去就设法同张三拉成某种关系，想方设法把钱放给，先表示客气，不忙要利，形成利上利之后，最终写成文书，达到要地目的。如松树沟于友，指地借他六十块钱，月利一分，打过十多年利，遂滚死了地。平房子张兴使他一百元，月利三分，不久就死三十九亩半地，张因无法生活，走了关东，至今一无消息。窝瓜秧沟陈宽，二十八亩半地，使他三十元小洋钱，原来头几年陈宽准备还债，他假装大方："不忙，咱爷们那点事算不了什么。"滚了几年，二十八亩半地都滚进他的帐本。陈和他母亲去凌源打两三年官司，只过陈家一面堂，一次未见郑善，郑善只去钱不去人。

十四户家败人亡　雇活按月算工价

陈母两三年官司白打，回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气病亡。象这类惨事，举不胜举。经郑善放利，害的家败人亡的十四户，下关东的五户。郑善财产多得不可胜计，乾沟永顺兴有他六个股份，秦皇岛有大楼三处，岭下龙尾有烧锅，东南沟都有他窝堡（傍青户住的）。平房子有地，还有四个大板车跑北平天津。

郑善当过联庄会长，常常骑着大马，背着枪到处要账。他家除了窝堡招人傍青外，家里每年雇活十个，按月计算工价（叫做月工）；同时他还分三季雇，春种时是一季，傍是一季，秋收是一季。秋收后一冬，地榜后到秋收，这两个阶段不雇活，这样每年可省五、六个月的工价。另外还雇羊官三，猪官一，伙夫一，要账的二。他每年都是先雇上大打头的、二打头的，压下价以后，再雇三打头的和其他跟作的，以便依次减价。他到各处要粮利，都是带着自己的斗，比普通斗大二升半（在斗争中欠他粮的老乡，还拿来了那个碎坏的大斗）。他家里媳妇都是村、甲长的姑娘，他还用小便宜收买了走狗郝中（贫苦人）作爪牙，勾结小恶霸如杨仲宽，流氓如王亭宽，全区无人不知他的毒狠。

郑明设计造文书　强夺亲家房产地

郑国荣第三子郑明，与他二哥一样恶毒。郑明家三顷多地，也是二顷多"老虎牌子"地。贾杖子村不用说大人，就连十几岁的小孩子，一提起郑明，都骂声不绝。郑明谋财也是首先找对象，找好了后才下手。如贾杖子刘山是一个老实富农，有八十多亩土地。郑明就托人说媒，把刘山的姐姐作了他的大儿媳妇，后两家来往亲密，有天郑明把刘山父亲请去喝酒，灌醉后就劝他："咱们是儿女亲家，这年头很多人都惦上您的房产地业，咱们写个假文书，就说卖给我了，以免外祸。"刘当时醉了，但提出就写当契吧。郑明即进一步说："既是假的，怎样写也没关系"。结果写了死契和小价，并写了交钱日期、"兑关门"（即全家净身搬出）。刘认为是假的，毫不在意。回家不久，郑明即到刘家去交钱，刘家奇怪，但郑到底将钱丢下。刘家仍去种自己的地，这时郑便拿枪打。有天郑又带手枪到刘家立逼搬家。刘全家竟如此被

迫哭离家门，到西村小窝铺去住。郑明就这样伤天害理霸占了刘家的八十多亩土地和二十多间房子、一个院子、磨板仓。刘家三十多口人搬到西村，只靠着十三亩山坡地，每年夏天都饿得吃树叶子。刘山父亲受一家怨言，自己气得跑到关东病死了。刘家为这事打了十几年官司。郑明强逼其大儿媳妇回家偷来地契文书，向凌源衙门送去白洋钱，官司当然打不出这个真文书来。刘山的祖父母也因此病死。这件事当时震动了全区，谁都知道。

松树沟的刁庆云使郑明三十元小洋钱，净给他打利，一匹马、十一只羊、一口肥猪，还有二年半的活价，最后还滚进去剩下的六亩半地。这些年，刁家净靠耍手艺、扛活维持生活。刁赤贫出身，靠扛半辈子活，才还了六亩半地。这件事提起来没有人不流泪的。

霸松山逼人上吊　“通八路”唆杀七命

王恩有一架松山，离郑明的山很近，郑明要向王买，王因一家烧柴全靠这山，所以不愿卖。有一天郑明趁王打柴，将自己松山的松枝砍下来，偷着放在王的柴筐里，硬说王偷了他的松柴。使钱打赢了官司，把王饿肚子积钱置下的山，断给了郑明，还叫王家请客陪礼。郑嫌饭菜不好，推翻了桌子，后来王再治酒席，才算饶过。王觉得无路可走，上了吊，已经断了气，后又被人救活。直到斗争郑家时，王家还欠了请这顿饭的猪肉账。

贾杖子本村雷凤文曾使郑明三百元钱，不久滚成六百元，未还上利，利又滚利，共达一千二百元。雷家住的八间瓦房院场和所有的土地，一并顶了郑明的利。村中人见雷立刻无扎锥之地，都到郑明家求情，留间房子给雷住，郑明反把大家骂出去。雷被逼没办法，在故土难离的哭声中走了关东，现在全家都死了，只

剩下一个婴儿。沈中林有一个院场五间瓦房，郑明为了这块好地方，就硬赖沈偷了他半个猪，沈怕他，便全家搬迁围场，至今无信息，不知死活。杨仲芝的地紧连郑明的地，虽立有界石，也硬赖杨一条垄归郑明了。

郑明二子郑绍学当伪甲长，曾勾结特务检举七个同他有过大小私仇的人：薛庆余、刘怀、杨海荣、郑怀、郑洪兰、阎德富、张老占，都以勾结八路军名义处死了，害得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家雇活规矩大：不许作活时拉嗑（谈话），怕少作活；夏天不许露出兜肚咀，露出兜肚咀（上面有花），便吊在大梁上打一顿；作活的不准洗脸（怕看了他家媳妇姑娘）。骑牲口去看地，把驴放在别人家地里任意吃。群众说："要把郑明坏事一件件数清，半年也谈不完。"郑国荣长子郑继、五子郑印、六子郑雨田，每人也都是二顷多地，也害逼人命。欺压人不用提，那是家常事。

南霸天一家罪恶数说不清，其家内丑事亦骇人听闻，不多赘述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群众日报》）

如何彻底肃清匪患

热河自解放以来始终闹土匪问题。有些地区（如热辽）匪患已基本肃清，但大部地区仍在闹，有的在某些时期且越闹越凶。关于土匪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闹得这样厉害，能不能肃清，怎样才能肃清，等等问题，很需要弄清楚，求得确切的解答。

有人说土匪闹得这样厉害，是因为历史原因：热河出匪。我们就先从历史谈起。

热河的老百姓都知道，汤二虎（汤玉麟）原来是土匪出身，从汤二虎时代起，热河土匪确大增，官匪不分，先匪后官，当匪成了做官的捷径。（据说有人曾劝汤办学，汤答曰："妈那巴子，办学做什么，我一个瞎子不识字，还不当了督办？"这就是鼓励当匪。）日寇统治时期，因公开的土匪不利其统治，土匪便变成了它的中下层合法统治的代表——特务、伪警、讨伐队长、协和会长等。我军刚进入热河时，土匪并未四起，但当我们开始发动群众清算复仇时，各地土匪便也开始"对码子"（匪语，结伙之意）了，并于去年一月配合蒋军进攻，向我袭击扰乱后方。停战令后，土匪曾消沉短时。但当土地改革一开始，蒋军进攻承德赤峰之后，土匪顿时遍起，大股小股，到处猖狂，其数之众，蔓延之广，对群众祸害之大，口号之明确统一，均远非汤二虎时代所能比拟。所以仅仅温习这一段历史，就可以明了现在闹土匪的根本原因，乃在这一年来热河所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乃在反动地主与蒋军国特向

人民的进攻所致。

大家都知道，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过去是汉奸特务地主恶霸当权，穷苦的农民受压迫，现在是农民翻身，汉奸恶霸受清算；过去是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地主手中，现在是土地分散为农民所有。在这个伟大的变革当中，不法地主恶霸曾费尽心机进行破坏，在一切破坏无效之后，其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便走向垂死的挣扎，公开当匪和勾匪，用战争来反抗农民。据一切材料证明，现在各地土匪匪首，无不是大地主或与之有亲戚故旧关系者；同时又无不受蒋军国特的策动和支援。热河过去的土匪本与反动大地主有血缘关系(官匪不分之官都是大地主)，但这一年来更起了一个彻底的变化：反动地主——土匪——蒋特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这只要看热河各地土匪的统一口号便知："先打工农会（或穷人会），后灭共产党。"所以现在的土匪，一方面是进攻农民的反动地主武装，另一方面是蒋军的先遣队或地下军。在形式上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游击性大，有番号，活动地区大，较有战斗经验；一类更带地方性，活动地区小，即一般大团、伙会、大刀会之类。

单纯对付土匪，办法当然简单，但现在的土匪性质上已起了实质的变化；要肃清匪患，军事是主要的，但决不能单靠军事和主力，必须与各种斗争相结合，首先必须与土地改革和锄奸工作相结合。但是现在有许多干部还不了解这点，还存在依靠主力的思想，甚至有些干部因为恐匪而反对进行土地改革（说是怕激起地主当匪）。

为了更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向两种地区请教一番：一种是土匪已基本肃清的地区，如热辽；一种是土匪仍相当猖獗的地区，如经棚等地。为什么你们地区的土匪肃清了呢？热辽的回答是：我们的群众真正发动了，农民向地主开了几次火，土地改

革进行得比较彻底，民兵自卫队普遍组织起来，且真起作用，建立了村落联防和情报网，村子里坏人藏不住，剿匪主要由区小队民兵负责，依靠主力思想早已打破等等。为什么你们地区的土匪仍猖獗呢？经棚等地的回答则是：我们这里“夹生饭”和生饭很多，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地主的反动气焰还没有打下去，农民还有浓厚变天思想，民兵自卫队还未建立或不怎么起作用，干部中恐匪思想、依靠主力思想还很重等等。这种对比的情况是很多的，不仅县与县，即区与区、村与村也是存在的。

土匪既是地主武装，他们都是“地头蛇”，当然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和社会基础；他们既然有根，当然会生芽。斩草要除根，捉耗子要塞洞，今天剿灭土匪也与此理相同。前述两种地区的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农民还没有彻底翻身，没有组织武装起来，只要地主的土地还没有彻底分配，威风还没有彻底打下去，土匪便有活动的余地，便能安巢立窝，便能公开或暗地威胁农民进攻农民。所以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是肃清匪患的根本条件。在剿匪布置上，必须以区小队与民兵为主，必须建立情报网，建立村落联防会剿，其道理也还是因为土匪是“地头蛇”。民兵和区小队是革命的“地头蛇”。土匪有办法以跑和躲对付主力，但却跑不过躲不过联防了的民兵。情报网严密，发动群众性的锄奸，土匪的耳目——外探和坐探也就无法活动（黑龙阴谋暴动案的破获，尤其证明群众性锄奸的重要）。所以在贯彻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加强民兵联防，建立地方军，发动群众除奸，这就好比天罗地网，让土匪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必要的主力的会战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目前土匪的猖獗，应该看作是反动地主的回光反照，只是一种垂死的挣扎而已。反动地主的战线、土匪的战线是极不稳固的。

就以地主阶级本身而言，大部分中小地主是和这些最反动的常匪勾匪的大地主有矛盾的，大股小股土匪互相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而无论当匪的和不当匪的地主，又都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只是利用、也并不优厚于地主，（不是逃到蒋区的地主都纷纷活不了要求回解放区吗？）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同样施之于土匪身上，（不是热河所有的土匪都不准进入承德、赤峰、开鲁等城市吗？不是土匪被收编后便不能自由行动，如二十几股土匪集中在建昌被我一网打尽吗？）蒋军必败，我军必胜，这是肯定的前途；土匪（地主武装）必肃清，农民必翻身，这也是肯定的前途。我们要大量争取蒋军放下武器，并给以前途；同样我们也要大量争取土匪，特别是被威胁从匪者回首自新，给以前途。土匪只要放下武器悔过自新，缴枪不杀，并保证安全与生活的出路，分配给他土地。我们有本事歼灭蒋军，打垮蒋介石，同样更有本事肃清土匪，击溃地主反攻，这是许多老解放区的历史证明了的，请问那一个老解放区现在还有土匪活动？这同样也为热河新解放区的许多地区证明了的。

目前的匪患对群众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匪患未肃清的地区应首先力求贯彻土地改革，认真发动群众武装自卫，打通干部思想，积极组织民兵联防除奸，以求匪患之根本肃清。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冀热辽日报》社论）

农民在解放中

——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将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八年来农村经济关系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变化：封建半封建经济势力受到决定性的削弱，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已被排除；虽有战争的严重破坏和长期消耗，广大农民阶层——中农、贫农和雇农的经济仍然向上发展。

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不论战前战后，阶级关系向两极分化：广大农民相继破产为贫农和农村无产者；只有占人口中极少数的地主、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吸血而肥；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历来是较困难的；现在的大后方，农民上升为富农更加困难了。

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却走着与此相反的道路：两极（贫雇农和地主）缩小，中间（中农）扩大。

据手头有的北岳（晋冀）、太行、晋绥、盐阜和滨海五个解放区的可靠材料（注一），将战前与战后农村各阶层户数与土地百分比的平均数比较如下：

阶层	户数		土地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地主	3.6	2.4	29.5	13.5
富农	7.2	6.7	21	17.5
中农	28.4	38	29.5	42.5
贫农	54	47	19	22.5
雇农	5	2.5	0.8	0.6

说明：其他阶层如小工商业等未列入，故百分比的总和均不及一〇〇。

由此可见，在战前，不及户数百分之四的地主，约占土地百分之三十（华北旱地区域地比较分散，按全国范围的统计，地主几占有土地一半，至于产量，因地主所占多肥地，则将超过一半），占户数约百分之九十的中农和贫雇农，所有土地却不及一半（产量更少于一半）。而现在地主的户数和土地都大大减少了，中农以下阶层的土地则增至百分之六十六。两相比较，就可看出两个社会中——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今天新民主主义社会，农村阶级结构的变迁是多么大！

具体说来，地主的户数比战前减少约三分之一，土地减少一半多；富农没有基本的变动；中农户数增加三分之一强，土地增加五分之二以上（滨海中农增加比例最少，如按四个地区统计，则两者增加比重更大）；贫农户数约减少五分之一，土地约增六分之一；雇农户数减少一倍。上表只是一个概括的数字，仅足表明这个变化的轮廓。其中材料又大多是到一九四二年或四三年为止，现在中农的比重会更大一些。

两极缩小，中间扩大，这就是今天解放区阶级关系变化的基本规律。

下面进一步谈谈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具体情况，及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在理论上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连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也如此承认（国民党政府土地法第一七七条明明载着：“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值得大大颂扬的便是“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

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八年来，这一主张在解放区已真正变为事实：不管程度如何，快慢如何，整个地主经济都是在逐渐分化和削弱，农民已从封建土地关系上获得解放。下面是五个地区地主的户数与土地的下降情形(百分比)：

地区	户数		土地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晋绥	3.8	2.4	30.3	9
北岳	2.42	1.91	16.43	10.17
太行	2.8	2.1	26.3	12.9
盐阜	4.5	2.1	46.8	20
滨海	4.65	3.46	26.95	15.66

晋绥与盐阜两区，原来土地比较集中，因之地主户数和土地都减少一半以上，其余则均未超过一半。地主经济下降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减租减息政策和合理的累进负担政策的执行。他们原有的地租和高利贷两大收入，受到限制，大大减少了，一切超经济剥削也都取消了，他们不可能再将负担转嫁与农民了（地主在旧社会曾是负担最轻的阶级）。其次是战争原因，“扫荡”中，敌人的直接掠夺破坏，曾使地主历年的积蓄和工商业经营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收入减少，支出增多，加以敌人的破坏，战争的影响，又带来第三个原因：生产消极。不少地主为了避免减租，逃避负担，预防战争中的损失，就大量出卖或出典土地，紧缩经营，减小目标(还采取分家等办法)。其他尚有奢侈浪费等较次要的原因。

党的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削弱封建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发展，并不是马上要消灭封建经济。所以党和政府曾极力注意提高地主的生产情绪，如奖励他们投资工业和合作事业；在不影响农民的生活条件下，允许他们抽回土地雇佣经营，等等。

因此部分地主已自动（或被迫）转变其生产经营方式。例如一九四二年秋调查，北岳中小地主约有五分之三转为富农。最近两年，这种比重当更大。目前解放区的中小地主，参加劳动的相当普遍。不少有资金的地主已转向工商业和合作事业。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减租减息以后，地主感到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的利益不大，就会利用土地和资金来进行资本主义性的生产，以及自己参加劳动。

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富农经济一般说是停滞的和下降的。北岳、太行、盐阜三地区的材料，富农的户数和土地都只有很小的下降。如北岳，户数由百分之八点四五减到百分之七点八八，土地由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三减到百分之十九点五六。晋绥下降较大，户数由战前的百分之十点八减至百分之八点八一，土地由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减至百分之十七点五。引起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敌寇的破坏。富农多经营作坊与商业，他们的房产、工具和各种积蓄，被敌人焚毁劫掠，因而损伤了元气，或竟一蹶不振。如晋绥下降户中，由于这种原因的占三分之一。其次因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封建成分，兼营高利贷和出租一部分土地，在减租运动中，他们一时的部分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的削弱和根绝，会同样使富农轻松起来。最近两年特别是去年以来，由于军事方面的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变工互助的提倡，劳动政策偏差的纠正，累进负担扣除农本，特别是吴满有方向的提倡，富农经济的发展便通畅起来了。北岳早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富农经济即开始回涨与上升：户数由四一年的百分之七点七八到四二年的百分之七点八八，土地由百分之一九点二五到百分之一九点五六；阜平胡顺义村，去年新增富农七户，龙华葛存村去年新增富农五户。说明这一趋势比较完整的材料，有滨海区以及涟

东县三万四千多户的调查(注二)。

滨海区调查时间是一九四三年末，户数由战前的百分之五点八九增至百分之六点七五，土地由百分之一六点六九增至百分之一九点三二。涟东县富农户数由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六点五增至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八点五。这种变化，还有另外的例子足以作证：太岳阳城固隆村，一九四三年富农三十三户，去年竟增至七十七户(注三)。

中农经济自然更是有比较大的发展，已成为目前农村中欣欣向荣的强大经济力量（有相当一部分中农在向富裕中农发展，也有一小部分上升为富农)。下面的统计说明了这一事实(百分比)：

地区	户数		土地	
	战前	战后	战前	战后
晋绥	25.7	44	27.5	9
北岳	35.42	44.31	41.69	49.14
太行	35	48	31.4	47
盐阜	19	27.7	17.8	28.9
滨海	26.56	27.31	30.18	37.26

在北岳、太行和晋绥，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的一半。土地比重大于人口比重。在劳动力的占有方面，以北岳为例，中农拥有全部人力的百分之四十八，雇佣劳力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占有半数以上的骡马驴和约百分之八十的牛。

中农的向上发展，无疑是由于新政权各种政策实施的结果：租子比过去交得少了，负担减轻了，加以各种奖励与帮助，于是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多开荒，多种地，多施肥，种棉，纺线，经营副业，光景是越闹越好了。但也有极小部分中农下降的，这主要是由于敌人破坏和劳力减少所致。

占过去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绝大部分靠租入土地的贫农，

是租佃关系中的主角，又是欠债最多的阶层，封建的枷锁曾将他们束缚得最紧。贫农的户口比重一般大于土地比重三、四倍。现在他们从地主的火坑中跳出来了。贫农上升为中农（还有极少数上升为富农）的户数一般虽只有五分之一，但在经济上他们都向上发展了，"翻了身了"。他们的土地大大增加了（在地主抛出土地时，许多贫农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卖掉而去买地），人口比重只大于土地比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贫农，在经济上今天已接近于中农的水平。贫农这个阶层无疑将一天天缩小。

贫农获得发展的原因，与中农是相同的，政府对他们的照顾更多。特别在彻底减租减息之后，他们的劳动热忱更加提高，敌后不少劳动英雄都是从这个阶层产生的。

雇农（以及手工工人）的经济大部上升或向上发展，一般没有下降的。这里不详谈了。

总结以上阶级关系的变化，有三种情况：第一是上升。雇农、贫农和中农。第二是下降。主要是地主。富农一九四二年以前是停滞或下降，以后则开始恢复和上升。第三是转变生产方式，地主及其他阶层中之少数，如由从事农业转为工商业；敌人大破坏之后，劳力不足，将地出租等，属不正常的现象。可见占农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如今在经济上都获得发展或获得发展的充足条件了。

关于引起阶级关系变化的原因，最重要的当然是减租减息政策及其他各种正确政策的执行。如果执行中发生某些偏差，则易引起暂时的不正常的变化；政策未能贯彻的地区，则变化迟缓。由于劳动积极，以及发展植棉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经营的好，一般经济上升最快，富农和中农最具备这些条件。引起下降和阻滞上

升的最主要最普遍原因，就是敌人的破坏。敌人破坏掠夺严重，必然引起经济急剧下降和不能迅速上升。只有对敌斗争的胜利，才能保护人民进行生产，改善生活。而战争中人力和畜力的减少（敌人三光政策、疾病死亡和兵役等），也是直接影响各个阶层经济不能更快发展，或促使下降的普遍原因。

今后解放区农村中阶级关系变化的趋势，无疑将是上述规律的继续：地主经济日渐削弱，他们将逐渐改变经营方式；富农经济会继续发展；中农经济更加上涨，优势日增；贫、雇农必逐渐大量涌入中农队伍。

中国解放区执行了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其他各种正确的财经政策与社会政策，于是广大农民从经济上（以及政治上）获得解放，积极参加抗战，从事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建设，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地主虽然暂时受了些"损失"，但大敌当前，不动员农民抗日，他们自己就连生存也成问题，特别是敌占区地主普遍破产的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道理一般地主都有所认识，许多开明的地主士绅已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我们的政策一方面削弱地主的封建剥削，但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以调节阶级矛盾；而更重要的，乃在照顾地主阶级的将来，这就是帮助他们逐渐自食其力，改造他们的经济生活，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

减租减息政策的彻底执行，能够向土地改革的目标前进，这已为今天将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的实际所证明。毛泽东同志已向全国宣布："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下去，首先在全国实行减租减息，然后寻找适当办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抗战胜利之后，新民主主义政权如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至

少在已经建立的广大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现行许多正确政策领导之下，中农贫农以及富农的经济，自会得到更顺利的发展，无疑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新式的繁荣而富足的农村。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注一：本文材料全属解放区的巩固区。北岳材料包括十三个县、三十五个村，系北岳区党委作的调查，时间一九四二年秋。太行材料包括巩固区二十多个县、一百五十多个村，系太行区党委作的调查，时间大部分在一九四二年和四三年，其中战前数字为二十二个县、一百五十九个村的统计，战后数字为十六个县、一百四十八个村的统计。晋绥材料包括兴县二个村、临县三个村，系晋绥分局所作调查，时间一九四四年六月。盐阜材料见四月九日本报骆耕漠文。滨海材料包括莒南、赣榆三个区、六个村，系山东分局所作调查，时间一九四三年末。

注二：见骆耕漠文。

注三：太岳参议会行署牛主任报告，见三月三十日本报。

湖南农村的状况和特点

十二年来的变化

抗战后直到解放前的十二年，湖南的农村象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一样，有过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更加集中，使用却更加分散；封建剥削更加残酷；出现一批新兴的当权地主；加以天灾人祸，蒋帮无限劫掠，农村经济达到空前破产的程度。

在抗战前，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趋向之一，是地权日渐集中，但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抗战八年期间，由于伪法币的贬值，大批商业、官僚和金融资本都趋向于土地投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兼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湖南虽不如四川之凶猛，但当时处于湘北前线的各县，也都有过土地争购的浪潮。一九四〇年以后，滨湖各县强挽的堤垸即达四十八个。解放战争以来这几年，蒋帮掠夺更紧，又连年灾荒，曾引起地价下跌，土地兼并一般趋向迟缓。但农民被灾荒逼迫，抛售仅有的小量土地，在某些地区也更造成地主垄断地权的机会，如湘南、湘中各地灾区，以“石谷石田”强迫收买农民土地者，仍比比皆是。解放前后，人心待变，土地买卖渐趋停顿。

在抗战前，兼并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和少数军阀官僚分子；这十二年来，换了一批新的人物，他们是国民党的大小党棍、官僚、军阀和商业投机家，他们依靠政治权力巧取强夺，又能在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以进行土地的吞并。在乡村中，新兴地主当

权派，多是几位一体的人物，即乡保长、党团分子、民意代表、圈子大爷，又兼投机商人，有的更兼土匪恶霸。这些人往往就成为农民起来后的斗争对象。一般不会兼营投机商业、不直接参与反动集团的中小地主，有不少也受地主当权派的压迫而经济日渐下降。同时，由于土地与粮食的投机比商业更少风险，也有许多城市工商业者获得盈利时，不作扩大经营的打算，抽出部分资金下乡买田，他们认为生意不如田地牢靠，而且还可借此取得银行、钱庄等放款、挪借的信任。这种工商业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在今年三、四月减租退押运动中，曾全面暴露出来。

蒋帮日益加紧赋税的掠夺。整个地主阶级为了转嫁负担，保证收益，对农民的剥削当然也日益加紧。首先是无限制地抬高地租。租额增高五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不等；分租制者至少提高一成。押租也是普遍提高，或者追加押租；原来不收押租的地方，也要交押。此外高利贷的进攻也更加普遍，谷贷、青苗、会谷……辗转盘剥，农民负债户剧增，一般达农户总数一半左右。地主更乘农民之危进行夺地。其他额外剥削、地方捐税转嫁等，也比过去加重，农民代地主缴纳征实，更要负担全部运输上的消耗和化费。

地主为了保证加租，租佃期限日趋缩短，退佃成风，农民使用土地，毫无保证，随时有被撤佃的可能。租期短促，于是更加形成了土地使用的高度分散。一方面，地主的土地分散出租给许多农户耕种，如邵阳靖合乡有一个二百石谷田的地主，佃户多至十八人，有的地主在买田时就故意买得分散，以便多招佃户。另一方面，一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如作四、五十石谷田），却有六、七个东家。农民在押佃重重剥削下，自然无法安心生产，更谈不到发展生产。

至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特别是抓壮丁和地方勒索的残酷，更是众所周知。人祸带来天灾，天灾伴随人祸，十二年来，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连续性与惨重程度，实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灾荒饥馑已成为农村常态，湖南更是连年水旱，农村元气耗尽，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劳力与畜力大大减少，生产急剧衰落。据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统计，湖南荒地达耕地百分之四十。另一伪粮食部的统计，稻谷产量比常年产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高度集中

湖南农村最显著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前述土地的高度集中。

中国南方的土地一般比北方集中，湖南在南方各省又较突出，比邻近的湖北、江西集中的程度都高，根据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在湘阴和丰乡四个保（代表滨湖区）、邵阳震中乡三个保、益阳一个保（代表山区）的较可靠调查，农村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情况，有如下表（百分比取约数，小数点以下数略去）：

阶　　级	人口百分比	土地百分比	每人占地（亩）	公田百分比
地　　主	3	47	19	8
富　　农	5	13	5	
中　　农	30	26	2	
贫　　农	39	7	0.2	
雇　　农	10			
其　　他	13			

上表统计虽较可靠，但仍只能说明湖南土地关系的一个基本趋势。估计实际情况与此有若干差别，因地主、富农一般瞒田较多，如将土地最集中的滨湖区平均计入，则全省地主占有土地当更多。

湖南农村中公田（官田、族田、寺田、学田等）特别多（一般估计至少在百分之十以上，表中百分之八肯定是低了的），实际上为地主阶级（和部分富农）所垄断，因此上表约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占有土地实达百分之五十五。据抗战期中华北各解放区的调查，华北一般山区，地主约占土地百分之三十。湖北的调查材料（二十五个县三十九个村），地主占人口约百分之三强，占有土地约百分之四十左右。由此可知湖南土地集中的高度。

湖南各县土地分配的情况是很不一致的。按全省范围说来，可以分作滨湖、丘陵、山地这样三种地区。滨湖区域土地最集中，如最典型的湘阴，全县地主只占户数百分之二左右，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七十一。湘阴和丰乡四个保，地主占人口百分之三，土地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平均每人占地约达八十亩。滨湖各县都有所谓“洲土大王”，据国民党省政府一九四六年“滨湖洲土视察团”的调查报告，很不完全的查勘，“拥有一万至七万亩洲土垸田者，有陈浴笙、王一华、聂士达、汤冬生、陈肃涛、杨丹青、张经、杨传清等二十余人”。其次是丘陵地区，据长沙黎托乡五个保、益阳一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百分之四，占土地百分之四十五（公田在内），大体可作为丘陵区的代表。山区较为分散：湘西等地山区，地主一般占地约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据邵阳三个保调查，地主占人口百分之四，占土地百分之四十一（公田在内）。此外，在经济、交通发达的城市附近（如长沙、湘潭），土地比较集中。偏僻山区比较分散。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土地也比较分散。

现将省委政策研究室所调查的三种地区，各阶层人口与土地占有的百分比，制表如下（取约数），以供参考：

地　区	滨湖区		丘陵区		山区	
阶　级	人口	土地	人口	土地	人口	土地
地　主	3	60	4	33	3	27
富　农	4	8	4	20	5	14
中　农	34	26	28	26	23	26
贫　农	42	4	36	8	44	18
雇　农	9		5		16	
其　他	8	1	20	1	9	1
		公田 1		公田 12		公田 14

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地主占有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好地（这是全国一致的规律）。湖南的土地除一般好、坏之外，尚有田、土之分（土只能种杂粮，且产量少，一般产值只能抵田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地主是田多土少，而贫农则是田少土多。

湖南的富农经济是并不发达的。据前表，富农占人口约百分之五，占土地约百分之十三，即富农占有土地的比重，比人口的比重约高一倍半。富农占有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租，如邵阳霞中乡十六保，富农出租地占其所有地一半，当然这是较高的比例，不能作为代表。佃富农均占有一定的数目，上述丘陵区调查，佃富农约占富农人数四分之一，山区和滨湖区约占七分之一。佃富农占有的土地很少。富农经济不发达的最主要原因，是湖南租佃制度太发达，地主收租比自己经营划得来，收益可靠些。近年来

由于粮食值钱，也有地主收回部分土地自己经营的，但不普遍，总数也有限。

中农的人口比重与土地比重相当，这与过去华北和其他各地情形差不多。中农中佃中农人数很多，据上述调查，大约占中农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滨湖区佃中农数超过自耕中农数（附带说明：后表滨湖区中农人口高至百分之三十四，或是由于将若干上贫农错划成佃中农了），丘陵区约占自耕中农三分之一以上，山区约占五分之一。佃中农占有土地当然很少。因此一般自耕中农，每人不只占一个人土地。滨湖区中农平均每人占地在四亩以上，丘陵区、山区一般均不及二亩。

总的说来，百分之三的人口，占了百分之五、六十的土地；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土地。到过湖南农村的人，并不需要作多少调查，就会感到土地是如何集中，阶级划分是如何明显。有人说，湖南没有什么富有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只有中产阶级，这自然是很可笑的荒谬的说法。

贫雇农赤贫户多

湖南农村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赤贫户特别多。毛主席在大革命时就透彻地说到这种情形："据长沙的调查：贫农占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七十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本，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外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占七十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分之五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当年的调查仍旧

概括了今天湖南农村的这个特点。今天的情形与大革命时长沙地区相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前表，贫农人口为百分之三十九，雇农为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三中，多为手工工人、小商贩、担脚的和根本无职业的赤贫户等。因此雇农和赤贫户在农村中实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全省贫雇农、赤贫户总人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或达百分之七十。因为在土地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贫雇农、赤贫户特别多，如滨湖垸田中佃农一般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将此平均算入，全省贫雇农、赤贫总数就不会止于前表的百分之六十二。广大的贫农占有土地是极少的，只百分之七（华北调查是百分之十九，湖北百分之二十）。雇农赤贫"既无土地，又无资本"。

造成贫雇农、赤贫特多的原因，基本上自然是由于封建剥削厉害，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历年天灾人祸所致。抗战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贫农下降为赤贫者，显然日益加多。十二年来，湖南壮丁被蒋帮征调者，据国民党省政府统计，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约一七八万余人，其中虽有部分逃回，但总数还是惊人的；近年来因灾荒不断，离开农村的人口也日多；同时农村人口死亡率很大，由此减少的巨量人口，自然主要都是贫雇农。因此，前表贫雇农、赤贫统计仍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亦可说明中农下降贫雇农日益增长的趋势。

贫雇农既不能靠耕作糊口，便多另求生活出路，所谓作田只是"赚间屋住，留个窝窠"而已。他们辅助生活的办法多从事副业生产，学习手艺（泥木匠等），打零工、长工、挑脚、抬轿、作土种菜等。女人也尽量纺纱、积麻、拔野菜，以资补助。但由于战争损毁、交通断绝等原因，副业及手工业都很难维持，贫雇农一般无法保持最低的生活，有的逃亡觅食，有的城市求生，有的

便只得在饥寒疾病中走向死亡。湖南农民的血泪和惨苦，不到农村去看看，是难以逆料的。

这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雇农大军，就是今日农村一切改革的主力。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也最为迫切。因此如何解决贫雇农特别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赤贫的土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封建剥削异常残酷

第三个特点，是封建剥削异常残酷。许多人说，湖南地主的剥削不如北方重，这是根本不对的。

南方各省的租佃制度，历来比北方发达。据抗战前调查，佃农与半佃农合占全体农民的比例，北方十省为百分之四十，南方十二省为百分之七十；湖南为百分之七十七。湖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这种租佃形式的剥削，表面上似乎比华北某些劳役形式文明些，而在经济实质上更厉害、更残酷。最突出的便是野蛮的押租制度。这是北方一般少见的。湖南除了湘南及湘西少数地区外，押租制度普遍存在。押租是佃户对地主除地租外的一种额外负担；本质上，这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没有这笔保证金，佃户就没有资格列入地主的农奴队伍。地主利用押金，更便于垄断土地、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来束缚农民。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至永远还不清。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叫做“平批平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批重租”等，这不过是地主因时制宜便于剥削的花样而已。农民如不能一次将押金交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内扣交，有的地主更将押金再以高利贷放给农民。交

给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规定，退佃时应全部退还，但地主总是想尽一切奸诈手段，七折八扣，直至化为乌有。

地租以额租最普遍，分租不流行。额租一般是按租约上书写的出租田的产量，主佃对半分。由于押金轻重及其他原因，又有主佃四六、六四、三七、七三等不同形式；不缴押金田地，收获多东七佃三，也有东八佃二甚至东九佃一的。然而通常租约，额定产量多高于实际产量，因此名义上是对半，实际上地主收的成数要高过定额。如果以押金利息计入地租，即实际地租就比额定租率更要高得多。押租愈重，实际地租愈高。

至于其他的额外剥削，简直没有办法写得清楚。今年二月四日益阳专区的湘中日报，刊载一篇统计材料，地主的剥削花样有一百二十种。以下举出大家较熟悉的几种。例如虚报田数，长沙叫“写冒庄”，宁乡叫“纸上开田”，就是租约上的田数比实际要多，所以有的租额名义轻，而实际上很重。例如欠租转为高利贷行息，以牲畜什物作押。例如“粪厚加租”，佃户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加租。例如水租，佃户用地主塘里的水，每担田要交多少谷租。例如指仓交租，租谷要送到地主指定的地点去，耗费劳力很大。例如交租“车谷”时，风车重绞，每石要多车四五升。例如送礼（副产物剥削），送租鸡、租鱼、租肉、稻草、豆子，山里有什么就要送什么。例如请酒，请“春酒”、“新米酒”、“看禾酒”、“写批酒”。例如大斗收进，小斗借出。例如无偿劳役，抬轿、舂谷、挑水、晒谷、打鱼、修房、红白喜事，每年少则十几工，多则三四十工。……这些额外剥削，农民讲一天一晚也讲不完。

高利贷在湖南是很普遍很复杂的，这十二年来特别残酷，这里不多赘述。

在这样严重的残酷的剥削下面，农民往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正产收获都被压榨去了，不但难以进行再生产，连生命都无法延续。这就是农村破产，一切春荒、夏荒的基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还要长年吃糠、吃草的根本原因。

统治手段毒辣

湖南地主阶级在政治与思想上统治手段的毒辣，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他们既有北方地主野蛮的特性，又有南方地主狡猾的特性。他们利用衙门保甲（政权）、公私学堂（学权）、祠堂宗法（族权）、团防土匪（兵权）、庙宇会门（神权）来行使统治权力。近十二年来，更是借国民党的党、团、参（议会）、特（务），将农民束缚得紧紧的。

农村的乡保长，不是地主亲自出马，必由他们幕后操纵。象师长赋闲时办团防，六七十岁的猪仔国会议员争做保长，这在别省都是很少见的。为了掌握学田公产，搜刮农民油水，湖南地主最善于采用办学校、办善堂、修桥补路、积谷“防饥”这一套名利双收的办法。湖南农村的祠堂、庙宇和学校特别多，这都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好工具。伽蓝、观音帮地主办了不少事情。祖宗族法恰好迷糊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读书先生”在农村分外受人尊敬。湖南地主的会打官司、善于告状，也是特点，至于圈子会门，扶乩立坛，更不知欺骗笼络了多少农民群众。

湖南地主阶级的野蛮统治，在滨湖和湘西表现得最为突出。滨湖是“强管洲、霸管水”的世界，谁有权有势，谁就可以占地挽垸。争夺洲土时，佃户被双方“洲土大王”驱使，互相残杀，最野蛮者有将对方佃户抢来杀掉，用锅子煮人肉吃的。湘西土匪恶霸地主，自筑寨堡，自设关卡，自立公堂，烧杀劫掠是家常便饭。历史上湘西流行的说法是：“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

所以有人形容湖南地主阶级，说他们“能文能武”、“能屈能伸”、“半新半旧”、“亦官亦商”、“舞文弄墨”、“好事生非”。“上承曾左衣钵，下受蒋匪薰陶。”确实是一点不错的。

解放后，地主阶级的阴谋花样极多，办假农会，勾结土匪，挑拨离间，请客送礼，利用家族，施美人计……有些干部就上过当。

与地主阶级这种残酷剥削，毒辣统治，以及蒋帮劫掠镇压相对称的，是具有革命传统的湖南农民，他们潜在的革命热情从未消退，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十分迫切。这在解放后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减租和生产救灾等运动中，都热烈表现出来。这些情形就不多说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热河土地关系概况

热河的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封建剥削异常残酷，土地惊人集中，农民长期过着地狱生活，这主要由于历史的、民族的（注一）、以及敌伪长期统治等原因所造成。

根据现在所得到的一些材料，最令人吃惊的，便是在热河许多地区，土地竟如此集中：据不完全的材料估计，约有四分之三的土地握在地主手中；寸地无有的农民，占人口很大比重，贫农雇农一般占总户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种情形跟全国或华北相比较要严重得多。按全国范围的统计，地主约占土地之半；华北旱地区域的地主在战前约占土地百分之三十，贫农雇农户数平均不超过总户数百分之六十（注二）。

让我们来看看热河土地集中最典型的一个县——围场土地的分配状况。据伪满"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敌伪官方公布统计：

	户　数 （对总户数%）	占有土地面积 （对总面积%）
无地者	38	
五亩以下	7	0.6
十亩以下	6	1
廿亩以下	9	3
卅亩以下	10	6
五〇亩以下	14	15
一〇〇亩以下	10	19.4
一〇〇亩以上	6	55

依上表核算，无地的和三十亩以下的农民（主要当为雇农和贫农以及少数中农），占户数百分之七十，仅占土地百分之十点六；三十亩至五十亩者（主要当为中农及一部分富农），占户数百分之十四，土地百分之十五；而五十亩以上者（地主及部分富农、极少数中农），占户数百分之十六，而占土地竟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如以五十亩（实际上热河富农多在百亩以上）为界，则占户数百分之八十四的农民只占有土地四分之一。这个统计距今已八年，而这八年中敌伪统治最残酷，土地当更集中，农民的户数、土地，同地主的户数、土地，无疑正成反比增加。

再以承德县下板城为例：地主占人口百分之一点九，占土地百分之六十六点九；富农人口百分之一点二，土地百分之四点五；中农人口百分之十四点五，土地百分之十三点八；贫农人口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土地百分之十点四四；无地雇农及赤贫等人口百分之五十九点一。贫农雇农合计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点五，占有土地仅百分之十点四。这种比例多么骇人！承德县药王庙情形大致相同：地主富农占人口百分之八点一，占土地百分之五十七点五；中农人口百分之十一点二，土地百分之十点一；贫农以下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土地仅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又郭仗子村百分之八十均为佃户。喀喇沁右旗的王爷府村，十家蒙汉大户占有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二。热北林西庙前营村，贫农以下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七，仅占土地百分之十二点五；地主占人口百分之六点四，占土地达百分之七十二点八。平泉黄土梁、天义、巴里罕三个区调查，贫农以下户数占总户数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种土地集中地区，大地主比较多，在围场县：有名的“鼎丰裕”，相传九沟十八岭，平地二百顷，据说从围场到北平，可不吃别家的饭，不住别家的房，沿途都有他的土地和房屋（现在他

家究竟有多少地，谁也弄不清）。清泉沟的左天望、三区的孙西、齐晓亭，都有地一百来顷。三五十顷、一二十顷的地主很多。三、五顷者则每村都有。一区的乌拉沟，居民约一百户，都是“张四皇上”一家的佃户。袜子沟耕地八九十顷，都掌握在三家大地主手里。就在大地主少的地方，如一区腰站村居民一百三十余户，佃户仍占九十八户。

平泉、承德、凌源等县大地主的山地及平地也多用山沟计算，二十里、三十里不等。承德义聚泉有地一百多顷。平泉张鹏云有地二百顷；其他有三家，各有地一百顷上下。宁城街两大户有地六千二百亩。凌源山咀子齐家有地七八十顷，佃户达一百多家。有些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多为交通与商业发达地区，如赤峰，及热东铁路、公路沿线某些区域），则多经营地主与封建性较重的富农。赤峰初头郎村首户王家，雇长工五十多人；二户孟家，雇长工二十八人。平泉八里罕孔家，雇长工三十六人。雇长工十数人、二十余人的经营地主，在热河非常多。

热河的土地为什么这样集中呢？大地主为什么这样多呢？贫农、雇农的数量为何这样巨大呢？

这主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清朝封建地制的遗产，即所谓“旗地”问题而来。围场县昔为森林密茂之区，清康熙辟为皇帝行狩围场，同治年间始招佃开垦。县境中部、西部大部分地区，光绪末年才完全开放为屯垦地，居民系从河北、山东、山西等省移来，种地的向“公家”交租。另外清初“朝廷”曾划边墙（长城）外数百里范围，“授赐”其皇族、退伍旗军及功狗，驱走游牧为生的蒙民，强迁汉人，蓄为农奴，垦荒种地，向“庄头”依约交租，通称“旗地”、“圈地”或“皇粮庄头地”。据说此种“旗地”，滦平共有四屯，承德、平泉共有八屯，沿长城外各县都多少存在。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间，政府曾颁令取消此种旗地，作为“官产”，实行所谓“旗地改民”，分期拍卖（定价二元——六元一亩），且美言只准种地者“挂”地。但实际上此种“旗地”，绝大多数被有钱有势的人和原“庄头”以各种欺骗恐吓的办法抢“挂”去了。（被“挂”去者现称“挂地”）如承德商会联合富有者以“同庆堂”名义，“挂”了一百多顷，甚至有的农民托地主领照，地主将地“挂”在自己名下，无钱无势的农民就变成这些人的佃户。“旗地改民”执行中的弊端遗留至今，纠纷极多。且“挂”地后，稍一欠租，“庄头”就随意夺佃。现在农民都一致要求收回“挂”地。

热河的封建剥削特别残酷，这是土地集中的根本原因。地主的土地除原有“圈地”或“挂地”者外，差不多都是以高利贷、滚利盘剥等办法向农民兼并的。租额一般达收获量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有高至百分之百者（也有些“旗地”仍为百分之五十）。遇上年成不好，死租往往超过其收获量。这里可举凌源山咀子最近被斗争的大地主齐家若干佃户去年的租额，以见一斑：

佃　户	租地	每年收获	租额	去年收获	去年交租
金常贵	5亩	1.5石	1.0石	1.0石	0.9石
金国恩	3亩	0.8石	0.7石	0.4石	0.7石
王兴方	10亩	5.0石	3.6石	2.2石	3.6石
么金玉	10亩	5.5石	2.7石	1.1石	2.1石
王文科	18亩	7.0石	4.5石	1.8石	2.1石
邢占才	12亩	7.0石	4.2石	1.7石	2.9石
王保均	7亩	2.5石	2.1石	1.0石	1.4石

围场佛爷道地主丰益堂的山坡地，每亩地丰年也不过打一斗粮，地租每亩为七升。佃户黄金祥，前年打的粮不够交租，地主把他的二十四只羊，都赶了去；王汉乡交不够租，一头种地的大叫驴，也叫地主给拉走了。

由于近七、八年敌伪勒索加重，地主便向农民压榨更紧，任意增加租额。如承德双庙村，张家佃户租额："康德"五年是三石五，六年五石五，七年随增至二十石，反被地主抽回十九亩。大斗收租，租地以少顶多（如七八分地当一亩），地边、地沿也算亩垅，而且普遍流行押租，"民国"初年每亩押租三、五元至十元白洋不等。

此外，热河各地盛行"傍青"，这是高额地租、高利贷和无偿劳役相结合的一种很残酷的剥削形式。其中又分"里外傍青"、"大小傍青"、"线青"等。"里傍青"（即华北一般"夥种"与"安庄稼"）是地主除土地外供给耕牛、种子、农具等。收获后，扣除牲畜、饲料、种子（要算利）花销等对半分粮，或四六分（佃四），草秸杆完全归地主。另外规定一定数量的劳役，吃地主借粮则定以高额利息。"外傍青"（即活租），地主除土地外什么也不供给，收获后，粮食对半分，草一部分归佃户。另外也规定一定数目的"官草"和"劳役"，吃借粮也是高额利息。"傍大青"是几户农民集体向地主傍青，地主供给土地、耕牛、农具等，分粮等与"里傍青"同。

傍青的无偿劳役特重，都规定有一定的"官草"、"官柴"等。如有的规定每十亩地要作四个"官工"，随叫随到；每十亩地要交四十个"官柴"（每个约十斤）。每十亩地还要交一百个羊蒿子（地主喂羊的草）等等。傍青户每年为地主的无偿劳动不下两三个月。围场五区佃户张万桐种张家五十五亩地，其退租比例为：二五减租二二点二斗，减息一七点五斗，劳役工资三十斗，大烟租九十一斗，由此可见高利贷和劳役剥削远超过一般租额。

借粮利息一般是"一米三谷"（一斗米还三升谷），利高的是"一个两"（借一斗还两斗）。傍青的借粮秋收时一定要还清，且不管时间长短需同样付利。不少地主借粮折钱（春季粮贵），秋收以粮价

(粮贱)折粮，这样算来算去，许多傍青户辛苦一年，偿还债务后，无一粒过冬粮，甚至倒欠地主。傍青户对地主负债往往永无清日，生活比农奴还不如。

围场六区傍青户刘殿树在给地主拉柴时，腿被大车压坏，不能做活，为了买药和雇人种地，把仅有的两只耕牛卖掉花光，还欠下工账，秋收后粮都给了地主还不够，两口小缸、一个猪槽都被夺去，地主将他赶了出来，结果残废讨饭吃。

关于高利贷剥削，上面只讲到傍青户的情况，就其范围来说，比租佃关系更为普遍；就其剥削程度来说，往往使得农民破产。在经营地主与富农占优势地区，多采取此种剥削方式，负债户很多。平泉黄土梁十区调查：四个村一百一十六户中，借债者四十八户，占户数百分之四十一，借债宗数一百四十五件。另外承德县孤山村共五十九户居民，即有五十六户负债。又双庙村八十九户，三十八户负债。债权人为地主与富农(也有个别富裕中农)，负债者则绝大多数为贫农与中农(无地贫户没有资格借贷)。

早年借贷一般通行所谓"钱三粮五"(即每月钱利三分，粮利五分)。但到伪满时，都改为按粮行五分利。计利方法上的残酷剥削，有"大加利"，即十个月本对利，甚至有加一五、大加二的，有"月铿子"，如借一百元，付九九元，月利三分或五分，每月又需多付一元(补足一百元)；有"听现价"，即粮贵要粮，钱贵要钱，等等。

为强夺农民土地房屋(借款借粮需比原本高四、五倍至十倍的土地房屋作抵押)，重利盘剥者用得最广泛的手段有以下诸种：有"三年房子二年地"，即抵押房子的借款三年付不出利，土地借款两年付不出利，即实行"过搓"房、地使用权归债权人。最厉害的是"老虎牌子"(即限期文书)，规定一定期限，如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即房、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归债权人。期限有短至一个月的，因其凶

猛如虎，故名。有“指地当租”，将出押地作为对债权人的“当地”，负债人照付息办法交租，如租额不能按期付清，该项“当地”即归债权人所有。有“死契活口”。契约上写成死契买卖或典当，连本带利作为典价，契约上贴一小条子注明何时偿还本利，过期就把条子撕去，地权即归借方所有，等等。“滚利剥削”，即在约定期间付不出利息时，就利上加利，将其与原本相加，作为土地价格，写成死契。

中农、贫农的破产下降，主要是由于高利贷，农民中流行语即“‘牌子’压死了”！甚至有的本利还清，“牌子”还押在债权人手中，作为压迫工具。黄土梁区地主李树梅在除夕日将“牌子”压在石磨下，诅咒穷人永不翻身。

其次原因便是土豪恶霸将一切负担转嫁农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粮从地出”，官官相护，自古皆然。日本侵占热河后，掌握伪政权的地主恶霸将赋税花销一概落在农民身上。经营地主种地不拿粮款，隐瞒土地（黑地）现象最为普遍。伪满时敌伪曾丈量一次土地，一村只丈两三块地，其余听村长口说。如围场一区伪甲长陈连举经营五顷地，纳科（出赋）地只五十亩，于是地主日富，农民日穷。

此外敌伪的残酷统治更促使土地加速集中。伪满政权中直接统治老百姓者为村长、甲长、警察署长、协和会长以及特务等等。在伪满时代，没有一定的财产、“资格”是不能当村、甲长的。这些人藉仗敌势，与地主恶霸和土匪结合，害命谋利，强霸土地，无恶不作。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过去无地或很少地，在伪满时代曾大发横财，群众恨之入骨。他们现在是群众斗争的首要对象。因之，大多数清算斗争中常联系到土地问题。这在近两三月来冀热辽日报上登载极多。如已伏法的凌源大恶霸韩白英仓父子，即曾

霸占土地数顷，与盘据建昌的土匪于大川勾通一气，残害当地老百姓。特务恶霸，过去又无不利用烟干地逼迫农民让出土地。日寇在热河强种大烟（种量为伪满之冠），以地好坏，规定产量，而规定量往往高出产量甚多。收烟干者百般挑剔，故意为难，农民最怕缴烟干。每逢收烟干时，农村中一片吊打哭号之声。农民都愿抵销土地，代缴烟干。于是大量烟干地便落入特务强豪之手。实际上他们不一定再缴，即缴也为数有限。此外日寇修兵营、修路、开稻田、以至为官员盖房舍，特别是集家修"部落"，又不知侵占了老百姓多少土地！

在上述诸种原因所造成的无法无天、人间地狱的环境中，热河人民真是痛苦极了，贫困极了，死亡随时威胁他们。现在老乡们见到下乡的干部，总是拉着诉说他们过去的痛苦日子。他们说："八路军再不来，不知要冻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呵！"往年一道山沟里，一冬冻死二、三十人是平常事。青黄不接时，农民两、三个月不知米味是平常事。土豪恶霸打死个把两个人，是平常事。农忙时，雇工累得几天几夜不能合眼，解手拉不起裤子，就躺倒睡着了，也是平常事。"穷人们在刀尖子上活着"！豪强恶霸的口头禅是"不杀穷人不富"。

以上是热河土地关系和农村各阶层情况一个简单的事实概要。材料有限，且零碎，只能当作一种参考的资料，其中不当之处，尚望读者指正。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于承德。

（《北方文化》一九四六年第二卷第二期）

注一：指满汉土地关系。因篇幅关系本文未加述说。

注二：指晋冀区十三县、太行区二十多县统计平均数，引自拙作《农民在解放中》一文，载去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我国铁路建设之今昔

一部列强交通侵略史

我国铁路建设始自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争以后，当时列强均纷纷争夺在华铁路修筑权。到一九〇五年止，这七年中，全国敷设路线共约八千公里，其中东清(中东)、滇越、胶济三路，完全由俄、法、德三国直接投资承筑，京汉(平汉)、汴洛(陇海中段)、正太、京奉(北宁)、道清、沪宁(京沪)、粤汉等线，都是借英、美、比等外债兴修。自一九〇五年至辛亥革命时，因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当时外人投资或直接经营的铁路，遂不复出现，并且赎回了粤汉、京汉等路筑路权，自筑了潮汕、新宁、京万(平绥一段)等几条短线。有人称这一时期为"收回铁路利权时期"。但自"民国"成立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时为止，铁路建筑除东三省一隅，因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呈畸形发展外，其他只有粤汉、陇海、沪杭甬等旧线略有成就，新路一条也没有修筑。从一九二八年到抗战前夜，由于英、日、美、法等国对中国资源争夺的猛烈，铁路建设又重新活跃起来。英国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地区，规定退还庚款的三分之二用于建设粤汉路，并投资于湘鄂路的整理，以及浦口轮渡、沪杭甬绍兴曹娥段、钱江大桥等建筑。法(比)国则获得成渝和陇海东西两段的承筑权，并贷款兴建同蒲路，巩固其在华北的传统利益。日本因此与法国剧烈竞争，要求建筑塘沽石

家庄线、多伦平地东线、济南彰德线、包头甘新线，同时“九一八”以后（至一九三六年止），日寇在东北修成了三千余公里的新铁路。

由上观之，我国四十多年铁路建设的历史，其实就等于一部帝国主义交通侵略史。铁路的修筑，虽然多少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列强商品的输入，原料掠夺的输出，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日寇在东三省的铁路建设，更奠定了“九一八”侵略的基础。

铁路的地理分布

我国已建铁道干支线总长，抗战前约一万六千多公里（东北铁路在内），比面积小于我国五十倍的日本，还少一万公里，与全世界铁路线最长的美国相较，只抵其二十四分之一。按全国总面积算起来，每百平方公里仅得零点一四公里的铁路；按全国人口计算，则每万人才分到零点二八九公里。比之英、美诸国，固然相差几十倍，即比之印度，也相差十数倍。（印度每百平方公里得铁道一三公里，每万人约一点七公里，总长六万公里）

我国铁路多半是辛亥以前所建筑，因此全国干线的中心，不是武汉，不是兰州，也不是南京，而是经济上关系不大，但在“民国”以前是政治中心的北平。经过北平有中国四条最大的干线：东北经渤海口入东三省的北宁铁路；西北经张家口、大同而至包头的平绥铁路；南下的第一线是经天津直达浦口的津浦铁路，由此渡江到南京接京沪铁路达中国贸易中心上海；另一线经过石家庄、郑州而达汉口的平汉铁路，由此过江到武昌，与粤汉路衔接，经长沙、衡阳而达南方的出口海广州，并接广九路，渡海至英国远东贸易港——香港。

贯通东西的干线，北部的陇海铁路，应由江苏海州（东海）经过徐州（与津浦路相交）、开封、郑州（与平汉路相交）、洛阳、潼关、西安而达甘肃，西安至兰州，至今还没有修建。南部浙赣、湘桂两路联络线，则于抗战初期通车。

此外剩下各自为政的地方铁道。例如山西的同蒲路，不在潼关与陇海路联络，反而终止于山西蒲州（永济），路轨仅宽一公尺。（其他轨道依英美标准制四呎八吋半。据闻日寇现在已将同蒲路放宽）由昆明入越的滇越铁路，与国内干线无联络，显然只是便利法帝国主义向云南作政治经济的侵略。在广东有三条小铁路：广州至三水的广三路，系入桂的预备线；由汕头至潮安的潮汕路，新宁至斗山的新宁路，后二者跟干线毫无联络。其他山东的胶济路，可当作津浦路的支线，山西的正太路，可当作平汉路的支线。

至于东北的铁路，可以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自成系统。除北宁路直入北平外，其他两条主要干线：一是帝俄兴筑的横贯吉黑两省的中东路，其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本着巩固远东和平的精神，以一万四千万日金售予日本；另一是日寇侵略的主要路线的南满铁路——由长春经沈阳直达大连，另由沈阳出安东至朝鲜京城。

由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国铁路的地理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据钱亦石著《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统计，全国铁路分布数字（一九三六年止），可列如下表：

东北铁道网	**5,320公里**
	占38.4%
辽宁	2,710公里
吉林	1,330公里
（注："九一八"后，日寇新筑的不在内）	
黑龙江	1,280公里

华北铁道网	**5,995公里**
	占42%
河北	2,330公里
河南	1,520公里
山东	1,245公里
山西	420公里
绥远	255公里
察哈尔	225公里
沿海铁道网	**1,373公里**
	占9.1%
江苏	875公里
浙江	258公里
福建	30公里
广东	210公里
内地铁道	**1,550公里**
	占10.9%
安徽	340公里
湖南	275公里
湖北	430公里
江西	40公里
云南	465公里

未完成的"五年计划"

前面说过，由于列强对中国资源争夺的猛烈，使得我国的铁路建设由停顿而繁荣起来，全长一千〇九十六公里、修筑了十余年的粤汉铁路，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全线通车后，更予国内外一大震动。铁道部自一九三六年度起曾拟定"铁路五年计划"修造各大干线。西北方面，以展筑陇海路西段，及修筑宝鸡至成都（七百五十一公里）之铁路为中心，借使西北与西南各省脉路沟通。西南方面，拟兴筑自成都至重庆的成渝路（五百二十三公里），自隆昌至贵阳的川黔路（五百公里，与成渝路衔接），自贵阳至昆明的黔

滇路（七百八十四公里），自株洲至贵阳的湘黔路（一千〇二公里），自衡阳至桂林的湘桂路（三百六十公里）。东南方面，则拟完成浙赣路自杭州至株洲（一千〇九公里），京赣路自安徽宣城至江西贵溪（四百八十八公里，连贯江南与浙赣两路），以及广梅路自广州至梅县（三百六十公里）等铁路。总计干支十余线，共长八千四百七十七公里，平均每年须筑一千六百九十五公里。其中同蒲路全线八百六十四公里已于一九三六年底通车，潼关黄河桥亦开始测量招标；京赣路抗战前仅宣城孙家埠至歙县通车；浙赣路玉山至南昌段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完成，南昌至萍乡于一九三七年初完成；沪杭甬苏州至嘉兴段七十四公里，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通车。耗资数千万、全长一千三百九十公尺、双层式的钱江大桥，抗战前已完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拟筑各线，或已进行勘测，或正筹划动工中。抗战爆发后，拟筑各路无法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大都陷于停顿。

从这一笔旧账中，可以看出当年的铁路建设，仍没有脱离列强经济侵略的控制，如其中已筑成者，大都位于东南各省。而另一方面，则缺乏国防的考虑，西北干线固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即西南各省铁道，亦未能决心迅速完成，抗战后加油赶筑，已有"临时抱佛脚"之感了。

沦陷了百分之七十

铁路是战时运输方面担负重责的工具。抗战初期，东线、西线、北线战事绵延数千里，军队运输必为铁路首要工作。据张嘉璈部长的报告，如京沪路自"八一三"事变至年底止，四个月中，开行军运列车六百二十八次，运送部队七十一万人，辎重约二万一千四百吨，每日开行军运列车，最高至二十五列。如平汉路于

抗战第一年中，开行军运列车四千〇三十九次，运送部队二百三十五万人，辎重一百三十余万吨，每日开行军运列车最高至三十列。而军队军需的输送，尤须确保各线的联络。如上海不保时，军队均退集南京浦口；追苏嘉路失陷，所有江浙一带部队，皆经浙赣路退集于津浦线；鲁南会战，大江以南部队又要过江北上；徐州沦陷，大批部队又匆忙南撤。因此，当时临近前线各路，如京沪、沪杭甬、津浦、胶济、平汉北段、陇海东段等线，均来不及拆除，而陷入敌手。方告竣工的钱江大桥，亦不得不忍痛炸成几段。幸各路机器材料多转运后方。

武汉广州退守以后，我国主要铁路干线已沦陷者约七千余公里，占全国铁路百分之七十以上。现将沦陷铁路里程表列后：

路　　别	沦陷里程	现有里程
京沪沪杭甬	507公里	
苏嘉	75	
江南	149	
淮南	225	
京赣孙歙段	150	
津浦	1,009	
胶济	395	
北宁	422	
正太	243	
平绥	812	
同蒲	643	
陇海	530	696
广九	179	
潮汕	42	
粤汉	308	737
平汉	1,070	293
南浔	129	
浙赣	79	930

（注：现有里数，并非全部通车，且有拆毁者。）

抗战后铁路修筑情形

抗战后，自应加紧修筑西南的铁道网。如果没有抗战，桂、黔、川各省同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到铁轨的踪影！西南铁路建筑的主要路线，计有湘桂、滇缅、叙昆、黔桂四线。原来计划自衡阳经桂林、南宁直达镇南关，而出越南。当时欧洲形势尚较稳定，该线实为沟通西南国际交通的理想路线。衡桂一段，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工，一九三八年十月通车，计每日筑一公里，实开我国铁路修筑的新纪元，通车时恰遇武汉撤退，对于物资后移，贡献很大。桂林至柳州一段（一百七十五公里），一九三八年八月开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通车，时值桂南战争紧急，军事上亦有相当价值。柳州至南宁，及南宁至镇南关两段，由于南宁失守，未能完成。自日寇侵入越南后，此线当然暂时陷入停顿了。

湘黔路于一九三六年即已动工，自株洲至蓝田一段，于一九三八年底通车，后因长沙吃紧，不数月又全部彻底破坏，已完成和正兴工的大小桥梁，悉数炸毁，民力资财白白浪费，实为一大憾事。

叙昆路由昆明至四川叙府（宜宾），为接通川滇、联络滇缅路的干线。全长七百三十三公里，于一九三八年底开始筹办，预计一九四一年三月完成。但因当时滇越铁路运输能力薄弱，所需材料不能如期到达，加之工人招雇发生困难，以致工程不能如期进行。滇越路阻断后，材料更难，不知何年可以修通。

滇越铁路系由昆明经楚雄、祥云、孟定直接缅边之国际路线，全线八百六十公里。筹备时期比叙昆早三个月。分东西两段修筑，土工已完成大部分。亦因工程浩大，工料缺乏，西段曾一度缓进，建筑步骤及工程标准都常有变更，预计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段通车，

未能实现。据最近消息，"政府为促进滇缅路运输效率，决积极动工修筑滇缅铁路。云南省府并发动滇西祥云等十七县民众，全力协修云。"（《解放日报》十月二十四日）

黔桂路东接湘桂路之柳州，西达贵州省会贵阳，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勘筑，利用湘黔路卸拆材料建筑。现柳州至直山一段一百六十公里，已于今春完成。同样因材料困难，湘黔旧料亦难应全线需要，短期内恐难全部完成。

成渝路亦因材料无法内运，土工虽已完成，但无法铺轨。

西北方面，咸阳至同官之陇海支线，于一九四〇年正式通车，其意义主要在利用同官之煤。按目前情形本可由同官向前延筑，但因对陕甘宁边区封锁政策，也"就此止步"了。至于陇海西段，久闻着手筹办，迄今天宝线并未见完成，甘新线几无人提及。

综观抗战以来建筑的新干线，除湘桂路完成四百公里外，其余均陷于停顿，或时兴时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材料供给困难；其次是人工问题。西南技术工人虽较缺乏，但人力短缺决非主因。实际上搞的强迫征工制度，征来工人受尽欺凌，日不得一饱，当然要影响工程进度和工人的招雇。同时还有计划不定的缺点，叙昆滇缅两路，原定用一公尺轨距，后滇缅西段，拟节款赶筑，又改用六公寸宽之军用便道，中途曾停工数月。叙昆路工程局成立两年，威宁以北路线，近闻将改经昭通。凡此种种变易，影响工程进行匪浅。

迅速完成两大国际路线

抗战至今，日寇并不能切断我国际交通，苏、英、美援华物资，仍络绎于途。但目前仅赖滇缅公路、西兰公路运输，数量自然有限。一条铁路的价值等于二十条平行公路。排除万难，赶速

完成滇缅铁路，固然是当前急务，但迅速筑成陇海路，接通苏联路线，也决不应再止于“纸上谈兵”了。

抗战前政府曾决定五年内完成陇海路，抗战迄今五载，陇海路西段工程，几近于停顿。去年交通部长张嘉璈视察西北交通后，曾在中央训练团讲演说：“西北地瘠民贫，而且因人力物力财力及地理气候的关系，交通的建设不易开始。现在西北运输上最顺便的要算潼关到宝鸡的那条铁路了，其他方面如西兰路、兰秦路、甘新路、甘青路等，再加以补修，也可以勉强对付了。因为在西北建筑铁路是赔钱的，政府现在赔不起。……”（见《西北晨钟》六、七期合刊）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今天谁也不能否认，苏联是帮助我们最多最真诚的一位朋友，西北接壤苏联，受敌人威胁最小，对我便利最大。自敌人进兵越南、窥伺西南以来，滇缅路已成其掠夺的目标，筹建西北铁路，更为刻不容缓。甘新铁路自兰州西行，沿甘新公路至迪化，沿迪塔公路至塔城，过塔城后二百公里，与苏联土西铁路相接，全长二千五百公里。虽然里程较长，工程艰巨，困难甚多，但为坚持长期抗战、目前远东局势以及整个世界动向和中国前途着想，一切困难都是应该在所不计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希望政府当局定下决心，以远大眼光，赶速完成西北铁路！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湖南地形物产概述

湖南全境地形，属于丘陵地带。除洞庭湖周围冲积平原外，其余是拔海四百公尺到一千公尺的山地。山坡多迂缓，山脊也平坦。湘桂、湘粤和湘赣毗邻的边境，蟠绕着南岭系的主干——五岭山脉：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岭分支向北，蜿蜒于全省。罗霄山向北出入于湘赣之间，为湘赣两水的分水岭；驰名全国的衡山直伸本省中部，为湘资两水的分水岭；雪峰山则自西南向东北曲折，止于洞庭湖滨，为资沅两水的分水岭；武陵山绕道黔鄂，迂回于湘西北。所以全省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倾斜。如果说湖南是西南根据地的前卫，那么五岭山脉便是保卫西南天然的屏障，重要的国防地理线了。

湘鄂赣区域对整个华中有更重要的意义。全境蜿蜒着幕阜山脉及其支脉庐山，北东西三面环绕着湖沼地。战略上北可以截断长江，威胁武汉；东进则控制南昌九江；向西可直搏岳阳，拱卫长沙。因此敌人每次进攻湘北，必迂回平江和出兵咸宁。另外一个被重视的地方便是南部的湘赣粤区域。这里的地势较前者更复杂而险峻，南北部都远离敌人的巢穴——武汉和广州，可作为联络华中华南的纽带，确保进退的自如。因此长沙大火后，湖南的省会不迁在湘西或衡阳，而移于耒阳。

以湖北比作人头，洞庭湖就正是他的大脑。洞庭湖乃长江水量的调剂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面积达一万五千方里。多年以

来，湖底泥沙日高，加之富者筑围成田，致湖面日狭，容易泛滥。春冬水浅时，更增加航行困难。所以敌人仅能止于汽艇的活动，无法全面控制。

湘、资、沅、澧四水，都流入洞庭湖。湘江与广西漓江同源，长二千五百里，入口附近汇入汨罗江，在四水中最大，便于航行。湖南又名湘省，由此可知湘江对湖南的重要。资水长一千八百里，流经邵阳、新化、益阳等地，航行较困难，有滩河之称。沅江长二千三百里，沿途要埠有洪江、辰溪、沅陵和常德，是湘西水运的主道。澧水最短，长一千一百里。湖南的交通，特别是货运，向来以航路为主。小火轮于洞庭湖中四时皆可通行；并可溯湘江至渌口（涨水时达衡阳）；溯资江至益阳；溯沅水至桃源；溯澧水至澧县。一般民船的航行都很便利，比如沿湘江可以到广西，沿沅江支流辰水直通贵州铜仁。四大水的支流，像蛛网似的布满全省七十余县。抗战以后，陆上交通线大部被破坏，更增了四河水运的重要性。

湖南公路素负盛名，旅客无颠簸之苦。但从武汉失守以后，以长沙为起点，整个湘东北、湘西北、湘中到衡山为止的公路，差不多全部被彻底破坏了。特别是滨湖十县的公路，多改为禾田、水池和丘陵。现在全省交通的中心已移至衡阳，公路自此可通广西、广东和江西三省，自从一九三九年邵阳到芷江的公路通车以后，由衡阳经邵阳与贯穿湘西的京滇国道相接，一周内便可到达贵阳。远在抗战以前，湖南公路大量采用木炭汽车，公路交通运输赖此未曾中断。

粤汉铁路是抗战以前不久才通车的，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幸它的命运太坎坷。长沙大火以后，从衡阳到长沙的筑路材料便被其他正在赶筑的铁道暂时借用了。现在衡阳与韶关

之间仍旧通车，京沪路上的蓝钢车依然健在。有人说，湘桂铁路是抗战逼出来的，这话很有道理。湘桂铁路原定计划从长沙通桂林，后来为了减除长沙的重要性，改由衡阳做起点。于一九三八年八月通车。时间仓卒，路基较差，加以衡阳到桂林是上坡，因此载重很受限制。西南国际交通线运来的物质，必须经过湘桂路才能输送到中国东部去。如果粤汉铁路被敌人打通了，那么长江以南的中国，真要被截成东西两半了。湘黔铁路原由湘潭（湘潭衔接粤汉株萍两路）穿越整个湖南中部，跨过湘、资、沅三大水，由玉屏进入贵州。一九三九年初，湘潭至蓝田（离锡矿山六十里）间已正式通车，湘江大桥也正在赶筑，但不久又全部彻底破毁了。所以目前湖南陆上交通，上半身是麻痹了，但下半身的血液仍照旧循环着。

古人没有正确的数字来统计物产的数量，留下“湖广熟，天下足”一句谚语，这虽然未免言之过甚，但由此可见湖南稻产丰富。湖南位于温带季风区域，雨量充足，土壤肥沃，多河谷盆地，容易灌溉。加之人口稠密（平均每方里四十八人），凡低矮山地，无不开为梯田，所谓“水无点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以上这些都是稻产的主要条件。据实业部一九三四年调查，湖南农田为四千六百六十四万三千九百一十二亩，其中水田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同年调查，全省常年产谷量约为一亿三千〇六十一万〇一百六十五石。产米区域主要是滨湖十县，因此洞庭湖有“米仓”之称。湖南最大米市有三，即常德、长沙和湘潭。抗战前米谷多由芦林潭和岳阳运往汉口。据一九三三年湘南谷米稽征所统计，该年全省输出米二百二十九万六千四百七十三余石，谷二万六千五百八十六余石。武汉失守后，主要销售地已改为粤桂两省，但奸商偷运至汉口者仍不在少数。现在每届秋季，便要抢运滨湖粮

食，一九三九年曾抢运米一百余万石。省政当局并规定每人仅准留谷六石，余者由政府收购，此事曾引起湖南人民怨言。

湖南茶产量为全国之冠，除滨湖地区外，全省无不产茶。主要茶区是安化（包括新化、桃源）和长沙（包括平江、浏阳等十一县）。赖此为生的茶农，全省约有数百万人。当局为了鼓励茶商营业，曾经实行贷款，统一运输，并提高品质，在安化成立“科学砖茶厂”。一九四〇年总计安化茶厂共六十一家，贷款二百〇一十三万五千元；长沙二十家，贷款三十三万九千一百元。现在全省年产约九万箱，安化区即占四万六千箱。茶砖多由西北运销苏联。

桐油是湖南的特产，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占很重要地位。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到十月底止，全省桐油出口共达二十万〇二百二十二市担。油市集中湘西，以洪江最著。湖南植桐事业近年推广很普遍，一九三九年据二十五个县的统计，共植桐二百一十四万七千六百四十八株。木材也是湖南著名的产物，尤以湘沅两水沿岸最多，松杉二项占全额十分之九。抗战后因洞庭湖封锁，产量锐减。

中国南部花岗岩层富金属矿，和华北广大煤田，是中国取之不尽的两个宝库。湖南的矿产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铅、锌、砒的产量占全国第一，锑的产量更为世界第一。由于湖南地居国内腹地，出口贸易主要靠水运，过去湘汉一段，更因秋冬水涸，运输不能直达，使矿产的输出蒙受影响。加之内地资金贫乏，经营规模不大，且用土法开采，设备简陋，实有“货弃于地”之憾。

全省现在每月产纯锑约一千二百余吨，产额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九、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七。主要产地为新化锡矿山（四十年前

产锑时误认为锡，留下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字）和整个资江流域。前者产量最多时每月达一千六百吨，近年来因表层采掘已尽，技术无法进步，产量遂一落千丈。产地重心现在已移至新化七里江等地。

我国锡产本居世界第四位，国内产地首推云南，其次广西，再次便是湖南了。全省每年产锡约万余市石，主要产地是江华和临武。最近江华、道县和宁远交界处，又发现巨大锡铅矿。常宁水口山的铅锌矿规模最宏大，蕴藏也最富，现在每月产铅砂四百五十公吨，含铅成份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含银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产锌砂三百二十公吨，含锌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六；磺砂五百公吨，含硫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湖南炼铅厂，现在每月可产纯铅二百余吨，纯银一万余两，纯锌七十余吨。

作为炼钢及电气事业重要原料的锰，在湖南也可找到丰富的产量。产地分布于湘资两流域，以湘潭、耒阳等县为主。一九四〇年底，由资源委员会购买的已达万余吨。钨的产区则多在五岭山脉和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如汝城、桂东、资兴等县。全省月产现约百余吨。

煤分为耒河煤田与湘江煤田两大部份，多无烟煤。蕴藏量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六。除供本省需用外，并有输出，现在耒阳煤田即由粤省建厅开采。铁矿零星分布很广，主要在湘、资两流域，以宁乡出产品质最好，量亦最富。湖南的金矿散布也很广。沅、资两水下游都是淘金集中区域，其他平江、浏阳等县产金量也相当可观。抗战后，省政当局与资源委员会积极开采全省金矿，均用土法，于是资水流域的农民兴起一个淘金热潮。现在全省每月产纯金八千两以上。

钨、锑、铅、锌、锰、锡等矿产都是国防工业的主要原料。

去年十二月，美国曾向我国增购六千万元的钨、锑、锡，其中绝大部分均出自湖南。近日报载中美订立矿产合同，美国需要我国大量的国防原料，湖南矿产前途更可乐观。

湖南工业仅第一纺织厂与炼铅厂规模较大，其他瓷业、造纸等均手工业。抗战后内迁工厂三百余家，湖南占百分之三十九，因篇幅关系，此地不予详述。

从地形、交通、物产各方面看来，湖南在坚持长期抗战，特别是目前保卫西南的战斗中，其地位之重要，无疑一天天在增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英国的远东前哨——香港

香港是位于我国南海西面的一个小岛，本岛面积不过三十二方哩。作为英国控制下整个战略地带的"香港"，则包括着附近的三十三个小岛和对岸的九龙半岛，从大于香港本岛的南头到九龙北部的新界，面积共达三百九十余方哩。这个英国远东主要航路的前哨，由于形势险要，且为中国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珠江三角洲的铁路与水路所经之地，因而控制了整个华南的贸易。

香港是世界第七大商港。世界商港进出口船舶数量以纽约第一，伦敦、神户、上海其次，再次就是香港。它是一个自由港，英国对华贸易以此为转运的核心。中国在抗战前，对外贸易的六分之一经过香港。我沿海各重要口岸被日寇占据后，香港更成为我国整个出入口的中心，各地工、商、金融机关都纷纷迁此营业。国内资金更视之为理想的寄居地，华商银行竟达二十七家之多，近来几乎代上海而成为外国的中心。同时由于被当作"国难"的天堂，香港人口最近激增至一百三十余万，高过抗战前将近一倍，造成平均每英亩一千八百人的人口密度。全港居民华人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商店行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为我同胞所经营。

英国在香港建有强固的海军军港，被认为是世界最良好的军港之一。港间有十方里开阔，三面围山，极为渊深，各类巨型舰皆可自由出入。香港本岛海岸蜿蜒层叠，遍布花岗断岩，四周山峰多拔海二千呎，据高临下，甚为险要。香港与对岸的九龙半岛，

相隔不及半公里，互成犄角之势。新界东北有噪林岛小港，东有吐露港，此港有极险隘的海峡，可停泊巨舰。新界东南还有喜比喜云港，地形凹入，为一天然避风港。所以就地理和战略形势观，香港与整个九龙半岛是分不开的。

华盛顿海军条约订定后，香港的设防工作曾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三五年日德签订同盟，日本在中国表现了无底的贪婪，香港才从长期睡眠状态下苏醒过来，仓卒决定一个需费五百万英镑的防御计划。这一防御计划在秘密中进行着，一九三七年春季举行了一次演习，才显出这一计划将近完成。

在这一计划之下，本岛和九龙建起了许多隐蔽坚固的炮台，配备着重炮和口径十六吋以下的钢炮。据说重炮每分钟可发重达三百磅的炮弹一枚，射程远及十五里。炮台内并设有机械室，能精算敌舰的速率、角度及炮弹射程，各炮台有地下室连接。香港悬崖深谷中，以及周围各小岛上，当然还有许多更秘密的小型炮台。

香港的船坞，不独二十五艘的驻扎舰队，就是更多更大的军舰，也可以容纳得下。港内修船厂，可修理任何巨大的军舰。新式的海军仓库和兵工厂分散各处，准备应付长期的战争。无线电台有好几座分设在极隐蔽的地点。自"新百年纪念闸"完成后，岛上的水源问题也告解决了。

香港的道路，标准甚高。近几年来，在九龙、新界和许多小岛上，建筑了蛛网似的与日常交通无关的新路，日夜有士兵守望，绝对禁止通行，很显然，这些道路是给大量机械化军队预备的。

由于岛上人口稠密，防空就成为防御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日军占有广州和海南岛以后，的确给香港以极大威胁。全岛采取"分区防空制"，防空网是最新式的听音器和高射炮相互发生机械的联系而构成的。所谓"分区防空制"，简单说来，就是把空

间划分为若干有严密规定的区域，每区通常是一平方里。都设有听音机，敌机来袭时，听音机即可决定敌机的方向、速度和高度，管辖该区的高射炮依照这种判断，可以密集发射，在天空中交织成严密的火网。

除了最新式的科学的积极防空而外，香港的防空总监还亲自往重庆考察过防空建设，计划在香港依山麓挖掘一百所防空洞，每处容纳三千人到二万人，据说已完成了一部分。此外并有义勇团的组织。义勇团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近几年来才日臻严密与扩大。义勇团团长由英国军政部派员担任，经常检阅，数量达五千人以上，装备齐全，已超过社会组织的作用了。

英国在香港的空军实力，已如在新加坡一样大大加强。新界、锦田、八乡等地的民用航空站都包括有飞机场、机库及贮油库。机场面积宏大，同时可容飞机五百架，四面为群山所抱，机场重要部分均设在山洞内。据闻尚拟建筑六座更新更大的航空站。驻扎香港的飞机虽仅有三百五十架，但质量甚优。上月十七日，更有一批加拿大军队派抵香港，据电讯所传，“纯系机械化部队，步兵以外尚有其他兵种”。香港的防御力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方中外人士均认为已大大增强。

从来研究远东军事的人，都认为香港为英国在远东的第一道防线。在太平洋上英国的三角（香港、新加坡、粤洲）形势中，香港的地位仅次于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前哨。香港与新加坡的关系，正如关岛和菲律滨一样，相互依靠，需要机动地配合。如果说海军作战决不能只依靠一个根据地，对于偏处马来半岛的新加坡，香港正是一个理想的屏障。

从战略形势看，香港固然跨于日本至越南及海南岛的交通线上，同时，离日本长崎一千〇七十六浬，离东京一千七百浬，英

国海军很可能在东海和日本海随时出现，以切断日本与台湾海峡的往来。空军也可能在日本本部上空出现。另一方面却仍存在着许多弱点。尤其自国民党消极抗战以来，日寇在华南的优势，已给予香港极大的威胁。香港与日寇占领的广州仅一苇之隔，离海南岛亦只三百五十浬，离台湾也仅三百五十浬，飞机三小时即达；反之，香港与自己的后卫新加坡却相隔一千四百四十浬，空中交通需十三小时，水路航程又需三天之久。和马尼拉虽较近，也隔六百浬，这种距离，给香港与新加坡、马尼拉的联络提出了困难的课题。加之九龙以北的深圳、宝安和河头角却已为日寇所占领，遂造成日寇陆海三面对香港的包围。

作为一个海军根据地，大体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为险要的形势，一为防守的军力，一为强大的军需后方。关于第一点，前面已有叙述；至于防守的军力，如不计质而征诸数量，英国则逊于日寇，不过对于英、加军的战斗力我们尚可寄予信心。香港所最困难的则是后方的缺乏。香港不如台湾或新加坡有丰富的资源生产供给，尤其缺乏粮食以支持在被封锁的情况下长期作战。可以作为后方的马来半岛，太遥远了；最理想的广东，却反为日寇所利用。

不过我们可以相信英国有保卫香港的决心，因此香港亦不至于全无准备以补救其缺乏后方的缺点。我留港孤军已与英、加军并肩作战，我留港一百数十万同胞正是人力的巨大源泉，我粤南前线的部队如能机动出击，攻袭敌后，自可配合英军作战。只要这些条件运用的好，香港决不如莽闯的日本军事家所说，“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而一举占领之”。虽如一般中外军事家的估计，香港孤岛不可能永远保卫住，但我们可以确信，今天香港的防御力量，定能给日寇以巨大的消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纪念抗战第十三周年

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曾是一个艰巨复杂、曲折万端的过程。这不仅由于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狡诈，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阴险毒辣，更在于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复杂。过去由于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不甚了解抗战怎样获得胜利的真相。现在大家比较清楚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明确坚定方针与切合实际的策略，则坚持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十三年前，中国人民的力量是那样弱小，环境是那样险恶，然而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排除万难，赢得今天伟大的胜利。现在美帝国主义竟来挑衅，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确实无所畏惧，我们有信心击败美帝的一切侵略行动。今天是抗日战争第十三周年，让我们重温一下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战的中心思想和方针策略，是很有意义也很有益处的。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战的中心思想呢？那就是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那就是无产阶级以自己坚定的独立自主的革命方针，团结和领导广大群众，争取中间力量，向反动势力作斗争，以克服其动摇性，逼迫其参加抗战和延迟其退出抗战的思想。这个思想和方针是如此明确一贯，紧随

抗战事业的发展，愈益充实其内容，逐渐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成为无敌的力量。这个中心思想，这个坚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保证。

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就规定了无产阶级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他说："中国反帝与反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达到目的。并且只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与彻底性的充分发扬，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与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毛主席尖锐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今天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任务的完成，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就不能有任何成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必然将引导革命趋于失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

必须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这句话在今天听来，似乎不难领会；如果回忆一下抗战初期的情况就远非如此，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人们对于抗战领导问题的认识是极其紊乱的。首先，人们只是从现象、从暂时的因素看问题。当时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力量，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领导下的力量，其对比是异常悬殊的。蒋介石拥有几百万现代装备的正规部队；掌握"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盘踞中国经济上的富裕地区；并且十几年来由于坚

决反革命而获得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能够取得国际的援助。而当时工农红军不过五万人，装备十分低劣；中央领导机关偏处西北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加之国民党利用人们的短视与成见，大肆散布共产党如何“投降”国民党的谣言，那时除了基于自己切身经验的革命群众，知道只有共产党坚决领导抗日，八路军、新四军数量虽少，而质量很高，是抗日战争最可靠的力量之外，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中上阶层人士，对于事情的真象是很不清楚的。于是许多人看不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为抗日主要依靠国民党，以为蒋介石是真正的“抗战领袖”。当时这种没有正确立场的“民族意识”，可说是弥漫了全中国。不少人士热衷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忙于向国民党献策出主意，到处为蒋介石搽脂抹粉，而不关心人民自己抗日力量的发展。有的人提出“多建议，少批评”、“绝对巩固政府威信”的口号，甚至对于国民党压制抗日群众运动的反动措施也不敢坚决反对，好象国民党就是中国，就是中华民族似的。抗战初期由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因而失去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机会的痛心教训是很多的。比如武汉失守前夜，城市中大批爱国青年，并没有被广泛动员到敌后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相反的，反而被动员到国民党机关、部队中去“帮助国民党抗战”，使他们在限制压迫下得不到报效祖国的机会，长期陷于苦闷，有的且遭致国民党的迫害。

这种抗战中的阶级投降主义，也反映到共产党的内部来。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转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的意见又正象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主义一样，疏忽了反封建这一方面，只看见资产阶级；“没有看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不主张放开乡村的革命，害怕农民革命破坏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在抗战期中，民族的投降主义是容易唤起警惕的，比较好反对的；而反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就比较困难多了。在上海、太原失守后，毛主席特别强调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毛主席说："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紧紧地掌握着这个抗战的根本方针，首先对国民党一切违反抗日方针的政策办法，不停地敲着警钟，公开地予以揭露和批评。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就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所实行的各种政策制度，"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族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主席概括国民党当时的限制镇压政策与全国人民的高涨抗日情绪为："占领茅坑不屙屎，全国人民急得肚子发胀又没有茅坑，矛盾的事情莫过于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一般人对蒋介石都抱

有程度不同的幻想；对蒋介石抗战的两面性：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长期认识不清。然而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眼中，在为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的革命人民的眼中，正好象罩在玻璃缸里的乌龟一样。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洞悉蒋介石反动集团一切阴谋诡计，在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决不为反动派、动摇分子和投降分子的叫嚣、阻挠所中止。为了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战，毛主席尖锐批判了束缚自己手脚的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有名的"先斩后奏"、"斩而不奏"的办法。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他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编者按：这是在中共推动下通过的），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件。"（《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在毛主席这个坚定不移的方针之下，自抗战开始，华北、华中敌后的人民游击战争就猛烈开展起来了，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日渐扩大并巩固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农积极性的社会改革政

策广泛实施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出现在战时日寇后方经过残酷蹂躏的土地上，中国新生的曙光从这里升起。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论联合政府》)这时的解放区已有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军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同前)

毛泽东思想对抗战、对革命所以可贵，不但是有总方向，而且有切合各个阶级和不同时地的政策，有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策略。毛主席的策略思想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科学分析。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任何时期中都精细地客观地进行这种分析，然后据以布置力量，决定对各个不同阶层的不同政策，明确规定依靠、团结、联合、争取与打击的对象。概括说来，这就是"依靠群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几句话。远在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即作了如下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

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并且预见到：“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此后汪精卫的公开投降及蒋介石集团的所作所为，在在都证实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的科学的分析与预见。

一九四〇年三月，毛主席关于这一策略思想作了更详尽的补充：“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

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我们所以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主席的有名的同顽固派作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也是此时提出的。

但是毛主席的这个英明的策略原则，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人们所了解的。比如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他们主张一切联合，而否认抗日统一战线里有左中右三派，否认我们党对于这三派的政策应有的区别。毛主席批评这些人说:“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在毛主席这一伟大的策略指导下,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全国人民的力量、进步势力才得以有极大的发展和巩固，中间势力的政治觉悟才得以逐步提高，在各个重要关头不陷于反动派布置的泥

坑，而能一步步追随人民前进。同时还应该说，蒋介石反动集团之居然拖到日本投降而未公开脱离抗战阵营，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策略的功绩。日寇投降后的解放战争中，蒋介石集团迅速走向孤立，全国人心之趋向中国共产党，这都不是偶然的事。

中华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民族，我们所背负的历史担子过于沉重，历代统治者遗留给我们的只是贫苦积弱，而我们的国内外敌人又是那样强大狂妄。充当这只大船的舵手，搏斗于惊涛骇浪，而终于驶向胜利之岸，这需要何等的魄力、远见与智慧。中华民族何等幸福，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新湖南报》社论）

蒋介石为什么参加抗战？*

（一）蒋介石是什么人？

我们讨论的蒋介石，是中国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中国的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各派从来都投靠一定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后台老板，蒋介石十多年来所代表的是以美国为靠山的这一派，正如汪精卫代表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的亲日派一样。他们之间，因为老板不同，和私利倾轧，彼此也有矛盾，如象抗战中汪精卫就跑到南京公开给日本当傀儡，而蒋介石却留在抗日阵营内。但在仇恨人民、反对共产党这点上，他们则是完全一样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会议上，总是宣布“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一直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攻。弄清了这一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抗战就很容易了。

（二）蒋介石为什么会抗战？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出卖大革命以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九一八”日本进攻东北，是他亲手给张学良下的不抵抗命令，却又混淆是非，将出卖东北的责任完全推在张学良身上。“一二八”淞沪抗战，也是他派了“中央”军去扯十九路军的后腿，迫使半途而废。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抗战又被他压制下去，连参加

* 《新湖南报》“群众生活”栏曾以“谁领导抗战”为题，发动读者参加讨论。共刊载来稿三十六篇。这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

是役的吉鸿昌将军也被他杀掉。一九三五年他又派何应钦与日本签订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颁布镇压抗日运动的“违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并疯狂屠杀镇压各地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加紧进攻当时已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一直到芦沟桥事变前夕，蒋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还在和日本大使川樾进行卖国谈判。总之，历史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一贯不抗日的；为了维持他的反共反人民统治，他已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许多卖国让步。

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只有一己私利，决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那么，难道蒋介石之参加了八年抗战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吗？不，谜底是有的。

三个原因使得蒋介石参加了抗战。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军事进攻企图独吞中国，要把英、美及其他帝国主义各有一份的半殖民地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中国。这就使得日本和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矛盾尖锐起来。蒋介石是亲英、美的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虽可向日本作许多卖国让步，但还不能完全换主投靠日本一家，就是说在日本武装进攻下，蒋介石不能公开出面给日本当汉奸。而日本又不再给予别的道路，这样就迫使蒋介石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这就是蒋介石当时念叨的:“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领导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抗日前线的黄河西岸，并已派兵东出山西。中共发布了有名的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些号召不仅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推

动了全国抗日运动，而且在蒋介石统治内部的有良心分子中也引起了反响。中共的号召和与红军作战的实际教训，感动了当时为蒋介石充当"剿共"指挥官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他们毅然发动了有名的"西安事变"，不客气地将蒋介石抓起来，实行"兵谏"。经过中共调解，蒋介石才在西安作了抗日的诺言，得以苟全回到南京。当时张、杨两将军实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这也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恨之入骨，长期予以囚禁，并已将杨虎城惨杀的原因。

第三，既然不抗日下不了场，在蒋介石还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武力遂其消灭异己、消灭中共的阴谋。利用矛盾消灭异己，这本是蒋介石藉以起家维持统治的法宝之一。蒋介石从西安事变被放回南京后，在一九三七年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还作了一条"根绝赤祸"的决议。在华北抗战和上海抗战诸役中，蒋介石确实达到了搞垮东北军，搞垮山东、河北等地方实力，及在死拚的阵地战中牺牲西南实力派川军、滇军等的阴谋目的。八路军向最艰苦的山西、河北日军后方进军，这是正中蒋介石下怀的，以为把孙悟空放进了八卦炉，不愁其不成灰烬。

以上三点正是促使蒋介石参加抗战的基本主观客观原因。明乎此，就不难了解蒋介石是好是坏，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为什么又抗战又观战，又国共合作又反共磨擦……等等似乎十分复杂难解的现象。

（三）非要蒋介石不可吗？

在讨论中有人说，共产党当时之所以联蒋抗日是因为自己力

量弱小，蒋介石的力量强大。这样说是不妥当的。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当民族敌人打进来的时候，阶级矛盾就要服从民族矛盾。共产党是在这个原则下逼蒋到联蒋、拥蒋抗日的。

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大国，阶级关系复杂而多变，革命的任务异常繁重，所以革命政党在执行每个具体革命任务时，必须尽可能团结、争取和使用最大多数的力量，去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的主要敌人，乃至尽可能使那些虽不能倾向我们的人亦保持中立，以减少阻力，减轻人民的痛苦，而加速革命的成功。联蒋拥蒋抗日自然也就是本此精神。蒋介石既有抗日的可能，那就应充分使用这个可能而克服其投降日本的可能。中共在抗战中真心诚意地对蒋介石作过许多让步和一些坚决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即在抗战结束后，当时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革命根据地、全国政治影响都较抗战之初已有百倍发展，但因为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明知蒋介石无丝毫诚意，毛主席仍然亲赴重庆，以争取与蒋介石在战后继续合作，避免内战，减轻人民痛苦。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胜利大局已定，中共也仍然再次允许和谈。以至直到现在还给隅处台湾的残余国民党力量以悔过自新之路。这些难道是单纯以力量对比的肤浅看法所能解释的么？不，绝不是，这乃是毛主席英明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和伟大胸襟气魄的表现。

"群众生活"出的题目是谁领导抗战？我建议再发动大家分别提供：（一）国民党在大后方如何抗战的？（二）共产党在敌后如何领导抗战的？这两方面的实际材料与意见，经过讨论，领导问题的结论也就容易得出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日《新湖南报》

记邯郸战役

《冀热辽日报》编者按：近日有不少读者来函询问邯郸战役详情，记者特往访曾参加该役之某负责同志，承其详述经过，特笔记于后。

邯郸战役为去年十月冀鲁豫解放区全体军民在邯郸进行的伟大自卫战争，胜利击退了当时蒋介石十万大军的进攻。战役中，高树勋将军率部一万二千人反内战光荣起义。此役对于国内和平民主运动贡献很大。现在蒋介石又大做翻案文章，不独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且疯狂布置关内进攻。值此险恶时机，将此战役略加介绍，其意义自为深远。

一、人民向敌伪进攻　蒋介石向人民进攻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解放区的人民何等兴奋！晋冀鲁豫边区的老百姓，不约而同地穿起新衣服，家家户户包饺子，象过喜事似地庆祝抗战胜利。部队简直沸腾了。为了赶赴各地受降，战士们什么东西也不带，只背着枪弹武器，不分昼夜行军，一刻也不愿意休息。他们的心念单纯而焦急：早一刻去收缴敌人的武装，就能早一刻解放那些苦难中的同胞。民兵们抢着报名要求上前方。八月天，地里的庄稼正熟，庄稼人的心却不在这上头，"让我上前方吧！让我去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各地子弟兵与人民的胜利大进军开始了。

人民的心意赤诚纯正可昭日月。蒋介石反动派却紧张地布置阴谋的棋局。日寇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的血手发下了第一道命

令：八路军驻守原地待命，不准去缴敌人的武装！接着来了第二道命令：各地日军、伪军替我维持秩序——照旧压迫人民，替我看着地盘，勿让八路军来解放老百姓。于是人民的军队赶到各城市去受降时，城头上的敌伪军已经藏起日章旗，挂起国民党的臂章，宣称他们"受命"守城。

在胜利大进军中，解放区军民虽遭到敌伪蒋三位一体的阻拦与袭扰，但是仍然收复了大量的中小城市，拔除了无数敌伪据点，控制了许多工矿区与交通线。胜利仍然是巨大的。

正在这时，蒋介石下毒手了。几路大军纷纷北开，以数十万兵力向华北各解放区挺进，企图夺取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把解放区拖回到黑暗的地狱里去。这一个巨大的内战阴谋，其中心就是沿平汉铁路进犯。从蒋介石对整个华北解放区的进攻看来，平汉路好比脊梁，是华北各战场的枢纽，津浦、同蒲两线是两只手臂而已。

国民党的第三十军、四十军、第八军、三十二军四个军的兵力，由郑州过黄河开到新乡，分布于新乡至安阳的铁路线上。八十五军分布于新乡、焦作、博爱——道清铁路沿线上。北面有胡宗南的第十六军，从风陵渡过河，经过同蒲路、正太路进入石家庄以南。以上这些是蒋介石在抗战中专心培养着打内战的中央正规军。此外，在元氏附近有内战专家侯汝墉部几千人；安阴、汤阴、淇县、汲县一带有叛国投敌的孙殿英部一个军（三个师，每师近一万人）。总计从新乡到高邑这一线上的敌伪军力共约四万人（其中永年与肥乡共有三千日军）。连同中央军兵力在十万以上。蒋介石的嫡系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为主力，沿铁路向我挺进，三十二军殿后，从新乡进入安阳。

为上述主力三个军的总预备队：道清路一线的八十五军是进

攻中的牵制方向，战役开始时，曾向我太行南部窜犯；胡宗南与侯汝墉的一部兵力则从北面经元氏占领高邑，他们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接应主力军，企图在邯郸南北会合。

二、我们处在不利的情况中

蒋介石的进攻是经过处心积虑的布置的。八路军与解放区人民正在全力进攻敌伪，所以在战事之初，我们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下。这个不利首先是兵力的分散。当蒋介石的大军已经进到新乡时，八路军还分散在山东、山西等处，进攻拒不缴械的敌寇。晋冀鲁豫的部队从春天向敌伪发动攻势以来，直到日本投降后，从未停止过战斗。士兵是很辛苦的。蒋介石的军队呢？日本投降以前，躲在后方养精蓄锐，敌人一投降，他们就有计划有准备地开来打八路军。同时，当蒋军前进时，各地的敌伪军受命配合，大肆活动。蒋日伪特务更是猖獗，到处打冷枪、造谣、写反动标语，宣传"要变天了，中央军要来了。"我们的困难重重，这种局势，不能不影响到解放区的物价突涨十倍。有些意志不坚、认识不清的人，真被这一时的混乱吓住了；也确有人发生怀疑："咱们的老家保得住吗？"

其次，蒋介石的军队不仅数量这样庞大，而[illegible]是以最新式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我们的部队呢？八年来为了抗战的需要，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的情况下，在日寇投降前后的胜利进军中才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但还只是开始。现在数十万新式装备的大军迎面压来，为了保卫人民，胜利地击溃反动派的进攻，要求我们立即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在这个紧急任务下，对于军队的组织机构与作战指挥，对于后方的供应工作，都提出崭新的课题。所有这些工作，对我们来说，尚是陌生的，或缺乏经验的，客观

情势要求我们迅速而且完善地做好这些工作。

三、组织起来 天下无敌

情况就是这样。战争就要开始。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党委领导全体军民，着手进行一切紧急工作。

第一步是在部队与人民中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使全体军民一致认识到蒋介石这次进攻的野心，如果不坚决打退，过去的将来的一切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都要毁灭。这一次反内战的胜负，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生死问题，也关系到全国人民在今后历史时期的地位问题。“用坚决的斗争，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用斗争的胜利支援重庆谈判!”（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进行谈判）这些战斗口号立即为全体军民所接受。“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个口号涵义很深，这是每个人切身的事情：民主政权，人民自己选举，人人能够说话，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如果蒋介石打进来，就要重新回到黑暗专制的日子。如果没有人民的军队，人民只有任人宰割，变成无力的羔羊。经过艰巨的减租斗争，贫苦农民才真正翻了身，得到些土地。如果蒋介石打进来，这些果实都要被剥夺。如果没有解放区，抗属有谁管？……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的胜利果实。那一件都是拚了命流了血才得到的。那一件都是从古未有，值得舍身忘命去保卫的。如果让反动派打进来，这一切都要完了。这个道理在广大军民中弄清楚了以后，每个人都变成了万夫莫当的勇士！拚命呀，不打垮反动派，就会失掉自己的一切。

有了坚定明确的领导方针，共产党掌着舵；这个方针又为群众所深刻认识与衷心拥护，再加上细密的组织工作，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能打败任何敌人。如上所

述，晋冀鲁豫的全体人民和军队都有了“坚决斗争，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信心与决心之后，各种工作就迅速展开了。

由长期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转到大规模的运动战，在干部与群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障碍的。必须解决分散和集中的矛盾，作广泛的思想动员，明确提出：游击战要服从运动战，在牵制方向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但在决定方向却必须进行正规战。这样才能很快将部队集中起来。地方武装全部统一，局部服从全体，没有全体那有局部。中心地区每县只留下一个排，区队也编入正规军，开赴前线。热烈广泛的参军运动发动了成千成万的人民涌入军队，奔赴前线，补充后防。参战的民兵在五万人以上。第一个大问题解决了：建立了主力兵团，划分了地方军；主力方向与牵制方向的任务也各各确定了。在部队中加强纪律教育，强调大兵团作战所要求的统一作战，集中指挥，协同动作，克服游击战争中“见机行事”的习惯。

有了足够数量与组织完善的作战部队，就需要同样的供应与供给工作。反动派进行内战用的是美国租借物资，而我们为了自卫，只有自力更生依靠人民。于是各地区的军火生产全部被统一起来；连区的民兵的军火合作社也组织起来，大家只有生产军火的任务，没有支配产品的权利，一枪一弹都要交由最高的指挥机构调度。许多新解放城镇的工人，也以火样的热情参加了这一工作，大家日以继夜地赶工，保证前方能有足够的武器与军火。

四、人民战争　最后胜利

从十月十八日蒋军开始进攻，到十一月三日全线胜利结束战斗为止，历时半月。十月十四日，蒋军从新乡出发，五天行抵安阳。十八日渡过安阳河。主力四十军为右翼，在安阳东北距铁路

三十里向北挺进。高树勋将军的新八军与之平行前进。这时，蒋军来势汹汹，我军处于被动，兵力都分散在各地，只能凭着少数部队的坚决勇敢来阻滞敌人的前进，争取时间。我们一个旅守御三十五里长的正面前线，抵抗住敌人三天三夜的猛攻，没有失掉一个村庄，反给敌人二千多名伤亡，使敌人精疲力竭。就凭着这样的部队，使敌人的推进速度由第一天的六十里，而第二天则为三十里……第五天就只能前进五里了。

十月二十五日，我们各地的主力赶到了。从二十五日到三十日，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第四日，高树勋将军率领新八军所部在火线上举行反内战的光荣起义。三十日晚，我军开始总攻。激战一昼夜，于三十一日先后将四十军与三十军击败。十一月三日拂晓，全线结束战斗，激战十五日夜的人民自卫战争终获胜利。

这十五天当中，晋冀鲁豫全体军民的紧张工作，不是笔墨所能描写的。十五个日夜前线后方都是日以继夜，没有休息。战斗的后几天，战士们已经吃不下饭，只能进些汤水梨果。许多人的眼睛因为过度疲乏而发炎。十五个日夜，大家心中只有一个意念：拚！果然，这一切辛劳与牺牲没有白付，总计这次战役，战果如下：进攻蒋军除高树勋将军所部一万二千人举行起义外，尚有放下武器之高级军官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等多人。俘虏蒋军近三万人，杀伤更多。并缴获大批美国武器如下：火箭炮三十四门，山炮八门，步兵炮十四门，迫击炮及战车防御炮三十四门，高射机枪及重机枪二百二十挺，轻机枪一千一百九十一挺，手提机枪三百〇二挺，步枪九千二百四十八支，及其他军用品甚多。至于对国内和平民主事业的影响，更是既深且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冀热辽日报》）

胡论"学生运动"

我们很幸运，又读到了胡适先生的"再论学生运动"："关于北平两次学生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十六日的示威游行，军警当局事先不知道学生游行的路线与目的地，——其实，据参加的一些学生自己的谈话，他们自己也很少知道游行的目的地和路线的！——军警在那天上午的手忙脚乱是可以原谅的。凡大规模的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民国二十二年看见纽约市的'兰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都没有丝毫纷扰。凡事先没有此种接洽，或军警与游行者有点互相猜疑，都不免有纷扰的结果。"

我很怀疑胡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感觉心与言矛盾的难过？现在的北平能不能同德谟克拉西的纽约市相比，这要请留学过美国的胡先生自己回答。北平"英勇"的军警，将警章帽子撤去了的军警，受了宋哲元的二元赏钱，吃了日本饭，"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能不能如纽约市的大示威游行一样的功德圆满，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我想胡先生也不能担保回答。至于说"据参加的一些学生自己的谈话，他们自己也很少知道游行的目的地和路线的！"不知道胡先生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怀疑学生的动

机？将这两次运动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如真是这样，那末，“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事实明显地摆着：学生出校门被杀、被打、被水龙冲；走到街口也是一样；沿途又是砍杀；整日被关在城外；天空整日吹荡的只是枪声、杀声、哭声、怒吼声；黑夜还熄灭电灯，抽出大刀拚命杀，拚命砍，……这种情况之下，难道还能怪学生自己也不知道游行的目的地和路线？我们再进一层想，这种真正“民意的要求”，难道北平的学生会要“友邦”来间接“御造”？

关于北平学生运动，胡先生引用北平各大学校长的话：“但此等群众行动，有抗议的功用，而不是实际救国的方法。”请问：“五四”和“五卅”的光荣的民族解放斗争，其效果在历史上难道仅止于“抗议”？这一次比“五四”、“五卅”意义更伟大、情景更悲壮的空前的北平学生运动，被人轻描淡写地归并于这样的两句话，我们全国青年只有同声一哭了！我只问思想家的胡先生怎样去见那些参与过这次运动的学生，那些受监狱之苦的，手臂鼻子没有了的，头破了的，成了残疾的青年！呵，还有那些已经死了的！

胡先生始终只承认一种有“抗议作用”的学生运动，我想这不过是胡先生自己理想的“学生运动”。一个看惯了美国民主政治国家的群众运动的人，总觉得只要有“抗议”的表示，就可以收到督促政府的功效。如果对“中国的”学生运动仍持这样看法，这样批判，那么所谓学生运动，就只是一种粉饰门面的工作了。

谁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华北问题，华北问题不过是学生运动的导火线。中国学生在过去几年似表现“变态”的沉寂中，对于国家大事很少过问，这只是政治势力压抑得不能动弹，滥用权力的当局种种压迫所致，同时许多由于学生又误信了政府“自有办法”，幻想着政府在作积极的“准备”，以为报

国有日了。可是这几年中铁的事实粉碎了我们的美梦！我们不能再受骗！我们不能再"埋头"！我们不能再躲在"象牙之塔"里了！

当东北沦陷的时候，全国学生也曾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可是经过了四年，四年中制造出来的是一条自投罗网——走向东京的死路！整个民族的灭亡就在眉睫。所以这一次的全国一致的学生运动是与以前不一样的，我们看清楚了事实，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我们不再为花言巧语所动。

胡先生的意思还是要我们回到课堂里去，拿起书本来培养自己的知识与才能，以供国家的需要。这当然是"爱护"青年的人的衷心之语。但是今天失一地，明天丢一省；今天这里"自治"，明天那里"进犯"；"友邦"的军队横冲直撞，"友邦"的军用飞机轧轧头上；卖国贼得到实际的保障，爱国的青年却遭受无理的摧残。这样实在的客观环境，要我们怎样来"安心读书"？并且华北当局一再公然宣言要修改教科书，眼看华北的青年马上便要受奴隶教育了。这种现象将随着侵略者的魔手而普及各地。所以现在的罢课问题，不独是北平一隅，而是全国青年的问题了。

我们的罢课有两种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是督促政府，马上对敌宣战；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救国的决心的表示。我们相信政府不是一声"抗议"、一回"请愿"就可以觉悟的。过去的事实已经使我们太失望了。敌人的侵略不是坐在课堂里读几句死书可以抵御的，我们决不愿在课堂里坐待国家灭亡。在民族这样危险万状的时候，知识必须同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在实际行动和实践中才有真知识可以求得。过去的教育绝对不能收到救亡的实效，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知识与经验绝对不能担当起即将来到的非常时期中青年的工作。罢课是我们不得已的举动，我们不

得不忍痛暂时抛下这些课堂里的书本，来做实际的救亡工作，我们不能再作“顺民”了。

胡先生是口口声声“爱护青年人”的，并且说过“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的话，我们现在诚恳地希望胡先生不要再唱“埋头读书”的高调，这些话无论怎样好听终于成了废话。现在我们要想知道的是与民族解放斗争实际联系的知识，救亡工作实践的方法。

一月六日灯下

（此文署名“可畏”，同下一篇“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都是当年担任武大学生救国会宣传股长时写的。刊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会刊《救中国》第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出版。）

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

今天看见诸位在这里集会，我们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同时又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在北平，现在十人、二十人的集会自由都没有了，军警可以随时冲进学校乱砍乱打一阵。

现在要报告的，是这次“一二九”与“一二一六”两次请愿、游行大示威的经过详情。诸位在南方的报纸上当然看不到实在的真象，就是在北平没有参加过这次运动的人也无从知道；平津的报纸一字都不敢提，教育栏的空白与临时插进的广告，实在令人痛心。

半年来，我们北平的学生时刻在惊心、愤慨之中生活着。尤其是最近两月，华北自治越闹越真。日本的战斗机一列九架在我们学校顶上飞过，周围郊野演习的炮声更不绝于耳，有时教授的讲书声都听不清楚。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有很多教授对我们说：明天将要换国旗了。各位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们怎样来安心读书？北平的学生从报上见到宋哲元去电中央，说华北自治是民意要求（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这些卖国贼的假面具完全揭破了。我们爱国的热情已到最高潮，热血完全沸腾，再也压不下去了。十二月八日，我们接到学联的通告，说十二月九日举行一次请愿，向何应钦请愿。这时的学联尚只有二十多校参加。现在分两部分叙述，先说城外。

城外有燕京、清华两校，共一千二百人。六点出发，天还没

有亮。由于头天晚上学校的汽车都被反动警察当局扣留了，队伍只好步行向西直门前进。西直门离我们的学校有二十里路。沿途曾几次遭到军警的拦阻，也挨过皮带、木棍的抽打。开路的一位同学，军警将四枝手枪抵住他的胸口，然而他将两手一分，队伍仍然向前行进了。大概郊外的军警，这时尚未奉到枪杀我们的命令。走到西直门，城门关上了。这时大家都非常悲愤：我们还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进不了中国城？警察用欺骗的言语，想诱散群众；然而语气之间，有的人似乎也还没有完全泯没良心。我们狂呼，怒吼，高喊口号，派人交涉，但一切都无效。可是待会儿，日本的军用汽车出城，城门却大开了。北平还是中国人的北平，可是北平城只能让日本人自由出进了！于是我们的队伍只好停下来，向市民宣传，在冷风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做煤球的，听见我们演说亡国的惨痛，被感动得流出泪来。有些军警也向我们哭着说，不是家里还有老母儿女等着吃饭，他们也愿意丢了枪杆和我们一道来干。这时有人提议到阜城门去，于是我们忍着饥饿、干渴、寒冷与疲乏，又走到阜城门。阜城门也关上了。"前进"是我们唯一的口号，我们的热血是永远沸腾着的。于是大家又走十多里到了西便门，西便门也关上了。喝着冷风，忍住饥寒，走了几十里路。我们的眼睛通红，欲哭无泪。等到五点钟，只好望着灰暗的天空，走回学校。这天我们虽然没有进得城，但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责任与努力。

现在再说城内的情形。先由东北大学说起。东北大学几百上千同学首先出动，走到西四牌楼，遇到军警的拦阻，大刀与枪托更飞舞起来。走在前面的女生，有二十多人即刻被打昏，受伤的很多，并被捕去十余人。然而队伍仍然冲了出来。走到西单牌楼，与平大法商学院及几个中学会合。法商三院大门已被军警由外面

上了锁，同学们都从墙上跳出。这时已集合成一千多人的队伍，声势浩大，便直往新华门（居仁堂在内）而来。其余西城的中国学院几十个同学冲出了校门，约会尚在纪念周的女附中同学，一块儿大呼口号冲了出来。师大的同学也到了新华门。东城方面，由女一中领导。北平这次学生运动，女一中同学最勇敢，牺牲也最大。由她们领头，陆续有很多的中学参加。可是有很多学校已被封锁，譬如汇文中学，前后门都被校警关闭，并有日兵汽车一辆停在门口。这时的新华门，已经拥挤着三千多人。像午炮声的口号，接连地响了。几年来积在心里的苦闷，平时轻言都不敢的话句，现在如雷鸣般在天空激荡了。口号不断高呼着，寒冷的空气也被震动得生发热量。要求何应钦亲自出来的口号，不断从群众中呼喊着，但是所得的答复，是"何部长已赴小汤山"。是的，报纸上也这样刊载，说是何应钦已去小汤山。但是后来，一位记者告诉我们，这是日本军部投的稿，有意放烟幕，而中国报则不敢不登。这时各学校的代表在墙角头开会。最后由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派了一个秘书作为何应钦的"代表"出来答复。答复是非常圆滑的。初听去似乎很入耳，什么"决不签订卖国条约，决不割让寸土啦"，空空洞洞。当然群众认为答复不满意。这时交通队已老早传来清华、燕京被阻西直门外的消息，于是"停止交涉"、"开放西直门"、"释放被捕同学"的呼声震天动地。三千多人同声喊出："到西直门去！""接应清华燕京同学！"于是群众都往西单的方向蠕动了。各校代表聚头后，临时决议游行示威。路过国民党军分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朝着大门，口号喊得特别响亮。游行队伍秩序非常的好，虽然天气是那么奇冷，几百个中学的女生始终随着大队。当我们走到西单牌楼宋哲元卫戍司令部附近，八、九十个警察和一队大刀队，便来阻挡了。他们拔出手枪和刺刀来，喝令解散！

一时大家都很紧张。东北大学的学生领头去抱住警察，劝他们加入示威游行，他们喊着："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祖国，也是你们的，来，大家一起挽救!"但是警察只说："干吗，你们运动能成什么事?"终于警察实行武力干涉。有的学生被大刀背打伤了。一部分带领大队的同学被打到小胡同里去，并且被捕了去。但大队仍行进着，而且迅速地又集合在一块。这时有许多中国记者随着游行大队走，有的还领导学生呼口号；十几个外国记者也随着游行队伍，并且替学生分发传单。商人和工人，市民和缠脚的老太婆，都争着要看。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喜的微笑，他们不时拍手鼓励欢呼。还有很多人力车夫和市民也尾随着游行大队。游行大队向西直门前进，想要求开门让清华、燕京学生进城来。可是待会儿交通队回来的报告是："西直门禁止通行"；"军警们都是武装招待"；"还有不少日本军等着，架好了机关枪，冲过去难免要起冲突。"大家知道去了也是无法开城门的，领队人便决定改道去唤起各大中学更多的学生来参加游行。

当大队来到辅仁大学，"欢迎辅大同学！欢迎辅大同学!"的呼声震动天空，尤其是从那些年岁小的女同学口中发出，使人们发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十分钟内，二百多辅仁同学便出来加入了。大队接着到好几个中学去，又得了几百生力军。北京大学到了，脚步走的特别慢，掌声、欢呼声同时起来："恢复北大过去的光荣!""恢复北大'五四'的精神!"这是多么动人的口号!好些女同学落泪了；尤其是东北同学，每人都含着眼泪。临时用纸糊的旗子举了出来。北大参加后更增加了大家的勇气。路过西河沿北大三院时，一位同学高举一个破鞋盒盖，上面写着"北大"，他一面喊着"三院全体参加"，一面往院内号召。这时全城都知道了消息，生力军从各方来响应示威运动。

这时候人数已超过了五千。口号不断地呼着，但是声音多是嘶哑的，还听到女同学的哭声。呼口号时，每个人高挥着拳头，有的还跳离地面。到王府井大街时，大群警察又拼命地来冲大队，但都无效。到中原公司那儿，几十个警察骑着马，摆成一队横站在大街上，企图阻止游行，但大队一齐冲上去，继续前进。王府井南口快到了，这儿是五四运动发生过流血的地点，再过长安街对面，就是东交民巷，日本军营。这时军警们惯用的武器——头号水龙——也运来了，一排四架。北平的冬天是多么冷，今年冬天又特别冷，水冲到身上马上结冰，射在肉上如同刀刺。（后来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待学生代表谈话，竟混账地说，那天学生热情太高了，所以要用冷水来浇浇）高速的水枪向我们队伍横扫过来，但我们的热情却给冷水浇得更加沸腾。为首的同学就在刺骨的水龙扫射中冲向前去。同时大刀、枪刺、木棒、皮带，一齐向走在前面的队伍挥砍过来。其中有很多穿中国大褂的日本浪人在指挥。群众被冲散了，勇敢的同学就冲上去抵抗，队伍当然紊乱了。同学被捕的也有，被打倒的也有，被打伤的也有。有几个已经走得很累的女同学跌倒在地上了，警察们的皮带还往下乱抽，有人颈子里脸上都流着血。街旁的市民看得太惨痛，便跑上去拦阻，可是市民也被一顿打开了。有两个受伤极重的女同学，一位是师大的，一位是女一中的。这位女一中的同学被刺刀穿胸而过，第二天便死在协和医院。一二九当天的示威游行便这样被冲散了。走在后面的人都被枪口包围起来，又捕去了好多人。大队回到北大三院，便议决全体罢课。

第二天，十二月十日很多学校被军警包围起来，清华、燕京各有三百多军警包围。城内的学校还没有救国会组织的，便马上成立起来。譬如弘达学院，学生于十二月九日晚间十二时开大会，

第二天一位同学爬墙出来，到燕京请人去指导。几天之内，北平七十多个大中学学生救国会，全成立了。同时全市大中学的学联也严密地组织好了。于是学联会决议，有再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必要，日期决定十二月十六日。事先极秘密，都是先晚发出的通知。现在仍分城外和城内二部分叙述。

清华、燕京两校学生一千多人，仍是六点出发。先晚教授们个别找我们代表谈话，话还没有说，便相对痛哭了！他们也知道我们这一次去必有更大的流血。我们每人穿衣很少，身体强壮的走前面开路，每人都抱着牺牲的决心。走到西直门，城门关上了，城上的大刀队望着我们狞笑。随后就沿途邀约了第一次未参加的外城的平大农学院、弘达第三院和孔德学校。走到阜城门，城门也关上了。再走到西便门，城门也照样关上了。这时同学们的愤怒真象要爆发的火山一样，我们忘掉了一切，我们要的是"进城"，决心用我们的勇气与热血击破这一座古城。我们开始冲城了。北平是中国故都，城墙是多么高，城门是多么厚，门闩又是多么粗，还有巨大的铁锁。可是我们以血与肉来冲锋了，大家都疯狂了。我们向那高大的城门冲去、挤去，很多女同学也参加了。站在城头上的军警将大块的砖推下来，我们也不管，我们流着泪，出着汗，拼命冲！冲！旁边的助威呐喊，有很多人都放声号哭了。这并不是因悲恸而流出的泪，这是激昂愤慨、热血沸腾到最高点的表现。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天地，动鬼神。真的，这一幕太悲壮了，简直无法形容出来。大家就这样拼命冲，有人跌倒，被踩踏着，可是也不管。同学们肉挤肉，眼睛是红的，脸是铁青的，这样继续了四、五十分钟，西便门终于为我们冲开了。城内还有很多军警。我们高兴得跳起来，我们四人一排，大步前进，向天桥前进。学联会的决议是各校都在天桥集合。当我们走到师大文学

院时，一个胡同内冲出很多警察，用木棍、皮带来抽打我们，可是他们人很少，反被我们赶走了。走到师大时，军警已将师大同学包围，我们这一大队冲上去，将师大的同学接出来，一道往天桥去。

现在再说城内的情形，还是从东北大学说起。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十五日晚上，清华、燕京两校有一百几十人组织先锋队，先进城住在东北大学。十六日早，清华、燕京的旗子也在东北大学的大门前面出现了。全体走到西四牌楼，前面有大批军警排队等候着，还有一辆军用汽车直开过来，想冲散我们的队伍。学联领导早就料到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付我们的方法，事先作了准备：如遇马车或汽车冲来时，赶快向两边分散。因此汽车来回冲几次，终无效果。后来派人去交涉的结果，说如果是分开三五成群地走，只要不是大队便可通行。我们的原则是避免冲突，所以便答应了。在大队未分散以前，军警并未行动；可是一等我们分散，他们便吹着冲锋号，杀！杀！横冲过来了，大刀（背）、枪刺乱砍一顿，当场受伤的四十多人。他们把学生赶到胡同里，两边口子给堵上，你跑到这边，喝一声那头去；跑到那边，也喝一声那头去，这样，同学们就被堵在小胡同里遭受毒打！有一位燕京的女同学被两个大刀队打得实在了不得，便叫道："我们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你们也是中国人，你们干吗要来打我？"那个大刀队竟然凶狠地回答说："你不用说啦，我们现在吃的是日本饭！"虽然经过这样惨痛的殴打，大队仍然集合了拢来。弘达学院四百多名同学冲出校门，将到师大时，便被大刀队的大刀（刀口向外）一阵乱砍，当时被砍伤了五十多人；后来据弘达的代表说，这五十多人当夜并未回校回家，已经失踪了。东城由北大领导。这次北大的同学特别勇敢，军警对他们的防范也特别严密。西斋的同学整

队出大门，便被几十个军警包围，将旗子撕去，并捕去几位同学。幸而东斋同学的队伍到了，大家便一起拥出西斋，向三院前进，去汇合三院的同学。当队伍走到街头，前面有一架水龙正预备喷射，有几个同学奋勇跑上前去，把水机压住，队伍得以通过。随即去汇合中法大学和几个中学，每到一个街口，都有一群警察挡在前面，因而便有冲突，但也有因开导而受感动的。当队伍将到南长街时，北区的学校，都陆续到齐了。到南长街口，又遇到更大的阻碍了，拱门下一大群巡警用水龙扫射，并以盒子炮、大刀对着。这时便有一部分勇敢的同学飞跑上去抢水龙，一部分同学趁此冲出了街口。那些抢水龙的同学，多数被军警击倒在地上，有的挨皮鞭抽，有的被大刀（背）砍，有的同学手被砍断，有的鼻子被砍掉，血冻成了红色的冰。当时的情景，惨不忍睹。然而大队已经如海潮一般冲过拱门，悲壮的口号声上冲云霄。

队伍向西长安街前进，到西单牌楼，又有一大群武装军警在严阵以待了。他们走过来，将我们的旗子撕毁，同时抽出白光闪闪的大刀来，冲进大队乱砍乱打，前面的同学登时被砍伤了，群众只好向后退让，他们却分两伙向后面追来，并大呼开枪。有的女同学被打倒在地；有的军警抓着女同学的头发打，将半边头发割去，问她再闹不闹？还有几个军警抓住了一个同学毒打……。虽然沿途遭受挫折，一大部分北大和中学的同学依旧整队到了天桥。

其他学校的同学一出校门，也都遇着冲突。如辅仁大学同学经过两次水龙和大刀、木棍；汇文中学同学一冲出校门便被刺刀乱刺，枪托乱打，登时受伤的有二十余人；慕真女校的同学被铁门锁着，不能出来，许多人爬在高墙上、窗户上，看见外面这种情形，都放声号哭；女一中的同学，因为第一次太勇敢了，校长被

撤职，换了一个汉奸，拼命压制，十六日早上还被军警强迫上课。清华两个代表跑去告诉她们，要她们赶快参加，于是学生都往礼堂集中，全体教员和军警也跑进礼堂，将台上的主席一棒打昏了，一阵乱打起来。女一中那一天跑出来的同学不多。总之，那天北平城内只听见军警的水龙声，枪声，喊打喊杀声，学生的哭声和怒叫声。每个学校校门及附近街道，都成了惨杀的纪念地了。这种悲壮的情况，无法一一详叙。

十点以后，先后零零散散偷到天桥的学生已有一万多。待会儿，清华、燕京、师大也来了，很多中学也陆续来到。各校到齐以后，大会主席跳上一辆停驶电车，宣布市民大会开始，征求各校同学的意见。当时决定进前门，经东单一带到外交部大楼（这便是所谓“冀察政委会”的会址，当天宋哲元等宣布成立这个组织）去游行示威。清华、燕京走在队伍最前面，最前面的九人一排，后面的四人一排，都是臂挽着臂，游行队伍几里长，声势愈大愈雄伟了。大家慷慨激昂，口号声壮烈万分，两旁群众夹道，为我们呐喊。跟着队伍的市民群众更不计其数。我们兴奋，我们痛快，我们雄视一切，我们忘掉了身上挨过打的疼痛，我们藐视眼前可能遭到的更大的屠杀，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可爱的中华，我们相信华北仍旧是中国人的。

队伍快到前门时，前面的人开始跑步。那时前门与东西两车站已布满了军警，黑压压的一片，采取包围形势。前面队伍已受到“绝不准入城”的阻止，数度和平开导与交涉都无效果，只有冲锋和肉搏了。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肉和血，军警起始是水龙，水龙不足用，继之以木棒、皮鞭、刺刀、大刀，于是大流血开始了；还不足用，第一排枪声响了！那时我们在前面，看得很清楚，军警都将帽子领章撤了，有的穿短褂，有的穿小棉袄，指挥的是日本

人和二十九军的军官，很多中国的警官对一个日本小胡子敬礼，这个小胡子用手指挥，这里去几个人，那里去几个人，怎样砍杀，怎样毒打。我们从城门洞望进去，黑制服挤得如同一群乌鸦。当时他们的枪是对着城门打的，子弹打着砖头落在我们头上，有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去。站在前面的人看得很清楚，不为所动，后面的群众便乱了。然而大队又即刻齐队前进。可是第二排、第三排枪声继续传出，大刀队、警队汽车压过来，机关枪也排列得更多了。这时有四、五十个外国记者跑上前去，抓住开枪的中国军警说："你们是中国人，干吗要打中国人？"

群众散开了的，马上便被交通队集合了拢来。这时学联代表立即开会。鉴于把守前门的军警太多，又听见军警宣告，前门内、东交民巷有无数的日本机关枪架着，是预备扫射的，外交大楼有二十九军一个旅把守着。于是决议回到天桥去开市民大会，可是又被军警阻止，不让队伍回到天桥去。于是又改变原议，即在西车站前广坪召开市民大会。当时决议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日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等六项要求。这时，大队自然不能继续停留在这里。经过双方商谈的结果，军警允许我们从宣武门进城，并由巡警跟随。于是队伍便向宣武门的路线走去。可是队伍刚一开动，几队军警便拦腰冲锋过来，将大队截为两段，将我们分散开来。北大、中国大学和很多中学的队伍被阻住，不准跟去，只允许进前门，坚持很久，終被押入前门，两旁军警紧紧跟着。刚进入城门，被一顿乱打分头赶散了。可是仍有一千多人跑进城，向宣武门走去。这时已是下午四点，宣武门紧闭着，门内布满军警。听得外面叫口号的声音，城门里面的人也叫口号，但无法联合在一起。大概坚持了半个钟头，后面又来了几十个军警和一架水龙，一千多人两头受包

围；他们过来先抢旗子，继之以毒打，这次被打的人特别多，有几位女同学受伤很重，鲜血直流，背上衣服也被大刀砍破。

再说那一部分到宣武门外的，途中又小冲突几次。抵达宣武门，始知又被骗了，城门关了。大队怒吼起来，军警置之不理，无从交涉。诸位，请想想当时的情景，大家整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所受的是寒冷、北风、大刀、枪刺。除清华、燕京、师大以外，所有的学生都在城内，相互间通声气的只能藉许多外国记者在城头上的报告。有一位清华的女同学从城门下的缝口匍匐穿过，被军警看见，用枪托重击她的脸，她还是奋勇爬过，刚刚开起铁闩，便被军警拖住毒打了一顿，被捕了去。这时天也快黑了，城上的军警宣布，天黑了他们将不负安全的责任。

这时许多小学生和市民慰劳团一个个背了成包的热馒头，提着开水，来慰劳我们。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小商贩提着篮子慷慨地叫着："大伙随意吃！"他们的话语与表情，使我们感动得说不出话，热泪满眶。有人高呼着："中国人心不死！""中国不会亡！"

经过很久的交涉，清华被捕的女同学放回了。军警宣布只要清华、燕京两校由西便门出城，他们便开门让城内的学生进城去。这时天已全黑，城内的学校代表决议，也劝我们回去。为顾全大家，我们只好忍着泪走出西便门。谁知道清华、燕京一走，大屠杀便开始了。

清华、燕京走后，城门依旧不开，内城的同学不能进城去，外城的同学不愿离开，在这样的情况下，师大的同学欢迎各校同学都往师大去。于是仍旧四人一排，高呼口号，在黑暗中前进。刚刚走到骡马市大街前端，忽然几十个军警冲出，又是枪刺，又是大刀。这时已近九点，赤手空拳的学生在漆黑的狭隘的街道上受着砍打，前仆后倒，秩序当然大乱。后面的队伍又被军警哄到

前门去，说由前门可以进城。可是将到大栅栏时，南城的电灯全熄灭了，这时二十九路军的大刀队全体出动。

宋哲元在喜峰口抗日时，清华曾送他们大刀一千把。现在他们却用来对付爱国的学生了。大刀队将两头胡同口堵住，用刀背乱砍起来。有几十人冲进一个人家的大院，也被大刀队拖出来，一个个砍打。同学们疲倦得站立不起来，无法抵抗。统共被捕二三十人，受伤近四百人，失踪几十人。

第二天，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多个大刀队无缘无故冲进师大，又砍伤了五十多人。女一中军警强迫上课，学生到教室里，教员在上面哭，学生在下面哭。

东北大学学生吃饭、穿衣都由政府管，所以更是受气。军警对他们也特别残酷，时常跑进学校去捣乱。诸位，这就是现在的北平！我们学校的电话都被切断了。

燕京的校长将一个燕京的同学从监狱保出来。那个同学对我们说："监狱的苦可没关系，最痛心的是早晨听见打铃，问狱官干什么？他回答说：干部人员训练日语班上课。"我们到协和医院去慰劳受伤的同学，有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对我说："我被一个大刀队追着，腿上砍了一刀，我跑进一个人的家里，主人为我裹好腿，送我上医院。一出门那个大刀队便在门口大叫：'嘿，你出来了！'又用刀背对我乱砍。"一位燕京的女同学脸被砍开，一件绒线衣全被血渍了，她愤怒地告诉我："他们不是打人，他们是打一块木头，他们口口声声，妈的，什么中国不中国。"受伤的同学，有的被砍了鼻子，有的被砍断了手，有的肩被砍开了，……。我们这些没受伤的，真是太难过了，望着他（她）们，眼泪止不住。最后去看一位女二中的同学，只有十六岁，她的背上被大刀砍有五寸长三寸深的刀口，头部也有伤，情势危险，我问她怎样了，她眼睛

朦朦地张开，望着我们说："我怕不行了，希望全国学生联合起来！"

诸位，武汉是华中的重心，北平学生向你们呼吁；希望你们将中国学生运动、全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肩挑起来！

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北平学生代表刘毓珩、陈其五（清华大学）和朱南华（燕京大学）来到武汉，向各校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的详情。此文即报告的记录。文前按语说："编者曾陪他们往三镇各校，听的次数不下五、六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窑洞杂述
作者=李锐
页数=309
SS号=10381155
出版日期=